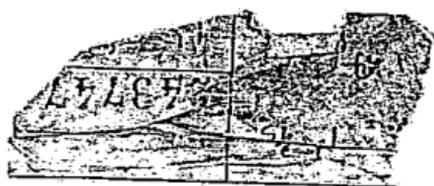


鄧爾回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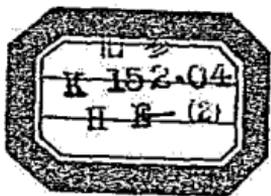
K 107-04



南 京 中 央 日 報 編 譯



00-0241



赫爾回憶錄

南京中央日報編譯



赫爾回憶錄目次

文字部份

胡適序	一
第一章 羅斯福的諍友	一
第二章 白宮與國務院之間	六
第三章 做事與對人	一一
第四章 倫敦會議霧中開	一六
第五章 一件不痛快的遭遇	二一
第六章 努力互惠關稅二十六年	二六
第七章 不干涉主義的示範	三一
第八章 商務計劃的最大威脅	三六
第九章 調查軍火生產的失敗	四五
第一〇章 孤立主義與風作浪	五〇
第十一章 美國開始發覺了	五五
第十二章 一個流產了的和平大會	六〇
第十三章 慕尼黑會議前後	六五



第四章	戰火中找不到和平	六七
第五章	孤立派鼓勵了希特勒	七二
第六章	美蘇間的齟齬	七七
第七章	一片和謠聲	八二
第八章	法國倒下去了	八八
第九章	義大利跳入戰火	九四
第十章	戰敗法國的艦隊問題	一〇〇
第十一章	咄咄逼人的蘇聯外交	一〇五
第十二章	美軍燈換來英海島	一一一
第十三章	不想坐第一把交椅	一一七
第十四章	希特勒大舉攻蘇	一二三
第十五章	密電碼和俄和談	一二八
第十六章	口蜜腹劍的日本外交	一三四
第十七章	日本倣襲珍珠港	一四〇
第十八章	戰爭期間不得過問戰事	一四六
第十九章	戴高樂引起的波瀾	一五〇
第二十章	副國務卿威爾斯的去職	一五六
第二十一章	戰後歐洲的監國	一六一
第二十二章	初晤克里姆林宮主人	一六六

第三章	曲終人散望重逢	一七二
第四章	巴爾幹的不幸	一七七
第五章	和平的播種	一八三
第六章	人亡政息話滄桑	一八八
第七章	不贊成苛待德國	一九三
第八章	向總統劉陳對德意見	一九八
第九章	「聯合國」的誕生	二〇四
第十章	因病辭職	二〇九
第十一章	美國是和平的動力	二一五
第十二章	無條件投降的原則	二二一

圖 片 部 份

一、單頁插圖

1.	二十六歲時之蔣爾	頁四
2.	中美款訂租借協定	二六—二七
3.	中美平等新約簽字	四四—四五
4.	越爾與張伯倫	七—七三
5.	戴高樂訪美	一〇—一一
6.	蔣爾引來樞廷白宮	一三六—一三七

7. 李維諾夫招待蘇爾………一六八一—一六九
 8 「聯合國」的誕生………一八八一—一八九
 9. 日本投降了！………二〇一—二二

二、文內插圖

1. 參加莫斯科會議回國之蘇爾………(頁二)
 2. 蘇爾及其家人共度聖誕………(頁七)
 3. 在私邸接閱公文之蘇爾………(頁一二)
 4. 蘇爾與密倫敦經濟會議………(頁一七)
 5. 蘇爾與密倫敦玩冰球………(頁二一)
 6. 田納西州莊之雪景………(頁二七)
 7. 助理國務卿威爾斯………(頁三二)
 8. 羅斯福與蘇爾聯署之文件………(頁三七)
 9. 英外相西門爵士………(頁四一)
 10. 副總統迪納………(頁四七)
 11. 華約于墨西哥之風潮………(頁五一)
 12. 被日機炸沉之美艦巴納號………(頁五六)
 13. 美首相與伯倫訪法途中………(頁六一)
 14. 威爾斯陪德外長里賓特裡甫………(頁六八)
 15. 堅持禁運軍火之密爾波拉………(頁七二)
 16. 巴羅林與德外長里賓特裡甫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頁七七)
 17. 「莫洛托夫麵包」炸彈………(頁八三)
 18. 攻入巴黎之德軍………(頁九〇)

19	奧英法宣戰時之義大利	(頁九五)
20	法艦隊任阿爾及爾炮擊	(頁一〇一)
21	蘇軍進入比薩拉比亞邊境	(頁一〇六)
22	美國移交英因之領事權	(頁一一二)
23	一九四〇年英國大選羅斯福總統親臨投票情形	(頁一一八)
24	大西洋會議在倫敦上會晤	(頁一二四)
25	蘇聯與野村會商	(頁一二九)
26	美日談判中之來稿與野村	(頁一三五)
27	避日慶節墮下之珍珠港	(頁一四一)
28	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投落	(頁一四八)
29	引起波蘭的敵高特將軍	(頁一五一)
30	在總統辦公室中之蘇聯與威爾斯	(頁一五八)
31	莫斯科會議中之普爾與莫洛托夫	(頁一六二)
32	克羅斯林宮主人史達林會談	(頁一六七)
33	自莫斯科會議歸來下僕與夫人親吻之趣聞	(頁一七三)
34	邱吉爾乘裝甲車抵希波	(頁一七九)
35	主持聯合國宣言時之趣聞	(頁一八四)
36	主持維爾遜會議之羅耶史三巨頭	(頁一九〇)
37	出席魁北克會議時之摩根索	(頁一九三)
38	史汀生	(頁二〇〇)
39	領巴教會議時之斯退丁是所與薩代表葛羅米柯談話	(頁二〇六)
40	七十二萬餘之老國務卿蘇聯	(頁二一〇)
41	羅斯福總統之體操	(頁二一一)

42	美國國會撥款一角.....	(頁二六)
43	德元帥季德爾致停戰情狀.....	(頁三三)
44	日本在密使里德茲降情狀.....	(頁三三)

赫爾回憶錄序

胡適



這裏收集的「赫爾回憶錄」是赫爾先生的自傳的一部分，專記他十二年的國務卿生活（從一九三三到一九四四年）。我在北方報紙上得讀中央日報社的譯本，今天很高興的寫這篇短序。

在美國的政治制度裏，國務卿的重要只次於大總統，他是總統制之下的首席閣員，在最近幾十年裏他是世界最大強國的外交首領。當一九三三年二月廿一日羅斯福總統發表赫爾先生爲國務卿的時候，全國報紙的社論差不多一致贊揚總統的知人善任。在國會裏，反對黨的老參議員波拉(Borah)先生也公開的贊美赫爾的任命。

這樣一致的輿論擁護，是赫爾先生幾十年的政治成績得來的社會信任。

這位田納西州來的參議員那時六十一歲半，已做過二十二年參議員了。他的國會生活可分做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期從一九〇七到一九二一，是民主黨從在野到當政的時代，是從塔虎脫到威爾遜的時代。後一期從一九二三到一九三三，是民主黨又從在野轉到逐漸恢復政權的時代。

自從林肯總統就職（一八六一），直到威爾遜總統就職（一九一三），整整五十二年之中，民主黨只有克里夫蘭當過做總統（一八五—一八九）；又一八九三—一九七），先後兩次執政八年。其餘四十四年，全是共和黨當國的時期。（林肯被暗殺之後，副總統群生繼任，他雖然號稱民主黨，但民主黨人並不承認他。故群生總統的一任不能算是民主黨執政時期。）到了一九一〇年的國會選舉，民主黨開始抬頭，在衆議院裏得到了多數。這時候，總統還是共和黨的塔虎脫。

在新國會召集之前幾個月，民主黨的眾議員之中，有四個議員發起了一個不動聲色的議會革新運動。這四個人是

吉普 (Kitchin, N.C.)

海 (Tipton How, Va.)

休斯 (Wm. Hughes, N.J.)

赫爾 (Hull, Tenn.)

這四個人決心要改革幾十年來眾議院裏的議長專制的制度，他們秘密聚會，擬定了「眾議院規則」的修正案，商定了各分股委員會主席的人選，並且決定了新國會裏民主黨的立法政策。

等到民主黨的議員到齊開會商議如何改組眾議院的時候，只有這四個人袖子裏有現成的方案，有準備好的理論，有請人選的人選名單。別人都沒有準備，於是這四個人日夜辛苦努力的结果全被通過了，都成了民主黨的全體主張。赫爾先生從這個經驗裏學着一個最有名的教訓：在議會制度裏，幾個人的決心與苦幹往往可以得着很大的收穫。這時候，赫爾先生剛滿了三十九歲。

兩年之後（一九一二年），共和黨內部分裂，老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創立了進步黨。三黨競選的結果，一位大學教授叫做威爾遜的，被選出做了大總統。國會的兩院都是民主黨佔多數。民主黨革新政治的機會到了。

在威爾遜的領導之下，民主黨做到了很多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大扭是賦稅法的革新，包括關稅的修正，所得稅的實行，遺產稅的建立。在這三個方面，赫爾先生都有很大的貢獻。

赫爾先生從少年時代就相信直接稅是最合理的抽稅方法。美國在南北戰爭時代會實行徵收所得稅，戰爭完了，所得稅也取消了。十九世紀末期，麥米林 (Benton McMillin) 在一個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裏提出一個所得稅法案，通過國會，成爲稅法了。但最高法院在一八九五年，用五對四的判決，宣告所得稅法與憲法抵牾，故

無效。那位製定所得稅法的麥米林恰巧是赫爾幼年時代最崇拜的鄉先輩，所以赫爾早年就成了直接稅的信徒。平日搜集並研究各國關於所得稅和遺產稅的資料與方案，他在國會裏早就被大家公認為「直接稅專家」。每有機會，他總要攻擊共和黨的保護關稅政策，提倡他的直接稅法。到了一九〇九年，共和黨忽然改變方針，塔虎脫總統提請國會提出憲法修正案，承認聯邦政府可以徵收所得稅。這個修正案（所謂第十六個憲法修正案）通過國會之後，須送到各州議會去複決，須有全國四分之三的州的複決始可成為憲法。直到一九一三年二月間，這個憲法修正案才得到法定的複決。赫爾先生就提出他用心準備的所得稅法，作為開稅修正案的一章。開稅法低的結果，政府每年要減少七千萬美金的收入。赫爾的所得稅第一年可得七千萬元，正可以補足此數。他在議場上指出，若照英國當時的所得稅率，美國每年可收四萬萬元。他的目標只要使政府與人民接受並了解所得稅的原理與細則，所以他把所得稅率定的特別低，單身男女每年收入在三千元以下，已婚男女每年收入在四千元以下，都免出所得稅。這個法案在通過國會的歷程中，赫爾先生出力最多。所以美國人至今稱他做「中央所得稅法之父」。

這樣開始的所得稅，不到幾年，就成為美國最重要的一筆稅收。所得稅法頒布後一年（一九一四），歐洲戰事就爆發了；再過三年（一九一七），美國也參加戰爭了。所得稅法在一九一六年又由赫爾領導，經過一次重要修正，特別注重「過分利潤」的徵稅。從此以後，所得稅成為戰時籌款的一個主要方法，在六年之中，給美國國庫增加了一百五十億金元！

威爾遜總統的八年，是赫爾先生的立法事業最得意的時期。那個時期的許多財政立法——如遺產稅法，如戰時發行的「自由公債」條例，如一九一八年的戰時籌款法，——都是他領導制定的。

威爾遜總統的世界和平理想失敗後，共和黨又取得政權了，民主黨在一九二〇年遭遇空前的慘敗，許多民主黨議員都落選了，赫爾先生在那暴風雨裏也丟了他的衆議院位子。民主黨的全國總部窮到不能還欠債。從此以後，民主黨又得坐十二年的冷板凳了。

民主黨在那最失意的時期，想要推出一個新的領袖來收拾人心，重整旗鼓。那時候，黨內各地領袖不免互相埋怨，互相責備。只有赫爾先生是大家沒有異議的。所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選舉他出來做主席，主持整頓全國黨務的工作。赫爾先生做了三年多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他還親自主持一個民主黨宣傳機關，設在華盛頓，只在一條小街上租兩間小房子，只僱用一個女書記，一個每星期薪俸廿五元的外勤新聞幹事。赫爾每天到這裏辦公。這就是民主黨的中央宣傳部了。

兩年之後，赫爾仍在他的原區當選作衆議員了。國會裏的民主黨員也從上屆的一百三十二個衆議員增加到二百零七個了，從上屆的三十七個參議員增加到四十三個了。

一九二四年大選又快到了，田納西州議會要提出赫爾先生做總統候選人。赫爾先生很堅決的謝絕了。那年七月，民主黨提名大會推出台維斯 (John W. Davis) 爲總統候選人。候選人推出之後，赫爾先生才把全國委員會主席的事交與他的繼任者。他交代時會說：「我很高興，我現在交出的組織是沒有負債的，舊欠二十三萬五千元完全還清了，居然還有幾千元的盈餘。這個組織現在是一個很進步的機構，從今以後在每個主要方面都能够工作了。」

但那一年大選的結果，民主黨還是失敗了。直等到八年之後（一九三二），羅斯福作總統候選人，民主黨才得到向來沒有的大勝利。

這是赫爾先生作國務卿以前的政治事業的小史。當威爾遜總統領導民主黨中興的時代，赫爾是威爾遜的一新自由」的革新運動的一員健將。當威爾遜以後的十二年民主黨倒臺的時代，赫爾是坐鎮大本營的元老，整頓黨務的功臣。羅斯福總統會做威爾遜政府的海軍次長，他很認識那位在國會裏替人民說話，爲直接稅奮鬥，主張國際經濟和平，反對關稅壟斷的南方自由主義者赫爾先生（參看回憶錄第六、八兩章）。赫爾先生在國會兩院有了二十多年的經驗，最受兩院議員的愛敬。羅斯福總統正需要一位能得國會信任的國務卿，所以他毫不遲疑的請求赫爾先生做他的首席閣員。

羅斯福是美國史上任職最久的總統，赫爾是美國史上任職最久的國務卿。一九三三以下十二年的大事，就是這部回憶錄的內容，不用我多說了。

我讀這些回憶錄，常常使我懷念華盛頓的許多朋友，特別使我懷念赫爾先生。

在第三章裏，他告訴我們，他反對傳統的社交酬應，所以他在國務卿任內，從不出來參加午宴或晚宴。華盛頓的各國使節都尊重他這個決定，平時宴會總不請他。他自己說：「這種決定有很大的便利。我在晚上的時間可以比較自由，研究我帶回家的文件；白天也可以有更多時間和各國大使公使以及國務院人員商談。」自己也是最勤勞又最謹慎的公僕。他在第三章裏說的每天的忙碌生活，都是華盛頓人人知道的事實。他自記他

接見外國大使公使的態度與情形，也都是很確實的記載。他那間辦公室，我至今記得。他對人的誠懇與和藹，我也至今記得。我退休之後，曾有人問我對於赫爾與副國務卿威爾遜的評判，我說：「我們退出來，可以直接了當報告我們的政府。但我們同赫爾先生商談，他只肯說：『我一定同國務院的同事們商量商量。』他從不輕易說『可』或『否』。從外交官的立場說，我應該喜歡威爾遜。從我的大學教授立場，我佩服赫爾的小心謹慎。客觀的看來，赫爾先生是一個偉大的國務卿，正因為他不輕易說可與否，而必須先請教國務院的專家。」

我現在讀赫爾先生自己的話：「做事求快的人有時會說我太多考慮，其意即是說我做事太慢。對於這個批評的明白答覆便是：羅斯福總統當政期間，我在處理公務上的錯誤，大部份由於匆忙和欠缺考慮，而我的政策却是多加考慮，並且及時加以考慮。結果許多消息最靈通的人士都說，我的公務紀錄中並無重大錯誤。」這段自述使我回想到兒童時代讀的朱子小學裏那個「勤謹和緩」四字訣的故事，尤其是那個「緩」字の意味，祖負天下第一強國的外交政策，而能以「多加考慮」的態度行之，這正是赫爾先生的勤謹和緩，這正是他的偉大。

中國讀者讀這部回憶錄，當然特別注意第廿五章，第廿六章，第廿七章。回憶錄裏，只有這三章記的是對日本的外交，又只限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廿七日到十二月七日的事實。這未免太少了。這當然是因為這些在紐約南京上海報紙上發表的回憶錄，不過是赫爾先生的長篇自傳裏擠出的一部分，我盼望他的自傳裏有更多的資料，可以使一般讀者明白赫爾先生在一九三三年繼史汀生（Henry L. Stimson）作國務卿，就繼承了史汀生先生的「不承認」主義，不承認日本在中國用暴力造成的局面。我盼望他的自傳裏有充分的資料，可以使我們了解美國政府在一九三三以後，曾經在很困難的境地裏，給中國種種可能的援助，給日本種種可能的打擊。

這種補充的材料是很需要的。不然，一般中國讀者就不值得為什麼日本要那樣仇恨美國，就不值得為什麼日本要襲擊珍珠港，毀滅美國海軍了。

我所謂「很困難的境地」，赫爾先生在回憶錄裏也略略說了幾點。第一是當時美國的孤立主義的氣氛高漲。第二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〇年的中立法案如何束縛白宮與國務院的外交權力。這些回憶錄本原是給美國人看的，故沒有詳細敘述那幾年的中立法案的內容。但我盼望中國讀者至少能細讀第十章「孤立主義與風作浪」，與第十五章「孤立派鼓勵了希特勒」。這兩章裏描寫兩個孤立主義的領袖：一個是參議員奈埃（Senator Nye），一個是參議員波拉（Senator Borah）。這兩章雖然簡略，但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美國在那個時代為什麼完全沒有力量制裁侵略國家，也完全沒有法子幫助和平國家維持和平。

在第十章裏，赫爾先生說：

「奈埃委員會的審查給予孤立主義者一個跳板，引出了我們的第一個中立法。……這種中立法把行政機關束手縛腳，再告訴任何未來的侵略國家如德義或日本，教他們儘可以對他們心目中的侵略目標去宣戰，我們將力求我們的人民不把軍火賣給被侵略國家。……『中立法』預先告訴世界，如果一旦發生戰爭，那些事是我們所不為的。這樣的中立法會阻礙我們運用力量防止戰爭。」

在第十五章裏，赫爾先生告訴我們，在歐洲大戰爆發之前一個多月，羅斯福與赫爾用了全力，運動不動參議院裏的孤立派領袖，還沒有法子改動中立法一個字！

其實依我看來，美國的孤立主義與中立法鼓勵了一切侵略者。試看下列的對照表：

(1)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第一個中立法頒布。

同年十月，墨索里尼開始他的阿比西尼亞的侵略戰。

(2)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第二個修正而更嚴密的中立法頒布。

同年七月七日，日本開始大規模的華北戰爭；八月十三日，日本開始上海戰爭。

(3)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八日，白宮討論修正中立法的會議無結果而散。

同年九月一日，希特勒的軍隊進攻波蘭；九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

這豈不是偶然的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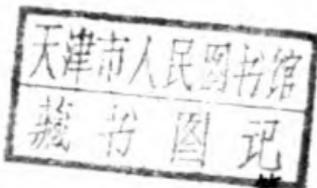
在那樣嚴重的孤立主義與中立法的層層束縛之下，羅斯福赫爾的政府還能夠做到他們所會做的；還能夠使一切侵略國家都仇恨他們，怕他們；這就是這些回憶錄要告訴我們的故事了。

一九四八、五、一夜。

附註：序裏關於赫爾先生的事蹟，主要參考書是 Harold B. Hinton 的赫爾傳記 (Cornell Hill: a Biography, 1942, New York)。



。爭戰西美加參，長連連 H 州西納田任每 爾赫之時歲六十二
。年七九八一於攝照此



赫爾回憶錄

第一章 羅斯福的諍友

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四年羅斯福連任三屆總統的十二年間，赫爾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舵手。羅斯福對他絕對信任。對於許多重大的國際事件，包括珍珠港事變以前九個月的對日談判，都由赫爾主持決策。這回憶錄的開端便明白地描繪出他和總統之間的友好融洽情形。然也在內政政策上，他和羅斯福時常有不同的見解。

十二年間如魚得水

當我在國務院的十二年中，總統跟我，彼此之間從來沒有一句不和好的話。自然我們也有少許顯著的爭論，却會以懇切直率而和好的精神討論得妥妥貼貼。我們的關係大體上是很愉快的。

我在接受總統選我出任國務卿的建議時，提出了一項條件，便是不願僅給政府傳遞它和各國政府間來往的公文，却無充分地參加外交政策的擬定和執行。總統對這附帶的條件表示尊重。

他和我對於國際關係在多方面抱著同樣的見解。如果在我們分離的時候遇有突發的事件，我們彼此都知道對方將會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赫爾於芝加哥羅斯福會場後成返華盛頓，羅斯福親迎於機場，在機場車上合影（中爲赫爾，左爲羅斯福，右爲赫爾夫人）



或者是完全在一般政策的範圍以內，或者是他已經表示過贊同和界說明確的見解。

採取什麼行動。在外交政策上的見解如此相同，正是我們所以能够保持有效的工作關係的主要因素。

在本回憶錄中，我主要地只打算寫出這政府處理外交的情形。不想把由總統本人担任總設計者的羅斯福政府內政成績的紀錄包括在內。單憑着羅斯福政府所承繼的經濟恐慌以及在他領導之下所擬的補救辦法，各種空前重要的大改革等等的紀錄便能使他在我國的內政史上佔有一崇高而永恆的地位。除了遇到一種聯合的外交和軍事政策的實例以外，我不想寫總統在最近的世界大戰中作爲我國陸海軍總司令時的一切成就。在這裏，他那出類拔萃的成就表現他是我們歷史上最能幹的總司令之一。總而言之，他是一位真正偉大的總統。

外交方面完全信任

在國務卿任內，我發覺對大多數的事件我須自行決策。雖然一位國務卿應照例和總統商談重要的政策事項，並且是總統在外交方面的代理人，實際上大部分是由他（國務卿）自己主動和負責。我可以對美國的駐外代表們頒發訓令，要求各國的駐美代表提出解釋，向外國政府致送外交照會，並且跟那些政府談判條約。

我須用自己的判斷力來決定那些政策或事態的發展是十分重要，應當提請總統注意。有時我把一個牽涉到新政策的問題呈給總統，附上若干適當的建議。有時，有一個政策問題太不重要而不必提請他的注意，

舉例來說，在義大利和阿比西尼亞作戰時，我曾建議實行道義上的禁運，心裏特別是想到義大利。總統當時在墨西哥海岸附近的一艘巡洋艦上。我告訴他，如果他同意的話，我們建議用他的名義宣布禁運，他欣然地同意了。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在蒙特維的亞泛美會議時的力圖解決大夏谷戰爭（Chaco War）。我把這事當作會議促進和平的諸事的一部分，並會作適當的決定。我臨時將我們工作的情形大體地報告給總統。

還有一個例子，是由我主持和英國談判，租借紐芬蘭到英屬圭亞那一帶的英國基地，而以美國的途險驅逐艦五十艘作為交換。總統跟我談過這事，並且得到了普泛的諒解，他於是把主持和英國談判的任務交給我。我足足地幹了十幾天，隨時將我們商談的情形報告總統。談判結束時，我負責代表我國政府在協定上簽我的姓名。其中還包括着和邱吉爾電報往還的責任。邱吉爾在電報中正式保證不許英國海軍在任何情形之下落入德人手中或自行擊沉。

在許多其他的實例中有一個最後的例子，那就是在珍珠港事變以前九個月和日本大使的談判。我跟日本大使舉行了四十到五十次的會談，主要是在我所住旅館的房間裏。我隨時將談話的一般大意報告總統，同時又為我所約定的總統和日本大使的會議預備種種的資料。

總統和我對於處理外交的技術方面沒有很多的經驗。後來，因為我們同時遭遇許許多多的問題，所以很快地得到了這種經驗。多半會輪到我的重大任務，就是對國外迫切須待解決而毫無希望的複雜局勢去履行我們的政策，並適用種種的基本原則；最初幾年因為國內情形是難以形容的混亂，弄得每天必須總統特加注意，所以這任務也格外繁重。

羅斯福總統第一任時埋頭於許多內政問題中，所以他幾乎把外交事務完全交給我辦。一切主要的發展我都透澈地告訴了他，他却希望我在政策和行動上是主動的。從第二任起，他對於外交的興趣和參與已大為增加。

羅斯福總統關於外國的知識，極其廣博。自從哲斐遜、約翰·昆西、亞當斯士和約翰·亞當斯士三位總統以後，沒有那位總統對於外國人民和情形比他知道的更多。他有時雖然因為直接和別國政府領袖接頭以致使我們受了過大的束縛，而且有時忘記了他的軍事決策在外交上的關係，但他對世界趨勢却是進步的，前瞻的。

他是一位具有偉大魔力的人物，在談話時每每能使他自己令人愉快而富有吸引力，這在我們和外國政府的政治家以及外交代表來往時是有幫助的。他是一位罕有的能夠判斷別人心理的人，老是能夠極有效地將任何文告或呼籲傳播給大眾。據我看，在這方面，除了老羅斯福以外，以往歷屆的總統沒有一個能和他相比。他最長于以高聲戲劇化的方式將各

體偉大的口號和原則如四大自由之類宣布給全世界。他對於各種人物的廣泛認識，再加上他的能力和優良的判斷力，使他具備了做領袖的最高本領。

總統對我體貼入微

當我在職的十二年裏面，總統對我這國務卿除了極少的例外情形以外，簡直是體諒得無以復加了。他幾乎一定不變地贊同我的建議或意見，其中時常包括重要的外交政策。除開他和邱吉爾、史達林的會議他認為主要地是軍事性質以外，實際上時常在對外關係方面採取一重要步驟以前，徵求我的意見或同意。他有無數次是希望我將關於外交問題的演說材料供給給他，或者替他撰擬給邱吉爾、史達林和別國政府元首們的函電與短文。

賀迪金斯（Harry Hopkins）有一次對我說：「一個人或許無高殿專羅斯福多久，總統永遠不會向他道謝。但是賀迪金斯又繼續地說，實際上羅斯福總統對於那些人替他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衷心感激的。我答應道，我和他的關係始終能免於互相攻擊，更沒有簡慢的言語；我又說，在很多時候談到我的工作的某些方面，他總表示十分的欣賞。

每當總統或我本人遊歷歸來，乃至常常隔不了多少時候，他一定是請我到他辦公室裏同進午餐，以便我們能够談論各種問題和情形，而不受攪擾。

如果天氣溫暖的話，他便說：「我們自己舒服一下罷。」他於是脫下外衣，捲起領頭，解開鈕扣，敞着領子。我也

是這樣做的。

午餐開來了（不用酒），擺在他那橢圓形辦公室的桌子上，這辦公室對我已有很多的聯想。我曾在這間房裏第一次看見威爾遜總統，後來又看見柯立芝總統和胡佛總統。

我們的談話是隨便的。通常總統會講一個他剛才聽來的好故事。接着，我們可以花費約摸一點鐘的時間來討論我們當前的各種問題。我們常常只是兩個人在一起，很少有人來打擾我們，然而如果偶爾遇着一位重要的人物打電話來，總統必得去答話。

談話時，他始終是體諒我的。我們有時對於重要問題發生爭論，當我力持相反的理由時，他從沒表現過不耐煩的脾



氣。他著神地聽我把話說完，從不打破我的話頭。在相當的時期以後，我信中間任何一人知道對方經過了充分的考慮，仍舊存着定見的地方，彼此都懂得避免過分瑣細的辯論。

內政意見小有參差

我們的談話幾乎完全是討論外交問題，但我也隨時音泛地對內政問題表示點我自己的見解。有幾次我說下面這樣的話：

「我從青年時代起，曾經研究過自由派大師們的思想如同洛克，密爾頓，皮特，柏爾克和格萊斯東以至勞合喬治的一派。我在威爾遜總統的開明領導之下，「一直從事」這樣的研究。在國會裏我的成績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百都是關於勞工立法的，主要的是進步性的立法。但我仍不禁感覺你對於你的某些內政方面的改革進行得太性急而且太過火。沒有充分的時間使它們和國內的情形相適應。人民也沒有時間來消化它們。我想本國人定期地需要暫時時間使他們自己熟悉些這類激烈的新政策。有些時候，這類政策本身似乎過於激烈。」

我又會向他說明我不贊同政府永遠花錢的政策，却始終是主張一個基於各種進步和實際政策而訂的平衡預算的固定政策，而且國家在各主要方面的適當進步，便可把這些政策作為良好的基礎。

總統常是以完全尊重的態度聽完我所說的話。後來他繼續地吃東西或吸煙，毫不作聲。等到靜默了幾秒鐘以後，他或我便提及一些別的事情，談話也就轉到別的方面。

第二章 白宮與國務院之間

赫爾任職的十二年間，外交差不多全歸國務院的僱限，羅斯福專心勞力軍事和內政，雖有左派份子挑唆，依然無損兩人間的和諧。

我常常在清晨去見總統，便是他還睡在床上的時候。通常是他已經起來過了，吃過早餐，然後又回到床上去處理一天中的第一批公務，他的床上總散亂着報紙、文件、書信和電報等等。我拉過一張椅子在旁邊坐下，開始和他討論手頭的問題。我在國務院的十幾年來一直這樣做。

大體說來，我在社交上和總統的關係並不密切。除了正式的場合之外，我從不被邀參加白宮的宴會，也不搭乘羅斯福總統的遊艇作週末郊遊，或到他的故居海德公園（Hyde Park）去。我決心不把精力浪費在社交生活上，而以之處理辦公室中的事務，總統對我這一決心極表尊重。而且老實說，我也不喜歡和白宮的人羣混在一起；那裏明明是「自由主義」的玩意，却往往走到極端。總統左右的人有好些是極端自由主義者或是半急進份子，我和他們氣味不投，如果勉強參加在他們的集團當中，不僅他們感覺不自然，我也處境很窘。

對於我更重要的是偶然或單獨和總統共餐，這時沒有人來打擾，我們至少可有一個鐘頭的時間隨便交換意見，說話時不必小心翼翼，字斟句酌。

婆婆媳婦政見異趣

我和總統的母親，羅斯福太夫人（Mrs. Sarah Delano Roosevelt）最爲相投。我認爲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婦女，把這一切都奉獻給她的兒子和國家。我最初是聽說她常常支持我和我的政見，因此便開始對她有所瞭解。她成了我的好朋

友，而且在我的談話中，她總表現其博學多見以及對於國際問題和情勢的卓越見解。羅斯福夫人比我更左傾一點，我和她很少碰頭，但已足使我欽佩她的能力。她是倡導和平組織的勇敢戰士，而且在和平以及其他人道目標上，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有極大的聲望。

我相信總統對我是完全坦白的。不過我從不參加他的純粹軍事性質的會議（除非所討論的問題和外交有關）或內政會議。我從不詢問他有關於機密的軍事或內政情勢的問題，除非預料他會立即而毫無保留地供給我以全部情報。有幾位駐外大使，尤其是先駐莫斯科後來調駐巴黎的湯姆（Tomlinson），駐倫敦的甘納德（Kennedy），先駐莫斯科後來調駐比京布魯塞爾（Brussels）的戴維斯（Joseph E. Davies），和總統的老朋友，喜歡越過我這一級而直接寫信給總統。駐外大使和公使和總統通信，甚至討論。

不過他們的任務却很少妨礙政府的嚴格外交活動。

第二章 白宮與國務院之間

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羅斯福總統在華盛頓白宮接見國務院官員。



重要政策問題，固然總是一件不妥當的事——我和總統談話時會深斥其非——但是我却想不起有什麼例子，表明這種行徑會使國務院的見解和行動方針遭受嚴重障礙。

總統有一種行為常常使國務院感覺頭痛，便是派遣私人的特使出國和外國政府的首長商談，或完成某種任務。這些特使中有賀浦金斯、華萊士（Henry Wallace）、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杜諾英（William J. Donovan）和戴維斯等，他們都會首過一個以上的任務出國。派遣這些特使出國，往往會給駐在當地的我國大使或公使製造困難。

總統在這類任命會提出多次建議，

不過大多數是國務院提出人選，他大致是批准的，只有極少數是例外。

老朋友呼名不稱姓

他的建議通常是用鉛筆或鋼筆簡單的在白官便條上寫幾個字；交到我這裏來。這些便條連日期也不寫，只是：（譯者註：史密斯、鍾斯、白朗、即張三李四趙五之意）

「史密斯到重慶」

「鍾斯到巴黎」

「調白朗回來」

「？」

當土耳其將其首都從伊斯坦堡移到安哥拉之後，我收到他的一張鋼筆便條：

「C.H.（譯者按：這是赫爾姓名Correll Hill的縮寫。）」

「爲什麼我們不把大使館從伊斯坦堡搬到安哥拉去呢？各國都在搬了。」

「R.D.R.（羅斯福姓名縮寫）」

我使用紅鉛筆在下端寫上：

「一個好答案」

「C.H.」

在羅斯福出任總統之前，我總稱他爲「佛蘭克林。」（即總統之名）後來我稱他「總統先生，」這有一項理由，便是我去見他時常有旁人在一起。不過我即令單獨和他在一起，也稱他爲總統先生，雖然我們使用稱呼的時候很少。他在當總統的以前及以後，都稱我爲「柯德爾」（即赫爾之名）。

總統只到過國務院一次。他是在散值之後來看看接上他的「匿名助理人員」行將使用的辦公室。我會再一建議他去拜訪前總統胡佛（Hoover），商討類似國外禮情等問題。我自己毫不遲疑地和前任國務卿史汀

生 (Henry L. Stimson) 會商，而從他那裏得到極有價值的協助，尤其是有關商務協定法案方面的。不過總統和胡佛的關係却弄得複雜，結果前者從未邀請後者到白宮來。

我自己曾和胡佛多次非正式會談，不過不是在國務院的正式場合而已。我們的談話依胡佛的建議，在前任副國務卿克思爾 (Wilhelm Candler) 的家中舉行，事後我便將詳情報告總統。胡佛對於政事表現極其關切。至於他對於羅斯福的態度敵視，是否使他的黨派色彩更濃，我却無法下一判斷，無論如何，這可說是一種變方面的敵視。

有些極左派份子時常就國務院的問題，在總統面前肆意挑撥。這並不是總統本身和國務院之間有所齟齬，而是少數左派份子因為我不聽從他們的意見，故意在總統面前恣意挑撥。他除了爲了國務院有一點「漏洞」而時常抱怨之外，從沒有在我的面前說過一句「憎厭」國務院的話，像後來有一兩個人所傳說的那樣。他關於外交政策的演說，聲明和兩件的初稿，大部份由我和國務院官員自動或應他的要求而起草，他也很願意我們這樣做。

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卅一日，即我到國務院幾十一年之後，交給我一張便條，其內容頗值得引述：「隨附我送交邱吉爾的備忘錄抄本一份。（這張便條是我把有關自由法國委員會和義大利的關係一事寫成的備忘錄送給總統時附去的。）感謝上帝，我和國務院之間沒有他和他的外務部之間的那種麻煩！(F.D.R.)」

內閣表面有小內閣

一般而論，總統的內閣在決定外交政策方面，僅佔極不重要的地位。在內閣會議，我並未發現對於外交問題多所討論的現象，一如旁人所想像的那樣。

我對於內閣採取被動態度，不願透露重要機密，因為這類情報常常透露給所喜歡的新聞記者或廣播記者。據我所知，洩漏機密的只限於極少數的閣員。

有些閣員時常侵及其他閣員的權限。這類情形後來有幾次使我不大滿意，例如在討論對日本施行禁止出口的時候，以及華萊士的經濟作戰委員會想把國務院以及其他機關的主要經濟作戰權限，據爲已有的時候便是。

我的政策是使外交不受國內政爭的影響，總統的政策是他自己只處理內政以及純粹軍事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和總統的私人關係，自然不會像處理內政問題的幾個閣員那樣密切。他們經常和總統會商，研討不斷發生的無數問題。這樣一來，形成只包括少數人員的所謂廚房內閣也是極自然的事。當他們企圖假藉總統或其他名義，干預其他部門的工作時，似乎也沒有受過總統的斥責。更奇怪的是，當我和總統合作得極和諧的時候，竟也會有二三閣員串同某些白宮人員，假借總統的名義，攻擊國務院的政策。這是我們閣員中有些人必須經歷的不愉快經驗之一。

總統對於這些內閣會議極感興趣。他的快樂個性在會話中充分顯現。他喜歡在會話中插入一些趣聞而且喜歡自己說出來給大家聽。他永遠是高興的，談笑風生。

爲了談天犧牲吃飯

有一天，他參加內閣會議稍爲遲到了一點，一路笑着進來。他說，他剛才受他家裏的一個人頂接了一下。這個人告訴他說：「先生，你說得太多了，我們永遠沒有機會插一句嘴。」總統笑着把這事告訴我們，然後轉過頭來對我說：「柯德爾，你同意這句話嗎？」

我答道：「唔，總統先生，今天我來開會之前，有幾個新聞記者到國務院來看我，他們對我說：

「國務卿先生，有人說白宮的膳食很不好，我們希望曉得你的觀感。」

「我從未吃過白宮的膳食。」我答道。

「什麼！」他們驚訝道：「我們曉得你常到白宮吃午飯或晚飯。」

我說，「這話不錯。不過我在往白宮之前總先吃飯。然後在總統吃飯時，我才有機會說幾句話。」總統和全體都大笑。

第三章 做專與對人

白髮斑斑的國務卿不喜歡社交活動，寧可把全部精力用於工作。對人淺語結瑟，做事三思而行，木頭球戲是他唯一的嗜好。

THE THIRTIETH

謝絕酬酢信任太太

從記不清的時候起，便有一種習慣，需要國務卿每天出去賡酬，參加午宴或晚宴，尤其參加晚宴的時候更多。這種習慣不論有什麼好處，其消耗許多時間和精力却無疑義。我對於社交問題毫不遲疑地決定了自己的態度。我對各國外交團的人員說：

「我可以天天和你們一起參加宴會，其結果我便不能有多少時間和你們見面及商談，你們只能去找我的幾位助理國務卿。如果我拒絕赴宴，便能有較多時間和你們見面和會談。我取後者。」

他們都贊成我的意見，我認爲這種決定對於一切有關的人們有很大的便利。我在晚上的時間可以比較自由，研究我帶回家的文件；白天也可以有更多時間和各國的大使、公使以及國務院人員商談。在其後的十二年間，我一直遵行這一政策，只在官方或外交的情勢有嚴重必要時偶有例外。

我的太太在担当必要社交生活的負累方面，確有莫大功勞。每當我必須宴請來美的外國政治家，或內閣舉行對總統的午宴會時，她起親負籌辦之責。當我在國外開會時，如果我無法親自去拜訪各國代表，她便去拜訪各代表太太以示聯絡。

有些担任公職的人，基於互相諒解，常常避免把他們政治上和公務上的機密告訴太太，而太太們也以自己的社交生活以及處理家務的責任爲滿足。可是我對於自己認爲重要的任何問題和人物，都經常告訴我的太太。她小心地保持一切

機密。她在國內外和外交官及政治家談話時，我從未見她犯過一次錯誤。

木槌球戲打敗冠軍

我在可能範圍內雖儘量避免社交活動，却願意在對於我身心兩方面都有重大利益的方面有一點消遣，每星期有一兩次的傍晚時分，如果天氣好的話，我常常聚集三個僚屬，在「烏德萊（Woodley地名）」史汀生家裏的草地上玩木槌球，以消除我的思慮，使腦筋略略鬆散，準備應付未來的工作。木槌球戲成了我唯一的運動，而且在不大玩這一套朋友們看來，我差不多已是一個專家。

有些人也許認為玩木槌球有點無聊，但它確是一種極科學的遊戲，玩球者必須注意集中，否則必不能有所成就。每一季當中，我有四五次可以一次跑完全場，中間毫不停頓。我總讓同玩的其他兩三個人先動手，然而我再從第一根柱子開始，慢慢跟上，終於超越他們而獲勝利。

有一次，曾充我的助手，後來担任華府國立藝術陳列館館長的麥布萊（Henry McBride），帶來一位「選手」，以老朋友的身份介紹給我。後來我發現他是美國某一區域的木槌球冠軍，不過我却贏了，也許是這位冠軍對於場地不習慣的關係。

我很少能够安安穩穩地打完一場球，而不受任何打擾。有時史汀生出來和我說話，有時我接到國務院的緊急電話，甚至總統也會打電話來。國務院官員更常常帶著文件直接來找我，以便在他們傍晚散值之前讓我看過一遍，簽一個字。

大槌球戲使我深感滿意，因為它可以使我的腦筋有時脫離工作的羈絆。同時又可以使我充分享受戶外的新鮮空氣和



赫爾比家中此間由辦公室帶回之公文（右為夫人）

陽光。不過我在國務院的最後幾年中，因為工作對我體力的消耗日益加甚，醫生說我必須逐漸減少這種遊戲，打這種球相當費力，這也許是大部份人想像不到的。

深謀遠慮鎮定應變

十二年的國務院生活中，差不多天天都有許多急迫的問題，需要僚屬們和我自己努力工作。我的整個任期實可稱爲一段緊急期間，當我們努力以適當方法處理每一項重要問題時，人性的每一方面以及全球任何部份的行徑都會遭遇到。我天天總設法在上午九時至九時十分之間到辦公室，而且常常由我所住的旅館步行到國務院。我先會見我的主任秘書。最初担任這職務的是麥布萊，他以他的經驗，判斷力，能力以及應付院內外人士的交際手腕，對於我實有莫大貢獻。其繼任者是葛雷（Carl M. Gray），這位先生具有驚人的機警、工作效率、忠誠以及優良工作的一切條件。

麥布萊或葛雷給我帶來大批來自全球各地業經分類的電報以及其他公文，並交給我各駐外大使、公使和領事對於其駐在國情勢發展的分析 and 批判。他然後又把前一天國務院中所發生的任何特殊情事，給我作一個秘密報告，並提出適當建議。接著他又交給我一張當天的約會登記表。

我在處理手頭的公文、電報以及其他文件時，在可能範圍內不再經過開會或調查，立即便作決定，並指示國務院中的主管官員立即付諸實施。我必須斷定那一件事重要，必須給總統看看或請他決定。

然後我請副國務卿進來，最初是費立登斯（William Phillips），繼任者是威爾斯（Sumner Welles），最後是斯退丁紐斯（Edward R. Steinfelt），把對於他在處理公務上有價值的一切情報告訴他。接著進來的是幾位助理國務卿以及本院的其他重要官員，以討論他們主管的各項特殊問題。

在一天當中，幾乎不斷有人要求在我的辦公室中舉行緊急會商。世界大局日益不安，我們的困難也逐年加重，我和國務院重要人員開會的次數也愈多。每當有嚴重問題發生時，我對於國務院的人員，不論其官職高下，只要他對於問題的任何一方面能作貢獻，我必把他找進來，使他有機會發表意見。經過透澈的會商和研究之後，我喜歡坐下來，自己作最後決定。

做事快的人有時會說我太多考慮，其意即是說我做事太慢。對於這一批評的明白答覆便是：羅斯福總統當政期間，我們在處理公務上的錯誤，大部份由於匆忙和欠缺考慮，而我的政策却是多加考慮，並且及時加以考慮。結果許多消息最妥通的人士都說：我的公務紀錄中並無重大錯誤。就我所知，總統也認為無論他在國內還是出國期間，都沒有使他陷入嚴重困難。

喜用紅筆不學青蛙

我批公事時喜歡用紅鉛筆，襯衫口袋裏時常插上四五枝。我的太太對這很感頭痛，她說襯衫沾上紅鉛很難洗掉。

某日有一個國務院官員來見我，表示不願在另一個官階低於他的官員的辦公室中開會。我對他說：「如果大廳外面的黑人司關，對於我所注意的任何問題能有貢獻，我也樂於走到門廊上他的辦公桌前去和他談談。」

當我有任何秘密事項必須告訴某一職員時，我有時會對他說：「這件事我是秘密告訴你的。」這並不是說你可以秘密告訴你所遇見的第一個人。」

在接見外國大使或公使時，我最初是採取友好而不拘形式的態度。如果我的辦公室中剛好有舉行重要會議，我便在外面通往祕書室的一間小室中接見他。在這間陳設極其簡陋的小室中，我會和英國大使樂相助爵（Lord Lothian）舉行美國驅逐艦交換英國基地的談判。後來如果有任何外交官，對於我在這間簡陋室中接見他表現絲毫失望情緒，我立即便告訴他，英國大使以及其他最高級外交官會在這裏和我舉行過最重要的會議，他們態度都很高興。

我接見外國外交官時，總求其也像接見其他任何訪客一樣的態度誠懇和不自矜持。我對付他，正像我在長期政治生涯中，對待所接觸的美國人一樣。我通常認為外國政府如有什麼美德，不必即歸功於其大使，同樣，其政府如有罪過，也不一定由大使負責。當某國政府行動粗魯或對我國有所冒犯時，我的客氣態度也偶有例外。從這位外交官在我辦公室門口出現的時候起，我便想出多種方式來接待他，或持極度冷靜，甚或表明我自己和我國政府的遺憾。這些例子大都和後來幾年的日本大使有關。

我在對付外國大使時，定下兩項原則。第一是我們如沒有實力做後盾，決不說威脅性的話。沒有實力做後盾的威

舞便是虛聲恫嚇，而虛聲恫嚇可能引起極密的後果。

另一原則是不作不一定能履行的諾言。我常把田納西州某湖邊小鎮一個小店主的故事告訴僚屬。有一天他向某食物公司兜生意，要把一車蛙腿賣給他們，公司的一個代表準時而來，和他簽訂合同。幾個月之後，蛙腿沒有交貨，那個代表又來了。他發現小店里只有一隻蛙腿，於是便問店主爲什麼不履行諾言。「唔，」那店主說：「湖邊的青蛙叫得很響，我以爲它們至少可以裝滿一車。」

每當有一位大使或公使離開我的辦公室時，我的一位速記員便會自動的從另一扇門進來。我立即把商談經過適當的口授給她，把我們之間的對話盡量正確地記錄下來，再把彼此所交換的任何書面照會附在後面，然後我再把這備忘錄的內容，電告駐在該外交官本國首都的我國大使，使他能完全明瞭這一方面的情形；對於駐在其他國家京城而跟這事有關的我國代表，也一一分別電告。

第四章 倫敦會議霧中開

赫爾在一九三三年的倫敦經濟會議中，本想設法使低關稅國的稅率，以接近當時西邊不景氣的現象，但因為羅斯福不予支持，所以也就沒有得出結果。

關稅政策中途變卦

我出長國務院時，政府早已準備參加在倫敦召開的經濟會議。國聯主持的這一會議的籌備會議，曾經在日內瓦開會，並詳細的擬訂了諸事日程，寫作進一步籌備起見，總統邀請了和我們有較大商務關係的十一個國家，請它們派遣代表來華府和我們商討經濟問題。

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總統在廣播演說裏，列舉出這次談話的四大目標：（一）縮減軍備，（二）減低貿易壁壘，（三）穩定各國貨幣，俾使商業公司能預訂合同，（四）重建國際間的友好關係和較大信心。此外總統又和英國首相麥唐納舉行了有關戰債的特別會議，但毫無結果。

我關於戰債問題談判，極少參加。總統把這件事託了助理國務卿莫雷（Raymond Moley）。我覺得這問題與財政部關係較多，與國務院關係較少，而且我相慣戰債談判，根本是徒勞唇舌。我很滿意，總算這件事與我無甚牽涉。

約莫在這時候，莫雷有一天清早到我處來。他神色嚴肅，對我說他並不如一般謠言所傳，想圖謀我道國務卿位置。他走後我對另一位客人說：「至少莫雷心裏有這回事。」此後有許多事都證明我看法不差。到倫敦會議時更是明顯。

一九三三年五月初，我得總統同意，調令當時在倫敦的戴維思（Norman Davis）對倫敦經濟會議的籌備委員會建議訂立一個暫時性的關稅休戰。其他國家躊躇不能決，但最後還是附帶了各種不同的保留和解釋，加以接受。

五月廿日莫雷突然發表廣播演說，認為即令會議成功，在倫敦的談判也絕不會有何好結果。他的演說事先事後都沒

有和我商量。他又說對外貿易無甚重要。這篇演說全英轉播，被認為是政府的風平態度——以致損害了以後發給赴倫敦的美國代表團的訓令中所申述的立場，其實當時代表團是按訓令行事。他的廣播又一再在歐洲轉播，因此又損害了美國代表團尤其是損害了我自己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總統就該嚴斥莫雷，但不幸羅斯福先生有時是允許他的親信對他的其他朋友們放肆的。



一九三三年，倫敦。經濟會議上，赫爾與胡佛之
談話及良好之風度，頗得盛譽。圖為當時會前赫爾
(右)與英方代表團談。

預備在倫敦提出。

五月卅一日在我乘羅斯福總統號船從紐約啓行時，口袋裏有一份當時在總統桌子上的互惠商務協定法案的稿子。我預備把這份草稿給在倫敦的其他代表團一閱，以此向他們證明對減低關稅稅率的努力。我們確是誠心誠意，而且也有力

在五月底，我所領導的美國代表團正準備坐船往倫敦時，才發現現在倫敦要討論的減低關稅和減少貿易壁壘的主張和產業復興法案及農業調整法案（尤其是前者）所要求的提高關稅主張是互相矛盾的問題，當時才提出來並略加討論。我堅持我認為倫敦會議應實踐的幾個目標，尤其是減低關稅稅率。在我們啓航前，並沒有反對我主張的行動。

委派團員未經商量

五月卅日總統接見代表團，除我外還有五個團員，總統委派這些團員時，全沒有和我商量。

羅斯福先生給了我們一個在倫敦應遵循的政策之備忘錄。他要我們立即在會議裏提出的有下列幾點：會議期間成立關稅休戰；確定一個協調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一般原則；取消外匯管制；確定國際貨幣本位；成立逐漸取消人為貿易壁壘和減低關稅稅率的基本協定；訂立管制若干基本商品的生產和分配的協定。我帶了包括上述幾項問題的六項提案，

實行。我希望在會議順利進行期間，總統會把遣法案送交國會，國會也會通過。事態還在發展中，我不能把它提出，只能以此作為情報告訴他們。

旅程中，我開始了在船上努力工作的習慣，以後幾年為開會跋涉坐船，我總在船上這樣工作。我總算運氣，從不落船。即令在大風暴時節，我仍能怡然讀書。我繞着甲板散步，偶而也在甲板上打高爾夫。我每天和代表及專家們在船上要開幾次會，同時又用無線電和華府取得聯絡。

我覺得在當時較大國家最關切的三大經濟問題，我在倫敦實在只能討論一個。那三大問題是戰債、立即穩定各種貨幣、和減低關稅稅率及貿易壁壘。戰債根本不談。穩定各種貨幣在倫敦將要討論，但是由會外的財政部和聯合準備銀行的專家去討論，與美國代表團無關。因此就只剩下減低貿易壁壘一項。

不久我在船上開始接到從華府來的無線電，傳來有關提高——並非減低——關稅稅率的新立法消息，而且要實行限制進口數量，這表示總統不會把商務協定法案遞交國會。六月七日啓航後一週，我致電總統：

「傳說您不會請求國會授以行政權，以證訂基於互讓關稅稅率的互惠商約，其中並附有如國務院起草的法案中所包含的，國會對此保有否決權的規定。我竭誠相信此說無稽。我幾經考慮後的判斷是：這並非特有礙我們出席倫敦經濟會議代表團的任務，而且要等到一九三四年再請求授權訂立這類的商約，也是大錯。」

總統覆電令人喪氣

總統答稱：「我完全了解和贊成在這國會開會期間你對減低關稅稅率的焦慮。你會前這幾天風波迭起，立即休會實為必要。否則也許反會促成紅利法，抵幣膨脹以及其他法案的強欲通過……所以關稅立法似乎非特不宜提出，而且無法成功。」

「你有全權在倫敦訂立基於互讓關稅稅率的商約。有權進行一切不必事先經國會授權的談判。而且你也可以預約下在華府開會，和各國個別訂立若干互惠協定。所有這種種協定，無論是普通的或是變通的，待國會重開時，當立即遞交議會請求批准。」

這個電報是一個致命打擊。因此我失去了去倫敦的最大理由之一，也失去了我對道會議成功希望的幾個主要根據之一，我原希望在會議中真能使若干國家跳出世界不景氣局面——雖然也只能是逐漸的。我的主張和總統在電報中所主張的基本不同如下：

對我，最要緊的是國會授權行政機關，使它有權訂立包括減低關稅稅率的互惠商務協定，在其限度內，這種協定不經參議院同意就可生效。後來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就這樣實行。但是總統主張的却是照老規矩商訂關稅條約，就是必需經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意始准實行。這辦法對我一無幫忙，也無鼓勵，因為美國參議院，從沒有通過過行政機關所訂的減低關稅稅率的商約，更何況訂立前未獲國會同意。

在我到達倫敦時，我發現其他國家代表團都深知美國代表團當時的困難處境。總統在六月九日宣佈他不會把關稅立法遞交國會。其他代表團立即不肯訂立可以無定期積壓在國會裏的任何條約。

六月十一日在議會開會前，總統電我：「請勿為此間有關減低關稅稅率 and 取消貿易壁壘的情形操心。國會正在為內政問題爭執的緊要關頭，這時，舉行關稅辯論，將危及我們整個計劃。」

「我絕對支持你，這裏的所言所行不會有礙你的努力。你的或我的政策仍沒有改變。記着，如果我們能使商約簽字，我們可以在致開召開參議院特別會議，請求批准。」

但這裏對我毫無希望。總統的支持我只是紙上談兵，但是我如要在倫敦有所成功，我還需要他的實際行動。

與會國家各懷鬼胎

但是我們不應忽視一件重要事實，就是幾乎所有國家對如何減少貿易壁壘辦法，都是意見分歧，英國趨向限額進口制，有些金本位國家像法國、比利時、荷蘭和瑞士都要求在她們考慮減低關稅稅率前，先暫時穩定貨幣。其他國家又要求其他如戰後暫停償還等先決條件。

從沒有一個會議像這個經濟會議那樣不清不白的。似乎會議大部分都在濃霧裏進行。在這裏，獨斷家不講理的人以及喜歡挑撥者可以大顯身手。

這種矛盾的見解和態度是倫敦會議的特色，却也可以應用到美國代表團身上。美國代表團裏有主張提高關稅稅率的參議員皮德曼（Key Pittman）；有關於穩定貨幣，實際上是關於一切問題的不同意見。而其中最大的不幸錯誤，是以一個出席世界會議的官方首席代表，卻沒機會對整個代表團人選和總統有所商榷——至少讓團內人員有這種清晰印象。這樣，若干人會缺少忠誠或不願全團合作，還有些更是公然反抗。這是我的經驗。

第五章 一件不痛快的遭遇

赫爾率領美國代表團在倫敦出席經濟會議期間，羅斯福總統又派了莫雷赴英，大家以為莫雷的確比赫爾大，莫雷自己也像煞有介事地擺出神態，並且致電總統，批評美國代表團的失敗，弄得赫爾很不痛快。



赫爾與赫爾同僚在英途中途在英甲板上

倫敦經濟會議雖這樣令人灰心，却也有它比較光明的一面。我和我太太出席英王喬治的招待會。我們又計劃了一個我們愈離的短途旅行，所以我從招待會出來後還要到幾哩外的一個鄉下地方，在會議中，我想有所建樹，而又苦於材料不足，為此緊張，鬧得我精疲力盡；我覺得照我當時的情況，我必得不顧一切的稍事休息。英王的招待會上，高朋滿座，包括來自六十六國的代表們，我等了好久，再等下去，勢必不能下鄉，因此我提議我的同僚和我在不受他人注意之下，悄然撤退。我先想抄近路走到英王近旁，但未能如願；後來我才知道，我剛走，英王就找我，但是他們告訴我我已不在那裏了。

後來，我告訴若干負責的英國官員，說是我想請英王指定一個時候覲見，立刻就傳來了與我有利的答覆，我發現英王異常民主，他誠懇招待我，非常稱讚美國人民；接著我們對經濟會議及其目標談了約莫三十分鐘，談得隨便而親切。我們同意議事規程上所列各項論題的重要性，以及每一項論題應得適當解決的必要。英王喬治說他希望會談的後半期再能看見我。不幸，這並未實現。

會諸開始，就有陷入僵局之顯明象微。恰在這時，我們得到訊息說，總統派遺莫雷來倫敦作聯絡員，把華府最近的局勢發展告訴我們。關於莫雷出人意表地飛謁總統於其遊艇以及莫雷離紐約和華府時所引起的喧擾和種種推測，報紙上都有生動的報導。各地盛傳他帶着新的訓令或是總統的信件而來，或者可能來接長美國代表團。從這時起，他在海上的七天期間中，會諸只是消耗時日毫無進展而已。倫敦各報用大標題標出：莫雷是「控制歷任總統的人」，他正來倫敦照料美國的利益。巴黎報紙更爲興奮，不客氣的罵我，認爲事實已證明我無能爲我政府處理當前局勢。

莫雷抵英聲勢赫赫

莫雷在倫敦所受優遇，僅次於國王所能享受的。由高級官員組成的代表團、新聞記者和其他人士，都熱情洋溢的到普利穆斯港去接他，爭着向他致敬。到達倫敦後，他到我辦公室來看我，握手致意，並和代表團人員見面。記者要訪問他，我陪他一起去會見，但是我並不出面，似乎他是記者們唯一想見的美國人。此後直到那件事爆發時爲止，我很少見到莫雷。我決定讓他的所欲爲，同時看他在這種倫敦局面下能混多少時日。

莫雷到達後不久，就送信給我，要我轉達美代表團，說他只想注意穩定貨幣問題。他立即和當時的財政大臣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和英國財政部的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Sir Frederick Leith-Ross)會談。據傳第一次會談地點，是在莫雷當時暫住的英國大使館。

其後幾天，各國政府的總理和其他要員對莫雷趨之若鶩，我仍舊不出面，好像我是在會諸裏徘徊無事而最不足輕重的人。

有一次英首相麥唐納問我：「你可否請莫雷到我那裏來？我想和他一談。」接着，他突然想起來，又說：「你如果高興，也可以同來。」

再過幾天，麥唐納把我叫到一邊，像一個老師訓學生似的對我說話：「你知道嗎？」他說：「在像這樣的會諸裏，對報界發表聲明是不合常例的。」(我會發表過一二次)「這樣是不行的。」

我反唇相譏：「如果這事和另一位代表團的團長撤開我，而追隨我的一位下屬，直接和我這下屬商談的情形比起來

我的發佈新聞也並不見得更不合常例。」

但是大體說來，麥唐納是一位值得欽佩的人，能力強，說話流利，在任何集團裏，他立刻會吸引人家的注意力；他博覽羣書，其一切知識尤其是有關政府的知識，非常豐富。

莫雷早就發現，有幾位外國代表和外國報紙毫不負責的說，他來倫敦，非特是一位聯絡員，還是擁有全權的總統代表，其權力超乎代表國之上。這種流言迅速的傳遍英國和歐洲大陸，對代表國尤其對我非常不利。莫雷這時正為各國總理和其他要員所趨奉，雖曾幾次明白的抗議和否認他具有這一地位，但在行動上，却真的像他代表整個美國政府。

莫雷計劃碰了釘子

莫雷談判成功一個穩定貨幣的協定，並電總統請求核准。他異常自信，以為總統必將接受他的建議，所以他通知英國和其他政府的高級官員，要他們在六月三十日下午某點鐘在唐寧街十號會面。他立刻打電話到我住的旅館，囑咐讓我也到唐寧街十號，去簽訂他認為即將成立的協定。我立即斷然拒絕，並且說，我是出席倫敦會議的一個代表，與穩定貨幣問題無關。他再請求我，我把他談話截住，不讓他再說。

印度國窮面七首現，終結了這齣趣劇。總統來電，不准莫雷所建議的協定，那時，我正啓程赴克來夫登(Cliveden) ，當我從旅館裏出來，走到第一步石級時，莫雷趕下來理着我說：「華府來了電報，不贊成貨幣穩定。我們必須想個辦法。」

於是，我轉身向他，我看他聲勢已盡，完了！我和他談話，閉頭便說：「你最好回家，第一，你在這裏無所事事。」接着，我再就這點向他解釋，然後我走到車前，預備到地下去度週末，我是在經人家多次迫切邀請以後，才應許去的。

我回倫敦時，總統那出名的「炸彈公文」已經到達，其中拒絕莫雷的穩定貨幣建議，而且對經濟會議說得很不容氣；總統說：如果經濟會議從較廣泛的問題轉向一個純粹人爲的只影響整個國家貨幣兌換率的暫時試驗，真是「一齣世界悲劇。」這一個公文使經濟會議大譁。

經濟會議幾瀕崩潰

公文到達後幾小時，我們代表團裏的副團長考克斯斯州長（James M. Cox）趕到我辦公室，他是奉我的命令每天和麥唐納見面的。他非常興奮的說：「英國和其他重要國家為總統來的公文而大譁，決定今日下午召開指導委員會，明天召開全會，在那時，再宣佈會議無限期休會。在他們的決議裏，他們要總統負這會議散場的全責。」

我集中全力制止這一運動，並且在大局關得不可收拾之前，把局面安定下來。

我去見麥唐納，我竭誠請他改變態度，諄諄句贊成這會議繼續開會的話；他聲色俱厲地說他無意為此。他狠狠地怨恨着總統的公文，那公文動搖了經濟會議，也毀了麥唐納的整個政治地位，他本來是想因這會議成功而鞏固他的地位的。我接到報告，據說在私人談話裏，麥唐納曾說他也許要為此不得不辭首相之職。

在指導委員會重開時，前途仍未能樂觀。

我求請並獲准在會議開幕時發表二十分鐘的開幕演說。我的主要理由是全球六十六國已一致同意這會議有絕對召開的必要，也同意要為解決無窮迫切需要挽救的財政和經濟問題採取行動，否則整個國際機構，只有更形崩潰。

會中代表不是支持麥唐納就是支持我，加拿大總理貝納特（Bennett）、日本石井子爵和瑞典代表，都竭力擁護我的主張，張伯倫也贊成我。

我們反對休會的理由，已足夠打倒英法計劃；結果來得突然，也很令我驚奇，連首相麥唐納也放棄他原來立場，加入了反對方面。經過兩小時辯論後，全場同意會議應該續開。

一片鬼話令人憤慨

其後三週會議，有類一種撒紙飛走的遊戲（註），去找些各大題目下可以討論的瑣屑小事而已。

莫雷諾爾前，給了總統一個電報，是一個嚴刻批評代表團的觀察報告書。他說，整個代表團除皮德曼之外，都不能

在會場上代表總統，事實上皮德曼除了他那鮮有人感覺興趣的有關白銀的提案之外，貢獻最少。莫雷昂蠢地把電報用國務院密函拍出，美國代表全知道這電文內容，除皮德曼外，大家都異常憤慨。

七月廿七日夜，我乘哈定總統號船回國。離倫敦前，我接到總統來電：「在你行前，我要再使你知¹我對你的關注和信任。你令人欽敬地面對著極大困難，由於你的勇敢和誠懇，才挽救了國際繼續討論世界棘手問題的原則，這原則如經崩潰，就將無法再作更進一步的相商。下週你抵紐約時，我將在海德公園，我希望在你到達時，赫爾太太和你能去那裏過夜……。」

爲了總統，我應該說：總統當時和以後都堅持他從沒想給莫雷以任何特權，更別說駕馭美國代表團之權。他說他的意思是派莫雷到倫敦當一名聯絡員，把也許代表團要知道的情報帶去，再於數日內攜回也許總統關切的消息，他告訴我，莫雷以那種大家所顯見的熱中的心情，來鼓動或默認，或者既鼓動而又默認的大吹大擂和活靈活現的情形，實在令他大爲驚奇。總統另給莫雷一點外面的工作，幾週後，把他調離國務院。

註：Nath. Chase 這是一種小兒競走的遊戲，其中兩人扮鬼，先走數分鐘，沿途撒落紙片，其餘的人扮狗，藉紙片追蹤前往，以捉得鬼回來者得勝。

第六章 努力互惠關稅廿六年

若因爲了這低各國間的團結關係，曾作過廿六年的努力，最後雖然獲得成功，但是太遲了，已無法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一個人的政治生活只是一些連串的面突。我什麼衝突都嘗過，但從沒有一個衝突比我爲商務協定的奮鬥更長久，更成功，更重要的。三十六歲時我在國會作第一次演說，要求減低關稅稅率，減少貿易壁壘。一九三四年在我們終於得勝能把它們減底時，我已六十有二了。一九三三年在安德伍特法（Underwood Act）（註）通過時，我們也有一個暫時的勝利，但世界大戰阻礙了這法案的實行，一九一一年共和黨當政，更立即把它撕得粉碎。

我從索得維的帶（烏拉非京城）歸來時，發現發生了兩件事。第一總統贊成商務協定計劃，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在我不在國內的期間委了皮克（Cedric M. Peck）爲調整對外商務關係的委員會的主管。皮克會做過農業調整局局長，不相信減低關稅稅率，而主張在施行農業調整法和農業復興法的政策時，在國境四週應設禁止外貨入口的藩籬。他的理論如得實行，將置商務協定政策於死地。他的新議在商務政策執行委員會成立剛一月後發表。

我立即開始和商務政策執行委員會合力起草商務協定法案。委員會一致主張應先請國會立法，指令和授權總統訂立互惠商務協定。大家都認爲只有進行行政協定，才能成功。如果必須由參議院批准的高約包含減低關稅稅率條文，要想通過，簡直是癡人說夢。

我們外交政策的經濟方面之上，我相信還有政治的一面，不過兩者間有密切關係。在我看來，如果我們在經濟場合挑起其他國家對我們的敵意，那麼事實上在政治場合她們就不可能和我們發展友好關係。在商務上和她們作戰期間，如何能與她們促進和平？在我進國務院時，我曾在檔案裏發現有三十四個正式而有力的外交抗議，這些抗議都是在史摩特·霍雷高關稅率法（Smoot Hawley Act）通過後許多國家提出的。她們的抗議不僅限於言辭方面，而且受美國禁止輸入貨物輸入的刺激後，也以牙還牙的報復。



中美簽訂租借協定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中美簽訂租借協定，由美國政府撥款援助抗戰中之中國軍隊。圖為美國務卿赫爾（左）及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右）在華盛頓簽署協定。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中美簽訂租借協定，由美國政府撥款援助抗戰中之中國軍隊。圖為美國務卿赫爾（左）及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右）在華盛頓簽署協定。

敬手無意中幫了忙

我自蒙得維的亞歸來後，專心從事對付國會的準備工作，以使商務協定立法得以提出並獲通過。一九三四年二月底，我們已把商務協定法案起草完畢。說來希奇，我們的敬手皮克登幫了我們不少忙。初稿太長太複雜，皮克提議：「把法案縮成二三頁長，也許還容易通過些。」我們採納了他的意見。他是對的。

三月二十日，法案在眾議院以二百七十四票對一百一十一票通過。六月四日以五十七票對三十三票通過於參議院。在參眾兩院討論時，輿論對史摩特·霍雷法的掙扎也幫了我們不少忙。

六月十二日夜九時十五分，我自蒙總統在白宮裏在我們的法案上簽字，他每一筆都似乎在我的稅率可減低一半之多，但附帶條件是必需其他國家也作同樣減稅。(三)對於一切不歧視我們的國家都得應用這減稅原則。



西歐各國之田莊
文內論商務法所及田莊
納田及稅

心裏劃下了一道快慰。我多年來爲互惠商務政策和減低關稅稅率的奮鬥成功了。

商務協定法是什麼東西呢？由我在國會和在國務院的經驗，得知羣衆對我們政府在外交上的廣泛政治行動比經濟行動有興趣得多，也易於了解得多。要了解一個外交抗議，一個政治條約，撤回大使，或是承認一個新政府，並非難事。要他們了解對外商務、關稅、貨幣兌換和債務間的交互作用，却就難了。

商務協定法本身很簡單。基本上包括三要點：(一)不經提交國會就可商訂協定。(二)關

前兩點用不著解釋，第三點却是爭論焦點。這就是所謂無條件的最惠國條款。這名詞起得不太好，給人以獲得或是給予有利或特殊待遇之感。這意思只是：「我對待你，不會比我對待我最優待的人差，只要你對待我不比你對待你最優待的人差。」

至於關稅稅率的減低，意思也簡單，就是在我們減少從甲國輸入的某些物品的稅率時，同樣乙國和別的國家如有這種物品輸入，我們也同樣減低其稅率，但乙國和別的國家對我們輸到她們國內的輸出品，所徵稅率，必需和她所徵其他同國家貨品的稅率一樣低，所加限制，也像她給其他國家貨物的限制一樣寬。如果乙國對我們產品所徵關稅稅率，比別國輸去的產品的稅率高，所加限制也比別國輸去的產品嚴，那麼乙國輸到我國來的東西，就要付史摩特·霍雷稅率——這是美國歷史上最高的稅。

實際上，一九二三年以前，我們對最惠國原則的應用，是有條件的。就是說譬如我們和甲國訂關稅條約，我們並不把我們和甲國間的減稅，適用於乙國和別的國家，除非乙國和別的國家肯像甲國一樣的對我們減低稅率。哈定總統期間，國務卿休士才開始把這原則無條件適用。

有條件減稅的失敗

有條件減稅是失敗的，爲什麼？兩國間貿易，無論在物產上或品質上，決不會跟其中一國和別國的貿易情形相同。如果我們對甲國減稅以交換甲國對我們的減稅，就很難確定的說甲國所給我們的那一種讓步，是來交換那一種減稅的。所以按邏輯講，我們不能跑到乙國說：「只要你肯像甲國一樣的對我們減稅，我們對你也可以像對甲國一樣的減稅。」乙國也許對我們和甲國協定規定的貨物不感興趣。這樣也等於要和許多國家有一串無盡的商談。

所以商務協定法特別規定廣適用無條件政策。但是有人說這樣等於我們有所失無所得。他們會說：「你把甲國輸入我國的馬匹、馬鈴薯種、威士忌酒減稅，甲國以減低我國輸到她們國內的汽車、小麥、豬油的稅爲回報。這當然很好！然後你又到乙國和其他國家去，自然而然的把我們對甲國的讓步也適用到了她們身上——而一無所獲。這真是要不得！」但是事實上，我們並非一無所獲。乙國和其他國家要在不歧視我們的情形下，才能得到像我們對甲國一樣的減稅待

遇。乙國也許只對丙國和丁國才抽最低關稅。但是如果乙國想在我國享受減稅權，它必需讓我們也享長她給予丙國和丁國的待遇，所以所謂無條件的最惠國名詞，實相當使人誤解，其他國家並不能無條件的享受我們減稅之權，而是有條件的必須在她們給我們平等待遇時，才能享受減稅。

實際執行起來，這個原則對美國的出口商有幾千萬美元的出入。

商務協定實行的最初兩年，我們的輸出因受平等待遇而得到不受歧視的保障，我們從其他國家得到的錢，達二位六千五百萬美元。

還有些人認為如果連來和我們簽訂商務協定的國家也得享受減稅，那麼輸入就會大增。他們說：「減少甲國輸來的稅也計不錯。但是如果乙國和其他國家也在同樣稅率下把鞋子輸入，我們就遭殃了。」

這一問題的答覆是乙國和其他國家並不全製鞋以供輸出。也許有一二國有鞋供輸出，但和甲國比來，她們可能是比較小的輸出者。

如果甲國是我國生產者的主要競爭者，我們對甲國減稅還不能有損於我國的生產者，那麼，對供應較小的乙國或丙國減稅，更不可能對她們有害。

對我們輸出的國家，總有一樣或幾樣東西是她們佔優勢的輸出品，這是事實。我們由於氣候、世襲的技巧或是原料出產地的關係，也能製造若干產品比別國的更價廉物美。

所以在談判商務協定時，我們特別注意減低這種輸出品之稅率，對其他不是她們佔優勢的出口貨，暫時不管。這樣我們集中於減少甲國最大宗輸出品之稅率後，我們也可以使甲國給我們自己的輸出品，作關稅上的最大讓步。我們對甲國所忽視的產品，可以和別的大量出產該種產品的國家去商量，這叫做和「主要供應者」商洽的原則。

戰爭機會可以減少

一九一六年起我一直說經濟戰可以孕育政治戰，商務上的平等待遇可以減少戰爭的可能性。一九三四年商務協定法通過，翌年非澌戰起（譯者按：這是指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三年後亞洲有戰爭，五年後歐洲戰事也爆發。



有人也許會說：「你看，商務協定並不能防止戰爭。」

當然我並不說商務協定是防止戰爭的絕對靈藥。而現在商務協定法通過時，希特勒已當政一年有半，正積極備戰中；墨索里尼已當政十二年，正在計劃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日本也在中國的東北已近三載，正準備退出海軍限制條約。這些國家用不着商務協定裏的自由商業，因為她們早已把她們商業適應戰爭需要。如果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講演中呼籲的商務協定法得以通過，而不是通過一九二二年的福特納麥康勃法 (Fordney-McCumber Act) 同時其他國家能如法泡製，那麼也許歷史會完全不同。

我兒時在田納西田莊上時，有兩位隣舍——我叫他們琴金斯和瓊斯——他們彼此為敵。多少年來雙方不睦——我不知為什麼緣故——他們在路上或教堂裏碰見時，彼此冷眼相視，不交一言。

春季來了，正當琴金斯最需要做騾子作春耕時，他的一隻騾子跛了脚。同時瓊斯正缺餵豬用的玉蜀黍。當時瓊斯已春耕完畢，可以讓一頭騾出來，琴金斯有一合可供豬食的玉蜀黍。一個友好的第三者出面使他們兩人碰頭，瓊斯讓琴金斯用他的騾子，琴金斯出玉蜀黍交換。

結果，兩個老冤家不久便成了最好的朋友。一個普通的貿易和普通的隣居感使他們有感於彼此的經濟需要，給他們帶來了和平。

是的，雖有商務協定，戰爭依然爆發。但是美國未曾和與我們簽訂商務協定的國家破裂過，確是事實。除極少的例外，凡和我們訂商務協定的國家，在抵抗軸心國家時都聯合一致，這也是事實。政治團結跟着經濟團結而來。

註：安德伍特法：由衆議員安德伍特提出，主張減少原料、糧食及若干製成品的關稅稅率，因減稅而損失之收入，由所得稅上補足。

第七章 不干涉主義的示範

古巴政局不安，美國政府派道威爾斯以大使身份前往古巴，同時任調停之職，威爾斯和菲爾對古巴政局的看法，各有不同。

拉丁美洲紛紛擾擾

我踏入國務院時，西半球的困擾情況正在加甚，拉丁美洲各共和國彼此不和，巴拉圭和玻利維亞間的叢林裏，正有大廈谷戰爭，是新大陸上空前最激烈的戰事，哥倫比亞和祕魯間又發生可能發展成真正戰爭的邊境糾紛，古巴方面，馬嘉多將軍（General Gerardo Machado）的獨裁政府當政了十二年之後，慢慢失勢了，有人正在計劃革命。

在我面前，有預定年底在蒙得維的亞召開的泛美會議。該會議本該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召開，但因西半球有效合作的前途異常暗淡，所以已延期一年。現在又有再延之說。

整個的局面正潛伏着不安的因素，前途似完全令人灰心。我知道要推行羅斯福總統的睦隣政策，在西半球要大費周折，但這個事實也是一個挑戰。

早在三月四日以前，我已決定對付拉丁美洲的原則之一，應是虔誠的奉行不干涉原則。

古巴也是使我們焦心理由，對馬嘉多將軍殘暴專制的普遍憤恨，愈來愈見尖銳。事實已很明顯，是馬嘉多不辭職，就革命逼他走路，炸彈，槍擊，不斷在哈瓦那發生，糖廠和蔗田被焚，學校關門，一九三一年未成功的革命留下來的游擊隊，正在山裏活動。流亡的政客湧入美國。除政治的不安外又加添了經濟苦難，這經濟苦難一部分也是美國的高稅率關稅引起的。當時局面有一觸即發之勢。

按照一九〇三年條約的所謂卜雷特修正案（Rutledge Amendment），美國為保持古巴獨立，或為保持一個足以保障生

命財產和個人自由的政府，有干涉古巴的合法權利。但是總統和我都決定我們不干涉古巴。雖然我們有這種合法權利，這種行動會使我們和整個拉丁美洲的關係更見惡化。這樣會整個推翻我們所強調的不干涉主義。這就好像去餓飽我們希望他抵換的傳統敵人。

威爾斯奉命使古巴



羅斯福總統和我都同意派威爾斯以大使身份去古巴，同時如果古巴各黨派願意，他也可代總統作調人。基於總統的建議和我的同意，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任威爾斯為助理國務卿。他能力強，經驗富，更有蓬勃野心。其後許多年，我們對若干問題的看法截然不同。前幾年我已發現對政策的若干重要問題，我和其他僚屬見解相同的時候多，和威爾斯見解相同的時候少，我自然負一切決定之責，在任何情形下，我都竭力盡這職責。

當年春西貢大使身份赴古巴之助理國務卿威爾斯隨身帶着我五月一日給他的一份調令。調令上說：「你應當記在心，美國和古巴兩國政府間的關係，是兩個獨立平等主權國間的關係。切勿採取任何行動，致使美國必要採用兩國現存條約上規定賦予美國的正式干涉權。」我調令他盡我們能力協助改善古巴經濟狀況，和古巴商訂商務協定，盡量貢獻他友誼的調解，同時向馬嘉多總統表示，我們竭誠希望他能採取行動，以終止恐怖主義形態。

八月十二日馬嘉多將軍在假，翌日前外交部長塞斯比德斯博士（Chato Chardón）組織聯合內閣。馬嘉多下台後，到處是不安，人們和財產常受攻擊，羅斯福總統命兩艘驅逐艦去古巴，但堅稱這絕不是干涉，更無絲毫干預古巴內政之意。

我們決定用不着正式承認塞斯比德斯總統，因為這政府變更根本是按照憲法程序，威爾斯大使工作努力，和各黨派都保持接觸，八月十二日國務院給他熱烈賀電，總統和我拍電給他表示「重視你所做的一切。」

我和拉丁美洲各重要國家的大使們，也常有關於古巴的談話，這是符合我的決策，理是我認為無論我們在拉丁美洲採取任何外交行動，只有在與我們前面的有關各國商量後才能執行。我們不再作單獨行動。

古巴政權此起彼仆

情勢很快的發展到了頂點，古巴軍隊裏到處叛亂兵變。在由巴蒂斯達中士（Sergant Fulgencio Batista）領導的兵變裏，塞斯比德斯政府倒了。九月七日，我接到威爾斯大使來的長電，建議讓有美國重兵在哈瓦那登陸，小股軍隊在其他古巴城市登陸。

「我所建議的，」他的電報上說：「是下列性質的非常有限的干涉。我們寧允許塞斯比德斯政府像它顛覆以前一樣的自由執行任務，仍能全盤控制政府的各部門。當然顯然的，由於火部軍隊的叛變，它決不能勝任愉快地掌權，除非由它（塞斯比德斯政府）請求，美國政府肯財化維持公共秩序，直到古巴政府有充分時間……組織新軍爲止……。這種政策在我們方面也許需要有大軍在哈瓦那登陸，有較小股的軍隊在該共和國若干較重要的港口登陸。」

威爾斯大使又說：「在我看來，這政策的不利之處，是事實上此我們將招致古巴的極端激烈份子和共產集團的非常敵視；在我看來，目前事實全貌既已向拉丁美洲的代表完全解釋過，那麼我們的援助也會被認爲在「瞎幫」政策限度以內。過去五月來，我們對古巴人民的關係已盡力顯示了我們的睦鄰政策。」

我明白電報的意義後，就帶到白宮給總統看。我當時竭力對他表示我的意見，就是我們不能也不應想到干涉古巴，即令是程度有限也不行。在我看來，似乎威爾斯太過受古巴當地情形的影響，沒看清一旦我們同意他所請，全拉丁美洲

的危險反響，從我以前和總統的談話裏，我知道他也像我一樣的決心不干涉古巴。羅斯福總統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他說他只預備派一艘巡洋艦去古巴海面，在古巴我們本已有些輕型艦隻。同時我們應嚴禁海軍艦隻派軍隊登陸，除非在撤退被困於古巴兩面突軍隊間的美國僑民有所必要。

決不干涉古巴內亂

我和總統會商後，就去我的旅館——那時已當傍晚——去起草對威爾遜的答復。草畢又回白宮，在那裏總統和我都迅速同意這草稿。於是我到國務院，在是晚八時把我們同意的答復發出。

「我們完全瞭解你電文中所列各種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經過充分考慮後，總統已決定給你下列電報：『我們深以為任何有關美國在任何情形下將有何種行動的諾言，無論其是否含蓄性質，至遲不能提出；這會被認為破壞中立，被認為有利於許多黨派中的一個，被認為企圖成立一個全球尤其是全拉丁美洲以為是美國的一手製造的政府。』總統和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代表的談話，已得美國和全拉丁美洲的普遍贊許，任何有違這政策的行動會產生不幸結果。」

「當然上述的並不是指你應該採取行動，去堵塞或至少去影響任何一黨派的任何運動；換言之，我們要嚴守中立。」

塞斯比德斯政府又倒，馬丁博士（Dr. Grau San Martin）成為總統。我們遲遲未加承認，以便看它是否能恢復秩序。各派間的戰鬥依然繼續。這是我乘船去出席蒙得維的亞會議時的情勢，我走後兩週，總統發表聲明，表示我政府願意重談給我們在古巴軍事干涉之值的一九〇三年條約。因此在蒙得維的亞會議開會時，我們不干涉的行為記錄大白於世界。

自動放棄不平等約

古巴是我們當年對拉丁美洲的積極新態度的核心。我們對古巴的行動，可向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證明，我們的不干涉

主張到底是否真心誠意。在我從蒙得維的亞會諸返華府途中，古巴的馬丁政府又倒，另因國民黨領袖孟迪達（Colonel Carlos Manrieta）不接作總統。我在基羅斯特（Key West）和加佛萊大使（Caffery）會談起承認孟迪達政府的問題。

這次談話後，我和華府的總統通電話，表明我支持加佛萊意見，認為應承認孟迪達政府，同日我接到助理國務卿費立波斯的電報，說總統要在下星期二三邀請在華府的拉丁美洲代表和他在白宮碰頭。總統會告訴他們，我們對承認古巴政府所提的先決條件，現在的古巴政府已能滿足，孟迪達的大眾和政黨的支持，而且政府得軍隊之助，顯然已能維持公共秩序。

國務院現在急急準備新約以代一九〇三年的條約，商談業已開始，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我與代理國務卿威爾斯和古巴大使史德霖（Manuel Marquez Sterling）在新約上簽字。威爾斯竭誠請求我讓他和和我一起簽字的特權，雖然這是不合常例的。我因他在商談中盡力極多，所以答應了。

同日羅斯福總統把條約送交參議院。短短兩天，參議院就投票通過。六月九日交換批准書，古巴爲此慶祝三天。

第八章 商務計劃的最大威脅

羅斯福的復辟皮克反對該國的互惠商務協定計劃，而主張訂立物物交換協定，總統頗加支持。老國務卿經過不斷的努力，才算挽回總統的心意，使互惠商務協定計劃沒有中途夭折。

商務協定計劃的最大威脅，並非來自外國，也非來自共和黨黨員，更不是來自若干製造商和種植者，而是來自羅斯福政府本身，來自以前的農業調整局局長皮克。

一九三四年三月總統委他爲對外貿易顧問。羅斯福總統發表他的這一任命給我的震驚，真不啻在我雙目間用大鎚一擊。在私交方面，皮克對人最和藹，最好說話。他忠於他自己的看法，固執已見。但我相信他的經濟見解並不高明，如果把他的經濟見解來代替我們商務協定所根據的完善經濟政策，那真是最大的悲劇，他和他同道者的努力，有時再加上總統幫忙，幾乎顛覆了我整套的國際經濟政策，也幾乎顛覆了我把這套政策伸用於世界，以促進經濟福利與和平的計劃。

皮克常帶着一大堆統計表到白宮去，總統也常支持他對報紙發表的發明。他給總統一份簽呈，要求給他控制蔣個對外貿易政策和談判之權。如果有此大權在握，他會剝奪國務院、商務部、農業部、和財政部對於對外貿易的發言權。幸好我能制止這一發展。

於是皮克轉而和外國商訂物物交換協定！——當時這種協定正在歐洲流行，而我們却想因爲基於平等待遇的商務協定的訂立，這種協定最後會被消除。無疑的是由於一種好意的觀點，即認爲美國擁有必須在國外推銷的剩餘物資，但是他完全沒見到這種物物交換協定和商務協定並不能同時存在。

商務協定法強調的是廣泛的政策和廣泛的商務法則，並不是對付個別的物物交換。我們商務協定政策的一個基點——商務協定的平等和反對各種歧視與關稅特惠——可能爲皮克的物物交換建議而公開遭受干犯，我們的計劃是大刀闊斧的給以檢出種種便利，尤其是若干累贅的過剩物資像棉花、烟草、豬油、小麥、汽車等物，要以減少國外的歧視和減少關稅特惠以及增加商務待遇的平等性以協助其輸出，在我看來，最緊要的是在各處保持這種政策。

差以毫厘失之千里

一九三四年夏間，我和國務院裏屬僚化了許多時間，力圖皮克的理論。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皮克和德國商訂一個物物交換協定，於是雙方衝突達到最高峯。德國公開的不肯付給到期應付美國的二十億美元債務，它一方面對美國債權者犯失信之罪，一面却又假裝要和我們訂立公平的商務協定。

一面它又按期償付其他國家的戰債和高欠，以緩和他們於一時。

希特勒的經濟魔術家派遣代表團到美國，皮克和他們商談。

這個代表團有希特勒和沙赫特拖住人家喉管不放的一貫作風。我們應經過進出口銀行傳給德國八十萬包棉花，貨價的四分之一由德國付美金給進出口銀行。其餘四分之三付德幣，外加百分之十二·五的保險費。進出口銀行把這筆德幣打個折扣賣給要買德國貨物的美國入口商，讓他們以此償付德貨價錢。

在商討這筆買賣期間，我竭力向總統辯論反對。我覺得總統對他在選舉和就職前所持的對外貿易政策，已興趣大減。他在研究內政改革之餘，幾無餘暇去研究國際經濟關係。從我和他的接觸裏，我不信他那時在密切注意對外經濟的一面。

十一月九日我接到他處來的一份非正式備忘錄，上面說：

「正像多少年來我們所遇到的許多問題一樣，都有它爭論的兩面。純粹理論上說，你和我的想法相同，但每隔若干時日，我們總得變通一個原則，以應付一個爲難的不愉快的事實。過去六月來日本棉織品在菲律賓的傾銷，就是大好證明。」

「我想，如果你和代表商務上非常實際一面的皮克，能在某天晚上消磨一二小時，談談這最惠國條款問題，那麼在

羅傑印便
斯之
福文
(左) 羅傑印便
(右) 羅傑印便



許多場合，都得有幫助。」

這個實際上說來是我應去拜訪皮克，而且要放棄我的計劃讓他擔任經濟上的領導權。我絕對相信總統和皮克對這重要問題看錯了。對平等待遇原則，絕無妥協餘地。你不是享受平等，就是受不平等的待遇。你決不能同時兼有兩種。商務協定法已奠定了一切商務協定的平等待遇原則。如要改變這原則，那麼總統所稱爲「爲難和不愉快的事實」，會變得更加爲難、更不愉快。

我確曾去訪過皮克。但正如我所預料的，我們關於他的建議的談話，談得毫無結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寫信給在喬治亞溫泉的總統，送給他有關我們商務政策的三點備忘錄。「政府的若干部門……據我所知完全同意我這裏所說的幾點意見。」我說，「只有我們的好朋友皮克除外，我在火車上告訴過你，報界大體上也支持我們。」

皮克說服了羅斯福

幾天後我離華府去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對農業和商務協定作一演講。在我回華府途中，我的助手麥布萊在佛吉尼亞州的夏洛特斯維爾迎我，帶着副國務卿費立澄斯在十二月十三日寫給我的信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開頭這樣寫着，「過去兩天來發生了我知道會令你喪氣的事實。」他重述十二月十二日皮克和總統的會談，其後白宮通知國務院，總統已批准了皮克和德國所訂物物交換協定。費立澄斯打電話到白宮，總統答應等我回來後再作最後決定。

我回國務院後，立即和僚屬列舉反對對德物物交換協定的理由，由我呈給總統。我告訴他，這樣我們的商務協定計劃會大受損害。我們已接到了巴西來的抗議，本來巴西正和我們在商談協定。巴西也是棉花的輸出國，它說如果我們和德國訂立這種特惠協定，它也要依樣辦理，現在且慢和我們簽訂協定。

我指出這種買賣實是津貼德國貨之輸入美國。我們以德幣付給德國貨物的輸入者，而所付給德幣又打了一個折扣；這無異於他們所買貨物的價格，比別的家來的同樣貨物便宜。

而且還筆買賣實，必需把德國馬克以金元舊兌換率折合美金。這至少對德國方面，破壞了我們的美金貶值。我說我們的棉花輸出者事實上也許把東西賣給德國，而並不能取得美匯。對他們，也毫無保證說一定不會強使他們

應本地出賣棉花。美國政府也許經過進出口銀行，還會蒙受其他損失。

我又指出物物交換協定，是基於皮克的想法，即認為非此不能在德國推銷棉花，相反的，我認為德國當時需棉花孔急，它至少會買五十萬包，而且會找到美金來付價款。

除了這些枝枝節節的理由外，事實上，這買賣還是一種差別待遇，而並非平等待遇。德國所有對美的輸出因此全能享有特別便利，其他對美國輸出這種物品的國家，勢必抗議，或可能報復。智利大使會對我們說，如果德國的肥料因這計劃在我們市場上享有特惠待遇，智利的硝石勢必被迫在美國廉價傾銷。

總統終於懸崖勒馬

「除去它對美國人民的重大歧視之外，」我說：「這對德國倒是筆好買賣，我們美國冒了大險，却一無所獲……這提議中的計劃，必然會引起美國大部分竭力反對希特勒政權的民衆的極端憎恨。」

幸而總統看出了這些理由的正確性，撤回他對皮克所訂交易的批准。這接也終止了皮克和其他國家訂立同樣協定的企圖。自此以後，包括在商務協定原則和計劃裏的新建議，逐漸的削弱和打破了皮克的計劃。我不斷證明給總統看我們計劃的完善，尤其是平等待遇的必要。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給他的備忘錄裏，我說：「我們可和其他國家確定軌範，把我們的商務活動限於極端狹窄的實物物交換和雙邊談判交易的法則，但是要知道過去一年來，我們的輸出增加了四億五千萬美元，這筆錢等於全歐各國的輸出增加額，而歐洲正在實行幾百種這類狹隘物物交換和雙邊商談條約的方法。」

我向羅斯福指出，第一步應該是取消或減少過高的關稅，過高的關稅會實際的或全部的持除了競爭，而且這過高的關稅實行多少時候以來，也未能取得使國內生產等於國內總消費額百分之十至十五以上的成效。我們也應減少下列的幾種稅率：適用於出名沒有效力的商業或工業的稅；適用於很多新奇物品、特製品、模型、圖樣、奢侈品、半奢侈品、原料和國內產品不同的各種貨物；以及不合和美國產品作嚴重競爭的各種貨物的稅。

兩月後，皮克的職位被撤銷。商務協定計劃獲得挽救，其後的種種結果充分證明我們反對皮克意見之非謬。

第九章 調查軍火生產的失敗

英爾外相西門爵士，對國際調查各國軍火生產事，不能和蘇俄及薩斯福合作。同時英法間又意見紛歧。英美法三大國家，意見不能一致。如果當時能採一致行動，也許能遂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英國對日太過體貼

羅斯福當政的最初幾年，正值德國整軍，日本備戰，義大利弓上弦刀出鞘時，最不幸的是許多紛歧意見竟使西方幾個大民主國——美國、英國、和法國！——間的關係遭受損害。我入長國務院後，立即看出只有這三國間的態度一致，最好是蘇聯也能參加，才能喚醒那窮兵黷武的三個侵略國家。而事實上我們所表現的不合作和互相攻擊的冷淡局面，比調協一致的時候來得多。

至於我們和英國的關係，英外相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常使我們煩惱。自中國東北的被侵略時起，我開始覺得西門缺少一個穩定的基本方針。從各方面所得情報，我相信他對日本太過體貼，我至今仍作此想。他竟承認日本在東北有若干特權，這實在使我們吃驚，總統就職後立即決定要重建我們的海軍，以達海軍條約上所規定的實力。西門却要求我們放棄這計劃，否則會發生海軍軍備競爭，但在建造中的英國軍艦，他却並不說要放棄。倫敦經濟會議時，西門也不合作。他為人冷酷。

西門反對軍備調查

一九三五年三月西門反對國際在各國就地調查軍備生產的原則，這使總統大怒。羅斯福總統和我都認爲我們應同意這原則。三月八日我會將對日內瓦的美國公使韋爾森（Hugh Wilson）的一封信轉給總統，其中說明西門反對的三點理由：（一）調查後會使英國軍備的脆弱狀態，暴露於歐洲大陸諸國家；（二）如果他們同意，他們對法國就是放棄了他們的一將牌，「這樣法國人就會沒有使他們再進一步，想訂立普遍限制軍備條約的刺激；」（三）關於定購軍火情況的詳細發表，會促成不利於英國軍火貿易的不公平競爭。



門 西門反對軍火調查之英外相

次日即三月九日總統給我的覆信上評論稱：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電報，我想你該把它留着以備來日之需。」他接着又說：「這表明了兩件事：第一，由於所謂軍備弱點，英國不願接受國際公開發對軍備的調查——這樣使我們無法把軍備調查應用於德國。而我們却認爲應用於德國，最關緊要。換言之，要把德國軍備維持於我們所規定的標準，唯一實際的辦法是調查德國的軍備供應，而英國却連自己也不肯受調查，因此破滅了我們調查德國軍備的希望。最後一段是坦白承認，英國的所以不願意接受定購軍備情況的詳細發表，是由於這樣會不利於他們軍火貿易。」

他結論時說：「將來我們也許可以從相與提出這項免子來（譯者按：這是變戲法上的話，意即奇蹟的創造），以證明目前英國政府對目前世界軍備或目前世界作戰武器貿易的限制或減少，

並不熱忱。

「我非常失望。」

在華府，這一時期的英國大使林賽爵士（Sir Ronald Lindsay）也很難對付。他和美國的接觸範圍，只限於有限的社會上最高階層，其中大部分是反對羅斯福政府的。我們很難使他瞭解我們的觀點。我以後和他的繼任者樂相助爵和哈羅法克斯助爵，比較相處甚得，他們兩人都比他能夠，比他好說話。

英法兩國同床異夢

我們對付英法的最大困難之一，是他們兩造的彼此不能相處。

英法間的爭執在巴黎和會時開始。法國要把她的戰略邊界移到萊茵河岸。後來她放棄這企圖，以交換英美的保證協定，而這協定却始終未曾實現。自此以後，法國覺得英美兩國要棄她去抵抗德國，保衛英美，而同時却又要她削減以實行此一防務的軍備。英國要的，是一個較強盛較繁榮的德國。法國要的，是在法國實力水準下的德國。法國總記得德國的優越工業力量，而且不信任不論由任何分子組成的任何德國政府，為此法國不能同意任何德法軍備接近平等的事實。在另一方面，英國不喜歡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優越地位，比較喜歡維持歐洲均勢，這樣她自己的實力才可作一個決定因素。法國雖竭力反對英國對於大陸的見解，却依然不斷的想能和英國前立一個強固的對德的的安全協定。

有一個問題是大家會不斷提出的：在這時期內，英法力量怎樣佔優勢，德國居於道義劣勢，她們怎樣會准許德國取得優勢，竟至威脅她們自身的生存？事實真相是英法都不願意從事預防性戰爭。那時在英國，孤立主義的情緒和當時美國國內一接強烈。法國在一九二三年進佔魯爾時，也不過是一種預防性的措施，結果却遭英國竭力反對，普恩加萊 (Poincaré) 政府因之而倒。因此以後沒有一個法國政府願意從事預防性的戰爭。

民主政治緩不濟急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民主國家的基本弱點，或是可看出人民佔重要發言地位的政府的弱點。在若干場合，民主政體受人詬誶，但她們最不幸的是外患當前或外患在眉睫時，犯行動遲緩的毛病！簡直太遲緩。雅典人創辦的純粹民主政治，是他們對文明的貢獻。但是這小小國家，在大敵當前時却還要全民投票，決定雅典與否一戰。他們缺乏領導精神，也缺乏由合適的政府官員領導的適當政策，因此反把雅典葬送在無法無天的意存俘虜和奴役雅與人的侵略者之手。爲這一弱點，顛覆了終至絕滅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如果在一九三〇年後的十年間，能適當尊重此間和其他愛好和平國家裏個人和集團的不同和衝突的意見，另一方面擁護和平的各國又能一致行動充分武裝，我相信她們可能以要求德日義強盜國家拚一拚的方法，避免這次戰爭。

我們一面努力改善和英法兩國的直接關係，以增進歐洲的和平機會，一面又不斷努力加強國聯的威望。總統和我是已故威爾遜總統的熱忱信徒，對於國聯常銘在心。一九二〇年以來，我們多少次都想用宣傳和實際行動，支持國聯，使它能聲威赫赫，我們的幾次嘗試雖甚努力，卻是徒然。

有一次總統對我說，他在考慮派遣美國大使駐在國聯的可能性問題。但是阻礙重重。其他非會員國沒有這種代表，我們駐瑞士的公使已能在那裏善盡代表之責，如再派大使，國內的孤立主義者又會抓住這機會，痛斥政府。

和平威脅加深孤立

歐戰兩洲對和平重重威脅，在美國並沒有產生應發生的效果，反走了相反的方向。按理他們應該促使大部分美國人民更樂意和心理正常的國家合作，以壓力加諸顯然在備戰的各國。雖知相反的，反使那些美國人（其中大部分是忠於他們的信仰的）驚退，聲稱他們和世界上其他部分痛癢不相關。他們全然沒有看出來，任何地方如有大戰，總會有許多重要地點影響及我們。

我自己和許多和我合作的其他官員，不斷想對我自己的國人和外國政府，指出愈來愈大的和平危機。甚至到現在，還有些人帶着掩飾不住的驚奇，和異常的愚昧或健忘，高聲質問當時負責外交關係的我們：「一九三三年後幾年你們在幹什麼？你們為什麼沒注意到逐漸在發展中的國外危機？你們為什麼不把這種危機以及爲應付危機而充分準備的必要，告訴給美國人民？如果孤立主義者的觀點有礙於這些危機和威脅的發現，有礙於美國對危機和威脅的了解，那麼你們為什麼不把這重大問題，喚起民衆的注意？」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對於這些顯然是愚昧的問題和驚嘆，過去的記錄可作圓滿解答。在侵略的危機逐漸暴發的時候，我在就座的最初兩年，就有過二十餘天的演說和書面談話，僅英文裏可用的字句，都重警告這當前的危機。

其後幾年我繼續的發出這種警告。我總是特別注意於準備我的公開演講稿。我知道這種講詞在國內會給廣為引用，外國政府大致也能讀到它們的全文。它們不特是表明我自己的，而是表明美國政府的政策和意見。

有時候寫一個演講稿消耗時間，達幾個星期之久。我會把一紙主要的稿期請到我辦公室。「我預定在某月某日在某報發表一次演說，」我會說。「這是我說的話。」於是我把我會考慮過的意見摘要告訴他們，有時我也許面請前一夜在我的寓所寫下的提要。接着或就問起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最後我指定我做屬事的一位去把這些意見起草成一稿演講稿。一個重要部的主管人員差不多天天要發表各種重要的談話，事實上本人沒有功夫準備他自己的稿子。

在演講的初稿到我處時，我重加修改，重寫。然後，我把這份稿子給我的顧問們傳觀，再請他們寫出他們的建議或添加意見。

在我最後核准時，一篇重要演講稿已起草十五遍。

在我作有關政府對某一政策的重大演講時，我總是在演講前，把演講稿呈給總統。我常常自己把它送去，因為我不要在他看到前落入別人之手，也因為我要在他聽說時我親身在場，這樣他如有問題我可當場解釋，而且我也可親自看他的反應。總統總是默然的看我的演講稿，但是在他發現有特別感興趣的地方，也時時加以評語。但是他很少有所建議或提期，即令有，也都是並不影響原稿的基本性質。

除這種演講外，我在對重要國家大使的私人談話裏，也用同樣的論調告訴他們。

人家懷疑我演說時並不注意。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間我擔任國會議員時，也發表過後來應驗的預言，而未為人所重。一九三〇年以後，我在國會裏的經驗又移植到了外交場合。



圖左為汪精衛，右為蘇爾茲堡。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汪精衛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左）與美國代表（右）在華盛頓簽署新平等字號。

第十章 孤立主義與風作浪

參議院成立了一個奈埃委員會，調查軍火生產和銷售情形，該委員會把許多未經外務政府同意不得發表的密件文件，都予揭載，各國大使紛紛抗議，使替爾大窘。奈埃委員會是孤立主義者的傑作，是美國中立法的先導。

算威爾遜時代舊賬

參議院成立了奈埃委員會(Nye Committee)調查武器和軍火的製造和賣，該委員會的幾度報告美國中立法開了路。我懷疑國會裏還有什麼委員會，在我們對外關係上比奈埃委員會更產生不幸的影響，只有密查威爾遜總統所提凡爾賽和約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差可比擬。

自從露露美國製造商發售軍火給外國政府詳情的文章刊登後，捷濟就有一九三四年二月北達科他州共和黨參議員奈埃(Curtis P. Nye)提出一項議案，主張成立一個委員會加以調查。

在參議院瀾洋洋地媽媽虎虎地通過了這個提案後，副總統趙伯指派奈埃調查委員會的主席，奈埃是少數黨的共和黨黨員，又是色彩最濃的孤立主義者。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其責任應由參議員皮德曼担負，皮氏自己在許多場合也是一位孤立主義者。按常例，凡為任何目的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尤其是調查委員會，主席總是多數黨黨員——當時是民主黨——而不是少數黨黨員。皮德曼雖是外交委員會主席却為別的許多事鬧得心不在焉，竟決定讓奈埃當了主席。如果皮德曼另外提一個主席，副總統也可能接受。

如果我想到會指派一個孤立主義者的共和黨黨員，我會立即反對，但我預料會按常例指派一名多數黨黨人。這位主

席也會把調查限於合法合理的範圍，不會以此作大大宣傳。

奈埃的任派是一個致命錯誤，因為在他主持之下，委員會開始擴大其調查範圍，企圖證明美國的所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給美國的銀行家和軍火製造商拖進去約。它忽視了或是強駁了我們參戰的幾個大理由！就是非法擊沉美國船隻，德國潛水艇的殺害美國人的生命，以及像德國那樣的國家如經獲勝後，對美國的危險。那時我們只得採用自衛原則。

中國政府提出抗議

所以結果委員會裏的大多數人和我們的困難見解衝突，我們認為要維持世界和平，美國應負起在這項努力中的一部份責任。他們的觀點是如果可以禁售軍火，禁止貸款給交戰國家，那麼美國就能自動的避免戰爭，不需要為此和別國合作。歐戰兩洲逐漸蔓延的危機，在他們看來只是撤退到自己海岸的迫切理由，不該採取任何行動援助其他國家，解決他們的危機。

奈埃委員會一面侮蔑威爾遜總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動機和真誠，一面把我們以前的與國英法描摹出一幅醜惡圖畫，同時又竭力替以前的德帝國洗清罪名，這樣一來，把我們一九一七年的參戰理由，給美國人民以一個完全錯誤觀念。奈埃委員會對軍火交易的揭露，顯然很有用處，但是其結果却只是在最需要美國的力量去肅清海外日益逼近的戰爭威脅時，它把美國擱到最深的孤立主義裏。

奈埃委員會發現全國正渴望不利於大銀行家和軍火商的宣傳。它的胃口受宣傳的風頭所刺激，更想多作一些表現。它的首席調查員洛申勃希 (Stephen Kaushacht)，可以說是組成該委員會也是指揮該委員會行動的人。他只想把委員會的名字，在報紙標題上出現，所以全然不顧他那常常只包含謊言和半真半假消息的發表，可能對其他各國政府發生什麼影響，更遑論對本國人民的影響了。

而且委員會裏的參議員，讓他們的首席調查員任所欲為，這也是在那種情形下常發生的事。該委員會的人選不差，包括若干幹練人士，其中有些人專好攻擊大銀行家和軍火製造商。委員會應負該會實際工作的大部責任，也應負激烈

當手道派察院調查委員會主席之胡德波訪詢



攻擊銀行家和軍火製造商之責。他們負責宣傳的人經常有所謂新聞，如瀾一般地發到美國和其他各國的報章雜誌去。

在行政部門，很明顯的誰也抵抗不了孤立主義的旋風。單說一聲要調查，就博得了滿堂彩聲。當然總統和我也都同意和委員會合作，尤其是因為它調查軍火貿易的初衷，非常可喜。

奈埃委員會把一九三四年的整個夏季，都花在整理各種文件和大堆的證據上，在九月四日開始審查。我們和其他國家間的齟齬也幾乎同時開始。阿根廷政府爲了委員會所提及的某幾點牽涉一個阿根廷海軍將領，所以提出抗議。英國的代理外相文西泰（Vansittart）對有關英皇喬治五世的無根據指責提出極嚴重抗議，墨西哥政府抗議涉及羅德里格總統（Rodriguez）的地方。其他拉丁政府抗議關於他們幾位高級官員的受賄指責。中國政府提出一個備忘錄，否認向我們借的一千萬美元小麥借款，用於購買軍火的申述。

赫爾親身訪問奈埃

結果我在九月十一日親訪奈埃，和他談了兩小時。我對他指出宣傳有關別國政府首長和高級官員的謠言，妨礙我們的外交關係。奈埃參議員因此給我一函，他對委員會紀錄中若干聲明可能產生的錯誤印象，深感遺憾。我自己也發表了一個聲明說，委員會或我國政府的任何官員絲毫無意開罪於任何政府或其官員。我把奈埃的信和我自己的聲明一起交給向我抗議的大使們。

但是情形愈來愈糟糕。奈埃委員會開始未經授權，公開引證國務院的公文。按外交禮節的常例，一個政府接受另一個政府的公文，非得該政府正式同意，不得隨意發表。因此爲了奈埃委員會，我們和若干政府開始有了爭執。我覺得很

條約東委員會這種極端有害的不謹慎宣傳，我忙於帶着受創的感情向其他政府解釋或道歉。

但是我們的困難沒有加無己，奈埃委員會又根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背景，開始調查當時紐約各銀行和協約國來往的賬目。英法大使處提抗議。

我努力想把奈埃委員會的行動限制於合理範圍，並已尋求總統的支持。三月十五日我交給總統一份備忘錄，要他召奈埃委員會到白宮開會，勸該委員會「在公開審查時，對有損美國政府和他國政府間關係的問題，別再作不必要的騷動」。

四天后總統接見奈埃委員會，但爲了些別的理由，他沒提及我的請求。

我要奈埃委員會委員們瞭解的是：希特勒正圖開凡爾賽條約中的軍事條款，墨索里尼正完成他從阿比西尼亞的計劃，就在這時，英法站在一面，美國站在另一面，却在爲二十年前的舊賬而大事爭吵，這決不能制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計劃。這時英法正想使德國簽定限制軍備協定，想阻止墨索里尼在非洲的侵略，奈埃委員會促成的反英和反法的情緒，決不能有助於他們的努力。

委員會閱了大亂子

奈埃委員會前幕的最惡劣例子還不止於此。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委員會在公開審查期間，竟引用了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八日英國外相貝爾福（Arthur J. Balfour）給國務卿藍辛（Tansill）的機密備忘錄的內容，備忘錄裏會提及英國和其他協約國政府的秘密協定。奈埃斷言總統威爾遜和國務卿藍辛曾聲稱在巴黎和會前不知道英國的秘密承諾，其言是假的。這正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背信，因爲我們曾詢問英國政府是否允許發表這備忘錄，他們曾加以拒絕，我們也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此通知奈埃，我向奈埃委員會提出嚴重抗議，它答應把貝爾福備忘錄的所有抄本，全部送回國務院。

一月二十日我向報界發表聲明，說明國務院對其檔案裏的機密文件被發表的態度。我說我們政府顯然不能「未經該信任我政府之政府允許，發表機密公文」。

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我說：「在威爾遜當政時，我曾在這裏服公職，不用說和美國民衆一樣，我對他的愛國和狀

直誠實，有最高的——以前和現在都是這樣——崇敬。」

奈埃委員會的審查給予孤立主義者一個跳板，引出了我們現時代的第一個中立法。也因為這緣故，所以我把它詳為敘述。

事實上，我並不需要中立法，我絕不需要像奈埃那般孤立主義者所倡導的中立法，這種中立法把行政機關束手縛腳，再告訴任何未來的侵略國家如德義或日本，教他們儘可去對他們心目中的侵略目標宣戰，我們將力求我們的人民不把軍火賣給這侵略國家。

我也不要看見一個預先告訴世界，如果一旦發生戰爭，那些事是我們所不為的中立法，這樣的中立法會阻礙我們運用防止戰爭的力量。況且一旦戰爭來臨，世界組織的國際聯盟如想努力終止戰事，我們也因這中立法而不能給它以絲毫助力。

第十一章 美國開始警覺了

在一九三五年至次年的倫敦海軍會議裏，英國妥協和英法義乃至日等國成立君子協定，限制海軍。等到遠東局勢日惡，德國進犯索姆，這希望更趨告幻滅。赫爾早在一九三五年初即已認為美國必須建立一強大的海軍，以保障和平。

倫敦會議限制海軍

倫敦海軍會議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開幕的，直到次年三月底方才結束，羅斯福總統對於這個會議的進展情形十分關心。實際上，從孩童時期起，他對於各種船隻便有了廣泛的經驗。當他還只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來往在新英格蘭海岸附近的海軍船艦便大大的引起了他的注意。當他到華府出任威爾遜總統任內的海軍次長時，他更一心一意地致力於海軍問題，戰術、事實和行政問題的研究。卸任以後，他已是一位對於各種重要海軍問題都有深刻認識的海軍問題專家了；並且迷戀著海軍。

羅斯福出任總統時，他的海軍知識怕要超過任何前任的總統。在他的總統任期內，我發覺，只要是海軍方面發生的問題，他都特別注意。海軍事務的重要決策大都由他親自決定。倫敦海軍會議期間，總統的海軍知識方面表現了罕有的學識，他可以勝任愉快地參加各種技術發展的討論，還可以提供許多建議，就是那些年高經驗豐富的海軍將領們，對於總統這種淵博的學識也沒有不深為敬佩的。

關於倫敦海軍會議，在我給總統的電報裏，和我們的口頭談論中，提到海軍軍備的限制時，「量」和「質」這兩個字不斷地出現。前者指的是總噸數的限制。後者則是指各種船艦和基地的大小限制。有一天，總統忽然暴跳起來。「量

，質，量，質！——他喊著說：「我討厭，我懶得聽到這些字眼，我們不能找到另外的字眼來代替它嗎？」但我們始終沒有。

對於海軍條約，總統在二月二十八日提出了一個建議。他先以備忘錄的形式送交國務院，然後由國務院拍電報給在倫敦的美國出席海軍會議的首席代表萊維思。這個建議已在倫敦條約的一節中表現了出來，是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的發展。總統說：「我們給萊維思去一個電報，要他設法和英國、法國、義大利（並且經由英國而和德國）成立一個君子協定，藉此使每一個國家在決定建造超過百噸以上的任何大小的海軍船隻時，都要通知其他各國。選擇一個君子協定如果能够成立，四強或五強便可聯合，或各自邀請日本參加。對於這個意見，你覺得怎樣？」

德國是不是應該列為倫敦條約的簽字國，這是一個微妙的問題。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國和德國成立了協定，規定德國海軍為英帝國海軍的百分之三十五。因為這等於凡爾賽條約所允許的德國海軍力量的三倍，法國和義大利都極力反對。英國協定主要的是一個歐洲問題，而且我們也沒有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所以美國方面還是保持不表示確定意見的態度。當英國提議讓德國也參加倫敦會議時，法國表示反對，她認為除非能與德國就萊茵區問題取得協調，除非英國同意英法互助，法國是反對德國參加倫敦會議的。

希魔毀約進佔萊茵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軍違反凡爾賽條約與洛迦諾公約進佔萊茵區，萊茵問題的商討就被希特勒這樁簡簡單單的解決了，這時倫敦會議正在起草最後協定的全文。入侵萊茵區是一個我們未被牽入的歐洲問題，華盛頓沒有採取行動。



• 自幼即迷戀於海軍艦艇之羅加福（左持魚竿者），一九三七年五月乘艇垂釣於墨西哥灣，獲一大魚。

但是很明顯的，那是對於戰爭又邁進了一大步。三月九日我給戴維思打了一個電報，請他就歐洲的新局勢和可能發生的有關美國與歐洲局勢發展的關係的謠言或新聞，作一評論。並且說：「不管怎樣，我們是毫無疑問地正在歐洲事務方面步入一個日起緊張的時期。」

三月二十日我們把條約的最後草約送呈給總統。

總統批准了草約，並提出了一個意見。三月二十日我們把這個意見通知戴維思，要戴維思說明：「條約裏沒有提到（總噸數）的限制，美國政府和他的代表們是非常失望的。」

三月二十一日我又給戴維思去了一個電報，告訴他總統認為他和斯丹德雷（Stanley）海軍上將應該寫一封信向英國首席代表艾登表示謝意的信，「表示對合諸期間英美的密切合作情形感到欣慰和滿意，並順便表示：在這個新的條約中，雖然沒有像以往各海軍條約中所有的限制條款，但美國政府願意避免和英國從事海軍競爭；英國和美國接受了那個現有的，大家都已知道了的等量艦隊原則；在現有情勢下，兩國政府還要繼續維持這種平等原則；若雙方都能遵守這個原則，對於兩國政府間的友誼和世界和平必然大有貢獻。」英國的覆信大約也作同樣的論調。

這件事剛作了，消息便馬上洩漏了出去，於是英美海軍合作的「秘密諒解」的各種傳說，便相繼刊載出來。駐日內瓦的韋爾森公使（Wilson）通知我，說這個消息最初是由合諸中的日本觀察者所洩露的，是英方告訴他的，但英方告訴他的時候原約定不能發表，而他卻失約了。我們於是把兩封信發表了。

裁軍希望漸趨幻滅

一九三六年四月，戴維思從倫敦返國。我和他作了一次關於世界局勢的長談。我們談到從我進入國務院以來的各個重大演變。我們面前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和責任，這是我們的政府必得承擔的。這個問題是，鑒於地球上有很多地方已是極端不安，我們須得決定，從各方面的實際需要着眼，美國政府該在什麼時候放棄裁軍而保持和平的義務，並且迅速充實武裝，俾有足够的力量來抗拒德日寇的武力征服的行動。

十多年以來，就一般來講，世界的趨勢是朝向裁軍。但近幾年來，我們看到了日德寇的種種行動和言論，那是志在

侵略。我們看到這些國家拋棄了各種裁軍的保證和一切維持和平的書面契約。同時，我們也看到，以這種侵略國家爲首的擴軍競賽是在瘋狂的進行，相伴而來的是那種高聲叫囂和厚顏無恥的征服的威脅。

我和威推思談到這些發展時，情形已經很顯然，以裁軍爲基礎的和平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前的問題是，守法的國家是否能夠適當的合作以遏止飛快發展中的軍事侵略計劃，還有這種合作能夠達到何等程度。但是我們的政府卻不得不忽視這個可能保持和平的方法，最顯著的理由是：美國的民意，就大多數而言，是頑強而猛烈的反對我們承擔任何這樣的聯合保證。

因此，美國唯一可簡的另一途徑是，一方面仍繼續宣講並實行和平，也請其他國家，特別是那些明顯的侵略國家採取同樣政策，一方面必須立刻注意侵略者的行動並及時加強我們的武裝，使其足以保障我們的安全。

造船儲錫購存橡膠

早在一九三五年年初，我便和總統談到過我的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我認爲，特別是由於遠東方面的情勢，我們必須加強建造一個強大的海軍。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我送給總統一個備忘錄，裏面附有一份駐日大使格魯從東京拍來的電報的副本，詳述他對於東方未來情勢發展的看法，還有一份是國務院所撰的關於遠東情形的備忘錄。

國務院備忘錄中的一段是這樣寫的：「我們必須尋緊努力，早日完成一個強大的海軍，使別的國家不敢妄想向我們攻擊；我們應該讓世人知道，我們雖然不願意作戰，我們也沒有攻擊旁的國家的理由，但美國人民不但不可以作戰爲榮，而且，在某種局勢下，還要以「不作戰爲榮。」

國務院主張建立海軍，有些閣員認爲非常奇怪。有一天，跟我和總統都是朋友的巴魯區（Herbert Brown）告訴我，總統對於我的便要建立較大海軍表示訝訝。

一九三五年我便開始計劃如何備存錫，這是一種美國產量不多的軍用金屬，戰時對於陸海軍兩部一定是非常需要的。計劃是由國務院經濟顧問費斯（Dr. Herbert Feis）博士擬定，並且經由費斯，我把這個計劃通知英國大使林賽爵士。這個計劃的基礎是，英國政府應該替美政府購買並交付一定數量的錫，錫價可以算在英因欠美國的債務賬上。

林賽爵士把這個計劃研究了一番之後，六月六日他來看我，並且說他已經把美國的建議送往倫敦去了。

林賽爵士顯得很憂鬱。他說英國人民認為債務已經告一段落。英國很難籌措款項來償付爲美國購買的錫債。

我提醒英國大使說，世界上錫的主要來源是在英國資本的控制之下。像我們所建議的那類小額的實物支付將爲象徵付款精神的復活，並符合這種精神，在以前，英國政府曾經熱心的担負過象徵付款，只是在強生法（Hiram Johnson Act）成立以後這種付款才中斷了。英國政府如能接受美國的建議，必能改善美國人民對於英國政府的心理狀態。

林賽爵士並不以爲英國外務部會採納這個建議。他的看法是對的。倫敦方面完全拒絕了。直到四年以後，在歐戰爆發以前的第三個月，我們才得和英國談判以我們的棉襪取英國的橡膠和錫的協定，我們才開始籌款軍用物資。

實際上，假如我們在國務院裏的努力能够像意想中那樣早，那樣圓滿的收到成果，當珍珠港事變爆發時，我們一定有了充份的儲備，因此也就可以減輕戰爭時間的負擔了。

第十一章 一個流產了的和平大會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羅斯福總統發有名的一檢疫演說，把侵略國家當作傳染病，務讓別國與牠們隔離。不料美國的一些和平團體竟反對他的意見，以為他使美國人趨於世界戰爭。後來前國務卿威爾遜又主張在十一月十一日召集世界和平大會。美國當時駐蘇大使曾向惠靈里尼提出這計劃，羅氏一笑置之。蘇俄個人也反對這計劃。和平會議，卒然沒有組成。美國還是照常訓練軍備。

羅斯福苦口倡「檢疫」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了他那個有名的「檢疫演說」，從就任總統時起，羅斯福先生便不斷地爲了恢復國內的正常狀態而拚力鬥爭，結果使他對於外交事務便不能全神貫注。從我這方面講，美國孤立情緒的增高使我日漸不安。很多和平團體的活動、信件、訴願以及民意測驗，處處表示這種孤立情緒的增長。我也擔心這種情形將在國外造成的後果。

九月間，聽說總統有意提前實現他的橫越全國而達太平洋岸的旅行，我和戴維思（Norman Davis）商量，並向他表示了我的一個有力的意見，我認為總統在旅行途中，特別是在孤立主義勢力盛行的一個大都市中，應該發表一開國際合作的演說。戴維思同意我的意見。我便跟戴維思一同去見總統，我們把這個想法建議給他。他也深有同感。他說，假如我們能爲他準備這個演說的材料，他一定在旅行期中發表。

回到國務院以後，我們先擬定這個講詞的草稿。在我們的草稿中並沒有那個有名的「檢疫」字眼。演說發表以前，草稿是經過統修正過的。加入這個字全是總統自己的意思，我是在演說發表以後才知道有這個字眼的。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底和平、自由和安全，一總統說，一正受著其餘百分之十的人民的威脅，這百分之十的人民現正設法推翻國際的秩序和法律。當然，想在法律下過和平日子，想按照百年來便為舉世普遍接受的那種道德標準來過日子的那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能够而且必須找到一個途徑，使他們的意志能够佔勝。……」

「不幸的事實是，不守法律已經成了世界上的一種流行病，而且很快地傳播開來。當一種生理上的傳染病開始傳播時，爲了保障公眾的健康，使不致爲疾病所傳染，社會上同意，而且協力把病人隔離起來（檢疫）。」

反對檢疫觀念的反響很快地便發生了，而且非常猛烈。過去，爲了形成並加強國際合作底民意，我們曾經不斷地推行一種教育運動。這次演說的結果，像我所看到的至少把這種教育運動拉回了六個月。我們那些推行這種運動的人，利用了一切的機會，演講、聲明，能够行動時還採取了行動，我們是盡力而爲了；但我們總是小心翼翼、留心不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羅斯福發表「檢疫演說」後，日本海軍在是半島將保護長江美領之美海艦「巴納」號作沉。上圖爲「巴納」號，下圖爲當時美人開訊後憤慨抗議之遊行標語（本報資料室）

致於做得過火而引起孤立份子的攻擊，因而使我們退到比以前還不如的地步。假如我們慢慢進行，不招致不當的反對，那麼我們的言談，我們的行動，縱然沒有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有力，那樣有深遠的影響，但比較我們如果發表聲言或俗的言論和採取虛率輕率的行動，對於世界所能發生的影響却要更大些。因為我們所引起的激烈反響，使世人得著一種印象以為我們是一個自相分裂的國家。

美人反戰姑息養奸

有六個和平主義的大團體發表宣言，說總統「指示美國人民走向世界戰爭的道路。」美國勞工聯盟決議：「美國勞工不願捲入歐洲或亞洲的戰爭。」有兩個眾院議員，費休（Elliott）和丁克漢（Tinkham）向總統威脅說，他們要使他受到貨難。費城「詢問報」（Inquirer）向國會作電報測驗的結果，表示不到兩個人中便有一個人反對在遠東問題上與國聯採取共同行動。此外，還有人發動了一個二十五萬人的「使美國置身戰爭之外」的簽名請願運動。

這種反響當然很快的便傳揚出去，而且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的軍閥耳中聽來非常悅耳。無疑地這更鼓勵了侵略國家，也更增加了歐洲民主國家對於我們的懷疑，他們會懷疑我們除了言論以外是否也能會有一天和她們站在一起。無疑地日本因此也採取了更大膽的行動，一個最厲害的事例是日本飛機竟在兩個月後把美國的砲艦「巴納」（Panther）號炸沉了。在一九三七年十月這個月裏，副國務卿威爾斯與想天開地發明了一個保持世界和平的主意。他起草了一個備忘錄，直接拿給總統那裏去，他希望總統在十一月十一日歐戰停戰紀念日那天，召開一個包括駐在華盛頓的各國外交代表的盛大白宮會議。總統在會中要發表一個動人的演說，呼籲各國坐在會議桌前來商定一個和平的基礎。總統要把這個和平基礎的大綱寫出。一是國際行爲原則底協議；二是裁軍；三是經濟安定。他要下一結論說，除非轉而採取和平政策，和平是不能保持更久的。

差不多在我得知這件事以前，我覺得總統已是衷心贊成這個計劃了。擬議中在白宮扮演的這幕有聲有色的活劇打動了總統的心。幾年以來，他都在默想着一個主意，打算邀請歐洲各國政府領袖和他在海上相會。他和他們將坐在一隻戰鬥艦或是巡洋艦上的一張桌子的四週，來商定一個持久的和平計劃。他還沒有來得及提出一個正式的建議，但他會跟一

些人談過這個意思，而且總統的這個想法也在外面停開了。但是反響並不十分良好。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駐羅馬的費立邊斯大使在他和墨索里尼作了第一次談話以後，寫信給我：「很顯然地，羅曼（Rome）義大利駐美大使」已把總統想跟歐洲各國領袖集體會晤的意思報告他（墨索里尼）了。當他提及這項意見時，他笑了。他並沒有在口頭上加以任何可否，只是向我露齒而笑，並且聳了聳肩。」

我個人的看法，認為總統計劃中的這種會談，其結果只是一種失敗而已。和各國政府在短短的一兩天內圍着桌子談話，絕不會深入到繁複的協議，爲了這種理由，勞的政府對於這個觀念不會十分熱心。在那樣一個大西洋中會議裏，唯一可能得到協議的，是一種祕密協定，但他們知道總統是不會簽訂祕密協定的。

沙赫特氏東施效顰

德國銀行總裁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也曾經向波維斯大使（Joseph E. Davies）提出一個類似威爾斯所設想的那種計劃。波維斯電報通知我，說沙赫特告訴他希望波維斯給他（沙赫特）向法國和英國提出一個建議，這個建議要保障歐洲和平，保持邊界現狀，裁減軍備，樹立一個新的可行的國際聯盟，廢除各種制裁，並且要使德國獲得殖民地。他說，法國可能同意，英國反對。

沙赫特當時說他希望美國總統能够在華盛頓召開一個國際會議，波維斯把自己的看法告訴他說，除非能有成功的保證，總統大概是不會樂意捲入這樣的一樁事務的。沙赫特答說，如果事前不能得到一個實際的協議，這個會議自然不必召開。這次會議不能稱爲「經濟會議」，要稱作「和平大會」。

當我發覺總統正全心全意地準備在歐戰停戰紀念日的那一幕白宮演劇時，我極力反對這個計劃，因爲它是既不合理又不可能的。我把我所看到的情形扼要地寫給總統。在一九三七年末尾這個階段，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已是大踏步地走上了重整軍備的道路，形勢很顯然，她們是志在進攻，不是爲了防守；她們是志在征服，不是爲了和平，在這樣的一個時候，民主國家爲了自保，正應竭心盡力的武裝起來，如果在這時我們把她們導入一種安穩的幻覺，那是非常危險的。幾年以來我們看到了軍事侵略的危險，現在看來是更爲迫切了；因此，在軸心國家不斷瘋狂地加強武裝時，如果和平

國家又在自身方面進行一種新的更進一步的裁軍運動，這該是多麼不合實際。任何一個消息稍微發達的人都會知道，五年來的各種努力都是爲了勸請軸心國家加入裁軍協定，但她們却有意地拒絕了，而且更進行一種大規模的重整軍備運動。軸心國家對於和平國家這種爲時已晚的裁軍請求，怕會笑掉牙齒的。

談到和平軸心強身

即使能成立一個協定，而這個協定又有什麼價值呢？這三個軸心國家已經一再的表明了她們完全不願她們的諾言，和她們對於條約的蔑視。「條約」一詞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看來不過是嗤之以鼻的一樁笑柄。軸心國家對於他的呼籲會有什麼反應，當總統在聽了墨索里尼的回話時，已經有了一個大概的路數。墨索里尼說，義大利已經動員了百萬人民，花費了二十億里拉（義大利貨幣單位，合美金一角九分三）。他只有向阿比西尼亞進攻，否則他的威望會受到損失，會引起其他國家的輕視。墨索里尼的話正好說出了他的軸心伙伴們的心聲，她們也一樣地動員了數百萬人民，花費了幾十億馬克或日圓，她們想取得她們所能取得的東西。

事前並沒有和旁的國家商議，也沒有向旁的國家探聽意見。威爾斯底那個放蕩的計劃，就準備在歐戰停戰紀念日那天搬出了。

至少，在事前不探聽英國和法國的意見，是不夠聰明，不算公正。目前她們正和德義進行着微妙的談判；她們正設法使西班牙問題而成立的「不干涉委員會」能够負起任務；不經通知而突然把這樣的一個大計劃向她們提出，是會使她們深覺手足失措的。

一九三七年六月，戴維思當時是在倫敦，他傳出張伯倫首相有意來萊盛頓拜訪總統一趟，羅斯福先生願意發出這請柬，但他認爲張伯倫首相最好在美國國會九月裏閉幕以後再來，而且他認爲在這次訪問到來以前應該有一個週密的外交準備。

七月八日張伯倫寫了一封信給戴維思，戴維思又把這封信轉給總統和我。信裏說他必須打消秋間和總統會晤的意思，他說他認爲時間並未成熟；一個會議不能得到相當的收穫而徒然引起外界的注意，是最糟糕了；他並不認爲在現階段

裏我們能够希望達成我們心目中所想像的目的。

至於談到東方，日本不願意中日之間由西方人來調解，她當然也不會出席一個想使與會國家同意某項實質問題的和
平大會。

我和總統關於這個题目的各次談話中，他並沒有辯難我提出的觀點。這一計劃終於放棄，我們也從事我們的經常努力，便是重整武裝並喚起輿論，使民眾注意世界烽火的重重危機。

第十二章 慕尼黑會議前後

從希特勒準備進攻捷克到他邀請張伯倫，達拉第和墨索里尼開會。可以看出張伯倫的姑息政策和鄧斯通在最後關頭以後仍不放棄呼籲和平的希望。希特勒卻從這裏看出西方國家的弱點，遂一發而不可收。基爾始終是反對姑息的。

希特勒準備攻捷克

一九三八年八月裏，捷克危機似又迫在眉睫，報章的電報，不斷地傳到我的桌前。英國和德國暗地裏在進行着一個熱烈的和平談判。英國政府已派任錫曼（Walter Runciman）在布拉格調停捷克和蘇台德區納粹黨之間的爭執。任錫曼我曾在 一九三七年看見過。同時，希特勒看來是在準備一個對捷克的進攻。

九月十五日張伯倫首相離開英國，親自去和希特勒進行談判，這是後來一連串談判中的第一次。恰在張伯倫離英之前，英國外務部向甘納第大使建議說，如果美國總統對於張情勢的演變願意發表任何意見，他們是十分尊重的。在那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我說：「關心保持世界和平的國家，對於英國首相和德國總理之間今天舉行的歷史性的會談，自然會予以深切的注意。」

在歐洲的電報雪片般飛來，情勢也越來越緊時，我不斷的去白宮訪晤總統。我也時常派副國務卿威爾斯和助理國務卿柏爾（Baer）帶着情報和意見書到白宮裏去。副立德大使和甘納第大使差不多天天都跟我通電話。

九月二十二日張伯倫又回到德國去見希特勒。情勢已經很明顯，英國政府是在對捷克加以重大的壓力，想使她屈服於德國的要求，美國報紙對於這件事情大都加以評論，說捷克是被出賣給希特勒了。



一張伯倫首相對於和平的熱心……團體的努力和個人犧牲之精神，是有些英雄的意味的……（圖為當年張伯倫（中）奔走和平，於風浪中，乘「青德堡」號輪渡橫訪法，在甲板上以水手姿態示外相哈里法克斯（左）如何保持不跌。（本報資料室）

九月二十四日甘納第從倫敦打來電話，提到英國內閣已明顯地現出分裂。他說張伯倫相信「不惜任何代價的和平」，而旁的閣員却說他們不要「再從希特勒那裏取得任何憤怒的迴答」，並且相信「無論如何他們必須作戰」。他說英國政府已把林白上校（Colonel Charles Lindbergh）請去商議。林白對於戈林的空軍有很深的印象。他老早就對我們說，他相信德國縱然跟歐洲各國的聯合空軍作戰，也是綽有餘裕的。

同一天，蒲立德也從巴黎打來電話，他認為爲了保持和平我們應該有所舉動，即使不能成功也得如此。他建議總統可以向英、法、義、德和波蘭政府領袖發出呼籲，請各國派遣代表出席。

第二天，二十五日，我們駐捷公使克爾（Wilbur J. Carr）——在我初進國務院時，他曾經作過助理國務卿——打電話來，說達克總統貝奈斯願請羅斯福總統勸說英法不要背棄捷克，而使她歸於毀滅，也因此使一個不只限於捷克的世界衝突更爲逼近。

赫爾反對姑息政策

總統跟我先前已經談過我們應探何種行動的問題了。總統準備以個人名義向有關各國政府領袖提出呼籲。我個人的意見則是我反對這種呼籲，但我不相信所得的結果可證明這種呼籲是正常的。我向總統說，我覺得我們所已接到的種種資料，足以證明德國已是高度武裝，她準備不顧一切危險走向大規模的侵略戰爭。除非是有足夠的強大武力，要不就是完全向她投降，此外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遏止她的侵略企圖的。

也就是說，沒有適當武力任何舉措都必然是姑息性質，而且只是暫時的。

我擔心總統過份熱心的行動，曾把我們也投入張伯倫的那種姑息陣營裏去，總統也早晚會染上張伯倫所已得到的那種污名。我想這種步驟會誤使愛好和平的國家相信我們是別無其他途徑可走了。進一步謀：即使這種努力得告成功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那些愛好和平的國家會以為戰爭的危險已成過去，再不必進行那種大規模的迅速軍事準備了，而這種準備是應付無可避免的德國的危險所必需的。我的看法是，戴希特勒的計劃和決心而言，子彈已是上膛了。更危險的是，向希特勒作熱烈的呼籲會更加強他那本已狂妄的自負心，這樣會使他相信沒有人願意反對他，他是最強大的。而因此，他便可以一步一步地得到所希望的一切。我對於希特勒的任何保證都沒有信心，把土地割讓給希特勒以求取他的保證的想法，在我看來是十分可笑的。威爾斯推著總統向前走，我却勸他走得慢些。

羅斯福決呼籲和平

但總統相信蒲立德的那種想法，成功與否我們不管，總得有所舉動。他對我說：「這沒有什麼害處，在最後關頭以前呼求和平是可靠的。」

因為總統決定了要進行他的呼籲，我們便盡力設法找最能發生效果的時刻把它們發出。多少天來我們起草了一個又一個稿子，改了又改。威爾斯與柏爾擔任大部分的起草工作，總統親自動手的時候也不少。

九月二十五號夜裏，我們把總統的公文加以最後的改正。我們拚命地在文字所能表達的限度以內使它十分有力。甚至在大家對於草稿同意了以後，總統還用鉛筆改了一些地方。於是在九月二十六號清晨一點鐘，總統把內容相同的公文分別地直接送給希特勒和貝奈斯，並由我送給張伯倫和達拉第。我們也各送一份給我們那駐在華沙與布達佩斯的外交代表團，調令他們送往波蘭和匈牙利的外交部。波蘭和匈牙利也會向捷克提出要求，她們的叫聲威脅更加深了這個問題的危險。

總統說：「爲守人道，我代表一億三千萬美國人民向你們熱烈的呼籲，請你們不要中止了談判，這些談判是希望能以和平的、公正的、和具有建設性的方法解決所爭論的各項問題。」

「我再懇切的說一遍，只要是談判繼續進行，不同的意見終會妥協的。一旦中止談判，理性便被擠棄了，武力便顯露鋒芒。」

公文送出一後，我們簡直是屏息止氣地等待着回音。沒有好久便有三方面的回信來到了。就在那同一天，九月二十六日，貝奈斯、達拉第，和張伯倫說他們和總統的看法完全一致，並且表示願意進行和平談判。那天晚上希特勒原定發表演說，爲了使英法捷三方面的表示能在希特勒演說以前便使世人知道，所以我們在一接到她的答復以後，便馬上把它發表了。我們最期待着的是希特勒的答覆，但沒有收到。

英法兩國開始動員

歐洲已在動員了。甘納第打電話告訴我，英國政府已向法國保證，如果戰事發生，英國將支持法國。他還告訴我，張伯倫已通知希特勒說他的要求——張伯倫看他一次，他的要求多一次——無法接受，但請求他繼續談判，我問甘納第英國是不是相信法國已經有了相當的作戰準備，甘納第不能給我具體的答復，只說：英國人認爲，像他們過去所做過的像形一樣，他們可以在戰事發生時即時奮起，他們已經通知他們的艦隊隨時警備，並且已經召令地方軍隊入伍。

蒲立德打電報告我，達拉第希望，在短期內能够召開一個會議，來決定歐洲的真正和平；他認爲這樣的一個會議必須由美國總統召開。

張伯倫首相在第二天，九月二十七號夜裏向美國人民發表一個廣播演說，但總統回說不必。他認爲由英國首相直接向美國人民演說會引起誤解。

希特勒的答復在九月二十六號夜裏到了。全文很長。對於捷克政府，凡爾賽條約和國際聯盟都予以猛烈的攻擊，結論是把破壞和平的責任放在捷克，而非德國的身上。

我們現在必須決定所應採取的第一步驟了。蒲立德建議總統給希特勒再發一個電報，要求希特勒同意派一代表參加像蒲立德前次所建議的那種海牙會議。他說達拉第對於他的意見非常「高興」。

在前一天裏，我們還接到不少別的政府底電報，也表示支持總統的呼籲。九月二十七號下午，我們訓令我們那些駐

在其他國家的使館們，要他們請那些國家的政府也向德國和捷克發出相當性質的呼籲。有十九國政府——其中十七個是拉丁美洲國家——照着這個建議採取共同的行動。

我們還發了一個電報給駐德大使費立登斯，裏面是總統給墨索里尼的私人機密文件，要求墨索里尼「幫着我們繼續努力，使目前的問題能藉談判，或別的只要不是採用武力的和平方法獲得一個協議。」

渴望和平主張談判

羅斯福總統決定再作一次呼籲，這次只是發給希特勒一人，由威爾斯起草，九月二十七號晚上便發出去了。這次呼籲建議即時在歐洲一個中立地點召開會議，由奧捷克爭端直接有關的各國全體出席。裏面有一段這樣說：「只有繼續談判仍舊是當前這個問題能夠謀得永久解決的唯一方法。」

在我們緊張地等待希特勒的答復的當兒，我把英國大使林賽找來，我要他把張伯倫最近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公文抄給我們一份，我向大使說：「我把你帶來是要向你說，戰爭似乎是迫在眉睫了，如若發生這個可怕的戰爭時，我希望你的政府能夠知道，我們爭取各國貿易地位的政策和目的。在我們爭取各國貿易的途中，不管我們做些什麼，我得聲明，我們絕對沒有這種意思，想趁着戰爭的機會，趁著英國不幸而捲入戰爭的時候，來奪取英國的貿易地位。」大使似乎十分感動。

德召集慕尼黑會議

九月二十八號下午，在世界局勢懸而未決的當兒，希特勒邀請張伯倫，達拉第和墨索里尼於第二天跟他在慕尼黑相會，來解決捷克危機，戰爭至少是延緩了。

戰爭的延緩不是由總統所取的行動所致，是很難說的。無疑地，它們發生了相當的影響。十月二十日，英國大使林賽交給我一封英王喬治六世寫給總統的信，是爲了答復總統的邀請而寫的，因爲總統曾經函請英王暨王后於一九三

九年訪加拿大時也來美國一遊。「我覺得必須向你說明，對於這次危機中你所採取的干預行動，我是多麼熱烈的歡迎。」英王寫著說：「它們對於保持和平貢獻甚大，這一點我是毫不懷疑的。」

但在我看來，慕尼黑協定似乎不過是一個暫時的解決辦法。是用武力對抗希特勒來保持和平的那種方法呢，還是用投降來換取和平的那種方法呢？結果是採用了後者。希特勒沒有發動戰爭，因為他不用一槍一彈便可以得到他要得到的全部東西了。捷克斯拉夫現在是毫無防禦地擺在德國面前，像魏茅特岸上的鳥兒一樣，不餓時他可以坐待時機，高興時就把它吃掉。英國和法國在他面前讓步了。張伯倫首相對於和平的熱心，他爲了獲取和平而願盡的努力和個人犧牲精神，是有些英雄——雖被人誤解了——的意味的。但在希特勒看來，却是一種軟弱的表示。因此，我相信，像我在上月裏同法國大使所說過的一樣，這樣產生的和平只是「暫時的和平」。張伯倫稱它爲「我們當代的和平」，但時間是很短的。

第十四章 戰火中找不到和平

剛國務卿威爾遜幻想和平，要求赴歐。但赴歐以後，國內外謠言紛起，盛傳威爾遜會對希特勒讓步。群爾使對總統我衷誠設法游說，他自己又向報界聲明威氏此行只在尋求事實，不參加任何和平談判。等到威氏返華報告他和英法德義四國領袖以及歐皇奧諸外長等談話的經過，才知道和平真正沒有希望了。

安全幻覺貽害無窮

早在一九四〇年一月，總統在白宮告訴我，說他想派威爾遜到歐洲各大都城走一趟，看究竟還有沒有和平的希望。他問我是不是同意這個意見。

（稍後，總統很明白的向我表示，說威爾遜會幾次秘密地到他那裏去，請求以特使的名義把他派往外國。因為這個原因，一九四〇年威爾遜請求總統把他派到外國去，我覺得很滿意。也因為總統僅僅問到我對於威爾遜的出使有沒有什麼反對，所以我很滿意。）

我很快地回答他說，如果他真的希望威爾遜出國走一趟，我並不反對。不過，我說我有幾點意見應該提出。

我把近幾週來常向總統表示過的一個看法又向他說了一遍。我說：「戰爭的危急關頭實際上已是迫在眉睫了，三個精心國家已經建立起前所未有的龐大的武裝。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的發言人已經厚顏臉皮地表示他們極想從事無限制的征服戰，他們是堅定而準確地像槍彈一樣的朝著那個方向前進。他們這樣的做法是緊跟着我們從一九三三年到今年，一直在孤立份子反對的限度以內，竭盡種種的努力來促進和平的作風而來的。」

當年威爾斯(左)訪歐抵柏林時德外長里賓特
露甫(右)時合影



我接着說，在這種情形下，世界上已經是燃起戰火了，軸心國家已經準備好了，而且實際上正挾其強大的兵力向前躍進，我們還進一步的談論和平，並且派人到那些走上戰爭的國家去遊說，這種舉動是打算仍舊抱着虛幻的希望。對於那些不應當因為地理環境關係可以安然無事，或由於中立關係而產生安全的幻覺，使袖手旁觀，却正應積極準備保衛自身的各國與人民，這種虛幻的希望是危險的。

老是重彈可以迅速和平的舊調，把人民引入一種虛幻的安全的感覺，其嚴重的後果可以從下面的一個事實得到證明：在這樣的一個時期，英國兵口中吟嚮的一個最流行的調子是「把我們洗過的衣服晾在齊格飛防線」(意即我們的國防線在齊格飛。按齊格飛為德國西陲堅固的防線，當時與法國之馬奇諾防線齊名)。我覺得這的確正在造成不祥的結果。

御命使歐謠言騰沸

我聽說，世人對於威爾斯此行的目的和結果，會發生種種謠言，這種謠言會使歐洲和我們本國的人民感到惶惑不解。

在戰爭中的這個階段，我個人是不想派威爾斯或擁有他的官階的任何旁人，到歐洲去進行那樣的一種任務。威爾斯的想法是這樣的：在「假戰」進行時，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些和平的基礎。但情形很明顯，希特勒正瘋狂地準備用那唯一的方式——全面的、猛烈的戰鬥——來結束。特勤正瘋狂地準備用那唯一的方式——全面的、猛烈的戰鬥——來結束。這種「假戰」，而唯一可以終止他這種準備的辦法則是向他拱手奉送他所要求的一切東西。這無異由納粹統治了整個歐

洲，而且幾年以內又要發生另一次戰爭。

二月九日，總統發佈了威爾斯出使的消息，內中說：「應總統之請，威爾斯訪問義大利、法國、德國和英國，只是爲了向總統和我報告歐洲情勢的現狀。總統因爲心裏記着我向他提出的那些意見，他強調並沒有授權威爾斯，讓他用美國政府的名義，提供建議或承擔約束，並且強調調勞的政府官員，向他發表的談話必將嚴守秘密，只能由威爾斯轉達總統和我兩人。」

在同一天，我又宣佈我們已開始和勞的中立國家進行非正式的談話。我解釋說道是「尋求健全國際經濟制度，同時也是尋求全球裁減軍備的初步工作。」這種談判並沒有牽涉到現時的戰爭情況，但談判涉及道兩個有關未來和平的共同問題時，交戰國家自然也包括在內。

我們已開始進行一種研究和調查的工作，想儘可能的描繪出戰後世界的新輪廓，以介紹給其他國家，以及我們自己的人民。這種談話便是我們研究調查工作的一部份。

威爾斯出使消息的宣佈引起了很多的謠言，我知道這是必然的情形。總統雖然聲明，威爾斯的出使並非說我們有任何約束，但很多孤立主義份子却抓住這個機會來大放空氣，說我們即將捲入歐洲的爭執之中了。其他的人士也同樣確信，威爾斯有一個確定的使命，就是不惜讓盟方或我們付出任何的代價來促成歐洲的和平。更有些人捕風捉影地說，總統跟我和威爾斯跟我之間發生了齟齬。爲了平息這種謠言，我在二月十四日那天發表了一個聲明說：

「我想總統和我對於外交事務方面的政策和方法，意見是一致的，幾乎正如另外任何兩人處在我倆各自所處的地位時的意見那樣一致。在我倆之間的一些商談中並沒有什麼異乎尋常的事情發生，這些商談的結果使總統宣佈了派遣特別使節赴歐的消息，以及稍後使我發表了有關戰後經濟復原和裁減軍備的聲明。」

後來我接着說了一些向威爾斯表示恭維的話。

人類和平基於道德

威爾斯借國務院歐洲司長莫法特 (Jury Merrington Moffatt) 去訪問羅馬、柏林、巴黎和倫敦。他可以看到各國政府

的領袖和教皇庇厄斯十二世 (Pius XII)，而且可以同他們詳細地交談。他向他們提交我國經濟政策的備忘錄，這備忘錄的中心點，是談到我們所希望在戰後能夠採用的商務協定計劃。他從他們那裏得到了他們對於戰爭的論辯的冗長的說明。

雖然威爾斯忠誠地遵守着總統要他對於無論聽到什麼話都要嚴守秘密的訓令，但有關於他的謠言却跟着紛然騰沸。這些謠言使盟國方面和一些小中立國家深為沮喪，她們唯恐總統在威爾斯返國以後，會採取一種爲了促成和平而向希特勒讓步的行動，因爲在當時的戰事階段中，促成和平的行動是必得能夠滿足希特勒的大部要求方能奏效的，而且這種行動必會造成另外的一次戰爭。結果，總統和我同意他應該發表一個演說來驅除這種恐懼。因此在三月十六日，總統便在白宮向基督敎國外服務團教士會議上發表了一次廣播演說：

「今天我們要爲和平找出一個道德的基礎。如果和平而不承認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那便不是真正的和平。如果和平的結果只是限制、飢餓、殘忍，或是人類的生活爲武裝陣營所控制，那便不是永久的和平。如果弱小國家必須生活於對強大鄰邦的慄慄危懼的心情中，那便不是健全的和平。如果免於侵略的自由是用貨品換來的，那便不是道德的和平。如果和平而否定了人們可以自由知道那些人類可藉以覺得共同立場的理想權利，那便不是明智的和平。如果和平而否定了人們信仰上帝的權利，那便不是正義的和平。」

蕙求事實不作調人

爲了更進一步來止息這種危險的謠言，三月十八日我向總統提出了一個備忘錄，裏面附有我打算拍給當時在羅馬的威爾斯的電報草稿，這個電報是「作爲一件特別須要當心的事項」。總統在備忘錄上用鉛筆寫了「可，EDR」(按：EDR爲羅斯福總統全名之縮寫)。當天我便打電報給羅斯福，說我已向報界說明他的任務只是尋求事實，他不能在交戰國之間担任調人的工作，或參與任何的談判；還說明，無論是爲了評論或是爲了行動，如果認爲他會提出任何以武力威脅爲後盾的和平建議，或是附有時限的最後通牒式的和平建議，那都是完全不可想像的；還說明，我認爲除了供我方的參考以外，旁人是不會交給他任何和平的條件的。威爾斯在離開羅馬以前向報界發表了一個聲明，說他並沒有接到或

傳達任何和平的遠望，他的唯一的使命是收集情報。

三月二十二日英國大使樂相來看我，他這趟來是因為我們政府採取的他所謂敏捷的行動來向總統和我表示謝意的。這趟行動是爲了消除那種「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的情緒的傳佈，此種情緒的由來，是因種種謠言傳說威爾斯可能在歐洲進行一種談判式的和平，談判式的和平無異於德國戰勝。他（英國大使）說這種談判和平的努力會有損於英法戰爭的局勢。我很明白地表示說，在近幾週裏，我們並沒有忽略了整個問題的最細微的部份，並且準備在適當時刻把我們的立場儘可能的力予闡明。

威爾斯三月底回到華盛頓後，給總統和我寫了一個詳盡的報告，內中記載他和墨素里尼、希特勒、達拉第、張伯倫和教皇以及他們的外交部長們談話的情形。就他從他們那裏所蒐集的情報而言，不會有人比他得到更多，但他所得知的情報，並沒有任何地方可以作爲我們行動的基礎。跟他交談的領袖們並沒有給了他和平底希望。總統在三月二十九日發表了一個聲明，說目前雖然沒有一點可以獲致公正和平的景象，但威爾斯所收集的情報等到將來建立這種和平時，必然有最大的用處。但從後來的事實證明，就連這樣的一個聲明也是太樂觀了。在此後的五年多的時間裏，和平並沒到來，當和平真正到來時，一九四〇年時的英德義政府領袖已經亡故，法國當時的政府領袖而今也不復在位了。

第十五章 孤立派鼓勵了希特勒

一九二九年七月白宮參院兩黨領袖舉行商討廢止中立法案的禁運軍火條款，參議員波拉反對最力。國務院收到駐外諸使節的報告，都認為戰爭迫在眉睫，英國並召集海軍船隻及人員於八月大演習，因為預料大戰將於九月間爆發。美國之未能廢止禁運軍火條款，多少鼓勵了希特勒敢於大膽地入侵波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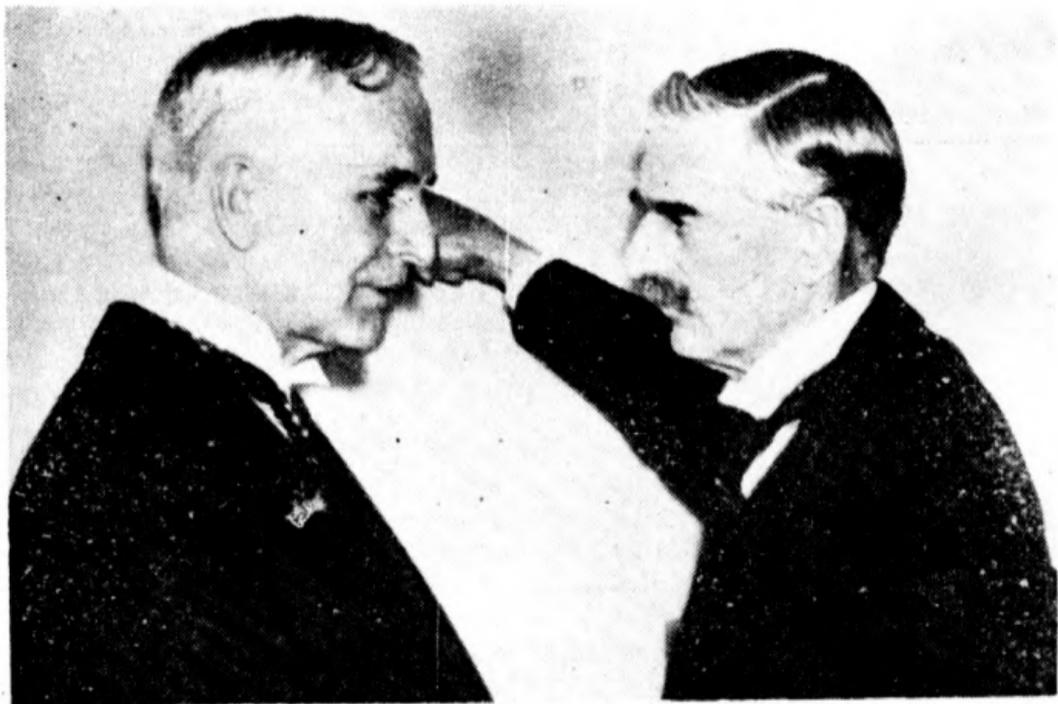
波拉堅持禁運軍火

羅斯福總統同意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八日晚上舉行一次白宮會議，由參院兩黨領袖參加，總統和我打算在這個會議中作一次最後的呼籲，請他們支持廢除中立法案中禁運軍火條款的建議案，如果此舉失敗，則因此項立法不獲通過而發生的後果，便得由反對者負其一切責任。總統與我都認為我們不能不作一個最後和最緊要的嘗試，以勸誘參院領袖，使他們對一旦歐洲發生戰事，美國所將遭遇的危險局面，有一個充分而清晰的認識。

當會議在總統的樓上書室舉行時，表面，顯得心平氣和，骨子裏却煞是緊張。到會者有副總統邁納（Cannery），多數黨領袖巴克萊（Barkley），皮德曼，少數黨領袖麥克那利（McNary），少數黨領袖奧斯汀（Warren Austin），以及參院外交委員會少數黨



堅持禁運軍火之火拉波



倫伯張相財英與（左）解務國爾村之中議會選世界世敦倫日四十月六年三三九一 倫伯張夷爾赫

重要份子波拉 (William E. Borah)。

總統首先便指出參議員奈夫的絕對孤立主義立場，阻礙了我們的方案在參院之通過。這時波拉便揮手作勢地迅速打斷總統的話，插嘴說：「還有其他的人哩，總統先生。」總統有幾分訝異，轉過去向他說道：「波拉先生，你說什麼？」波拉於是重複說：「還有其他的反對者，總統先生。」接着總統與波拉便繼續交談，波拉強調他對廢止禁運軍火的反對，並着重指出他的觀點。即至少在不久的將來，戰爭是不會發生的。

總統於是向我說：「柯德爾，你對未來危機的可能性有甚麼意見？」

我儘可能地抑制我自己，並設懇地回答道：「倘若波拉參議員能够看幾件向國務院報告國際局勢極端危急的電報，我相信他一定會改變他的論調的。」

此時波拉乃以一種沉重而武斷的語調，說他會得到來自國外的消息，足以證明其判斷之不謬，這個消息便是說歐洲在不久的將來不會發生戰爭。他並暗示這個消息較之國務院所得到者尤為確實可靠。

最近，我會注意到所謂是道次談話中波拉參議員的筆錄的出版物。我並不願談到道次談話的冗長情形，然而我必須聲明的是，就像前文所述，對於波拉的話，我有一個確切而一定的了解。總統對於這席也會屢次明白表示，關於波拉的話，他是和我有著同樣的了解的。

以我過去的經驗，我從沒有像道次的難於克制及怒憤填膺。從國務院唯諾如山的官方事實報告中，我知道波拉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正面對着在夏季結束以前戰爭即將全面爆發的危險！——我曾經這麼說過。在波拉的談話中，對其來自私人的消息之信賴遠過於對國務院的官方文電之信賴，這對我們所有的外交界是一個莫大的侮辱。

兩黨領袖相繼表示他們的觀點，一致認為要使廢止禁運軍火案在國會獲得通過是不可能的，在他們發言之後，總統便向我說：「柯德爾，你對這種情形有何感想？」

當波拉非難我和國務院的時候，我已差不多要發怒了。所以在回答總統時，我簡直沒有掩飾我的激動：「波拉參議員抹殺國務院的一切事實報告，而這些事實對於他所主張的戰爭不會爆發的理論，却是一個完全的反證，在他這種自鳴得意抹殺整個事實的態度之下，我真不知如何想法。」我再繼續說下去，我便不能不丟掉自制的權力，我深覺眼前就有危險，而對於以魯莽的態度忽視一切事實與理由，則感覺受到很大的污辱。

白宮會罷依舊中立

會議在此種情形中宣告結束，白宮便在午夜時發表了兩則公報，其一陳述與會的民主、共和兩黨參議員的共同見解，即在國會道次會議中，對中立法案不能有所變更，但下次會議時，可能加以考慮。另一公報則發言：「總統與國務卿認為參院未能採取行動，那麼在目前與明年一月之間歐洲萬一發生新危機時，勢將削弱美國為保持各國間的和平，而運用其強大影響力量的領導地位。」

僅僅過了五個星期，我們便不得不使用這種影響力量，以作阻止歐戰發生的最後一次努力了。希特勒對於美國國會不服行政部門的領導情形看得非常透澈，他並相信英法將無法從美國獲得武器，彈藥與飛機。所以我們的影響力量，就希特勒而論，無疑已為他這種認識所削弱了。

會議散場後，波拉由麥克那利參議員伴隨立刻便來向我解釋。說他決無絲毫意思指責我或我的官方立場，但對於我所領導的國務院之指責却是不可能去道謝的，我冷冷的接受了他們的聲辯。我相信波拉用意極好，但我仍不得不斷定他因為神經非常興奮，所以不能清晰地思考。

我會數度邀請波拉到國務院來，以便給他看看我們派駐歐亞各處的外交使節的報告，並相與談論一般的外交情勢，但他從來沒有接受我的邀請。如果他在討論中立法案時來到國務院，我將給他看些甚麼呢？在百十種參考文件中，我檢出的將是：

駐外使節紛紛報警

我們駐柏林的代辦寇克（Alexander Kirk）於五月十三日電告我，許多其他國家的外交代表雖預料德國不會立刻向波蘭下手，但對於避免衝突的可能性是非常悲觀的。柏林各國軍事人員們的一般意見，是德國在軍事上能够隨時進攻波蘭。六月二十四日寇克報告說，謠傳德國正進行着不平常的軍隊調度，並繼續作軍事活動，由這種謠言造成一般印象以

爲正在準備應付不測的事件。

葡立德大使五月十六日從巴黎來電說，達拉第總理會發表他的意見，戰爭在六月底以前可能不致發生，但他也並非完全樂觀，一月以後，葡立德來電說，法國外長顯約告訴他，他雖預料德國不會立即有任何侵略行爲，但他確信在夏天結束以前將有一個嚴重的危機。六月二十八日葡立德電告：波蘭駐法大使認爲德國與波蘭之間在八月半左右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八十。六月三十日葡立德報告：法國外交部雷普爾（Alexis Léger）（譯者按：雷氏係法國國務長），一個具有嚴重性質的危機，在月半以前是無可避免的了。

波蘭大使波達基（Polacki）伯爵五月三十一日向我說，在以後數月以內，希特勒一定會向某一方面採取某種行動。六月二十六日鮑氏通知我：波蘭正努力準備，以便在德國發動戰爭時可以和它週旋，我當向他表示我的意見說：歐洲的情況於波蘭是不利的，不祥的象徵與情況已經日漸增加，早晚歐洲與戰爭的基礎有齊高度的配合以後，若不能同時設法避免事端，將發生嚴重事件，但没人能預測是在甚麼時候。

駐英大使甘納第六月二十七日電告我，哈里法克斯勳爵認爲德國情形已經很不安，下月底以前有發生戰爭的極大可能，七月五日甘納第來電說：哈里法克斯會告訴他，英國正在發召後備役的船隻與海軍人員，表面上是在準備八月間的大演習，但實際上爲了要使海軍在戰爭來臨前的一個月便有所準備。因爲假定戰爭是將發生在九月間的。

我們駐海牙的代辦班頓（J. Webb Benton）六月三日報告說，荷蘭海軍參謀總長亨斯納上將（Eustenh）認爲，希特勒可能在八月半與八月底之間收復剛過後訴諸戰爭，亨氏並指出德國已力促德國人儘可能趕快收復。

此外，我們尚收到駐外使節除遠歐局發達的經常報告，說明德國繼續以壓力加諸波蘭並使用策略以圖佔有但澤，同時並說明立刻締結英蘇協定的種種困難，對於此項協定，英國幾個月以來便已經在外交上多所努力了。

所有這些文件，只要波拉及其同志願意，便可請他們一加瀏覽，可惜波拉却甯願信任他自己的消息，這種消息據後來的報告只是來自倫敦的一家小新聞社。

孤立作風 鼓勵侵略

在美國強大的孤立主義運動中，這是最後一次有效的行動，這個運動使用其所有的各種方法而一意孤行，並且一直都是美國的一個威脅，但自從歐洲開火以後，它便不能再對行政部門的建議案有所阻撓了。

沒有一個人能確切的說，我們對廢止禁運軍火法案的努力之失敗，便是希特勒最後決定從事戰爭的最後因素，甚至是一重要因素，但我可以斷言，如果我們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月甚至七月廢除了禁運軍火案，無疑他便不得不把這個因素列入其估計之中。我同樣地還可以斷言，此項行動的失敗，對希特勒的一往無前實是一種鼓勵，德外長里賓德羅甫也對他鼓勵有加，里氏保證英法不致真正的援助波蘭，即使她們是這樣也不會有什麼效力，因為那時美國的物質援助便將停止供應了。七月二十日，蒲立德從巴黎致電總統，說倫敦與巴黎都認為美國國會稽延修改中立法案的決定，使希特勒立意於八月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大見增強，英外交部次官文西奈（Vansittart）且以戰爭將在八月發生而與人打賭。



第十六章 美蘇間的齟齬

美國與蘇聯最初因為佛羅城貨船事件發生意見，繼而美國出面調停蘇芬爭端，也為蘇方所拒絕，後來又因為蘇聯檢查美國副領事的行李，美國也採取報復手段，一度美國駐蘇大使館不准和不國通長途電話。但蘇聯却仍願意暫時遷就蘇聯一點。

蘇聯對德懷有戒心

當國會辯論中立法案的時候，東北歐局勢的強化引起了我們的關懷，那時蘇聯正從事一個廣泛的活動，沿着波羅的海描繪其新的戰略邊界，她很明顯地是在增強她對外國的防範。就當時的軍事情況說，波羅的海是在德國力量的控制之下，足見蘇聯的這種行動未必是以盟國為對象的。史達林對德國顯然還存着戒備之心，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中的諾言，史達林並不比盟國更為信任。

蘇聯保衛自己對抗德國的努力，我們雖也很表同情，但我們却是憂心忡忡，深恐這行動足以擴大歐洲的衝突。

在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以後，蘇聯好像一隻陷在泥沼中的鮎魚，期待着某種事件的來臨。在九月底與十月間，她使兵不血刃地把波羅的海三小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拿到自己的控制之下。在她的



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德外長里賓特洛甫（右）與史達林（左）握手

重重威脅之下，三國同意給她以若干戰略基地，並得在每國駐部隊兩萬人。此後，三國在名義上仍然各有其政府並且是獨立的，所以我們覺得也沒有採取外交步驟的必要。

但蘇聯以這種同樣的威脅，加諸芬蘭時，却不能發生效力，那個勇敢的蘇俄小國，在各方面努力抵抗而不願就此屈服。

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此時不幸由於一隻美國貨船「佛稜城」號（City of Flint）事件而發生了齟齬。（佛稜城號載着許多貨物運往英國，於一九三九年十月九日爲德國袖珍戰艦「德意志」號所俘，並被作爲一個捕獲物押往挪威的特羅姆索（Tromsø），繼而駛往蘇聯的海港摩爾曼斯克，由於該船在摩爾曼斯克的停留，美國便得基於國際公法上關於海上作戰的原則而提出抗議。）

在「佛稜城」號事件的演進過程中，蘇芬間的談判仍在延緩進行，不過進行的情形顯得甚爲惡劣。蘇聯改變國界及割讓芬蘭湖內島嶼基地的要求，芬蘭認爲不曾摧毀她的獨立。十一月十三日談判破裂，兩國關係於是急遽惡化。十一月二十八日午後，滿立德大使自巴黎以電話告訴我，蘇聯已廢棄蘇芬互不侵犯條約，可能不久即進攻芬蘭，他建議假使美國政府可能對當前的局面有所作爲，那麼最好便儘速行動。

美顧斡旋竟然碰壁

我立即以此意轉告總統，我們決定只要她們願意，我們即出面向雙方斡旋，藉以平息爭端。根據這個決定我便照會莫斯科與赫爾辛基，說明美國政府對芬爭端的激烈，表示深切的關懷，同時並聲明：「對於目前作戰區域的擴張以及國際關係的跟著再起惡化，我們都極其引爲遺憾。在不捲入爭端漩渦及懷希望以和平程序解決爭端的原則之下，如果雙方同意，美國政府樂於出面斡旋。」

芬蘭對我們的建議甚表歡迎，蘇聯則認爲無斡旋的餘地。緊接着，史達林便發動了對芬蘭的攻擊，並轟炸若干城市。

這種敵對行動的再度爆發，使我們極爲失望。在我們進行磋商之後，總統便在戰爭開始的次日向新聞界作了一個有

力的聲明。他說：「在那些國家的愛好和平的人們，現在依然盼望着世界在法律與秩序的基礎上繼續其友善的關係，對於這次以武力解決國際糾紛的新衝突，他們將一致聲詞譴責。」他並向芬蘭和蘇聯發出呼籲，請他們停止轟炸無辜的平民。

駐莫斯科的史丹哈特大使電告我，當他以此項呼籲交給莫洛托夫外長時，莫氏堅決否認蘇聯空軍會轟炸平民或不設防的城市，或有絲毫採取此種行動的意向。（但我國駐赫爾辛基的公使館曾電告我蘇聯空軍轟炸不設防城市的許多例證。）史丹哈特說，他在和莫洛托夫談話時得到一個印象，即莫氏不希望有第三者居間調停，蘇聯發生戰爭，是爲了儘可能提早結束芬蘭問題，以便對於巴爾幹、黑海區域或德國方面的發展能夠自由應付。

美國禁止飛機運蘇

我們現在決定對蘇聯禁止飛機的出口，作爲一種道義上的制裁，這種制裁我們已經用於對待日本。

總統與我早就決定中立法案不適用於蘇芬戰爭。站在一個政府的立場，我們不能運送軍火給芬蘭，但如果私人出口商願意售軍火給她，我們也無意加以禁止。進一步講，波羅的海已被宣布爲歐戰作戰區域，我們的船隻已經被禁止進入該區。最後，我們依然希望阻止蘇聯成爲合法的交戰國。我不能不承認共產主義的蘇聯與納粹主義的德國間，其根本矛盾是這麼的深刻，希特勒的野心又是這麼沒無涯，那麼蘇聯將來仍然投到盟國的陣營裏來是非常可能的，所以我們這時不能不慎重將事，以免把她逼到對方去。

我們本身與蘇聯間不愉快的關係，可以十二月初的一次不幸事件爲例。自從一九三三年與蘇聯建立邦交以後，我們駐蘇的領事人員即受到許多的限制。他們的行動受限制，且隨時都受到監視，在到職或離任時，行李也要遭受檢查。但在美國，我們却從未想到以這種待遇，適用於同樣的外國官員。

最後，我們決定要作一次嘗試，即以同樣的待遇適用於對方，看這樣會不會引起蘇人的注意，並將這種辦法當作針對他們忽視普通禮節的比較外交抗議更爲有力的答覆。當蘇聯外交部爲一個即將前往紐約的新任副領事要求一張「海關免驗護照」時（海關免驗護照是使持用人免除海關檢驗的一種文書），駐莫斯科的史丹特大使便回答說，如果我們能獲

得保證，在將來有美國領事官員希望進入或離開蘇聯時，蘇聯政府也願意頒發同樣的證件，我們將樂於頒給一張海關免驗護照。蘇聯對此是拒絕了，史丹哈特於是提出，在該副領事抵達紐約時，他的行李應該由海關人員予以檢查。

檢查領事禮尚往來

後來便這樣執行了，蘇使奧曼斯基遂於十二月七日以電話通知助理國務卿麥沙史密斯（Messersmith）提出強硬抗議。麥氏當時便告訴他，副領事的行李受檢查，是因為美國領事在出入蘇聯也受到檢查，這是我們實施互惠原則的行動。

奧曼斯基力爭這類問題，應以最惠國的原則來處理，這就是說蘇聯對待我們的領事，應該如同他們對待任何其他國家的領事一樣，我們對待蘇聯的領事，應如同我們對待任何其他國家的領事一樣。

但麥沙史密斯却告訴奧曼斯基，美國若干年以來，便是以互惠的基礎來處理這類事項，意即蘇聯如何對待我們的領事，我們便如何對待蘇聯的領事。

奧氏爲了他的便利，要求我們舉出蘇聯政府常常檢查入境的美國領事的行李的真實證據，史丹哈特大使應我們的請求，把這類事情列了一張表送回給我們。

因爲總統對於這種以牙還牙的事頗感興趣，我便給他一個由麥沙史密斯擬成的備忘錄。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回答我的一個備忘錄中說：

「你十二月十六日的備忘錄，所說蘇聯如何苛待與外交團有關的美國公民各節，極見詳盡精到，我認爲爲了抵制蘇聯的無禮措施，我們應該以一個同樣的措施來對付他們。

「當較爲重大的問題出現，即明顯的無禮行爲出自史達林，加里寧或莫洛托夫時，我們當然是不能在這裏以同樣的無禮行爲予以報復的。但我仍不免覺得那一天或許就將到來，到時候最好便宜於把那種情形讓奧曼斯基去直接考察了。我們可以告訴他蘇聯政府的拒不答復我關於轟炸平民的電報，以及不允美國大使與「佛稜城」號通信等舉動，足以表示對文明國家政府間普通禮貌與儀節的完全輕忽。因此總統真正地懷疑，蘇聯政府是否還認爲值得去延緩這種外交關係

我們不必再說什麼，但是這樣便足使蘇聯政府感到相當受辱了。」

我們把這個意思轉告給蘇方，但並不能使他們懷疑一切外國人的態度有所轉變，這種態度是襲自許多世代以來的俄國官員們的。

來自蘇聯諸如此類的小刺激，接二連三地使總統頭痛，史丹哈特大使電告我們說，我們已經不能再與駐莫斯科大使館直接以長途電話通話了，如果想通話，便得親自前往蘇聯的中央電話局，當我把史氏的電報交給總統以後，他在一九四〇年元月十日寫了這樣的一個備忘錄：

「我正在奇怪我們是否也可以用同樣的規則加於此間的蘇聯大使館，或者至少也得告訴奧曼斯基，我們正打算如此行動，同一規則，我既能施之於我，我難道不能回敬於他！F.D.R.」

不過史丹哈特爾後又來電說，這項困難已經被蘇方矯正了。

雖然，只要有此必要的時候，我們便毫不遲疑以強硬的态度對待蘇聯，但我的基本政策仍然是儘可能與蘇聯保持友善的關係，而不使她有絲毫印象，認為美國是她的目前的敵人或潛在的敵人。友誼之門是經常敞開着的，我至少願意遷就蘇聯一點。

第十七章 一片和諧聲

芬蘭既敗於蘇聯，和議隨之而起。芬外長和羅馬尼亞外長都要求蘇聯嘗試探和平。赫爾當然也提出一個蓄意自取的和平建議。後來比王、荷蘭女王乃至里希里尼竟無不希望和平，不過觀點却互不相配。最後蘇聯認定有羅姆馬放廷取勢變路，互通聲氣的必要，便決定派遣蘇聯以總統代表的名義往在梵蒂岡。

芬蘭敗衄和議大作

蘇芬戰爭在北方的冰天雪地中繼續進行着，蘇聯滿以為可以速戰速決，想不到因為芬蘭人民的英勇抵抗，竟演成一幕三個月之久的喋血苦戰。

這一場爭鬥雖然在交戰國家的名單上又增加了兩個國家的名字，但在一九三九年尾幾個月裏面，歐洲是充滿了和平運動的謠言。在波蘭崩潰後是一段停頓的時期，這便是和平的謠言與委靡得以發展的良好環境。我對這些情形是關心的，因為它們始終是把美國與那些假定正在進行的運動聯在一起。

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美國駐布加勒斯特公使棋室（Crichton）電告我，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對於總統或許正在考慮倡議一次和平運動的可能性表示極大的關懷。第二天我電告他說，我們并未考慮任何這類運動，同時我們也沒有接到任何交戰國家的表示，希望我們這樣做。

希特勒在十月六日的演說中，提出了一個關於和平的含混建議——在這個和平中，無疑將使他得到大部分戰時所攫取的東西以及捷克和奧地利。在這次演說之後，駐比大使波維斯電告總統和我說，一位高級人士——據後來透露這人便是比王利奧波德——曾經向他說，只有總統能够制止德國對西歐的攻擊，比利時希望總統能再作一次努力，就像他在

薩爾芬蘭之「莫洛托夫雞蛋」炸彈。



過去危機到來時所作的一樣。

就在十月七日這天，我們駐柏林的代辦寇克來電說，一個接近希特勒的人士曾經向他表達這種看法，認為總統將利用希特勒的演說，乘機給他一個密函，表示贊同他的「尋求和平的努力」，並設法將希氏建立和平的基礎予以澄清。兩天以後，寇克來電說，德國某報界發言人向報界說，德國極可能接受總統休戰與進行和平談判的建議，他並暗示德國可能參加一個在離戰區很遠的地方舉行的會議——有人解釋這是指華盛頓而言。

第二天，美國駐赫爾辛基公使許恩菲德（Schonfeld）來電轉告芬蘭外交部長的建議說：美國不妨採取主動以試探究竟有沒有和平的

可能。

電報如雪片飛來，都是報告這一類的事情，於是我在十一月八號星期日召集我的僚屬在我的辦公室裏舉行會議，我並邀請波維思參加，每當我特別需要他寶貴的意見和豐富的經驗時，我常常是這樣借重於他的。關於美國是否可以在此時會採取某種合理的行動以恢復歐洲的和平，我們之間早就已經有過澈底的討論。

在這個星期日的會議中，我們仔細研討一宗可能的美國建議案的初稿，我們將在其中要求交戰國家提出他們的和平條件，我們則作為中間人把這種條件傳達於彼此對立的交戰國家。在廣泛交換意見之後，我說美國在此時作一種和平運動，我不相信能夠發生任何有用的後果。

德酋凌人盟國氣沮

對於到現在為止一直是勝利者的希特勒，我們所能採用任何和平運動，都不得不利於他而使盟國喪氣。我們無權強詞英法在這樣的條件下議和，我們對英法的和平建議將把她們擺在一個錯誤的地位；假使她們接受，她們便不能不同意希特勒的大部分條件，假使她們拒絕，她們又將招致反對和平的譴責。

我們不採行動的決議，並不能制止和議的繼續蔓延，這些謠言在我們看起來很多都是來自德國，其目的一部分是企圖藉此造成一種印象，認為希特勒是無時不在準備議和的；一部分是想在和平謠言與進攻謠言的交互使用下，把盟國弄得眼花撩亂。

寇克代爾十一月五日從柏林來電說，沙赫特表示他願意前來美國，堂堂正正地作一次非政治性的演說。如果他能夠到將受總統接待的保證，他將提出解決歐洲糾紛的意見。寇克同時報告說：近來他曾經注意 多完全是非官方性質的其他類似的努力，但他警告切不可對它們過於重視，他說和戰的最後決定權，仍然操在希特勒手裏。

德國政府想藉非官方的人員跟其他各國政府建立接觸關係，沙赫特的建議在我們看起來便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這些非官方人員，似乎是超然於德國政府之外，可以完全獨立行動的，並且事實上似乎有些地方是和政府相反的。

當比王利奧波德突然前往海牙，並會同荷蘭女王威廉明娜暨官願為結束戰爭而出而善旋的時候，戴維斯大使於十一月七日電告總統和我說，他們的建議是為一個消息所促成的，這個消息便是德國將於十一月九日攻擊荷蘭。荷蘭公使勞頓博士（Dr. Alexander Lathion）於九日神經非常興奮地來訪問我，轉致荷蘭政府給總統和我的一封公文，內容是說荷蘭和比利時的中立，恐怕在數日之內，甚至數小時之內便要橫遭破壞了。十一月十一日總統給比王和荷蘭女王的覆函表示友好之意，但沒有作甚麼約束性的諾言。

十二月十四日，葡立德大使從巴黎來電，轉告法國外交部的雷哲爾給他的一個聲明，其中指陳墨索里尼正設法實現一個未成熟的和平，在這個和平中，將保持德國的納粹政權，因而也保護他在義大利的政權，雷哲爾相信，墨索里尼望重英、法、德、義四強協定的基本原則之舊夢，這個協定是墨氏在一九三三年所提議的。（註）

美擬聯絡羅馬教廷

這回時候，總統在已經和我們商討一項計劃，以建立與梵蒂岡教廷的某種關係。早在七月初，距戰爭爆發約兩個月以前，威爾斯和我便會討論到在可以藉這種關係得到的各種利益，我們感覺梵蒂岡有很多方面的消息甚為妥適，特別是關於德、義、西班牙等所發生的事；而這些事却是我們所無從得到的。由於我的建議，威爾斯寫了一封信給駐在羅馬的費立澄斯大使，徵詢他的意見，費氏在七月十九日的覆信中主張建立外交關係。他並建議任命一個基督教徒作為英國的代表。威爾斯當把這封信送給總統。

在與總統會談時，我提出警告說，我們不能派遣一個正式的大使駐在梵蒂岡，而只應以總統在教皇那裏派一個私人代表為限。我贊同費立澄斯的建議這個代表應該是一個基督教徒。英國便會按照程序任命一個基督教徒作為駐梵蒂岡的公使，又派一個天主教徒作為公使館的一等秘書。同時我並說，假使他採取這個步驟，他應同時得到其他教會的美國領袖們的同樣合作。

駐羅馬的費立澄斯大使曾於九月二十五日電告我，梵蒂岡的「羅瑪觀察家」(Osservatore Romano)曾對總統致國會的中立咨文刊載一篇充實而客觀的報導。我將此電送交總統作為他的參考。

總統於十月二日給我一個很長的備忘錄，起頭便說：「這完全是我本來的意見，我還不會與任何其他的人商討過。」他預測着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即不論戰爭是否即在「轉瞬之間，或下一個夏天，或三年之後，或五年之後」結束，當結束的時候，將會有一批數目頗大的難民自各國逃亡出來，其中有基督教徒，也有猶太教徒，甚至來自英國，法國和意大利。

他接着說：「因此，我很懷疑，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你是否便不應該去與梵蒂岡，與英國基督教會聯合會商酌的代表，以及與歐洲類似的組織，就這整個的問題進行商討。我們是已經通過了戴勒委員會和猶太教徒取得聯絡的。」

但和天主教會的聯絡，却應該直接跟梵蒂岡教廷發生，因為這個問題對歐洲天主教徒的迫切重要性，實遠過於對美國天主教徒。

「因此我認爲，現在雖還沒有提緊這麼去做的特殊理由，我們似可考慮，日後以仰特別使命駐在梵蒂岡的名義派遣一個特別的公使或大使，以便我們能有一個直接通消息的方法，去商討歐洲天主教難民問題。」

在這個備忘錄中，總統將他派一個外交代表駐在教廷的建議，僅以難民問題爲基礎。他沒有提到梵蒂岡將爲獲得和平的一個因素，而這一方面後來可以說對他是無關重要的。

十月十日他給我另一個備忘錄，談到費立澄斯大使所轉告的「羅馬觀察報」對他致國會中立咨文的報導，總統說：「由於種種理由，我想你最好把下面一類的話電告費立澄斯：『請你在方便的時候告訴教廷國務卿，總統對於「羅馬觀察報」就美國消息所作的公正記述，感到極大的愉快……』。」十月十一日我便依此致電費立澄斯，十月二十日接到他的回電，說教皇對於總統的來電極感滿意。

戴勒叩命駐梵蒂岡

經過在梵蒂岡幾星期的試探之後，我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電費立澄斯，把總統給教皇賀聖誕節的信的全文告訴他，這封信將在第二天公布，我並告訴他總統想宣布任命勃勒（Myron C. Taylor）做他駐梵蒂岡的代表。總統的原信，是由紐約大主教（現已晉升爲樞機主教）史培爾曼（Francis J. Spellman）轉交給駐華盛頓的教廷代表的。總統並以類似的函件，分致基督教領袖美國基督教會聯邦會議主席巴特里克博士（Dr. George A. Buttrick）和猶太教領袖美國猶太教神學院院長何德勃（Rabbi Cyrus Adler）。較勃勒更適當的人選沒法找到，他足智多謀，常識豐富，除了梵蒂岡的工作以外，在我們發起和發展一個擬議中的世界和平機構的綱要方面，他成了主動人物之一。

一九四〇年二月，戴勒乘船赴歐，我們和梵蒂岡間的新關係於是開始。這關係發展到教皇對於歐洲和平問題也有和我們同樣現實的洽商的方法。他並決定除非和平可能獲得，而且可以持久的話，他將不提出解決的意見。直到德國上了屠宰場以後，這時候才來到。

（註）四強協定（Four-Power Pact）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簽訂於羅馬，其中揭曉的原則計有四點：（一）四國對於與她們有關之事採取共同行動，並約定在國際範圍內共同努力以促進各國對維持和平的有效合作。（二）保證國際

盟約若干重要條文的效力。(三)保證軍縮會議之成功。(四)對於與他們有關的經濟問題採取共同行動，並努力使歐洲經濟復興。

第十八章 法國倒下去了

自從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德軍開始進攻比荷盧三國，便勢如破竹，一鼓而佔領荷蘭，復大敗法軍於色當，於是法國戰局急轉而下。獨立第卅軍團雖與德軍力佔有綽大優勢，但德軍擊退每年製造飛機五萬架。雷諾知道局勢艱危，首先要求美國對德宣戰。邱吉爾却因為英國不能自保，拒絕了法國的求援。結果巴黎陷落，法國就首先投降了。

德開始襲擊比盧荷

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夜裏十時五十分，我房間裏的電話鈴子響了，駐布魯塞爾的柯德海（Cromey）大使以緊張的語調告訴我，大隊德國空軍已飛越盧森堡進入比境，並且據報告已飛過了荷蘭。柯德海告訴我們，龐大的德國部隊在比、盧、荷三國的邊境上集中，比利時推測德國可能在黎明時即開始進攻。

我接著便打電話給總統，把柯德海的話告訴他，並通知國務院的幾個僚屬，於是便起身去辦公室，到那裏的時候，十一點鐘才散過不久，我立刻便打了幾個電話到歐洲各主要國家的首都，當接通柯德海時，他告訴我盧森堡已經被佔了，德國飛機正在轟炸布魯塞爾附近的飛機場，看情形德國是向比、荷、盧、三國同時進攻的。

然而比德因隨後在低地國家獲得成功的消息更為驚人的，是而立德大使在五月十五日那天給總統和我的電報，他說德軍挾其佔有壓倒優勢的坦克和俯衝飛機前進，已經在色當（Sedan）地方大破法軍。雷諾總理曾經打電話給邱吉爾首相說，由於德軍在色當的突破，戰爭可能在幾天之內就告失敗。雷諾的意思是除非英國立刻把戰鬥機隊從聯合王國調到法國，戰爭是會失敗的。邱吉爾答應向戰時內閣提出這個建議，並向雷諾堅稱無論如何，戰爭決不會失敗。雷諾回答說，邱吉爾是知道的，只要他雷諾一天是內閣總理，法國便將抗戰到底。

同一天五月十五日，甘納第大使將他與邱吉爾的一次主要談話電告總統和我。首相對他說，他將在第二天給總統一封信，告訴總統如果義大利參戰，他想要盟國勝利的希望就很渺茫了。邱吉爾說法國正在要求更多的援軍，但他不希望在兩個時候從英國派出人來，因為他相信，不出一個月英國就要受到厲害的攻擊，邱吉爾說，他希望把我們的奮鬥送艦借三千或四千艘，同時還借用一點我們所能通融的飛機。

有一點是總統和我所深信不疑的，那便是一個同盟國的勝利，將為美國安全的必要因素。

總統把全局作了一番檢討之後，決定把所有可用的軍用飛機都收集起來運到法國去，五月十四日蒲立德電告我，建議允許法國派一線航空母艦來把它們載走。在與總統商量後，第二天我便回答他說，限於國際公法和美國法律的規定，要在紐約發載這些飛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可以把它們先飛到加拿大東部海岸的一個港口，可能是哈里法克斯去，再在那裏裝運。後來是這樣做的——却已經太遲了，沒法運到法國。

大造飛機協助盟國

從閃電式的佔據荷蘭和突破色當的兩件事情上，表現出德軍是佔着絕大的優勢，這很顯明的使總統和我感到有將美國重裝軍備的一切估計加以修正的必要。總統計劃向國會提出一個特別咨文，要求把本年度的軍事款項在實際上加上一倍，他和我討論這個計劃，我是完全地同意了。五月十三日，蒲立德會拍給我一個呈總統的電報，強調美國飛機增產的重要性，因為在德軍前進時飛機所處的地位是太重要了。我因而向總統建議，他不妨告訴國會說美國應該訂一個每年生產飛機五萬架的目標，我過去便曾向我的僚屬提出這個數目的。總統的反應與我的僚屬的反應不謀而合——他真正地默然不贊一詞，因為五萬架飛機是我們當時每年生產量的十倍。

然而我力言我們最好是把一個很高的數字訂為目標並作一種長遠的打算。這種產量在我看起來並不像其他的人們那樣認為不可能，我感覺以我們素來著稱於世的龐大生產能力，只要把數目提一下，便足以發生刺激我們自己的人民，安慰同盟國，和使敵心因憂慮等效用了。

總統立刻便同意了。在他五月十六日致國會的咨文中，他說他很樂意於去看這個國家配合得有一個每年五萬架飛機

的生產量，他要求爲武裝部隊各部門增撥款項共十一億八千二百萬美元。

雷諾請美對德宣戰

當時雷諾總理開始向總統作了一連串不同凡響並且差不多是歇斯底里式的呼籲，這位法國的內閣總理，是爲可憐的德國勝利而感到令人不難理解的驚恐和激動了。但他的要求却是不可能的。

法外交部秘書長雷哲爾五月十八日告

訴蒲立德大使說，雷諾打算在那天晚上向總統作一次私人的呼籲，問他是不是可以促使國會對德宣戰。蒲立德電告總統和我，他已回答雷哲爾說，這樣的一個呼籲將比毫無得益還來得糟糕，總統不會要求國會對德宣戰，國會也勢將全體無異議地反對宣戰。蒲立德向雷哲爾直地指出，如果雷諾發出這樣一個僅足以存案備查的呼籲，那便是雷諾希望他能够在某一天告訴人家，他曾經向美國總統作過一次呼籲，而美國總統却給他碰了一個釘子，蒲立德

向雷哲爾評論說，這件事在他看起來是無

甚價值的，時機是太嚴重了，不僅對於英法嚴重，對美國也是如此，除了三國政府坦白相處以外，任何事都是空的。

總統和我非常贊成蒲立德給雷哲爾的回答，他道出了我們對此事的反應。

那天晚上蒲立德會晤雷諾本人，雷諾說他已經打算給我一個正式的照會。



門與凱樂巴入進車德，「劇惡的西爾法」

蒲立德告訴我們依照他的意見，雷諾不會把問題想透，並已決定提出一個儘足存案備查的照會，這個決定是在那天下午蒲立德和雷哲爾談話時所預先制止過的。

總統和我研究過雷諾和蒲立德的談話以後，便以電話和蒲立德交談，並告訴他說，任何含有此種性質的事都是不能實行的。蒲立德這樣地告訴了雷諾。

但在五月二十二日，蒲立德又電總統和我說，雷諾告訴他，他不能把這個問題懸而不決。這個問題在今天已經比四天以前討論它時重要得多了。法國已從義大利和瑞典兩方面得到消息，如果德國能在目前法國北部的戰役中得到絕大的勝利，希特勒願意給法國一個單薄的和宜厚的和平。

雷諾說，要是希特勒竟在這個法國極爲沮喪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建議，法國人民將有願意予以接受的極大危險。雷諾本人認爲接受此議便不啻自殺，就好像捷克一九三八年放棄蘇台德區的情形一樣。從那時候起，法國便將在德國的蹂躪下苟延殘喘，一旦希特勒覺得方便，他勢將一如佔領全部捷克的情形，把法國一齊吞併掉。並且，在幾個星期之內，德國恐怕就要勝利地攻下英倫了。雷諾相信，到了那個時候，不出幾個月，德國的鐵騎和萬千架飛機便將出現於南美，巴拿馬運河將在空軍轟炸之下被摧毀，美國陸軍也將絲毫不能抵抗了。

他認爲美國除參戰以外的援助，是不足以拯救法國和英國的，假使我們目前不在這種援助之外給他們以軍事支持，我們將不能不看齊德軍追到美國來。

法國局勢急轉直下

法國現在的軍事情勢正在迅速的惡化。由於法國顯然地在崩潰中，我和僚屬們在我的辦公室裏舉行了很多次會議，請求他們考慮歐洲戰局各種可能結果，以及這些結果對於美國和西半球的影響。我們得到一個總結論，即盟軍的形勢是無望了，我們的注意力應集中於必須保持目前所存在的英法兩國陸隊，並勿使其落於希特勒之手。

總統同意我們應該向英法政府就她們的海軍問題提出一個直接的呼籲，我們因此便草擬了幾通電報，這些電報由我在五月二十六日拍了出去。在給蒲立德的電報中，我懇請總統希望他能立刻向雷諾和達拉第說，不管怎樣，我們是仍然希

望把侵略者堵住的。萬一情形每况愈下，我們認為法國艦隊的保持，對於重建法國和它的殖民地以及控制海洋是極爲重要的，同時對於較爲寬大的和平條件也將發生重大的影響。

我們給英國政府的電報也陳述對英國艦隊的同一看法。五月二十日，邱吉爾曾經給總統一封電報，鄭重指出英國所面臨的危局。他說如果聯合王國被希特勒征服，剩下來唯一可以與德國講價的將是艦隊。這時，總統便把這個最後的意見列在他給首相的電報裏，他向邱吉爾建議，萬一情形更趨惡化，英國艦隊可以撤往加拿大。總統向他們保證美國將不允德國或任何非美洲的國家攻擊加拿大或英國在西半球的其他屬地。只要英法的艦隊保持完整，德國除了在歐洲以外還可以在軍事活動方面有所爲外，她是不能夠戰勝的。

雷諾的呼聲現在變得格外如同瘋狂了。蒲立德於五月二十八日來電說，雷諾建議由法國總統和英國國王向羅斯福總統作一個聯合呼籲。當蒲立德晤見雷諾時，他已經寫了呼籲中的一句話：「爲保衛世界的自由而戰的將士們，已經被人在背後中傷了一次。」

雷諾說：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即令我們明天對德宣戰，我們也是無法用飛機飛渡一枝軍隊到法國去的，因爲現在還沒有這些飛機，但是我們有的是艦隊，大西洋艦隊應該立刻就派到地中海去，這個行動至少可以防止墨索里尼這時再在盟軍的背後中傷一次。

英不援法巴黎淪陷

英國既已完成了敦刻爾克的撤退工作，她這時便向法國明白表示，她將不再派遣飛機到大陸上來，巴黎的英國大使向蒲立德解釋說，作戰時飛機的損失程度是太大了，以致如果英國再把她剩下的飛機送來的話，兩星期內她便要沒有一個了。要拯救巴黎或拯救法國的陸軍已經毫無希望，所以還不如把飛機留在英國，以應付未來的不列顛之戰。

爲了答應雷諾的要求替法國做後盾，總統呼籲邱吉爾派飛機到法國去，但首相拒絕了。蒲立德爲邱吉爾的這個決定所激動，六月五日便告訴總統和我說，他深深的覺得，英國之保存她們的空軍和艦隊，恐怕是想把它們當作與希特勒談判時講價還價的張本。

不過總統和我的想法和蒲立德是不相同的。我們知道法國是完了，但我們相信，在丘翁不屈不撓的領導之下的英國，是決定要繼續作戰的。

跟德國妥協的思想，現在開始籠罩着法國的內閣。蒲立德的迭次來電更顯出法國的投降似乎只是幾天以內的事了。

德國正向巴黎前進中，六月十日法國政府便離開首都遷往都爾（Tours）。

同一天，墨索里尼便對法國和英國宣戰了。

第十九章 義大利跳入戰火

英法兩國對於墨索里尼大步走向戰爭的姿態已感到驚慌失措，羅斯福總統三番四次地向墨索里尼呼籲和平，教皇也採取平行行動，英法更願意在戰爭結束後，使我國的要求得到合理滿足。但是墨索里尼毫無興趣用和平方法取得任何土地。

羅斯福苦勸義大利

沒有一個政府在阻止另一政府進入戰爭的努力上，比我們對義大利更為誠懇的，在墨索里尼參加戰爭以前，我們對他作呼籲，施壓力，為時達五個月之久。

四月二十日，敕勒給我兩封呈總統的電報，在其中的第一個電報中，他說墨索里尼現在是真的有加入希特勒方面作戰，或者單獨向別的地區從事侵略的危險了。他引用教廷國務卿馬格利翁 *Martino* 權威主勢的話，即要求總統在兩三天之內採取行動，最好能立刻行動。在另一個電報裏，敕勒又引用教皇的話，即要求總統立刻給墨索里尼一封信，教皇說，他將在這個時候作同樣的努力。

接到這些電報後，我便和在喬治亞州溫泉的總統通電話，他認為在他以前所給墨索里尼的兩封信中，他已經說得夠了，這兩封信是經過義大利大使和威爾斯交給墨氏的。就我們所已經收到來自各國首都總統報告局勢的電報看來，我們是並不認為墨索里尼會在幾天之內開始行動的。

敕勒繼而又在四月二十六日來電說，他會一再晉見教皇和馬格利翁國務卿，他們都重複強調他們以前的建議。敕勒報告說，梵蒂岡方面相信，墨索里尼一次出其不意的行動，是呼之欲出的。特別是因為有一般人傳說着，爲了克服正在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義大利向英法宣戰，
圖爲滿街國之動動標語。(GUERRA 意國戰
爭)。

在於義大利國內反對參戰的論調，墨氏必須立刻行動。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總統回到華盛頓，我便把威勒來的各封電報交給他，並告訴他說，英法政府也是同樣憂慮着墨索里尼會參加戰爭。總統於是決定就在此刻以書面形式向墨索里尼作一次呼籲。

信的草稿於四月二十九日午後便擬好了，當天晚上就以電報拍給墨索里尼。

第二天威勒電告總統，教皇已經履行了預定的同樣行動的諾言，寫了一封親筆信直接交給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於五月一日接見費立澄斯，聽費氏向他宣讀總統的函件。他說德國不能被攻擊，歐洲的和平如不承認希特勒東征西討所造成的「新地理形勢」，這個和平便不能加以考慮。至於義大利，他說她那「地中海的囚徒」的處境已是忍無可忍的了，他並痛罵英國之領有蘇彝士運河及直布羅陀。

墨索里尼向費立澄斯口頭上所說的，事實上要比給總統的回信來的緩和得多，這封信是由柯朗納（Colonna）大使於五月二日携入白宮的。

第二天費立澄斯電告我，他曾晤見墨索里尼的女婿，外交部長齊亞諾伯爵。齊氏告訴他，英國將她的商船自地中海撤退的決定，使羅馬甚感驚異，因為除非盟國攻擊義大利，她是無意於參加戰爭的。

在荷比二國開始被侵後不久，費立澄斯又於五月十日電告我，他曾晤見才從墨索里尼處出來的齊亞諾，齊氏向他保證，由於這次新侵略行動的結果，並沒有使義大利決定或企圖改變她的態度。

墨索里尼癡心不醒

然而就在四天之後，局面便完全改變了，費立澆斯電告齊亞諾向他所作的聲明說，一個星期以前，他認為義大利仍舊超然於戰爭之外的機會是五十對五十，目前贊成參戰的機會則是九十對十。齊亞諾說墨索里尼已經下了決心了。

當倫敦和巴黎得到這個消息時，他們差不多是驚惶失措的。蒲立德大使電告我一個措詞懇切的要求，希望總統以更多的壓力加諸墨索里尼。雷諾總理要求把我們的一些途路隨送給英法，因為他預料義大利的若疑是要在地中海實施攻擊的。

當費立澆斯的電報到達國務院時，我便把它送交總統，他於是決定向墨索里尼再作一次呼籲，我們在國務院的人便再度爲他草擬電文，這個文件在五月十四日同一天午夜由我以電報發給費立澆斯。

總統說：「在我是使目前這樣一個就事論事的現實主義者以前，我會經有信給閣下，你如果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我想你將承認一旦這場戰爭蔓延到整個世界，它勢將不能爲各國的元首們所控制，它勢將造成千百萬生靈的損失，把我們所謂文明的自由與文化的精華摧毀殆盡。任何人，不管他是怎樣的博學多才，諒必不能向他自己或者他自己的人民預言這場戰爭的後果。」

費立澆斯企圖再去親自會見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這次却聲言他寧願通過他的外交部而接到總統的第二封信，不願接見他。三天以後的五月十八日，費立澆斯把墨索里尼給總統的復信電告我，內容是：「義大利與德國現在保持着同盟關係，將來仍舊打算保持這種關係，當此歐洲的命運岌岌不可終日之時，義大利處難作壁上觀。」

同時，在這個回信以前的幾天，駐巴黎的蒲立德也來電陳述許多關於我們這方面對義行動的建議。蒲氏和法國政府已盡可能地保持着最密切的聯繫，因此很能反應他們對戰況的不幸轉變的自然騷擾情緒。他建議總統應要求教皇、威魯墨索里尼、如果義大利參戰，便把義大利逐出教會。同時還請他以精神的立場譴責希特勒，說他的侵略行爲已差不多可以稱一道逐出教會的訓諭了。蒲立德並建議派我們的大西洋艦隊前往希臘作一次友誼訪問，如果義大利參戰，便斷絕它的橋樑，再則派美義僑和祖籍義大利的美國人也得通過決議反對義大利的參戰等。

我把這些不同的建議都和總統商量了。這時如果有任何合適的機會可以採取某種行動，我們都將樂於去做，然而事實還得很清楚，墨索里尼是已經拿定主意了。

什麼都可以讓步的

接着在五月二十五日，邱吉爾和雷諾請總統對墨索里尼再探另一步驟，他們建議總統就下列各點對墨索里尼作一個聲明：

- 一、總統有理由相信，義大利懷着對英法的某種領土要求，而這個要求英法兩國是知道的。
 - 二、英法現在完全願意考慮德國的要求，希望獲致協議以便在戰爭結束時，能够使德國的要求得到合理的滿足。
 - 三、同盟國將以與任何交戰國家相同的身份授予義大利而允許地參加和會。
- 邱吉爾和雷諾建議總統應該在聲明中加上一句，美國將竭力促使實施所獲致的協議，俾德國能免於參加對抗英法的戰爭。

這些建議事項由總統以他本人的身份去提出，而並不是以一個盟國代表的身份去提出。

總統同意這種辦法，而無甚難色，不過他的確說過，他寧願採取他上次和墨索里尼的通信裏就這同樣普通問題所提出的次一合乎邏輯的步驟，而不願照英法的請求依樣葫蘆，這種步驟是沒有任何政府的任何請求而出於他自己的主動的。

總統的文件，由我們在國務院起草，五月二十六日我便以電報拍給費立澄斯大使。

現在擺在墨索里尼面前的一個明確的建議，那就是他可以不必訴諸戰爭而達到任何合理的要求，並由美國政府保證英法都將遵守她們的協議。

但第二天費立澄斯來電所說的，却是墨索里尼的一聲「不！」齊亞諾告訴他，墨索里尼的意思是不僅要承認義大利的合法要求，並且還得履行其與德國同盟關係的義務。

義方答覆愈含敵意

墨索里尼答覆總統的口吻，一次比一次來得更含敵意，但總統並沒有爲這一事實所懾服，而還要向這個義大利的獨裁者更作一次呼籲。我們依照他的意思起草，於五月三十日電告費立澄斯。這一次總統便說：由於義國參戰以致戰爭更形擴大，「結果將立刻使美國本身加強其重整軍備方案，以及美國政府的加倍努力以一實際可行的方法，使盟國在美國國內易於獲得他們所可能要求的供應和物資。」總統提醒墨索里尼，我們在地中海上有將近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性的權益。

墨氏的答覆甚至比過去更見堅定和含有敵意，費立澄斯於五月三十一日把齊亞諾的聲明電告總統和我，墨索里尼已經決定參戰，這在目前僅僅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問題！——早晚間的事情而已。當費立澄斯坦白的表示：一旦義國參戰，美國人民的對義態度將發生一種深刻的轉變時，齊亞諾回答說，這件事已經考慮過了。

第二天，費立澄斯電告墨索里尼自己的聲明：他要履行他和德國間的義務，並且不願接受「任何其他阻力，」因爲這種阻力「將僅能使他們的態度更趨堅定，」他說他不相信義國的參戰將必然的使地中海的戰爭擴大，他詰問我們所謂在地中海的權益說，認爲這和義大利之主張在加勒比海有利益是同樣沒有道理的。（譯者按：加勒比海在西印度羣島和南美洲之間。）

利及向鄰人背上砍

這時，法國向墨索里尼作了一個直接的建議，以解決義大利的領土要求。不過蒲立德六月三日電告我，齊亞諾向駐羅馬的法國大使說：墨索里尼毫無興趣去用和平談判而取得任何法國的土地，他已決定對法國作戰，對於法國的照會將不予置答。

總統和威爾斯這時決定以法國的建議作爲跳板，向墨索里尼再作另一次呼籲。國務院把電文的草稿也準備好了，然

而到當時爲止，我認爲已經對決心以戰爭滿足其虛榮與慾望的強盜們，作了過多的這種呼籲，所以我異常堅決地反對發出這個電文。我的反對意見生效了，這個在六月七日已經準備好了的電文，終於沒有發出去。

當墨索里尼六月十日對英法宣戰時，我們當中沒有一個感到有什麼驚異。

那天晚上，總統向弗吉尼亞州夏洛特斯維爾（Charlottesville）的弗吉尼亞大學發表演說，檢討他對防止義大利參戰所作的許多努力。他說：

「在這個一九四〇年六月的第十天，握着利劍的手已經在它隣人的背上猛烈地刺入了。」

這一句話包括我們在國務院所擬的草稿裏面，威爾斯向總統建議把它取消，因爲它將促成墨索里尼對他的反感，以致在談判和平的時候將不能得到他的合作。事實上背後中傷的話，早在五月二十日雷諾總理萬會說過，浦立德的來電裏也會引用很多次。總統本已把它從演詞中去掉，但在赴夏洛特斯維爾途中又改變意思而重予加上了。

第二十章 戰敗法國的艦隊問題

戰敗後的法國，英海軍部心地的監視問題，擔心會落入德人之手，英國以冠領會提提法國在案，法內閣決定如果艦隊投降包括在德內條件內，則停戰不予拒絕。但英國仍不放心，以武力接收和監製了停在英國及北非港口的法艦。但法方對此並不重視，仍盼盟國勝利，釋放法艦。

蒲立德德堅、主留巴黎

就在雷諾總理當墨索里尼宣戰後數小時與他的政府遷離巴黎的時候，他便致電總統作了一次動人的呼籲，要求他公開宣布，美國除了不派遣征軍以外，將用各種方法來支持同盟國。

他說：「我們將在巴黎的前方作戰；我們將在巴黎的後方作戰；我們將在我們的最後一個省裏面重振旗鼓而戰。如果仍被逐出，我們將在北非，必要時甚至在我們美洲的屬地繼續作戰。」

總統和我知道法國既不能在巴黎的前方或後方作戰，也不能在他們的最後一個省裏面繼續抵抗，（雷諾腦筋裏所想的）是布列塔尼。但仍能保持陸隊的控制，撤往北非，然後再從那裏作戰。

我們雖有最大的好心和好意，但也知道我們在援助法國方面所能做到的，也有物質上和政治上的限度。法國的爭奪戰是真正地過去了，我們已不可能有何作為以阻止希特勒征服法國本部。所以我們打算發出一個回電，鼓勵雷諾和他的政府在北非作戰，並保持法陸隊的完整。

德軍於六月十四日佔領巴黎，恰是總統答覆法國的前一天。蒲立德大使與軍事行政長官一同把這個不設防的城市移



戴高樂訪美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法國國民委員會主席戴高樂，與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華盛頓白宮會談。圖為戴高樂與杜魯門在會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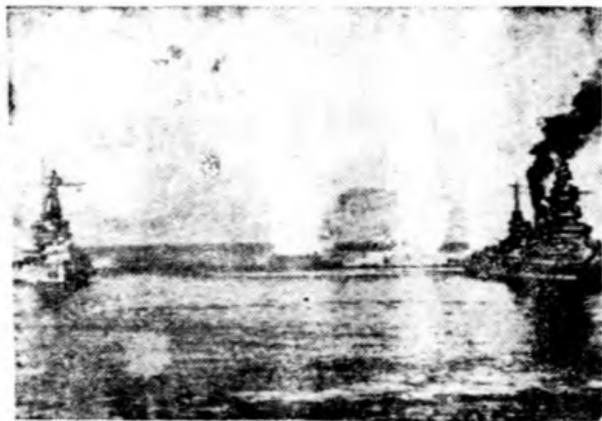
交給德軍，以致沒有犧牲性命。就蒲立德本人的願望，他是寧願留在巴黎而不願隨法國政府先遷往都爾而後又遷往波爾多的。他的想法是如果留在巴黎，至少是暫時地在德軍佔領之下留在那裏，比較跟着法國政府一同逃走，他可能對盟國和巴黎人民有更大的貢獻。他衷心嚮往美國前任駐法大使赫里克（Myron Herrick）的行動，赫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便留在巴黎而不願隨法國政府遷往波爾多的。

這個決定在我認為是不幸的，在六月十日法政府離開巴黎和六月十七日它要求一個停戰協定之間的這一段有決定性的時間裏，蒲立德因此完全沒法與法國政府保持聯繫。以蒲氏和法國政府領袖間無可比擬的友好關係，如果他能在那段歷史性的日子裏代表我們，法國政府可能已挾其艦隊奔往北非，就從那裏繼續作戰，雖然不一定會有這事。

蒲立德的職務旋由畢德爾（Biddle）大使繼任，他曾任我們派駐巴黎的波蘭流亡政府的使節。畢德爾雖是一個良好的外交官，但跟法國政府的關係和對法國政府的影響力量，是不能和蒲立德比擬的。

當德軍迫近巴黎時，蒲立德便直接和總統通消息，他說他知道國務院會反對他將要提出的計劃所以才親自和總統聯絡，他接着便提出留駐巴黎而不跟法政府遷走的建議。

蒲立德是常常用電話同電報和總統直接聯繫的，他並且有一個他所編的和總統單獨使用的密碼。這種程序在法國失敗的那些悲慘日子裏達於最高潮，結果是，雖然總統常把來自蒲立德的消息告訴我，並且當我詢問他任何一樁事情時，他也常給我以充分的情報，但國務院對於蒲立德的思想和行為，常常是茫然不知的。總統因為喜歡外交事務的戲劇性的一面，所以對於這種行為常常不加阻止。



法艦隊在阿摩爾河停泊

當我獲悉蒲氏的計劃時，便去會見總統。我對他說，我反對這種計劃而認為我們的大使應與法國政府一道走。在我看起來，蒲立德對於巴黎德軍佔領當局的影响力實在微不足道，因為他強烈的反納粹情緒，德國政府知道得非常清楚。然而另一方面，他對法國政府的影响力或許是具有決定性的。

總統於是親自打電話給蒲立德。他向大使說，他（總統自稱）和我認為他應該隨同法政府離開巴黎，他的理由是，蒲氏可能被共產黨或納粹黨徒暗殺，因為兩者對他都是恨之入骨的。蒲立德說他不能自危險中揭長而去，他說得總統不再反對他。

畢德爾促法續抵抗

畢德爾大使先在都爾遜而在波爾多勉力奮鬥，當他聽見雷諾、貝當、海長達兩朗、達拉第以及其他人士時，便一再向他們表示我們的觀點，認為法國既有完整的海軍，理應繼續抵抗。畢氏的來信把法國內閣中演出的一幕好戲給我們一個生動的敘述，在雷諾反對停戰而貝當贊成停戰的時候，內閣之外，陰險的賴伐爾卻開始利用他的勢力準備投降了。

於是雷諾便在六月十六日晚上辭職，由貝當組織新內閣，任鮑多恩（Baudouin）為外長，達兩朗為海軍部長，以便請求停戰。

英美兩國政府拼命努力以保證法國海軍的安全。邱吉爾並派他的海軍大臣、海軍第一次官、和殖民大臣代表他到波爾多去。在與總統討論局勢之後，我把一封轉給貝當政府的電報，交給我國駐波爾多的畢德爾大使，這是我做事以來所發的最強硬電報之一。

美極盼保全法艦隊

我說：「總統希望你來說，美國政府認為，如果法國政府在與德軍締結停戰協定以前，不能使艦隊脫離他的敵人之手，法國政府便將使法蘭西帝國的保持，以及法國獨立自主的最後恢復，受到致命的妨礙。再者，如果法國政府不能採

取這些步驟，並允許法國艦隊降於德國，則法國政府將永遠失去美國政府的女誼和善意。」

這差不多是一封鄙野的電報，然而局勢如此，也只有「一封強硬的電報差可有點用處。」

畢德爾於六月十八日把這個電報交給達爾朗，那時達氏正將參加一次內閣會議。畢氏並訪問從會議裏出來的鮑多恩給他一個副本。雖然鮑多恩在畢氏看起來是爲照會的強硬態度所深刻地激怒了，但他和達爾朗仍把它提交內閣。法蘭因而決定，在任何情形下，艦隊都不應交給德軍，並且，如果艦隊投降包括在德軍的條件內，則停戰應予拒絕。

法國艦隊並不是我們唯一的急務，我們對於英國艦隊可能遭遇的事也同樣的注意。現在法國已經屈服，希特勒已可從容轉過他的全部力量對付英國。總統和我相信，英國能够並且行將順利地抵抗納粹的攻擊，但美洲和歐洲之內準有不少的人附和貝當與他的僚屬的，認爲英國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將被征服或議和。

當英國的樂相大使於六月十一日來看我時，他說他已接到邱吉爾的一項建議，即在我們兩國政府的海軍官員之間應舉行參謀會議，以商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艦隊活動。我答覆說，我懷疑是否將有任何機會舉行參謀會議。但我將很樂意把這個建議轉告總統。

樂相當問，他的陸軍武官是否能夠和我們陸軍部內的有關官員會商關於英法轟炸德國內部的效果。我說我們雖然不能被聯聯着去交換那種性質的情報，但我可以保證我們的軍事人員是樂於把一切可能供給的任何情報供給他的武官的。其後我便爲該陸軍武官安排和陸軍部就此一問題舉行會談的事，我要求我們駐德的使領人員把英國轟炸德國的結果隨時彙報告訴我們。

我於六月二十四日又和樂相談到英國艦隊的處置問題。他重申那個建議說，我們兩國政府的有關陸海軍官員間應舉行秘密的參謀會議，如果到了英國政府不得不挾其剩下的艦隊而遷往加拿大的地步，這是有着高度重要性的。但只有在英國失敗時才會發生這種後果，而樂相和我又是根本未預料英國會失敗的。

我指出，至少在現階段，通過外交機關以交換情報是比通過陸海軍人員要妥當些的。總統和我所願慮的，是舉行軍事參謀會議之事可能「洩漏」，而政府的反對者跟隨着孤立主義派，也可能立即提出控訴，說總統正計劃着把美國拖進戰爭裏去。

英竟擊毀法方軍艦

七月三日，法國艦隊問題得到一個戲劇性的部分解決。那時，英國把停在英國港口內的法國軍艦奪了過來，他們通知在亞歷山大港指揮一個分艦隊的法國海軍將領說，如果他企圖把它們駛回法國，他們便把他的艦隻擊沉，因為在法國它們將為德國所控制；他們並以一個最後通牒送給在北非阿爾（Oran）附近的梅埃爾克比爾（Médéjerk）指揮一大隊法國海軍的司令官，要求該處的法國軍艦加入英國海軍，否則便駛往英國或西印度羣島或美國的港口，以便加以扣留。當法國司令官拒絕時，英國立即開火，把大部法國船隻打毀，並打死了一千多個法國人。

我對於英法間悲慘的破裂之最後一幕無能為力，僅僅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傷感而已。

一年半以後，當邱吉爾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會見總統時，在一次總統為他的特別客人所舉行的宴會席上，我坐在首相和一個英國海軍上將的中間，這位上將當問我對於英國在阿爾攻擊法艦的事有何感想，我當把這個問題閃避過去，以免使他和邱吉爾之間引起爭論，因為我會聽說過英國海軍的這次攻擊會遭到反對，英國政府之內對此亦發生嚴重的分歧。

但在幾分鐘後，我却和邱吉爾本人談到這件事，他作了一個一般的說明謂，雜棋法國是不足信任的，如果沒有這次攻擊，她將已經把艦隊奉送予德國了，他並且說那時英國的聲望正處在最低潮的時候，他希望藉這次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一下，英國是依然是想打仗的。

蒲立德於德國佔領巴黎後不幾天便離開那裏，在英國擊斃法艦後一日的七月四日在維琪晤見貝當、頓伐爾、鮑多恩及其他的一般人。他在五日電告我說，他們的反應是極度激烈的，有幾個閣員主張立刻對英國作戰，但貝當却極力的反對任何較斷絕外交關係更為嚴重的舉動，貝當向蒲立德說，他承認只有由另外的某一個國家擊敗希特勒，法國的獨立才能恢復，他所以說懇地希望英國勝利。他把英法之間的裂痕，談話他所謂的邱吉爾個人性格的缺乏平衡，而將這種裂痕看得極微。

第二十一章 咄咄逼人的蘇聯外交

西國侵蘇以前的美蘇關係，是歷史上所不愉快的一頁。蘇聯要求美國供給她所需要的一切作戰物資，却不聽從蘇聯所提的約告，停止侵芬戰爭。美國促使蘇聯走向和平的努力失敗之後，發於世界局勢，只有加緊武裝，以求自保，而蘇聯也只有以侵佔比薩拉比亞和波羅的海三小國，加強對匈約防盟地位爲計了。

蘇聯對美要求無厭

一九四〇年，我們和蘇聯的關係，是帶着一種願望的影響，這種願望便是不要採取任何更足以驅使她屈服於德國武力之下的措施；但同時我們也得把對蘇出口保持一種限度，即不要供給她以過多的作戰物資，免得落到了德國的手裏。蘇聯因戰爭廢絕了她各種作戰物資的來源，所以希望繼續保持她和美國間的貿易路線，然而她不能明白，何以我們並不在各種情形下，廣泛地供給她以武器。

有些時候她的要求簡直是不可能的，幾個月以來，她便想向美國的造船廠商購買一艘完整的戰鬥艦。總統和我也給意爲她造一艘。不過蘇方堅持應把美國最新式的設計和發明裝配上去。海軍方面可以同意把這艘戰鬥艦造得至少和我們已經有的艦隻一樣現代化，但却有理由不願意把所有最新式的機密奉送給蘇聯，這些秘密是美國長時間研究的累積，其中一部在我們當時尚在建造中的戰鬥艦上才具體實現出來。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日，我和奧曼斯基大使就美蘇關係作了一次通盤的討論，奧氏是我們所碰到的各國外交官中最難以應付的一個。他的態度和言語傲慢不羈，他行和我們這般跟他接觸的人抗辯的天性。他以盛氣凌人的態度要求各種諒

步，好像這些要求是一種天然權利；他流諷我們的行動，好像這些行動是可惡的干犯行爲。在我看來，他對美蘇關係大有妨害。

奧曼斯基這回帶着許多無足輕重的事來見我。在會談之始，他便背誦了一大套所謂不平之鳴。他敘述某共美國公司不讓蘇聯的工程師和看貨色的人去參觀他們的工廠；他敘述以臨時護照簽證前來美國的顯要蘇聯男女，在埃利斯島（Ellis Island）被長期扣留；他並談到我們的道義禁運辦法（和蘇芬戰爭有關）。他於是提出粗野的詢問道：美國政府究竟是要放棄還是繼續和蘇聯間的商務關係。

我特別的不就任何一方面加以批評。

這時他便想強調一點，即道義禁運是僅適用於蘇聯一國的。

我明白向他說：它適用於一切對老百姓濫施轟炸的國家。

奧曼斯基否認蘇聯曾對老百姓施行轟炸。

蘇炸平民累累有據

我答道：「我們有蘇聯轟炸平民的最可靠證據。鑒於你討論這個問題時的口氣，我之不能使你相信蘇聯曾經轟炸平民，就像你不能使我相信蘇聯未曾轟炸一樣。」

奧氏每次想要陳述蘇聯政府的和平願望時，我則每次表示這對種願望的懷疑。

這次會談差不多有一小時之久。奧曼斯基最後說，蘇聯政府沒有意思干涉羅馬尼亞的東部省區比薩拉比亞，這個地方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以前是屬於蘇聯的；蘇聯不大



蘇聯佔領區三海內兩期星內，佔領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聖利翁報本）。岸河波魯魯境，

相信土耳其將參加盟國所加於巴庫（Baku）產油區的任何干涉；蘇聯對於近東的任何部分都沒有企圖；然而他却避免提到芬蘭和德國的事情。

我於五月二十九日打電報給駐莫斯科的大使館，希望取得關於蘇聯向羅馬尼亞邊境進軍的情報。駐布加勒斯特的美國公使根室曾經電告我，蘇聯已沿羅馬尼亞邊境集中軍隊。羅馬人士相信，史達林懼於德國在西線勝利的程度，所以正企圖取得羅馬尼亞的領土，給他一個較好的地位，和希特勒講價錢。他們曾經提利羅馬東部省區的比薩拉比亞。

我們駐莫斯科的代辦塞斯敦（Walter Thurston）於會見莫洛托夫後，便於五月三十一日電告我說，莫洛托夫曾發出一大對美國的猛烈控訴。他特別震怒於蘇聯向美國廠商訂貨之被取消，認為這是不友誼和無法忍受的。塞斯敦向他解釋，由於國防上的理由，我們也正徵用其他國家政府的訂貨，所以並不是對蘇聯的差別待遇，這時莫洛托夫的脾氣便發作了。他說我們沒有權力去修改政府與政府間交往的正常法則，我們的行動是不合法和無法忍受的；我們必須担当這事的完全責任，它將對我們一無好處。

然而在六月初，塞斯敦便開始告訴我，蘇聯政府對盟國的態度已有改變。莫斯科對於德軍的疾速進展，現在已希望法國能繼續作戰。在這以前，莫斯科則是一直支持着法國共產黨的活動以阻撓雷諾政府的。

塞斯敦大使奧斯斯基，一個當他脾氣最不好的時候便舉止傲慢的人，於六月十二日來見我。我們的政府爲了國防上的目的，正把蘇聯政府過去所訂的機械工具取了過來，我知道他是要對這件事來一個抗議的。我熟知他和國務院其他官員間就這一問題所舉行的無數次會商，我對他所採取的叫囂叫咒的語調更非常熟悉，我於是便自行開始了討論。

蘇大使的橫蠻無理

在敘述了我們和其他每一國家，特別是與蘇聯，在各種情形下協力走向和平的無數次努力之後，我便說：「我們已經在難以形容的失望和遺憾情緒下，看到我們所作的一切努力化爲烏有。處於這種環境之下，美國政府已經進行一類武裝、武裝、武裝的舊政策，以便能保衛自身抵抗任何敵人。爲了這個目的，美國政府決毫不猶豫地去取得必需的物資或貯存所有的貨品，以供給這個晝夜進行不息的武裝方案的需要。」



我最後說，我們不能得着蘇聯較過去七年來更充分更廣泛的合作，真是失望之至。

奧曼斯基開始談到商業上的差別待遇，他說美國政府正在這樣做，我打斷了他的話說：

「在目前的緊急情形下，蘇聯政府還孜孜於這類小問題的爭辯，使我深感意外。蘇聯政府在其商務途徑之下，正以差別待遇施惠於其他國家，其中包括以大量的作戰物資供應德國，我們對這並沒有說過一句話。」

奧曼斯基聲明這是正常的貿易。

我回答說：「無論如何，這包含着戰爭所急需的大量供應品，這種事實便與正常貿易大有分別了。就美國政府方面而言，蘇聯自然是有充分的權利去實施這種正常的貿易的。在薩阿（阿比西尼亞）戰爭的時候，我們對義國採取一個大不相同的政策，當時我們即以道義禁運的辦法，將貿易保持於戰前的水準。不過在今天，我們主要論點則是建立於我們當前保存物資，以加強我們的軍備的政策之上的。」

我於是說：「我們有一個最高的希望，即希望蘇聯遵循一種方針，給她以對於和平的顯大影響力，因之總統在蘇聯侵入芬蘭以前，才慷慨地向蘇聯提議出而斡旋。」

奧曼斯基非常尖刻地說——尖刻的話之出於奧氏，就像麥子之湧出於打麥機一樣自然——是的，但是蘇聯對於總統當時某一場合所說的話，反響並不甚好。他所指的是總統對蘇聯之侵入芬蘭所作的譴責。

我回答說：「當一個大國有一個無助的羸弱小國墮在其喉嚨上，並把她硬得要死的時候，我一定認為該大國政府是無法反應或反擊的。在這種情形下，保持可能的較高度之戒嚴，自然便差不多是可以求助的唯一辦法。」

大使顯得很不自在，但並沒有說甚麼來答覆我。

在我心裏，有着莫洛托夫於幾天前對駐莫斯科塞斯致代辦的苛刻而傲慢的討論，又有着華府方面奧曼斯基大使在各種可能情形下所作聲色俱厲的傲慢談話，我於是便批評說：

騎上高馬威氣凌人

「莫洛托夫先生好像已經騎上了一匹『高頭大馬』，（譯者按，『高頭大馬』是一句俗話，表示盛氣凌人）我同時

也已經感到莫洛托夫先生在這裏的代表對英國政府的辱罵。這似乎就是我七年來努力維持與蘇聯間類似良好的關係而忍受許多尖刻指責的代價，也就是我希望這些關係獲得改善的報償。」

當奧曼斯羅繼聲中述他的控訴時，我便告訴他，我能够把對蘇聯的誠實控訴全部列舉出來，不過我實不願在我已經說過了的之外再說甚麼。他於是請求我——非常富於挑戰性——把我可能想到的列舉出來。很幸運地，從莫斯科回到蘇府的史丹哈特大使曾經給我許多頁的控訴，我便把它拿了出來。我向他唸了史丹哈特控訴的第一頁，我說我還能再多唸幾頁，但我不願這樣做。

最後，又談到我和其他人士為保持對蘇友好所作的長期而誠懇的努力上來，我說：「只要蘇聯認為適宜，美國政府將樂於去重行採取一些政策，以發展更完善的和平關係，並在各種實際途徑上保持互利的合作。蘇聯和我們的貿易額比較微小，如果故意誇大這項貿易的特殊重要性，將是一個錯誤，但我們樂於看着它的維持和發展，只要這種發展是在兩國互相可以接受的關係之下進行的。」

差不多就在這次會談的時間內，我開始接到我們駐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使節關於蘇聯要求的報告，蘇聯的要求是蘇聯部隊應獲准完全佔領該三國，並且他們的政府應予改組使對蘇聯更為友好。波羅的海三國不得不加以接受，而蘇聯的佔領便從六月十五日開始了。

德國誘和蘇聯恐慌

這種行動的一個理由是很明顯的，那便是史達林希望得到一個更良好的防禦地位以對付德國。我們駐拉脫維亞的公使魏察（John C. Wiley）於六月十九日電告我一個從可靠方面得來的消息說，克里姆林宮對於最近的發展是處在極度的惡慮和困惑之中，史達林的政策本建立在西德的一個長期消耗戰的前提之上。但這個政策由於法國的覆敗而告崩潰了，希特勒最近的聲明——為勸誘少國割讓和而發——說，他並不希望大英帝國的毀滅，這聲明在蘇聯心裏已經引起了恐慌，他現在正心着西歐問題將以蘇聯為犧牲而求解決。

在蘇聯佔領波羅的海三國後的兩星期內，她正謀取了另一防禦步驟，即佔領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和布哥維納。

(Bukovina)的一部分。非布加勒斯特的根達公使在五月間所告我訴的恐懼，算是不幸而言中了。蘇聯現在有了一個更易防守的西南疆界，波羅的海三國以及羅馬土地的佔領把這西方的曲折疆界拉直了。

我們駐在各處的使節的函電指出一個結論，即希特勒並不會接到蘇聯行動的任何事先通知，一個緊張的象徵現在是開始出現在蘇德關係之上了。

第二十二章 美軍艦換來英海島

英國因爲在波峽中對付德國潛艇，迫切需五十隻舊艦，美因這險艦依法可以出賣，同時美國也需要在大西洋沿岸增加基地，於是雙方想出一交換辦法，英國五十隻舊艦換來美在大西洋的若干基地的租借權。

英需要五十隻舊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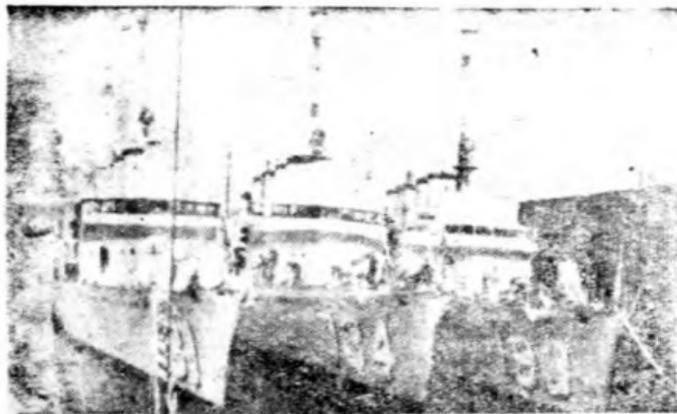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夏天，當英國海上的情勢，一天天趨於緊張的時候，我們面臨到新的決策。

八月四日是我動身赴白礁溫泉（White Sulphur Springs）的前一天，英國大使樂相勛爵特來看我，告訴我關於英政府要從我們這裏購買一批老式驅逐艦的「迫切需要」。他說，英國需要這些軍艦來渡過像他所形容的英國的「目前緊急的局面」。

當我參加哈瓦那會議（Havana Conference）的時候，總統正跟樂相商討這事件，並且又打電報給邱吉爾。關於英國在西半球可能轉讓或供給我們的軍事基地的問題也談到的。關於驅逐艦的出售或出借，在五月十四日德軍進攻法國後的第四天，法國總理雷諾就首次談到，第二天，邱吉爾也提及此事。

當時，總統是反對這個提議的。

可是，一切事情都是比較的。當法國的陷落大大地增加我們的危險時，我們就更傾向於出賣我們這險艦逐艦的打算，當軍艦對於國防的損失能夠以別的方法來補償時，譬如得到新的基地，我們尤其有這種傾向。我們的海軍早就需要在大西洋沿岸增加基地了。我們也感到，英國的艦隊處於軸心兇徒和我們之間，我們的驅逐艦既可以增強英國艦隊的實力



此中之三十分之五以上係由英海軍艦隊所佔領，圖為當時駐紮加拿大麥基安百
(不附資料)。

這對於我們本身，真正是增添了一重防衛。後來，國會又通過了一項政府法案，就是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通過的國防法，其中規定：凡經海軍軍令部長證明，某種海軍配備在國防上已失去重要性時，是可以將它出售的。

八月四日，當樂相到我辦公室來見我時；我已經完全明白英國的危險，正如同他所能說出一種。他說，僅僅在過去一禮拜中，英國就損失了驅逐艦五艘。他指出，在英吉利海峽對付潛水艇以及其他敵方行動時，驅逐艦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大型軍艦在海峽裏還不能發揮戰鬥力。

他說，這件事情，當我在哈瓦那時，他已經跟總統商榷過了，現在他之所以告訴我，是希望我能够在幾個星期以內，能把這件事弄出一個眉目。他又說，英國願意給我們便利，可以讓美國在靠近中美、南美的英屬島嶼上，在百爾葛他島上，建立海軍和空軍基地，在紐芬蘭也可以設立空軍基地。

一開頭，我就對樂相解釋：這種種的便利當為美洲所有的共和國的利益着想。我說：「爲了要保持在哈瓦那和以前幾次會議中所得到的諒解，美國的任何行動都要和美洲其他共和國取得合作。」

同一天，我送給總統一個備忘錄，上面說到出售軍艦和輔助船隻的事情。其中附有一份擬好的草案，打算送交國會，請國會特別批准這樁出售驅逐艦的案子，但是當我和總統討論草案的時候，我們都感覺到，這個草案一經送到國會，可能遭到兩重障礙——一方面，會引起孤立派的激烈反對；一方面，在這個草案被採納以前，可能要討論好幾個星期。

這就是我離開華盛頓時的情形。在我勾留白硫溫泉的三星期假期中，我裝有一條私人電話線，接到我的房間裏，每天都可以收到國務院的報告，因此在總統和威爾斯主持羅遜艦與基地的談判時，我也有參加意見的機會，並且跟他們保持密切的聯繫。八月二十三日我回到華盛頓後沒有幾小時，就去白宫出席內閣會議了。

在會中，總統對我說：「關於我們和英國間的基地與羅遜艦的談判已經擱淺了，看你能有什麼辦法。」

邱吉爾願贈送海島

當我跟總統談到基地問題時，我發現總統對於所有的基地，似乎都有一種驚人的知識，在這些港口上，他都會經航行過，游泳，或者那裏垂釣過。他知道那些港口有多深，有多寬，能够容納多少船隻。

他也知道這些島上一般居民的窮困情形，因此並不想去挑起管理他們的重担。但是在我離開華盛頓的期間，總統的意見已經有了改變。起初，他是有意要將那些基地全部收買過來的，後來他又主張租借九十九年算了。至於我個人呢？最初是贊同全然出讓的，終於也寧願同意租借的辦法。

於是，我就着手進行談判的事，決定愈快愈好的使它完成。

第二天，我正在審察談判以來的經過，白宫方面的通知來了，說：「明天晚上英國大使和總統有約，明天是一個星期日，總統希望我也能在座。」

星期日下午，樂相助傳來辦公室看我；因此在他跟總統談話之前我們將這問題預先討論一遍。他對於代理國務卿威爾斯在八月十九日送給他的建議，提出幾點不同的意見。他說，美國的建議是希望美國對於所需要的基地有全權指定和選擇，英國方面根本沒有開口的餘地，對於這一點，英國政府是火不贊成。他說，他們的政府也反對以羅遜艦交換基地的說法，並且希望把這件事改成彼此贈送的方式。

對於後面這一點，困難的是，邱吉爾首相在八月二十日的一次演說中，已經指出租借基地是一種贈與，他根本就不會提到羅遜艦的話。首相認為如果說互送而不說互換，可以使大西洋的兩岸，增加更好的合作精神。他又說，英國與論方面，對於贈送總比交換來得信任些。再說，英國將那些有價值的基地租借給美國，即使能够收到五十隻舊艦的話，也不能說是得到了全部價值的補償。

想出交換送禮辦法

可是，我們也有我們的困難。檢察長傑克遜（Jackson）認為總統，我們的陸海軍總司令，是有權將驅逐艦賣給英國的。可是，如果總統沒有得到國會方面的特別許可，而貿然去做的話，他一定要使國會相信以驅逐艦換得基地，此保存五十隻驅逐艦，更使我們感到安全。

其實，比這件事更重要的，還是總統根本就沒有權力拿國家的財產去送人。我就這樣地告訴了樂相助辭。

那天晚上，我在白宮會見樂相，當我們坐在一起，等待總統的召見時，我又向他強調地說：總統是沒有權力拿國家的財產送人的。

可是，當總統接待我們的時候，出乎我的意料，樂相對於我所說的，總統在法律上不能以公家財產贈送他人的話，竟一點都不加理會，却向總統呈上英國的建議。

樂相說完了他的一番理由之後，我第三次對他說，總統是根本沒有權力拿公家的財產送給任何政府或者任何人的。這番話我對總統還是第一次提起。羅斯福總統聽了之後，對我欣然地同意了。

總統隨即就把這件事交給我辦，要我跟樂相去商量決定。

第二天早晨，我去辦公室看國務院的法律顧問海克華斯（Hickworth）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唐森德（Townsend）想出一個對付的辦法。我們談了一陣之後，海克華斯突然想出一個辦法來了，他建議說：在耶吉爾要求互送禮物和顧到美國法律問題之間，還有一個折衷的辦法，那就是說：除非能夠換回一些代價，總統是不能將驅逐艦隨便做人情的。

既然，英國沒有肯定的說出，那些基地是可以租給我們，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把它們分成兩組來看呢？第一組是英國可以租給我們的基地，這包括紐芬蘭和百爾基他島的若干基地。第二組是如果我們給了他五十艘驅逐艦，他才肯租給我們的基地，這包括沿加勒比海一帶的基地，因為這些基地都靠近巴拿馬運河，所以，在戰略上，對於美國是更有價值的。

我立刻發覺，這正是我們追尋着的一套方案。

於是，我們就動手把提案重新擬訂起來。

那天下午，海克華斯和唐森德去見總統，總統對於這個折衷辦法，也表示同意了。

保證英艦隊不降德

在草案後面附有英國政府的鄭重保證，內容是，如果英國軍艦在英屬島嶼與四周的海上，不能支持時，「不論在任何情形下，英國艦隊不得落入德人手中或自行墜沉，務須駛赴帝國其他海港，繼續其防衛工作。」

六月四日邱吉爾在英國議會中發表的一篇演詞中，已經宣布了這個保證。但是由於我們以驅逐艦移讓英國的緣故，我仍希望他們把這個保證再正式重述一次。

八月二十七日，樂相助傳交給我一封邱吉爾給總統的長電報。邱吉爾在上面自稱「前海軍人員」，他贊同樂相先前提上的提議，要把所有英國基地的租借當作全部贈送。這個提議：是我們沒有接受的。

關於保證英國艦隊不會墜沉，或者輕易落入敵人之手的事，邱吉爾也已有打算了。保證的方式是由樂相和我分別交換函件。

邱吉爾以他一向倔強的脾氣說，希望雙方交換的信件不要公開發表。他說：因為「在我看來，投降也好，墜船自沉也好，或者破壞剩餘的軍用品也好，這都是德國政府或許更會幹出來的勾當。并且你一定知道，這些事對於德國人，已經成爲家常便飯了。你還記得罷，幾個月前在我給你的一封信私人電報裏，我曾經說過，在我們這方面如果有任何這樣的行爲都說明是一種懦怯。這是我們全國每個人的看法。」

關於保證是否可以發表的問題，邱吉爾在八月十五日給總統的電報裏，已經明白提出反對了。他說：「……請你設身處地替我們想一想，或者也以你們的立場想一想，如果我們把英屬島嶼和它的海軍基地的喪失不看作是一種不可能的事，如果我們讓這種印象滋長，你想對於英國人民這將要產生怎樣惡劣的影響。我們人民的精神是偉大的。」

老邱慷慨再贈一島

樂相將總統心目中所欲意之基地，拍了電報到倫敦去。邱吉爾同意了，並且又慷慨地加上加勒比海裏的安的瓜島（*Island of Antigua*），他說這島也可以建立水上飛機的基地的。

八月廿七日的晚上，天氣悶熱，約莫十點半鐘尤景，樂相，諾克斯和史塔克海軍上將都來到我的房間，看我穿着睡衣。我們四個人，將草案研究了一個多鐘頭，起初樂相有一些建議要修改，但是到了最後，終於他好像感到了滿意。他說，他要把這草約送到他的政府去。

八月廿九日晚上七點鐘，樂相助爵到我的房間來找我，把英國政府的覆文交給我。我們將全文修改了幾處，然後，我馬上打電話通知樂相，他在十點半又來到我處。對於我們的修改，他表示同意。

第二天，八月卅日，我將修改的地方打電話到海德公園告訴總統，並且得到他的許可。

樂相助爵是在波士頓消度週末的。九月二號，星期一下午，他回到了華盛頓，當天晚上七點鐘，就到我這裏來。在我的房裏簽字，並且交換了批准驅逐艦與基地交換事宜的照會。

樂相對於我前次給他的備忘錄，要求關於英國艦隊的保證一節，也將他的答覆遞交給我。

樂相在他的答覆中說：「英王陛下的大使承首相之命，特來奉告赫爾國務卿，此項聲明確保代表英國政府的既定政策。邱吉爾必須注意到，這類假定的意外事故，似乎會更與德國的艦隊或其剩餘的艦隻有關，而與英國毫不相干。」

這最後一句是邱吉爾自己添上去的。

我們於是在一星期之內結束了我們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段談判。

第二十三章 不想坐第一把交椅

早在一九三八年羅斯福便對華盛頓於一九四〇年競選總統，做他的繼承人。到了一九四〇年六月又重新重提，赫爾再三懇求，表示如奧蘭德做國務卿，一定可有較大的貢獻。總統後來又請他競選副總統，若論更不願坐在高位而年輕的第二把交椅上。羅斯福終於還是自行放棄，第三次連任總統，以諾亞士為副總統。查爾依西是國務卿。

羅斯福再三讓赫爾

羅斯福的出任第三任大總統，其直接原因，是由於希特勒的佔領法國，和英國在征服者和我們之間處境的孤立。我們危急的局面，促使羅斯福挺身而出，參加第三次的競選。

當時，總統不論跟我或者跟民主黨首腦們的私人談話中，他總這樣表白他的心跡，希望我做他的繼承人，我既會用盡方法來申辯我實在不是總統候選人。歐洲烽火漫天，日本又在亟亟準備他的第二步行動，美國面臨着千頭萬緒的外交問題，我覺得讓我在總統領導之下，繼續致力於外交工作，這對於國家，着實要比我競選總統來得重要。再說，我的身體也時常鬧盤扭，我實在不想在一九四〇年被牽入國家政治的漩渦裏去。

從一九三八年年底到一九四〇年七月，羅斯福總統老是肯定地勸我，贊成我在一九四〇年時出任他的繼承人。這件事第一次被提議時，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某日我到白宮去和他討論某項外交政策的時候。

當時，我跟他說：「就說這件事吧，幾年之內，都難得辦好，一直要等到你的總統滿任之後哩。」
他的臉露出驚喜的顏色來了，他回答道：「噢，那就好了，到那個時候，你正坐在我這副職位上。如果我的努力成

功，你就可以有權來處理這件事了。——我本可向牠道謝，同時還要向他建議，就讓我們來著手籌備競選。可是，我並沒有這樣做——相反地，我反而對他開誠佈公，說明我不想捲入總統的政治活動裏去。

「我相信，這世界正走向困境。」我說，「我想，我在國務院還可以有更大的貢獻。」

自從那次以後，總統又有好幾次利用機會來提到這件事。每次他提起的時候，我都不建議籌備競選，而且提出反對的意見。如果我們真的進行籌備的話，他將會受到束縛。

羅斯福總統在許多參議員、眾議員以及民主黨首腦們的面前，也曾經提到過他有意要我繼承他的話。

一九四〇年四月，在一次內閣會議聚餐時，我的太太坐在總統的鄰座。看樣子好像總統要我在飯後說幾句話似的，我的太太對總統解釋，說我不喜歡發表演說的，總統聽了後，回答道：「好囉，你得告訴他，最好要把演講習以為常，不久，他演講的次數多得很呢。」

從一九四〇年一月起，我向記者發表了好幾次談話，說明我一點沒有競選總統的野心。



連任三屆總統之羅斯福投其第二百九十二號選民之一票

赫爾人望過羅斯福

是一九四〇年的春天，有一次，報上載有關於下屆總統候選人的民意測驗揭曉，我所得的票數，在比總統的多。至於比起跟我敵對的有聲的共和黨候選人的票數，那更要多些。

這種情形，在我自己黨內，使新政派極端左翼份子大大的吃了一驚。甚至有些跟總統很接近的人，也包括在內。這一派人，都是竭力主張羅斯福總統是應該參加第三次的競選的。這樣一來，他們對我之可能為候選人，是不很愉快的。早在一九四〇年之前，這一個圈子裏的某些人，就拉攏了一批專欄作家，忿然對我發動嚴酷的抨擊。

差不多晚到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當我在白宮看見總統的時候，他還是一再提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以來，三番五次說過的話，那就是他希望我做他的繼承人。這一次，他還是不表示他的仍要參加競選的意思，而事實上呢，恰好相反。那一班接近總統的新政派人士，極力力諫總統參加競選的。可是，每次他都叫他們不要開口。各地的評論家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總統之所以告訴他的幾個知己朋友說我是一九四〇年的繼承人，只不過要利用我充當中間的緩衝品，然後，他自己才好插足進來。評論家們又說，他對於我並不怎樣信任。不過，無論如何，我明白他對我說的話都是挺真實的。我心裏既不想做總統，對於這些事情，也比較想鼓選總統時更能夠下斷語了。

我想覺得，雖然他本人一直保持着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向我表示過的意見，但是，在他的顧問們苦口婆心懇求之下，有些時候，他也可能有意參加第三任總統的競選。至少在一九四〇年春天以前，無疑地，他是希望我能當選，我是從他當時對我，以及對其他人的談話中，可以斷定的。

後來，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三日，我跟他又有一次談話。當時，法德簽訂了停戰協定，英國是如狂如癡，正忙於防禦被襲的準備；墨索里尼投身於戰爭中，日本蠢蠢欲動，我們自己的情勢，十分嚴重。這次的談話，給我這樣一個印象。以致當時回到國務院去的時候，我就筆錄了下來。

總統曾經請我午餐，席間，只有我跟總統兩人。在用餐的大部分時間中，我提出了並且決定了國務院裏的一些公事。最後，總統突然地說：「好了，現在讓我們倆談談政治罷。你知道，有許多人跟我這樣說：『你不能讓我們失望的』

1. 1.

總統說這番話時，完全用着一種不耐煩的，懷疑的口吻。

我說，這或許是人們的一種壓力罷。

總統說，他曾經讀過華盛頓給麥迪生（Madison）的信，信上說到華盛頓爲別人批評他參加第二次競選而訴苦。羅斯福總統說，他心裏也想寫一封信給像諾爾斯（Norris）參議員那樣的一個人，在信的末尾說，他想回到海德公園去，他說，這樣一來，年會上就可以將我的名字提出來了，他問我，對於這樣的一封信，有意見嗎？

我立刻答復他說：「當然啦，這樣一封信對於你的提名是不會延擱一秒鐘的。」

於是，總統又揣測他自己怎樣才能當選。他說話時，時微有些停頓和不連貫。在他的語調中，他是極不贊成競選這個念頭的。他說，他覺得除非戰爭結束，否則預料在十一月裏他可以當選。因爲，戰爭一結束，共和黨的候選人威爾遜很可能擊敗他；不過，對於這些，他並不介意，除非爲了國家的緣故。我聽完他的談話，沒有發表意見。

然後，他就開始說到我做總統候選人的長處和缺點。他的這次談話，比起以前他跟我談的，的確是要慎重多了。以前，他是直認我是他的繼承人的。

謀諸夫人不做總統

我打斷他的話頭，我說，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毋庸考慮到我。我所以這樣說，一方面是由於以前我會跟他提到過我不願參加競選的兩個原因；另一方面是因爲我洞察他自己已決定要參加競選了。於是，我強調我的健康情形說：「這些個月以來，我跟我的太太已經商量停當，我決定要脫離公職，尤其不要參加政治活動，爲了使我的情形不致對你競選總統之說發生些微的影響，所以我常常大事宣揚，我沒有參加競選總統的希望或意向。」

總統宣揚我一陣德高望重之後，接下去說出他所見到的我的短處，不過，他只提到一點——在農業地帶反對商務協

定的宣傳。他又說，我或許可能以華萊士，或者農業地帶人士做副總統，而當選。

我再度聲明，我沒有意思參加競選。我說，我不僅會慎重而完全地避開在他的政治動態領域和範圍之外，並使得我

們在國務院所做的，以及正在進行的一切工作，都歸功於他，他欣然同意說：這倒是真的。

在我們談話中，總統的口吻和論調，和十天以前他仍贊成我競選的話，是迥然不同了。

在這個時候，總統勢必下決心，參加第三任總統的競選。外面已經醞釀着一個大規模的運動力促他這樣做。我從一月開始發表無數公開的談話，竭力表白我沒有在一九四〇年參加政治活動的意思，並且絕拒許多州裏我的朋友爲我幫忙活動。就因爲我這些舉動，黨裏某些派系，尤其是較極端的新政派和總統面前其他急進的黨人，爲了國家嚴重的情勢，而在全國各地發起擁護羅斯福總統連任第三任總統的運動，也是勢所必然的了。這個運動的勢力，漸漸擴大，直到後來，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份子和聯邦政府官員及其他友好份子聯成一條陣線。這事當時已經確定了。

也不願坐第二把椅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總統就開始慫恿我競選副總統。他把我請到白宮去，唇焦舌敝地勸我連兩小時四十分鐘之久。我拒絕了，並且拒絕得十分堅決。

在我看起來，所謂副總統者，無異是一個人讓他自己當一名參議院的議長，既沒有權利參加商討國家大事，更沒有權利投票，除非在雙方票數均衡，相持不下的時候。會記得哲斐遜對於副總統的一段描寫，我復以爲然。一七九六年哲斐遜當選副總統時，他這樣寫道：「……它，在冬天可以給我一個恬靜的夜晚，在夏日可以消受鄉村裏的閒情。在政府裏，身居第二寶座，既榮耀，又輕鬆。」

把這種情形和我目前的處境作一比較，我立即堅決地對總統說，在艱難的來日，如果我仍留在國務院的話，想來，我還可以做些更有價值的事。

我對於閒散的位置和僅次於總統的最高榮譽，並不感到興趣。

一兩天以後，總統把我請到白宮去，又一次很誠懇地慫恿我接受他的意見。無如我仍然堅持我原先的態度，不爲所動。

約莫過了一夜光景，總統打電話到我的私寓裏來，他再三用許多強調的話語勸我。我還是拒絕了。

然後，他說：「讓我和佛蘭西斯（Frances 譯音註：指赫爾夫人）談談，我要說服她，她會說動你的。」

我的太太就坐在我的旁邊，她不住地搖頭。她不願被拉去參加討論。

對華萊士並無好感

於是，他說：「如果你不願意的話，我只好請華萊士出來了。」

我還是說我不願意。我說：「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所以說這句話，並不是說我擁護華萊士當副總統。事實是我要儘量避免給總統拉了去，我對於他提出任何代替的人，都不表示反對。就是在那種情況下，我對他提出華萊士時，才說了「可以的，而不是真的擁護華萊士，或者是贊成他參加副總統競選。」

七月十八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裏提名羅斯福為第三任總統的候選人。那天，我特地去白宮，向他道喜。

在我個人方面——對羅斯福之輝煌第三任總統這回事，很是反對。我擔心這會給未來的總統濫用其權力。我覺得這裏只有一個辯護的理由，那就是因為當時我們正處在嚴重的國際危機中，西方文明似乎臨到了有史以來最危險的時候；如果總統不出來參加競選，其他的民主黨候選人可能會落選的；這樣一來，從選舉那天起，一直到一月二十日總統就職止，其間兩個半月，我們的政府沒有一個真正的領袖，那麼，這事就可能有些悲慘的結局了。我覺得一個被人民所排斥的政府，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會尊重它，而且不知軸心國家要採取怎樣的行動，更不知在總統虛位空着的一段時間內，可能會帶來了什麼結果。那時，我腦裏所想着的是，當時可能有如珍珠港事變那樣的事情發生。

第二十四章 希特勒大舉攻蘇

英國在希特勒進攻蘇聯以前的半年中，即不斷擬委納粹攻蘇的決心和軍事計劃，並隨時以這些正牌的「假報告蘇聯」。蘇俄戰爭發動以後，美國即決定全力援助蘇聯。羅斯福大總統曾說過，更有合同蘇聯存續「供給最迫切需要的最高限度的援助。」

電影院秘密送情報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當希特勒侵蘇的消息傳到我這裏時，我正臥病在家，立刻我就打電話給總統和國務卿歐爾斯。我分別對他們這樣說：

「我們必須以全力協助蘇聯。我們曾經再三地說過，凡是抵抗軸心國的任何國家，我們都要盡我們的能力，予以援助。現在，蘇聯之屬於這一類，是毫無疑問的。」

我知道國內外若干軍事專家，正在預測說，在這次戰爭中，希特勒打敗蘇聯，只是幾星期內的事，可是，我不相信，就像前些時候，許多人說到法國淪陷後英國的崩潰，只是幾星期的事；我並不相信一樣。以前，我認為，只要在一九四〇年夏天，湧進大批軍火到英國去，我們就不致於讓英國有陷入德人手中的危險。同樣地，我以為，如果我們盡力以軍火，給蘇援助蘇聯，蘇聯絕不至於為德國所佔領。如果總統和我信任蘇聯抵抗德國的力量，那末，我們援助她的軍火，既然只會落到希特勒的手裏，我們的援助，也就成爲不智之舉了。

半年以來，我們已經獲得可靠的理由，深信希特勒是會進攻蘇聯的。因此，六月二十二日的事件，使我們並不感到驚訝。一九四一年一月，我收到遠從我們駐柏林的商務代辦吳茲(Sam E. Woods)寄來的一件秘密報告。他有一位德

國朋友，這位朋友雖然是納粹的敵人，可是，他跟德國政府的各部，德國銀行，以及黨裏的首腦們，都有密切的關係。早在一九四〇年八月的時候，這位朋友通知吳茲說，希特勒的司令部裏，正在開會，討論對蘇作戰的準備。幾星期以後，當希特勒激昂地說出，要使「從海參崴起，一直到直布羅陀止，只有我的軍隊存在」，這個情報更具體化了。

吳茲常和這位朋友在柏林的電影院裏會面。先由這位朋友，在代理店裏買好對號票，然後將兩張票送給吳茲，他籌劃好坐在吳茲的旁邊，在燈光昏暗的時候，偷偷將字條塞進吳茲的衣袋裏。

從吳茲那裏得來的情報，和希特勒攻英的種種跡象，是一個很烈的對照。可是，據那位朋友所接近的人說，德國對英國的空襲，只不過是一種烟幕罷了，希特勒真正的目的，只是在準備向蘇聯來一個突擊。

後來，吳茲的朋友又告訴他，德國方面已經替俄國沙皇時代二十一個省區的政府組織好一個類似德國國防軍的組織，這些地方負責經濟事務的人員已經指定了。整包整包的盧布鈔票已經印好了。

最後，通過這位朋友與德國參謀總部的關係，吳茲獲知關於希特勒戰略計劃的要點——採取北、南、中三路夾攻，以中路具有決定性，直趨莫斯科。所有的準備，限於一九四一年春季完成。

蘇聯情急與日妥協

吳茲的報告，包含這許多情報，當它達到我這裏時，是那裏最壞的，最近，我相信它是德國的一個「收詐之計」，我把它轉交給聯邦調查局的局長胡佛，徵求他的意見，胡佛聽了這個報



大西洋會議，羅斯福會於艦上決定聯合聲明保證蘇聯，右至左立者第一人威爾遜，第六人蘇聯總理斯大林。

告是正確的。史茲告訴我們一個辦法，可以證實消息來源的是否可靠，就是要我們去一間流亡在美的——位德國要人，我就請助理國務卿朗氏（Mr. Winthrop Lane）去看他，他終於得到了證實。我也和總統討論過這個報告。

然後，我決定將這報告中的內容送給蘇聯大使奧曼斯基。我認為，這是美國對蘇保持適當態度應取的一個步驟。由於我的建議，威爾斯曾經和奧曼斯基商談過好幾次，以解決兩國間的異見，我請威爾斯將這個情報拿去提請蘇聯大使的注意。威爾斯是做了。

當這同一來源的情報送到我處時，我又把它交給威爾斯，請他轉交奧曼斯基。他是在三月二十日送出的。

奧曼斯基毫不躊躇地將這情報送到他的政府去，他說過他要送去的。至於這件情報對於蘇聯的政策會有什麼影響，那是很難說的了。不過，只在三星期之後，史達林突然跟日本外相松岡簽訂了日蘇互不侵犯條約，這正當松岡認為不可能簽訂這類條約的時候。無疑地，史達林之所以跟日本簽訂這個互不侵犯條約，其目的乃在蘇聯要在遠東保衛自己，他相信，希特勒是打算在歐洲進攻蘇聯。進一步講，蘇聯對於巴爾幹諸國當時所採取的政策，比較面對着希特勒計劃把這些國家吸入軸心時所採的政策強硬多了。

蘇聯會在一九三九年八月激起希特勒從事歐戰，並在波蘭人拚命抵抗德軍的當兒，協助德國進侵波蘭。可是，自從一九四〇年八月以來，蘇聯一直都以各種方式，干涉和阻止希特勒的企圖。

關於我們所獲得的希特勒計劃攻擊的情報，當我跟日本進行談判時，對我尤其感到有用。根據這些情報，可以推測蘇日之間可能的友好，還可以使我們揣測日本採取一個較其他情形之下更堅定的態度。

蘇駐美使前倨後恭

真不幸，奧曼斯基跟威爾斯之間的談判是被裂了，或者可以這樣說，因為他們彼此的爆發性的，辛辣性的談話而爆炸了。奧曼斯基認為堅定就是粗鄙，老實說，奧曼斯基是很難對付的。加之，蘇聯所需要向我們購買的主要原料，如果以我們對英國的諾言來看，已比我們所能供給的多得多，蘇聯政府付與奧曼斯基的使命就是指望他能獲得這些。

五月十四日，奧曼斯基來看我，神情十分沮喪，在我們談話的最初二十分鐘時，我們從新檢討我們兩國間的不睦，

他說，這件事從去年夏天起他跟威爾斯已經討論過不下二十次之多了，還是徒然無用。後來，他還給我一封有他簽字的信，信上提到運原料赴蘇聯的船隻遲遲啓行的事。他的信上又說到我們對蘇聯的「敵對態度」，並且以威脅的口吻說，蘇聯將因我們的態度而做「一切必要的結論」。他又口頭上兩三次地說我們的行動，是由於對蘇聯政府的敵意，並且是一格出於個人敵意的個人舉動。

我在這裏打斷了他的話頭說：「當我想到一個國家的時候，我想到他的人民的地方比想到他的政府爲多。我和我們的政府對於任何國家的人民，都不懷惡意的敵意。對於蘇聯和它的政府，我本人絲毫沒有敵視之意。我們的政府也絲毫沒有把個人的事過於政府的行動。所以你的話是完全不確的，而且是極不公平的。我不希望你從我辦公室出去，還帶着一點這樣的想頭，以爲你已經把這個罪名加在我們政府的頭上，因爲這是絕對沒有根據的。」

末後，我說，我們在一九三三年承認蘇聯的以前和以後，都始終是蘇聯人民的友人。說到這裏，我們的討論有一點熱烈起來了。

六月裏的平一個星期，我們從羅馬尼亞京城（布加勒斯特）和瑞典京城（斯德哥爾摩）的公使館收到證實的電報，就在兩星期以內德國要發動攻蘇了。國務院收到這些報告，就發送我們駐莫斯科的大使史丹哈特那裏。

希特勒侵蘇的八天前，邱吉爾首相給了總統一個音信說，從各方面看來，他覺得德國的大舉攻蘇已成箭在弦上之勢。他說如果新的戰爭爆發，英國自然會竭力援助蘇聯和協助蘇聯的，因爲希特勒本來就是英國必須擊敗的敵人。他說，在他看來，英國不致有任何政治派別上的反響，並且相信德蘇的衝突，也不會使我們感到難處。

美英聯合保證援蘇

德蘇戰爭並沒有使我們有什麼疑慮，反使我們對於打回希特勒主義又燃起了新的希望。我在白磁溫泉，經常與總統和威爾斯保持聯繫，極力主張我們應向蘇聯作最有力的保證說，我們將竭力給予蘇聯一切的援助。總統便派賀浦金斯從倫敦到莫斯科去調查蘇聯軍事上的需要。羅斯福總統又解除了凍結蘇聯存款的禁令，並且決定不引用中立法。八月二日，代理國務卿威爾斯和奧曼斯基大使交換函件，我們還方面允許，給蘇聯一切經濟的援助，以加強其抵抗武力侵略的力

量。L

八月四日，我接見奧曼斯基，那大奧曼斯基帶了蘇聯的哥里柯夫將軍（Golikov）同來。奧曼斯基的態度與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迥然不同了，我告訴他，我不在華府的時候，尤其在我回來以後，對於使蘇聯得到我們所可讓給的軍用物資一事，我心裏是怎樣的關切。哥里柯夫將軍說，在二星期以前他已經把蘇聯所需要的物資，開了單子，送給國務院了，可是唯一的結果，只有運出六十架飛機到蘇聯去，而蘇聯最急需要却是高射炮和平射炮。我說我要加倍努力，使這些軍用品能加速運出去。

我和道二位蘇聯客人談話的時候，總統正與邱吉爾首相開大西洋會議，會上，蘇聯的問題引起很大的注意，賀浦金是出席會議的，他在會上對於蘇聯抵抗德國的力量做了一個很樂觀的報告。報告之後，總統和首相立刻同意給史達林一個聲明。八月十三日總統把這聲明拍了電報給我，叫我轉拍到莫斯科去。

這二位領袖向史達林保證說：「現在，我們共同合作，供給你以最迫切需要的最高限度的援助。刻已有大批滿載的船隻駛離我們的海岸了，而且就在最近，還有些船隻開出去。」我們提議在莫斯科召開一個會議，研討蘇聯的需要，英美為這事當派遣高級代表到蘇聯去。

大西洋會議的事，在其他的時常被談到。當會議要備妥當的時候，我正在白硫溫泉休養，當我回華府的時候，總統已經首途赴會了。這幾個月來，羅斯福總統都有一個念頭，想和邱吉爾晤談一次。我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是在五月底。

七月二十八日威爾斯寫信到白硫溫泉給我，說大西洋會議已決定在八月八、九、十日舉行了，他告訴我，如果總統所要討論的不僅是單純的軍事問題，他很想趁這總統隨帶一個人在身邊，可以將他們的談話，以及他們可能獲致的協議，正確地記錄下來。

由於總統和首相能够面談，交換彼此間的意見，因此這次的會議的成就就是頗多的。這兩位對於加速戰爭結束極多貢獻的偉人在英國戰鬥艦「威爾斯親王號」和美國巡洋艦「奧古斯他號」上，開始建立他們之間無比的關係。

第二十五章 密電碼與假和談

秘書使節首先透露日本偷襲珍珠港的計劃。蘇州和日使野村曾談五六十次，企圖挽回危局，但因日本決心濫發侵略行動，進佔越南海軍戰略要地，而使談判告一結束。

官方私人同時會談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格魯大使從東京打電報給我說，那裏的秘魯使節告訴他，他從多方面（包括日本人）聽說，「日本軍部已計劃在日美之間一旦發生「糾紛」時，大規模突襲珍珠港；襲擊時將使用日本所有的軍事設備。」秘魯使節對格魯說，他所以急於通風報信，是因為這項消息是從多方面聽來的，固然日方這一計劃似乎近於幻想。第二天我們便把電報內容轉告陸軍和海軍兩部。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同時就在這種情勢下，有兩位天主教傳教士，一位是紐約州瑪麗諾爾城（Maryknoll）天主教對外傳教協會會長華爾施主教（Bishop James Edward Walsh），另一位是德勞特神父（Father Donahue），經由日本返美。據他們報告，他們會和日本許多高級要員如松岡洋右等談過話，深知兩國關係緊張，而且可能每况愈下，同時他們還有一項值得矚目的願望，便是願以私人的地位，竭力避免戰爭危機。

他們一方面和政府中最卓越的一位天主教徒，郵務部長華克（Frank C. Walker）保持接觸，另一方面又和日本大使館的幾位人員時時見面。

總統和我都同意，華爾施主教和德勞特神父，再加上華克部長，可以在純粹私人的基礎上繼續和日本大使館接觸，把日本人的意向紀錄下來，可是我們認為我們自己在日本新大使野村吉三郎到達華府之前，不能採取任何行動。

野村(右)與野村(左)



野村大使在二月十二日首次來訪。他身材很高，強健，有一張貌似老實的臉，在體格上和一般日本人頗有差別。他能說一定（有時却不一定）量的英語。其顯著的特性是嚴肅，時作不自然的笑和鞠躬。我相信野村在避免兩國間的戰爭方面確有誠意。

三月八日，我在卡爾登旅館（Carlton Hotel）寓所中和野村首次長談，這是珍珠港事件前我們之間五六十次會談的開端。會談總在晚間假我的寓所書房中舉行，最初在卡爾登旅館，後來搬到華德曼巴克旅館（Wardman Park Hotel）。野村寧可到我的寓所來而不顧到國務院，以便使我們的會

談能盡量避免受人注意。

在這些會談當中，說的話雖然常常帶着諷刺，但是我們的音調卻從未超過普通談話的高度。野村極守紳士風度。就我們私人之間而論，關係是頗為友好的。

最初的幾次談話只限於我們兩人，後來雙方的顧問人員也一同參加。國務院的卓越日本問題專家巴爾亭（Joseph W. Ballantine），常於晚間七時四十五分在我的寓所出現，帶來一切必要的文件，並提出來和我商談，快到八點半的時候，野村和他的顧問人員來了，談話通常繼續到十點鐘，有時竟談到十點半。巴爾亭然後便回到國務院去，準備一個關於談話的備忘錄。

華爾施主教，德勞特神父，華克部長和野村大使等日方代表間的非正式談話，於四月九日到達一個頂點。當天我從他們手中接得一個建議草案，這是經過所有參與者同意的。在其中的幾天裏面，我會和國務院的遠東問題專家加以仔細

研究。

狩獐面目盡行暴露

我們研究這項建議時，已經筋疲力盡，它比我們一向所想像的嚴厲得多，其中大部份條款，足以代表瘋狂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能企求的一切。

我和各專家把經山華克部長送來的建議加以全盤研究之後，得到一項結論，便是其中雖有若干點不能接受，也有若干點是可以接受的，其他各點如經修改，也可以同意。我認為如有機會和日本從事廣泛性的談話，那麼這機會應該莫加以忽視，因此我請野村到華德曼巴克旅館來，我最近已選到那裏去了。

我對野村說，我已經接到解決兩國間問題的非官方建議，並且聽說大使自己也曾參與其事，而且贊同這些計劃。野村立即答道，這文件他全曉得。他還沒有把它送給日本政府，不過他認為他本國政府會加以有利的處置。

兩天之後，我在寓所中將一件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聲明交給野村，附帶告訴他說，我們之間成立的任何協議，必須以這些原則為基礎，這四項原則是：

「(一)尊重每一國家以及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二)維護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原則；

「(三)維護商務機會均等以及其他平等原則；

「(四)不擾動太平洋上的現狀，只有可能以和平方法改變者為例外。」

我對野村說，在接受這四點原則的大前提下，如果他把美日兩國人士私下準備就的非正式文件，送交他本國政府，如果他本國政府表示贊成，並訓令他向我提出，則可作為開始會談的基礎。

四月九日，野村把這文件連同我的四點原則以及其他觀察報告送往東京，我們於是坐下來等待日方的答覆。

五月七日，野村再到我的寓所來。他遵照日本政府的訓令，提出一項建議，便是我們兩國簽訂一項互不侵犯協定，我毫不遲疑地加以拒絕。「這和四日九日的文件中所包含的建議完全是兩回事，」我說：「我國政府除了以四項原

則作爲任何談判的基礎之外，不作其他考慮。」

識破密碼洞悉詭謀

野村又說，他已接到松岡的一封信，不過其中有許多「錯誤」。他問我是否可以給我看看。我略作考慮後說：既然其中有許多錯誤，他如果有這樣做的話，則不妨加以保留，因爲正如他所表示的，其中對於四月九日文件的內容，似乎大都作否定的答覆，這樣必不能使談話有所進展。野村依我的話保留這一電報。

實際上，我們對於電文內容早已曉得。其中有松岡對我一項聲明說，德義兩國領袖對於勝利深具信心，美國參加歐戰只有使戰爭曠日持久，並促成文明的毀滅，日本不能損害其同盟國的地位。

我們所以曉得這一電報，是因爲我們海陸軍的密碼專家，本其非凡的智力，已經識破日本的密碼，他們把由東京發往華府以及其他國家京城的官電都譯出來，再把它們譯成英文，送給國務院參考。

這些獲獲的電報，我們給它加上一個「魔術」的祕密名稱，在我們的早日談判中無關宏旨，但在談判的最後階段中，却佔極重要的地位。它使我們可以曉得日本外相發給野村以及其他外交代表的許多調令；使我們可以核在一下野村怎樣將他和我談話的經過，報告東京當局；它並表明日本政府雖在和我們談判和平，另一方面却仍在進行其侵略計劃。我把這些電報當作一個證人，他已將他那一方面的祕密和盤托出。

我自然必須審慎，使野村絲毫不能覺察我們曉得他們的密碼這一回事。我必須小心使我們的談話範圍，僅限於我從他本人或正常外交途徑可曉得的各點。爲了保持這些電報的機密起見，我派定一位秘書專門負責保管之責，確使它們最後不是退還海軍便加銷毀。

五月十二日，野村交給我一套全新的文件，這便是日方的協定草案，另附一紙，其中有關於建議的「口頭解釋」。我們現在已得到日本官方的建議。因此五月十二日這一天，便爲以後繼續不斷，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爲止的談判奠定基礎。

這套文件帶來極少希望，日本的建議大部仍只顧她本身的利益。它實際是主張日美兩國共同稱霸太平洋，並由日本

控制擁有其人口及財富十分之九的區域，毫不顧及其他國家的權益。

如果斷然拒絕這一建議，那便是把我們好幾個月來，就兩國間一切懸案和日本從事根本談判所得到的唯一真正機會，整個放棄了。

正式談判終無結果

因此，我們決定以日本的建議為基礎，繼續進行談判。

日本政府曉得我們願意以五月十二日的建議，作為談判基礎之後，他們便立即開始採取行動，但不是提出比較溫和的建議來稍稍遷就我們，却是採取反對方向，使其建議更適合他們的帝國主義願望以及軸心同盟。

我們對於日本的計劃幾乎完全曉得。表面上他們的行動是，七月二日東京舉行御前會議，接着又開始採取驚人的革種步驟，都足以表示他們是在準備一次大戰爭。

在這一方面之下，我們當時截獲的日本政府電報也帶來同樣驚人情報。七月二日由東京發往柏林的一封信，包含有下列不詳的政策片段：

「一、日本帝國將不顧世界大局如何演變，堅持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俾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的政策。
「二、帝國政府將繼續其處置中國事件的努力，並將採取各種措施，準備南進，以建立其自存和自衛的強固基礎。」

同一天，松岡又致電野村說：「南進的準備將予加強，關於法屬越南和泰國的既定政策也將予執行。至就蘇德戰爭而論，三國軸心的精神雖將予保持，但是現階段的一切準備以及情勢的處理，都應以我們本身的方針為依歸。同時外交談判的進行應該極端審慎。目前應採取一切可能的方法，防止美國參加戰爭，但如情勢有必要的話，日本將根據三國協定行事，並將決定何時使用武力，怎樣加以使用。」

不久之後，日軍便於七月二十一日佔領越南南部，這時他們已經佔領法國的整個戰略上重要省份，並指向菲律賓，

馬來亞以及荷屬東印度。

五月二十三日，威爾斯打電話到白硫溫泉來問我，野村已經要求和他會見，他應該對這位日本大使說什麼。

我告訴他，日本的侵入越南南部很像是她在西南太平洋發動大規模攻擊之前的最後一步。這一行動適發生於我們和日本的談判中途，因此我認為談判沒有繼續進行的理由。

威爾斯以有力的言辭把這些話告訴野村，並且把我的決定轉告他說，我們的談判已告結束。

從此以後，我們對於日本的主要目標，是爭取時間，準備國防。

第二十六章 口蜜腹劍的日本外交

其擔任日本首相以後，更迫切的希望依照日本的宣言和美國成立協議，並讓來栖三郎來美協助談判。日政府一再賤賣它的使團來期完成協定，否則，「事情將會自然而然地發生。」

東條東鄉心情迫切

我們已不能希望從近衛內閣得着什麼好處，更不能希望從十月十七日以後東條英機首相所領導的內閣得着什麼好處。東條曾經做過首相，他甚至在做首相時，仍舊是一位現役軍官。他是一位典型的日本軍官，帶着玩固，狹隘而有偏見的腦筋。他是固執的，任性的，（有些愚蠢），勤勞的，富有推動的能力。

新外相東鄉茂德是一位典型的日本外交官，在他這門行業中是一個很好的技術專家，但是見解也很狹隘，沒法得到一付廣大的眼光。

同時，我已經開始注意到東條和東鄉對於我們的談話已有迫切之感，近衛曾經強促我們迅速接受他的條件，但他的目的之一，是想藉着和我們接受協議而使自己能夠繼續在位。東條想趕快地做點事，他的目的和近衛的目的顯然不同。我相信如果不能得到協議，他便準備採取等於戰爭的行動。

這種迫切之感，這樣幾乎瘋狂地迫令我們同意一項協定而使日本得到所希望的一切東西的情形，一直繼續到珍珠港事變為止。東條秉政後幾天，我們截到十月二十一日東鄉給大使野村吉三郎的一封信，當這封信的譯文送到我的辦公桌上時，我注意其中含有迫切之感。這電報內容的一部分如下：「我國在表示意見和說明我們的立場，實際已經說出她所能說的一切的話。我們覺得我們已經到了一種地步，除了敦促美國重新考慮其立場以外，不能再採取積極的行動；

「來栖（左）野村（右）坐在那裏，鞠躬如禮，野村有時格格作笑，來栖有時也露齒而笑……他們的政府在幾天以內將發動新侵略，這樣早晚必定會促成對美國內戰爭。……」



於是，我們敦促或者若杉要（日本大使館參事）間接地讓美國知道我們已不能花更多的時間來討論這事。」

東條政府迫切的跡象繼續增高，十一月三日外相東鄉訓令日本前駐德大使來栖三郎前來華府，表面上協助野村和我們進行談話，由於日本政府的要求，我們立刻採取我們所能採取的一切步驟，使他搭乘飛機越過太平洋來到美國。

同日，我國駐日大使格魯電告，如果我們的談話失敗。他認為日本可能採取「不奮鬥，毋寧死」的企圖，實際上等於冒全國切腹的危險。

拍來密電限期協議

我初次從截獲的密電裏看見一個限期。東鄉在十一月五日給野村的密電裏表示：「由於各種情況關係，絕對必須在十一月廿五日以前將簽署協議定的一切準備辦理完畢。我知道這是一項難於遵辦的命令，但在目前情況之下，那是沒法避免的。請澈底了解這一點，並解決那挽救日美關係以免陷入混亂情況的問題。」

這對於我只有一種意義，那就是日本已經轉動了它那作戰機構的輪子，並已決定如果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們還沒有同意她的要求，她不到和美國作戰的地步決不甘休。

十一月七日，我於是在內閣常會中鄭重提出當前的危險的警告。在這次沈鬱的會議中，遠東的局面盤據了我們個人的心頭，總統循例在內閣會議開幕時首先自行討論一番時局，然後轉而邀請各有關的閣員再加以批評，或請該閣員作一次預測。這次，總統直接問我心裏是否有甚麼意見。

我於是說了十五分鐘的話，並指明在整個國際局勢中的種種危險。我將我們跟日本談話的發展情形從頭到尾地報告了一遍。

我的結論是：「依照我的意見，日美關係是極端的嚴重。我們應當注意到我們將會隨時隨地遭受日本的軍事攻擊。」

後來靜默了一會兒。於是總統過問全體閣員，徵詢每人的意見。大家都同意我對危險的預測。

內閣就同意在高級官員所發表的演說裏應着重於局勢的嚴重，以便全國人士對這種發展能有些準備。此後幾天，總統、海軍部長諾克斯和副國務卿威爾斯都依此方針發表了若干有力的演說。

野村雖然繼續正式地宣稱日本具有和平的意向，但那源源不斷地送到我辦公桌上的一些截獲的密電却又另外是一回事。十一月十四日，東京拍給日本駐香港的代表的一封信電，其中描述我們的談判如果不能產生協議時，中國所將發生的情形。據稱「我們將完全摧毀英美在中國的勢力。我們將接收敵人在中國的全部租界和重要權益（關稅和鹽課等等）」。

來栖特使詭計多端

十一月十五日來栖三郎特使到了華盛頓，十一月十七日野村帶他到我的辦公室裏來。來栖依我看來似乎和野村相反。他的外表和態度都不足使人信任或敬重。我從頭就覺得他是欺詐的。從截獲的電報裏，從經常收到的情報裏以及從以往歷次談話時我對日本態度的分析裏，我已經知道了日本的意向，所以讓我看來，來栖三郎離開日本時，斷不會不知道他本國政府的計劃和要他擔任的職務。日本政府派他到華盛頓來的目的是在下列兩者之中任擇其一的：第一，他將用一切可能的威脅利誘的方法，引誘我們接受日本的條件；第二，如果上面這方法失败了，他將用談判的方法來威嚇我們，直到日本準備攻擊的時候為止。

野村帶領來栖來見我時，還給我日本政府的一項聲明，我們會請東條內閣證實近衛內閣所會連續提出的各點，這聲明便是對我們那項請求的肯定答覆。



赫爾引來柄赴白宮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赫爾引導日本特使來柄，由離開其國務院之辦公室前往白宮與羅斯福總統會談。

經過了一度很長的談話以後，我伴著兩位大使穿過大衙到白宮去和總統會談。時局不能再比這更緊張了。剛在前一天，野村接到了外相東鄉的一封信，確定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限期。我也是從截獲的密電裏得知這消息的。

電文裏說：「依照你的意見，我們應當等著，看戰爭有什麼轉變；並且忍耐著。但是我非常抱歉的說，目前的形勢使這辦法不能實行。我規定解決這些談判的限期……不得有所改變。請你了解這一點。你看時間是怎麼地短促；所以切莫讓美國使我們變更原來的意旨，並且延遲了談判。務必根據我們的建議儘他們覓致解決辦法，並努力促成立即解決。」

因此，那始終是好像必須在虛線上簽字，否則就得担負一切後果之責的樣子。

在白宮的談話，在隨後三天來，樞野村和我本人的談話裏，這位新使者都沒有提出任何新建議。

我所截獲的從東京拍來的密電，現在一律證明危殆是毫無疑問地迫在目前。野村已經奉到撤退英美日僑的調令。他收到了一本新的密電碼，藉此，他就要收聽每天的日語短波新聞廣播，便可以從風向的報告中知道日本對美，對蘇，或對英的外交關係是否將近破裂。他已奉命在聽到這項消息時，將所有的密電本和秘密文件一齊毀掉。

無異於哀的美教書

後來到了十一月二十日——感恩節——野村和來樞將他們政府所提的一套新建議而交給我，這些建議在表面上是趨於極端的。截獲的密電已經告訴我們這是日本最後的一次建議。它是一個最後通牒（即哀的美教書）。

日本建議的性質雖然那麼不合理，任何美國官員從來不曾夢想到接受它，但是我覺得我的反響不應當太尖銳，以免使日方有退出談話藉口。

十一月二十一日來樞特使單獨地來看我。我問來樞，他或者野村對於整個的和平解決辦法是否再有什麼建議。他回答說沒有。

在來樞來拜訪我和他聲明他對於和平解決辦法再沒有什麼建議以後，我跟華盛頓的當權人士（其中包括史塔克海軍上將）談話時，便加倍地提出警告說，日本可能在任何時候進攻。

在外交上當時的局勢已經真正地絕望了。但是在我們這一方面却竭盡一切方法以尋覓和平解決辦法，和避免或者延遲戰爭。跟我經常接觸的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諾克斯，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和海軍軍令部長史塔克都請求要有更多的時間，從容準備美國的抵抗力量。反之，日本却要攤牌。我們堅持我們的原則；日本方面的要求帶有頑強而恫嚇的意味。

當我們打算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準備我們的對案時，我們起草了一個臨時協定，後面將附着一份永久協定的綱要。

我們擬定一個包括十點的和平解決辦法大綱附在臨時協定後面。大體上說，我的僚屬和我已經到了靠抓住稻草（譯者按：意即依靠無用的方法）想來挽救局勢的階段。

財政部長摩根索又送給我一份他在財政部所擬的解決辦法草案。這雖然使財政部長一直想以第二位國務卿自居的例，但是其中若干意見還算很好，已經併入我們最後的草案裏。

日方限期延後四天

後來所裁獲的東京方面給野村和來栖的一封密電又將限期從十一月二十五日延到二十九日。過此，便只有打仗了。密電裏說：「務必堅持既定政策，盡你們最大的努力。莫惜任何力量，設法實現我們所希望的解決辦法。至於我們當初為什麼要在二十五日以前決定日美關係，那是你們能力所猶不遑的，但是如果能在三四天以內能夠完成你們和美國的談話；如果能在翌日簽字（讓我替你們清清楚楚地寫出來——二十九日），如果有關的照會能夠交換，如果我們能夠跟英國和荷蘭得到諒解；總而言之，如果一切的事都能够完成，我們已經決定等到那一天。這一次，我們的意思是這樣，限期絕對不能變動。過此，事情將會自然而然地發生了。」

以後兩星期，我們便在一事情將會自然而然地發生了。這句話的陰影下拚命地努力到底，以求謀得和平，至少是爭取更多的時間。

在我和中、英、澳、荷四國使節談話後幾小時（十一月廿二日），野村和來栖都到我的寓所裏來看我。我見這兩位

來代表時帶着笑容，謙恭有禮，外表上又非常友好，幾乎疑惑這不是真的。我已經從被獲的密電裏知道了日本兇惡的計劃；又知道野村和來酒曉得這個情報，那麼，要以同樣的語調和同等的地位跟他們談話，實在是一樁苦事。

他們坐在那裏，鞠躬如禮，野村有時格格作笑，來酒也時時露齒而笑，他們的腦海裏一定是一再地盤旋着一種思想，認為我們對於日本的要求如果不答應「可以」的話，他們的政府在幾天以內將會發動新侵略，這樣早晚必定會促成對美國的戰爭。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們所截獲的那條給野村的一封信電說明，前一次密電裏所規定的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限期是依照東京時間，於是懸掛在我們頭上的一把利劍已經懸接在一座頂先發定了鐘點的時鐘上。

第二十七章 日本偷襲珍珠港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下旬，美日談判事實已告絕望，奈格乃開始執行其「欺騙談話」的任務，直到日本軍事準備完成爲止。日本攻美的最後一次宣傳談判破裂的開會，野村於珍珠港事變後一小時始送達，被赫爾責備了一頓。

美提和平解決計劃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遞給野村和來栖兩位建議（即十點和平解決辦法）是真心想使我們的談話能够繼續進行，並以此死的心願，希望即使在這最後關頭，或許還有一點常理能够認入東京軍事人員的頭腦裏。

後來，日本的宣傳——特別是在日本開始遭受嚴重的挫敗以後——企圖把我們十一月廿六日的德忘錄曲解爲「最密通牒」。日本素來見稱於世界的特性，是善於利用完全虛偽的藉口以欺騙人民，並使人民支持其軍事掠奪，他們這種宣傳是與他們的特性相符合的。

野村和來栖認清了和我們談判破裂的責任將在日本方面，所以在同日（十一月廿六日）發往東京而被我們陸海軍電台所截獲和譯出的密電裏，建議設法將那責任推脫掉。他們說：「如果我們在進行談話的期間，有意依照預定的作戰時間表行事，便會有一個絕大的危險，弄得談判破裂的責任落在我們身上。過去有許多次她（指美國）本可以因爲我們進攻法屬越南而考慮停止談判。現在我們如果不說明我們的意向，逼得談判破裂，突然獨立作戰，深恐她將利用這一點作爲對我們的反宣傳。」

在十一月廿八日所截獲的日本外相東鄉給野村和來栖的密電裏顯出了未來事態的態形。那密電說，日本跟我們的談

話將要被裂。密電又說：「但是我不願意你造成一種印象以為談判已告破裂。只許告訴他們你們是在等候調令，雖然你們還不明瞭你們政府的意見，但是依照你們自己的想法，帝國政府一向總是提出正當的要求，而且爲了太平洋方面的和平曾經忍受重大的犧牲。」

換句話說，來福所負使命的第二階段已經到了。第一階段是壓迫我們承認日本在東方的霸主地位。他們却失敗了，第二階段是藉談判來哄慰我們，直到日本軍隊準備攻擊之時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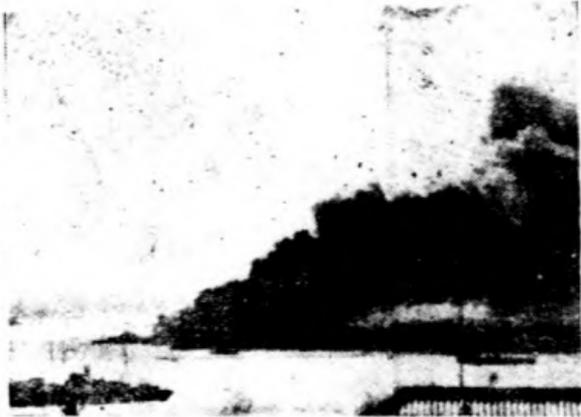
十一月廿九日，我收到日本首相東條和外相東鄉準備於十一月三十日在大政翼贊會和「大日本東亞同盟」主催之下所發表的爆炸性演說的摘要。東條演說的一部份如下：「蔣介石之所以在其徒然無效的對日抵抗中不惜犧牲強壯有爲的青年，以聽命於英美和共產主義的對日抵抗，是英美想使東亞諸民族彼此相對抗，因而在東亞的混水裏摸魚，並掌握東亞的霸權……」

「爲了人類的榮譽與自尊心，我們必須以報仇的手段肅清東亞方面這種橫枝。」

羅斯福提前回華府

我將這演詞仔細想過了一番，又和我們的軍事當局與遠東問題專家討論了一遍，並重新翻閱我們已經接到的關於日本在越南的新行動的各種報告以後，我就在十一月廿九日晚上與留在溫泉的總統通了一次電話。我告訴日本有立即進攻的危險，勸他提早回華盛頓。羅斯福總統同意了。

珍珠港被日機襲擊，船艦着車起火，濃煙冲天。



羅斯福在十二月一日星期一早晨到達華盛頓。在他到達前不久，野村和來栖到國務院來拜訪我，問我爲什麼總統提早返滬。他們兩位顯然是擔心總統匆匆趕回華府，和他們所奉到的蔣談判來哄慰我們的訓令，可能互相抵觸。我說，總統趕回華府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日本首相的高談闊論。

十二月五日，我以無線電報訓令我國駐在東京和遠東其他各地的外交代表，在萬一與國務院突然斷絕消息時，便須毀掉密電本、祕密檔案、護照等一類的文件，關閉使領館和隔離當地的職員，並告以其他事項。

第二天，十二月六日，我們覺得日本早已揚言的武力南進運動正在進行中。

依照總統的意見，現在已經到了拍電報給日皇的時候。他送給我一份草稿，內容大體和我一星期已前呈給他的原稿相同，但已稍加修改並添上些他自己的意見，我和我的僚屬們將全文看過一週，發現裏面有幾句話從技術上的準確性看來，似乎需要修改一下。我們將這幾點都改正了，然後把草稿送回白宮。常晚，羅斯福總統將原稿送回，再沒有什麼修改，只附上一個便條：

「親愛的柯德爾：將這電報急遞拍給格魯——我想這可以用我們的灰色密電碼（這是我們祕密性最少的電碼）拍出去——這樣可以節省時間——即使被別人抄收到，我也不介意。」

十二月七日（星期日）早晨我照常到辦公室去，正如同我自從一九三三年進入國務院以來，幾乎每個星期日都要到辦公室一樣。

這天早上，我接到一連串已經譯出的密電，其中包括日本外相東鄉給野村和來栖的一封信的十四段，這是他對於我們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建語的答覆。還有一個短電報訓令野村及來栖在那天下午一點鐘將這個答覆送交我國政府，如果可能的話，送給我本人。這真便是預定軍事行動的開始時間。

日本的照會等於侮辱。這照會說：我們的建語「忽視日本在對華事件四年中的犧牲，威脅日本帝國的生存，輕蔑日本的榮譽和威望。」它指責我們和英國及其他國家陰謀「阻撓日本創造東亞新秩序以建立和平的努力。」它的結論說：「鑒於美國政府的態度，日本政府不得不認爲不能再藉談判以達成協議。」

這照會却沒有宣戰，也沒有斷絕外交關係。日本是沒有經過那些初步手段而進攻的。

按到正午的時候，野村大使打電話給我替他自己和來栖約定下午一點鐘來看我。我答應了他的請求。

野村延遲約見時間

下午一點鐘過後幾分鐘，野村又打電話來請求將約見的時間延到下午一點四十五分。我同意了。

下午二點零五分日本使節們到了國務院，然後便到外交人員接待室裏去。差不多在同時總統從白宮打電話給我。他的聲音感而且促。

他說：「據報日本已經在進攻珍珠港了」

「這消息已經證實了麼？」我問道。

他說：「不。」

當我們彼此都表示相信這消息可能是真的以後，我提議頂好讓他設法證實，我心裏正在想到我和日本使節們的約會和我一同在辦公室裏的有海克華斯法律顧問和巴爾亭。他們兩人在我和日本談判的大部分時間裏都跟我在一起。我對他們說：

「總統得到了一個還沒有證實的消息，說日本已經在開始進攻珍珠港。日本使節們在等候着見我。我知道他們想要什麼。他們將拒絕我們十一月廿六日的照會。或者他們會告訴我已經宣戰。我倒有點不願意見他們。」

我想了一下以後，便決定，總統所得到的消息既然沒有證實，這消息還有百分之二的機會不是真的，我將接見這兩位使者。我跟海克華斯和巴爾亭稍爲商量了一下我將對他們說些什麼。海克華斯馬上離開了辦公室，我便請日使們進來，巴爾亭仍暫留在這裏。

野村和來栖下午二點二十分走進我的辦公室。我以冷淡的態度接待他們，沒有請他們坐下。

野村謙遜地說道，他會奉他本國政府之命在下午一點鐘遞給我一個文件，但因譯電手續麻煩，所以把它耽誤了。於是將他本國政府的照會交給我。

我問他爲什麼在第一次約見時指明是下午一點。

他答應他不獲得，但那是他所奉的訓令。

我假裝着在披閱照會。其實我早已知道了照會的內容，自然不能顯出實情。

我看過了兩三頁以後，就問野村他是否奉他政府的訓令遞送這照會。

他答應他是奉命的。

假裝談判暗中偷襲

當我約略地翻閱了那照會以後，我就轉過頭來面對野村，把眼睛注視着他。

我說：「我應當講，在過去九個月來我和你所有的談話裏，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假話。這絕對有紀錄可以證明。在我辦公處的五十年中，從沒見過比這更充滿着無恥的謊話和曲解的文件——其含有無恥的謊話和曲解的程度，大到使我一直到今天以前，從沒想像到地球上竟有任何政府能說出這樣的話。」

野村似乎將要說些什麼話。他的面部沒有什麼表情，但我覺得他的情緒極為緊張。我搖搖手止住他。我對着門口點點頭。兩位使者沒有說一句話，就轉過身去，垂着頭走出去了。

我會經看見有人記載，我會經用田納西州山岳地帶裏的土話把日本使節們「罵出去了」，但是事實上，我確只把我上面所說的一番話告訴了他。沒有任何「罵」人的話比它更有力量。

巴爾亭記錄了我所說的話。日本使節們離開的時候，我喊了一個速記員，將我所記得的對他們說過的話口授給他筆錄下來。這便是當時對報界所發表的聲明。

野村跟我的末次會議和他從開始主持談判時所表現的愚笨是一致的。他本國政府之所以訓令他要求在下午一點鐘和我會晤，是想在進攻珍珠港前幾分鐘將他們的照會送給我們。野村的大使館人員却因為譯電時的稽延把這件事做得拙劣不堪。無論如何，野村既然明知約定鐘點的重要性，雖然他祇能先帶來那照會的頭幾行，也應該用巧正在下午一點鐘的時候來見我，一面命令大使館人員將那照會的其餘部份隨譯隨送。

於是日本事先沒有警告就開始進攻珍珠港，在野村和來相遞送照會前一點多鐘便進攻了。

日本使節們離開我的辦公室後不久，我立刻和總統通電話，將我對他們所說的話向他重述一遍。他說，他對於我的措詞如此強硬，覺得很高興。那時，他又接到了一些關於進攻珍珠港的消息。

三點鐘過後不久，我到白宮去和總統及其他的人談了四十分鐘。羅斯福總統在態度和言談方面非常莊嚴。由於日本進攻珍珠港而造成的令人驚異的局面已經變得很顯著的。然而無論是他或者我們中間的任何人，對於美國足以應付這種危險的能力，沒有片刻失掉了信心。

第二十八章 戰爭期間不得過問戰事

戰事期中，國務卿不參加一切作戰會議，也不知原子彈的消息，華爾登一再向總統陳述國務卿不能與調軍事的不安，終未爲羅斯福所接受。

戰爭爆發以後，我們國家的軍隊，在總統兼總司令的領導之下，開拔到前線去了——但是，在戰爭中，外交的機構，也是挺重要的。我們和敵國間的關係雖然是斷絕了，可是，我們跟同盟國，跟中立國間的關係，有更多的責任，都落到我們頭上。

從未參加作戰會議

在平時，國務院要負責應付我們的國際關係，對於駐外軍隊的移動，也有提供意見的機會，譬如我們駐在中國的軍隊，是否應該增減等等，一到戰時，國務院對外軍事行動，就不再有發言了，那些軍事行動，只聽憑有關軍事當局的指揮。

珍珠港事變剛發生，我就告訴我的僚屬，從此刻起，凡國務院裏的各位職員，都要對作戰有所貢獻。我希望國務院裏的每一人，都能跟陸軍部，海軍部，以一切軍事機關取得充分合作，同時，又將我們一切的便利都供他們自由支配。我把它弄成了慣例，不讓國務院的官員，在我面前，批評陸軍部或海軍部某官員的錯誤。我對他們這樣說：「記着，他們是負責作戰上的策略和行動的，他們有權取得我們的充分合作。」

珍珠港事變以前，我是作戰委員會的一員，這個會是由總統、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陸軍參謀總長以及海軍軍令部長組織而成。每次開會，我總出席。珍珠港事變以後，凡有關軍事的會議，我都不去出席了。原因是總統不請

我參加這些會議。好幾次我都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我覺得，在許多重要的場合中，很顯然的，國務卿應該出席總統的作戰委員會，尤其是遇到那些兼有軍事和外交性質的會議時，更應該出席。因為，事實很明顯，幾乎沒有一種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可以沒有外交問題滲雜其間，而能夠進行的。

我認為，叫一位國務卿不出席重要的軍事會議，實在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常常向總統指出，某一件軍事性質的問題的發展，其中也包含着強烈的外交的一面，無疑的，這等問題是在軍事會議中決定的。我說，在當時討論時，我應當知道其中的情形。

卡薩布蘭卡會議，開羅會議，或者是德黑蘭會議舉行時，總統也沒有帶我去參加。大體上說，這些會議都是軍事會議。總統跟邱吉爾首相在華盛頓舉行的軍事會議，我也沒有參與。其實，他們的談話中，有很多是牽涉到外交的。我對他說：「並不是我自找麻煩，可是，我總認為國務卿是應該出席這些會議的。」我又引英國為例，指出英國的外相艾登是參加一切作戰會議的。

總統的答覆是，我們的制度跟英國的不一樣——我同意這話是挺真實的——意思是說外交形勢雖然是須待考慮的重要因素，但因為，英國的內閣，就是它的政府，艾登在他們的制度下，要比我在我們的制度下，可以更有權要求參加作戰會議。

從總統以外的人士那裏，我知道了卡薩布蘭卡，開羅，和德黑蘭會議的情形。我沒有特別的機會去問總統關於這些會議的發展情形。但是，要是我問到他時，除了少數的例外，他總是立即很坦白地，將最機密的事情告訴我。

我跟總統以及他的軍事助理人員討論過的一個軍事問題，便是第二戰場的地點問題。我同意，我們主要的努力，必須在穿過英倫海峽以達到法國。至於軍隊應當在什麼地方登陸，以及在這麼大的軍事行動中，應當採取那一條途徑經過歐陸，以征服希特勒，這些問題，一經決定，我就很快知道了。只是，事先總統或他的高級軍事長官卻從沒有跟我討論過。

事先不知有原子彈

說到原子彈的事，事先我並不知道。雖然偶而有人給我一點含糊的暗示，可是，我沒有追問下去，一直到原子彈投擲下來，公告宣佈了，我才真正知道有原子彈這回事。雖然，在準備使用原子彈的最後幾個月內，以及到它投擲時，我已經不是國務卿，因此，對於這件事，似乎是我可能不會知道的。羅斯福總統毅然作此重大決策，竟至不惜花二十億美元去研究原子彈，是值得歌頌的。總統還是不請我參加他的軍事會議。他對於軍事方面的公事，很有興趣，喜歡大權在握。在珍珠港事變之後，他願別人不叫他總統，而稱之為總司令。他深愛這個頭銜，可能他是覺得這個全權的位置，要比總統來得重要。

約莫在一九四二年，在一次內閣的聚餐席上，當我提出敬酒的當兒，總統在我起立之前，對我說：

「請你稱我為總司令，莫稱我為總統。」

敦促蘇聯對日作戰



圖為第一顆原子彈投擲在廣島飛起的火燄。「戰爭期間不得通同敵事」赫爾說：「說到原子彈的事，事先我並不知道。」



當我跟各國使節談話時，尤其是跟那些主要的盟國代表，要我不提到一些軍事問題，那是不可能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我跟蘇聯的新任大使第一次談話，他就是蘇聯的前任外交部長李維諾夫，在一九三三年時，我曾跟他舉行過談判，結果美蘇建立了外交的關係。在這次談判中，關於蘇聯允許我們利用他領城內的空軍基地，以便轟炸日本的問題，我會經向他提出。同時，我們又討論到用蘇聯給獲運送軍用物資去海參崴的問題。因為，日本顯然是不能許美蘇輸送物資到蘇聯的。

過了三天，當李維諾夫應邀來訪時，他說，蘇聯政府訓令他，說在當時情形之下，還難跟我們合作，一致對付日本。他說，在蘇聯正以全力對付德國的當兒，實在不能冒險，招致日本的攻擊。

我回答他說，關於蘇聯的處境，我是很了解的。我將德國企圖攻擊蘇聯前幾個月，我們警告蘇聯的一段事情，重新提起，我說：現在，我又得到同樣可靠的情報，知道日本將會不顧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約束，只要希特勒什麼時候需要他，他就會嚴守對德的約束，在什麼時候出來攻打蘇聯，以及攻打任何反抗德國的國家。我又說：其計劃是：首先由日本發動攻打美國，德蘇都要加入作戰，然後，當德國需要的時候，日本就攻蘇聯。

雖然，史達林早已決定，在當時不參加我們的抗日陣線，可是，我仍願在未來的日子中，常常向他提起這個問題，自從戰事發生以後，國務院的工作，在許多方面都改變了，或者說是緊張起來了。

關於跟軸心國交換外交人員和僑民的問題，我們談判了好幾個月之久。珍珠港事變後不到幾天，國務院會議談到這個問題時，我們從可靠方面得到消息，日本大使野村和他的海軍武官得到國內訓令，叫他們在大使館內切腹自殺，這樣一來，日本政府可以藉口，說是我們暗殺的了。

如果，這個計劃果然成爲事實的話，我們駐在日本的官員將會發生怎樣的後果，因此，我們委託瑞士公使趕緊去日本大使館，將我們收到的情報告訴他，探探他的口氣如何。他們談了好久，可是，仍然不能消除我們的恐懼。野村只是說：這種決定，不在他本人，而在他的上峯。

第二十九章 戴高樂引起的波瀾

自由法國佔領了法國聖丕爾和密克隆兩島，引起了美國的極大不快，美國發表聲明予以譴責，頗為當時國內外所不了解。若爾的用意是一方面固態對戴高樂表示不滿；一方面也是指飾美國和維琪法國的交妙關係。美國和維琪維持外交關係，對於當時盟國作戰是有利的，英國也支持出觀點。但美國即吉爾首相即常常激烈抨擊維琪，使美國與維琪關係陷於困窘之境。

自由法國攫佔兩島

珍珠港事變以後，我們和戴高樂間的非正式關係頗為他的不當行為所困擾，這個行為便是命令自由法國的軍隊強行佔領紐芬蘭海外的法屬聖丕爾（St. Pierre）和密克隆（Mikinson）兩島。這個事件發生在聖誕前夕，當時總統正在白宮接待邱吉爾首相。

這些島嶼本歸駐馬提尼克的羅伯特總督管轄，我們曾經和羅伯特成立協議，並且在珍珠港事變後不幾天又重申前議，即聖丕爾和密克隆的現狀不予維持，以保障我們的利益。我們也曾就在聖丕爾設立一強有力的無線電台一事和加拿大進行磋商，加拿大和我們都恐怕道電台會使德國潛艇得到指示。我們同意加拿大應派遣電務人員監督由該台發出的電訊，如果該地總督拒絕允許加拿大的行動，我們將幫助加拿大向該島施以經濟壓力。

加拿大政府於十二月四日告訴我們一個英國政府的建議，即這些島嶼將由自由法國加以佔領，這項建議加拿大和我們都不滿意。

十一月底，戴高樂會派遣他的「海軍部長」穆塞涅埃（Maurice）觀察自由法國軍艦在紐芬蘭海外和英艦一同活動的情形，同時着手把密克隆島歸入他的管轄。穆塞涅埃前在渥太華企圖探求加拿大政府的意見，加拿大外交部沒有允許

·引起波蘭的戴高樂·



他去那樣做。

十二月十五日，英外務部聲稱，邱吉爾首相感覺與其由加拿大政府在一个可能釀成棘手政治局面的情勢中採取行動，不如由自由法國的部隊去登陸，並控制電台。然而英外務部又說，除非已經得到了英加兩政府的同意，將不致採取任何行動。

繆塞理埃在同一天會見我們駐渥太華的公使莫法特（Mertepont Moffat），問他美國政府對於自由法國軍隊在那些島上登陸有何意見。總統於獲悉莫法特報告此事的電報後說，他不同意任何允許自由法國插足於聖丕爾和密克隆局面的政策。這個意見用電話告訴了莫法特。

莫氏於十二月十二日把我們的意見告訴繆塞理埃，繆氏向莫氏說，他認為我們做錯了，但他將接受這項決定。

華盛頓加拿大大使館的參事奧朗（Hume Wrong）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說，他可以告訴我們，自由法國部隊的任何行動都被取消了。

不過，繆塞理埃同時曾和戴高樂通消息，戴氏命令他就這事繼續努力。

氏之，沒有在事先通告加拿大或美國，繆塞理埃便以一支小部隊於聖誕前夕在兩個島上登陸，並接收管理權。我們駐聖丕爾的領事柏斯葵（Maurice Paquet）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向我們報告說，繆塞理埃對戴高樂非常不滿，他指斥戴氏的行徑簡直是個獨裁者，繆塞理埃說，他想辭職，以抗議戴高樂沒有於事前得到美加同意而給他的片面命令。過了一些時，繆氏真的和戴高樂決裂了。

發表聲明引起反對

第二十九章 戴高樂引起的波瀾

聖誕節那天，我於獲得總統認可後發表了一項聲明，認為由三艘「所謂自由法國兵艦」遠成的事件，是「一個違反所有有關各國的協約的專斷行爲。對於美國政府事前自然也沒有通知或取得其同意。」

不幸美國國內外許多有勢力的人，不瞭解大局，因之便對國務院和我發動猛烈的攻擊，認為不應該就那兩個島嶼之被佔領而作我所發表的那個聲明。像這樣似乎微不足道的行動，竟會引起這麼猛烈的反對，可說是少有的事。

因為聲明中「所謂自由法國兵艦」之「所謂」兩字，引起了對我們的一個特殊攻擊。我們的攻擊者認為，這種字眼表示我們是懷疑着自由法國的存在或他們是自由的這一事實，其實我們用這句話，只是表示：料想三艘是屬於自由法國的兵艦而已。

我與邱吉爾首相在白宮有一次率直的談話，以佔領島嶼一事為跳板而討論到我們和維琪法國間之關係的全盤問題。總統完全同意我的立場，他也參加這個討論，但當邱吉爾和我說話甚為露骨時，他總是站在一邊的。

我直截地按訴戴高樂是一個敗人計劃的人，他的行動直接違反了英、加、美三國明顯的意願，我並要求首相勸誘戴氏把他的部隊自聖丕爾、密克隆兩島撤退，而由加拿大和美國人去監督聖丕爾的無綫電台。

邱吉爾說如果他堅持這個要求，他和自由法國運動的關係便要受影響。

我答道，自由法國軍隊在兩島上出現，而我們對之毫無表示，則勢將危及我們和維琪政府間的關係。我再度強調維繫這種關係的重要性，因為這種關係使我們能夠利用我們的影響力量，免得把法國艦隊和基地落到德國手裏，並使觀察員們能夠繼續在維琪法國、法屬北非和西非立足。

邱吉爾同意這種與維琪的關係，對英國和對美國都很重要。

我立即詢問首相，他是否不能夠做點什麼事，防止戴高樂繼續在廣播和報紙上攻擊美國政府的行動。

當首相懷疑他是否能使這種對戴高樂的檢查時，我便說，戴高樂反美的宣傳運動，正受着英國金錢的津貼，一旦邱吉爾以撤銷英國的津貼相威脅，戴高樂在這方面就可馬上銷聲匿跡。

邱吉爾大捧戴高樂

邱吉爾同意把我所舉出的各點加以考慮。

事情發展到這一階段，首相便前往渥太華，十二月三十日他在那裏作了一次猛烈抨擊維琪的演說，同時並對戴高樂大事誇獎。

邱吉爾發表演說的第二天，我便給總統一個備忘錄，裏面說：「我們的英國友人，似乎相信全體法國人民是強烈支持戴高樂的，事實上依照我和我的僚屬的所有情報，全體法國人中約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反希特勒的，而在這個數目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不是戴高樂主義者，並且不願附和他。這一事實直接決定到我們對北非的各種計劃，以及在那方面的不應當戴高樂合作。」

關於最後一點，總統早已決定在任何英美遠征法屬北非的計劃中，不把戴高樂包括在內，他並把這個決心向邱吉爾鄭重提出。他認為如果包括戴高樂在內，勢將損害計劃的機密性，並將自然而然地引起北非法人的反抗。

邱吉爾在渥太華發表演說後，幾乎立刻又回到華盛頓，我於元月二日在白宮見到他，我毫不遲疑地說，他對於維琪和戴高樂的言論具有「高度的挑撥性」，並給予我和國務院極大的損害。

我向他申辯說，由於我們和維琪的關係對英國以及美國都有極大的價值，這一層他本人也是一再向我們表明過的，所以只要能說「幾句話」，便是雖然英國並不希望和維琪保持關係，但美國和她的關係對共同目標是有價值的，則對我們將有莫大助益。否則，我接着說，目前認為美國正在「姑息」維琪的一般印象，也即是直接違反了英國意願的印象，勢將繼續存在和傳佈。

首相對於這個建議毫不熱心。

我於是便要求總統把他對邱吉爾的個人的影響力量拿出來，以便矯正這種變則的局勢。然而羅斯福先生却說，他已經做到所能做的一切，其餘的已不能爲力了。總統和首相的這種態度，和他們後來變成激烈反對戴高樂時的態度，真是一個尖銳的對比。

這時我便擬訂了一個我相信可以爲美、英、加所接受的協議草稿，以便在戴高樂的同意下，使自由法國的部隊從兩個島嶼上撤退。它規定美、英、加三國共同行使對各該島的監督權，並把它們中立化和非軍事化。

總統同意我建議的解決辦法。於是我們便把它提交邱吉爾，他說如得到戴高樂的同意他可以接受，同時貝當政府也

同意了，可是戴高樂却加拒絕。

戴高樂對於我們提議中消除爭執的協議，從未加以同意。

最後，由於那次事件引起的波瀾漸次平靜，我感到最聰明的辦法還是讓這件事擱置下來，等到戰爭結束再說。總統同意了我的建議，於是這件事本來有擴大為幾章的危險性的，如此便只降為歷史的一條註腳了。

那次事件對我們與戴高樂運動間的關係毫無裨益，總統和我本人心中無異地認為，戴高樂對英國違反諾言以及直接違反美、加意願而行事，他本人應自負其責。我們認為他較我們過去所想像的戴高樂野心更大，更不可信任。

保全維琪於我有利

至於我本人，總統的拒絕向邱吉爾加更大的壓力，以澄清英美間關於戴高樂和維琪間的關係，乃是我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幾乎要辭去國務卿職務的數種原因之一。當時，我異常鄭重考慮到辭職問題，因此我給了總統一個簽呈，提出辭職的事。

我可以提出幾點批評來，把我們對維琪政策的效果作一總結。那個政策不幸在美國引起了很多激動，以致即令在今天，仍有很多人除了看見那最可悲的不幸事態之外，不願一查其中究竟。這些人好像在歷史上傾倒於叱咤風雲的戲劇性人物的那些人一樣，他們盲目地跟隨他，認為他毫無過錯，並且把凡不承認他的權威的人都認為是可惡的敵人。奇怪的是：許多英國人和美國人把戴高樂當作貞德再世，其熱烈擁護他的程度，竟遠過於他的法國徒衆的一般情形。

第一、羅斯福總統和我認為對維琪和對戴高樂是沒有兩樣的。

第二、邱吉爾首相和有些時候的艾登，對於我們和維琪維持關係加以有力支持，雖然他們自己却常認真維琪，以致使這種關係遭到困難。

第三、我們與維琪的關係給予我們許多確實的權益，它使我們在維琪法國和法屬北非內可以保持接觸，如果我們和維琪破裂，這種聯繫便將完全割斷。它使我們獲得情報。它使我們的使節能夠地去告訴法國人，說無論時間看起來如何長久，盟國最後一定獲得勝利，所以維琪法國不應和德國合作。它使法國人民不遺忘他們的基本自由觀念。以及法國

的自由組織必將恢復的希望。它防止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把基地和物資移讓給德國，它在防止把法國陸隊送到德爾手裏一事上面也大有貢獻。

第四、如果和維琪完全斷絕，我們便沒有了卓越的法國領袖可以做我們的對象，並且此舉將把貝當政府推到希特勒的懷抱裏去。給戴高樂以充分的外交承認，便表示撤銷對維琪的外交承認。這對我們是利小害大。不過，我們確已盡力給予戴高樂以軍事援助，並把他扶植成他應該成爲的一個軍事領袖和法國軍隊的統帥，而希望他願意把政治問題留到日後再行考慮，目前只効命戰場對德作戰。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和維琪的關係，可以使我們的領事留在北非。爲計劃並派遣一支英美遠征軍，開闢坦途和佈置環境。這支遠征軍將進入西地中海區域並支持英國在運東的行動。

第三十章 副國務卿威爾斯的去職

副國務卿威爾斯是一個工作勤奮的人，但是他好濫用職權。許爾曼說他可以直接晉謁總統，但他往往事先後都不告知許爾曼，並且企圖單面和總統決定問題。他和外國使節也常常以私人信件作公務接觸，有時又未經許爾曼同意對公開透露外交政策計畫，後來羅斯福總統也發現了這種不良的趨勢，於一九四三年八月，勸告威爾斯退出國務院。

副國務卿濫用職權

一九四三年八月，當羅斯福總統動身去魁北克的前幾天，他請威爾斯辭去副國務卿的職務。他將威爾斯請到白宮辦公室裏去，向他說明這件事。

在前幾個星期中，總統曾經跟我好幾次談到威爾斯的問題。我們同意威爾斯應該辭職，然後給他一個特別的任務，派他到國外去，担任新的工作。

由於威爾斯而引起的問題，我不打算把它全部列舉，因為，這樣做是徒然無益的。其中有些問題，已經顯歷兩三年之久。一九四二年一月的里約熱內盧會議中，他表現了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對我已經不是生疏的了，那就是，他往往不和我商量，便作重大決定。

從我們最初共事的時候起，我就給予他工作上的相當自由。我會經叫他直接去見總統，尤其是當我在國務院中，忙得不能分身的時候，讓他跟總統商討他正在經管濟的公事。這是和我的政策相符合的，我一向主張，凡是我的直接僚屬，副國務卿，參事，以及助理國務卿，在處理某些指定的公事時，可以由他們直接去晉謁總統，但是事先需要告訴我。我認為這種偶然的接觸，可以使他們得到更多的經驗，更大的聲譽，對於他們的工作，也可引起更深的興趣。同時，這

樣一來，他們可以分租一個國務卿身上的重負，可以使我輕鬆多了，尤其是當我們遭逢到困難的時候。

可是，我發覺威爾斯蓋用這種特權，有時，他不給我知道，就直接去見總統，甚至想和總統取得一個決定，他也驟蔽着我。這種傾向，或者自有若干解釋，那就是羅斯福跟威爾斯是老世交，他倆有着同樣的社會背景和學校背景。

當歐戰將要爆發的那段時期，我在國務院的公事，一月比一月繁重了，許多要來訪國務院的各國使節，尤其是關於例行公事和次要公事的，我多半授權威爾斯去接見。不過遇有一定要見我的外交使節，無論如何，我自然還是親自接見，遇到重要的公事時，我也跟他們保持接觸。同樣地，如果威爾斯遇到有關重要的問題時，也應將外交使節引來見我。可是，不久我終於發覺，威爾斯對於最後一點，在許多時候，他都不能遵守。雖然，我會經跟他說過，不管我忙到什麼地步，在這些情形下，我一定要親自接見外交使節的。後來，有一位很重要的大使應我之邀來看我，我請他下次再來跟我繼續討論，他馬上兩手一擺，說我必須先要跟威爾斯說好。如上面所說的事情，漸漸地演變得嚴重了。

我開始注意到，威爾斯跟我們的外交官，以及其他各國政府的官員之間，有着一種私人通信，而這種通信，本來應當通過國務院的官方途徑的。他寫給他們私人的書信，同時，又從他們那兒尋求私人方面的答覆，而信裏所說的那些事情，應當是由國務院以正常的辦法來處理信件的。這種行動造成的不利後果是，那些談判或討論的事項，本來應當是我和與此事直接有關的國務院官員也要知道的，可是現在却只抓在威爾斯一人的手裏。

擅自講演外交政策

一九四二年暮春，威爾斯發表了兩次有關外交政策的演說，想使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採取一種新路綫。其中比較重要的一次，是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到美國來時，於南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天，他在阿靈頓公墓的講演，其中提到我們的戰後計劃。這兩次含有透露新政策性的演講，威爾斯在事先，都沒有跟我商量過。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我請威爾斯來辦公室，向他指出說，從沒有一個副國務卿或助理國務卿有權發表任何程度的新外交政策，並且，這種權利在任何意義上，目前也不存在。我說，如果使國務卿和副國務卿有同等的權力，成爲兩個並立的首長，或者讓副國務卿單獨來越俎代庖，我是絕不能同意的。

我又說，在國務院條例明文規定之下，除非得到總統的命令，或者是經國務卿知道及授權的情形以外，副國務卿或助理國務卿都不能夠直接晉見總統的。這條規定，威爾斯知道得頂清楚。我說：我給他這種史無前例的直接晉見總統的特權，也可說，實在是我的錯誤。因為，據我所知，歷來的副國務卿從沒有一人曾經有過這種特權。

威爾斯的答覆是，他並未覺得在他的講演中，曾經說明什麼外交新政策。他又說，既然經我這麼一說，今後他根本就不再發表演說了。

我說，他的演講都十分精彩。我很希望他能夠多多發表一些支持戰爭的演講；我心裏只想到一件事，就是除非我們已經同意，否則，他的演講中是不應該提到外交新政策的。

直到我們的談話結束，威爾斯總是把這兩種種類完全不同的演講，混淆不清，並且堅持着說，他根本就不再發表任何演講了，這使我感到驚奇。更使我驚奇的是，他說有一次他跟總統談話，總統曾經說，他本人對於戰後問題，已經不打算發表演講了，不過，如果其他的政府官員要發表演講作為一種試探的話，他認為也無所不可。

我說，總統的一番話，以訪威爾斯並沒有告訴過我，而且，這和他剛才說的並不自觉地提到外交新政策的話，根本不相一致。

我們的談話，一度發生過澄清空氣的作用。後來，威爾斯雖然仍舊發表有關外交政策的演講，可是，他在事先，總跟我商量的。不過，他的越級直接晉見總統的習慣，還是不改。因此，我對他並不如對其他僚屬似的信任。

言論見解標新立異



赫爾（左）與威爾斯在總統辦公室。

我覺得，雖然，威爾斯受過外交方面的教育和訓練，可是，他對於許多重要問題和政策，所持的見解，却往往比其他的僚屬還要偏狹和不健全。在歐戰爆發以前，對於美國武裝干涉古巴，以及我們對於墨西哥會議結果的評價，我們兩人的意見，就不一樣。歐戰爆發之後，對於西半球中立區的問題，對於經邱在大西洋會議上所同意向日本致送的最後通牒的話，對日戰爭可能一觸即發，而美國在當時的準備，却比珍珠港事變時還要不如。珍珠港事變之後，我們在里約熱內盧會議上，對於處置阿根廷問題的意見又相左。關於他演講的性質，對於戰後國際安全組織的結構，所持意見，也形同冰炭。

說到這些意見分歧的原因，有時是由於哲學觀點的不同，有時是處理重要問題更實際而有效的方法不同，至於威爾斯的常常不願和我合作，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形，在他任職的後期中，特別嚴重，對於我們這些應以一整體合作的人們是不利的。

若干年以來，我曾經指望威爾斯能以可能最有效的方式，來監督國務院的行政。這是副國務卿份內的事，要這樣，才可以使國務卿有更多的時間致力於政策的擬訂。可是，威爾斯就好像專注意在其他事情上，這樣一來，國務院裏大多數人，對於他的服務成績就很失望了。斯邁丁紐斯出任副國務卿以後，我就要他將國務院澈底改革一番。

關於威爾斯對我的不忠程度，總統本人也開始覺得了。他特別埋怨威爾斯在阿靈頓公墓的演講，事先沒有跟我們中任何一人商量，而且埋怨不止一次。他又對我說，爲了這一次的演講，事後他曾經規勸過威爾斯。有一次，總統對我說，威爾斯曾去看過他，要求給他一個任務派他出去，至於這件任務的性質，總統並沒有提到。威爾斯提出這個要求時，事先也沒有跟我商量，羅斯福總統對於這件事，曾經有很嚴厲的批評。

威氏辭職悄然而去

我很可能到總統面前去，請他在威爾斯和我之間選擇一人，來解決威爾斯的問題。可是，一向我是習慣於和他人合作，而不是和他人處於敵對地位的。當時國務院的任務是艱巨的，威爾斯是一個工作勤奮的人，如果他忠於職務的話，

最好是繼續任用，而不是予以免職。

一九四三年的初夏，總統本人，已經感到國務院裏的情勢是不能長此下去了。他自己斷定，從當時各方面存在的情勢看來，國務院的工作效率，可以因為威爾遜的去職而得到改善。總統和我有一個共同的意見，就是對於威爾遜辭職的事，應當做得使他不感到太難堪。我們同意由總統給他一個流勳大使的名義，派他到南美或蘇聯去担任一件特別任務。當總統請威爾遜辭職時，就把這個建議告訴他，並且向他指出說，他這樣離開國務院，可以不致於引起不適當的感

覺。

威爾遜對於這個提議，沒有給總統一個確定的答覆。在跟總統談話之後，他就立刻跑到我的辦公室來。他表示，他相信總統是由於我的請求才這樣做的。我就把全盤事實告訴給他聽，我說，總統是將全部情形調查清楚以後，才依自己的慎重判斷而行的，至於他是否因為我的建議才這樣做，則在所不計。

然後，我勸他接受總統委派他特殊使命的建議，並且特別提到莫斯科會議。威爾遜忽然以一種最後的口吻說：在那樣的一種旅行裏，是不會有什麼收穫的。他接着便站起來，走到我的辦公桌旁邊，跟我握手告別。從此以後，我就沒有再和他談過話。

不久以後，我就啟程參加魁北克會議。威爾遜也北上緬因。對於總統的建議，他沒有接受，反而是一紙辭呈，寄到白宮去了。

第三十一章 戰後歐洲的藍圖

這位生平不飲酒飛煙的藝人，爲了出席莫斯科外長會議，像戰士一樣再取，披掛白宮用於戰後歐洲的藍圖，躍上了去莫斯科的運糧車。橫理大西洋，越北非，入中東，直叩蘇京的大門。

老將出馬親自飛蘇

大約是魁北克會議（Quebec Conference）的管見（一九四三年八月），一部份蘇聯報紙突然提議召開外長會議，他們認爲英、美、蘇三巨頭，雖因史達林要指揮東線對德大戰，抽身不出，無法覆面，但不妨來個三國外長會議，這點是可以辦得到的。

對這個建議，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同時加以考慮；他們問史達林是不是贊成這個最近將來可以開一次三強外長會議的意見。八月二十四日那天，史達林回答表示首肯，並且建議這次會議不應該限於探討性質，而應該是一種切切實實的準備工作，好讓三國政府對各項問題能作明確的決定。他還建議會中討論問題的範圍，應該先決定一下。

總統跟邱吉爾交換了幾次意見後，到九月六日，給史達林去了第二封電報，裏面說到這個市外長舉行政治軍事性質會議的意見，邱吉爾和他都樂於接受。至於開會地點，邱吉爾首相雖曾建議倫敦或英國其他城市，但總統說他覺得能遠點更好。他提到卡薩布蘭卡、突尼斯，或者西西里也行。他說本要派我出席，但不願要我長途跋涉，所以將派副國務卿威爾斯去。

兩天後，史達林回話，他主張會議地點在莫斯科，會期十月初。九月十一日，總統接受了。

這時，威爾斯遠在緬因州。我獲得可靠情報，知道他給華府的朋友們紛紛去信，說他遭受虐待。我收集了相當數量的這類情報之後，便去見總統，重提派威爾斯去莫斯科的事，說當日他和我曾同意，要威爾斯退出國務院，而不引起大家注意，此法最妙。現在情形不同了。威爾斯既自覺不適於參與我們的計劃，而又遠走緬因，給人寫信訴苦，顯然想盡力教人了解，這位威爾斯是個能為大局犧牲的人。當我和總統論及派威爾斯到莫斯科的計劃時，我同時提醒總統關於威爾斯的談話，便是別想從他這次旅行收穫什麼。我告訴總統，如若他不肯收回那些他自己所發的苛刻評論，同時宣佈效忠國務院和政府的話，現在，我便要反對國務院給他的認可了。

可是，像這樣的事，威爾斯絲毫不理。他繼續自緬因遙遠地批判我和整個國務院。這玩意兒還有一兩位和他關係極密的報紙評論家幫襯下去，說我是蘇聯的敵人，要眼見蘇聯走上絕路。這時我便去見總統，告訴他，如果派威爾斯去，我將堅決反對了。

我對總統說，不管會議在那兒舉行——不問在華府和重慶間的任何地方——我願親自出馬。

總統立刻表示，我願意去可算稱他的心，他把這話重復地重複了兩三遍。他並且很驚奇，因為他知道我一向身體不是很好，年紀也大了——已經快七十二歲的人——象之我又從未乘過飛機。

但還有一件事他不知道，我還有點幽閉恐怖症。這是幾年前的事了，記得那是一個很熱的夜晚，我在火車的臥車裏睡着了，窗戶敞開，列車隆隆穿駛一條長隧道，我剛好醒來，覺得窒息不堪，顯然是炭氣和別人的氣把我悶住的。我想是火車在洞中受阻，才發生那現象，我一直害怕在人多氣悶的地方立足，我想飛機裏和這一樣，便從不敢作凌空之想。但現在，去莫斯科是出席外交約會，這跟帶兵官一樣，不管願不願，都得帶領弟兄們衝上火線，因此，我決定一試。



莫斯科會議中之赫爾（左）與莫洛托夫（右）

確認中國四強地位

我沒有請教我的醫生，也不會諮詢太太，惟自己這樣決定下來。

未去莫斯科前，曾於十月四日及五日和總統有過兩次會商。六日那天，還和他進了一頓午餐。在莫斯科會議席上可能提出的計劃，我們都會一一加以研討。五日的會，我是帶着斯退丁紐斯、海克華斯、鄧恩（Dunn）、馬修斯（Matthews）、巴斯伏斯基（Pavolsky）一道去的，好在白宮和總統演說討論一次。李海上將（Admiral Leahy）當時也在座。

會中，大家同意，我們應盡全力要英、蘇容允中國也參加四強協議的計劃（指四強戰後問題協議的宣言，包括建立國際和平組織。蘇聯會反對中國參與——編者）。我們認為四強理念應該保持，即使這次因而協議不成也在所不惜。中國無論現在或將來，都是極重要的一個因素，爲了她本身和她對英屬印度的影響，我們都不能擠置不顧。

談到德國，總統堅決表示，他贊成把德國分成三個以上的邦，各邦主權完整，只靠藉彼此的郵政、交通、鐵道、關稅等體系，取得聯繫。他還贊成或者把電力也添進去，雖然他認為動力設備應以洲做基礎。他還說新設的德國各邦，應該取消一切軍事活動，這包括軍事訓練和軍備工業。東普魯士該和德國分家，所有德國人民中的危險份子應即驅逐離。

羅斯福要德國分家

總統又把其餘諸人提出的意見拿來研究。他們覺得，劃分德國可能產生許多不良後果，關稅同盟協定實行起來可能行不通，也可能成爲重新統一德國的有力工具。總統說我們有惹起大這些影響，他會放行德國，在那裏唸過書，能說德國話。因此，他認爲比我們更懂得德國。他堅認劃分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話題轉到別的事情上去了。可是不久，總統突然把話拉回來，他說：不過，他熟知德國情形是多年以前的事，也許他對德國的認識並不如他想像那樣多。他然後說

，整個過渡時期，將會是一個試驗與錯誤的時期，我們極可能發現在戰後將立即着手的分計劃，不得不予以放棄。他謂要賠償應取於人力與設備。

總統說，荷蘭或者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各國，要復原似乎不難；至於比利時，却不見得。比王利奧波德的地位風雨飄搖。當時他本人正爲德國的階下囚，英國維持過他，因爲邱吉爾相信君主制可以恢復。可是比利時還存亡亡政府，這個人在這方面可能引出麻煩。比利時又是個山語言不同的華倫族（Walloon）（居比利時南部及中南部，操法國方言——譯者）與佛來芒族（Fleming）（居比利時西北部，用荷蘭語——譯者）衆人工績成的國家。兩族不和，由來已久。關於這一點，總統提到一九四〇年關於德國的研究，裏面建議把亞爾薩斯（Alsace）、洛林（Lorraine）、盧森堡及上述比利時的兩部份結成聯邦。

說到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時，總統說，假使他能和史達林一晤，爲了高度道德的理由，他願向史達林呼籲說，英國和我們，不會爲了波羅的海那幾個國家跟蘇聯動刀槍的。不過，爲了蘇聯自己的利益，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打算，最好蘇聯能够自動宣佈，戰爭結束後二三年，願意在波羅的海各國再來一次公民投票。他帶着評論的口吻說，蘇聯雖然滿意了她上次舉行的公民投票，認爲已得正路結論，可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未必都作如是觀。總統認爲這個意見也同樣適用於東部波蘭。不過，無論如何，荷登界應在所謂寇松線（Curzon Line）略北，稜堡（Lemberg即羅夫J'wov）劃歸波蘭，等到戰爭的風暴一逝，在那裏也應該舉行一次公民投票。

羅斯福總統覺得，可以交波羅的海各出入口——基爾運河和各海峽——各設一個自由區，由國際託管；同時也可爲蘇聯在波斯灣設一個類似的自由區。

鄉間紳士三貓三窟

十月七日上午，耀眼的陽光普照大地，我到華盛頓機場，攀上去莫斯科的座機——有生以來，我的第一次接觸飛機。

我坐的是一架四引擎的運輸機，後面跟着兩架同型的飛機，裏面大半載着海陸軍人員。

上飛機後，海軍方面派邁爾斯中校來檢查養氣裝置，他帶着幾扇太平門對我說，萬一飛機落水，便用得着了。我告訴他，這幾扇門使我想起一位田納西州的老紳士，他帶着三隻貓。一天，朋友去看他，發現大門底下，挖着一個半圓形的洞。

「這做什麼用的哪？」客人問。

「讓貓兒出去。」他回答。

「只消一個洞不就夠了嗎？」

「因為——」老紳士反唇相譏：「我要一聲號令，三軍齊發。」說時十分有勁。

飛機首降西棕灘（West Palm Beach），過喬治亞州上空時，要升到萬呎，我在八千呎時便給戴上了養氣罩。老年人不適作高空飛行，原因是易患心臟病。我却未感不適。

次日歇聖約翰（St. John）在西印度羣島中之波多黎各島。改乘巡洋艦「鳳凰」號，橫渡大西洋赴北非。在卡薩布蘭卡登岸後，墨菲（Robert Murphy）來接，他是我們的外交官，派在北非，處理美國政治事務。我接濟趕赴機場，坐上那架與我們同時橫越大西洋的原機。

這一段飛行，有墨菲相伴，同赴阿爾及爾（Algiers），他把他對北非和義大利局勢的印象作成摘要交給我。在阿爾及爾，會跟艾森豪威爾將軍共餐，他從義大利趕來見我，其為人和信心令我大大感動。我也接受了戴高樂將軍的拜訪，傾談甚久，但沒有得到任何決定。戴高樂比我想像中更為友善，可是他的政治野心，據我看已是快要表面化了。

阿爾及爾到開羅是夜間飛行，躺在架床上，睡得不壞，次日清晨，我們向伊朗的德黑蘭進發了。

英國外相艾登曾電告我，建議去莫斯科前，和我在開羅舉行一次初步會商。我回電說：蘇聯朋友一般說來性頗猜疑，我們這樣做，在他們眼中，也許會認作英、美兩國想預先商妥共同政策，然後跟蘇聯打交道。可是，我到德黑蘭，艾登依他自己的日程，也差不多同時到了，我們見面了。互道寒暄，隨便交換了些見聞，沒有作任何真正的討論。

兩位蘇聯領航員在德黑蘭登機。哈里曼也加入了，他是我們派往蘇聯的新任大使，和我們一道去莫斯科。抵達莫斯科已是十月十八日的下午了，日影西斜，冷氣逼人。機場歡迎羣中，有莫洛托夫，有李維諾夫，我們那位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也在。莫、李二人向我問候，溫情可感。汽車陪着我向美國大使館駛去。

第三十二章 初晤克里姆林宮主人

這位自稱「麥格托夫」學生的國務卿，以及真話又坦白的態度，引起了蘇聯上下一致的讚美。史達林和地談了一個小時，從田納西州的聖誕到三聖會，從身邊取單談到世界和平。神秘的克里姆林宮主人，在方便股在這裏和盟者見面。

笨蛋不識人間情趣

十月十八日晚，三國外長在克里姆林宮聚首，誠懇合作和毅力從公的空氣洋溢會場，我們立即同意會中不發表演說，同意了那些顧問人員和我們一道開會，還有會場和第一次發表的公報。

同大使館後，我看見一封國務院來的電報，裏面提到邱吉爾十月十二日給總統的公文，建議由三國政府首長發表一個憲治德國犯暴行罪者的聯合聲明。電報上說總統願意我考慮一下聲明的文字，準備在莫斯科會議閉幕時發表。電文中還建議說，聲明應該對現在和未來的暴行切切實實加以警告，而不妨礙到我們對過去的犯者可能採取的任何行動；這是爲了免得德國兇犯們因此走極端，踏上歷史上那班走頭無路變節者的舊路，屠殺那些無助的犧牲者。

第一次正式會議定十九日下午召開。在這以前，艾登和莫洛托夫會先後來斯巴索大廈（美大使館址）訪我。

和艾登同來的有英國大使卡爾爵士（他後來任英國駐美大使），後者提及蘇聯想在會中討論軍事，他們特別希望能討論一下第二戰場的問題。我表示願意申述美國的決心：美國一定作戰到底，一定給她的盟國全力支持。我們同意應該把我們的計劃，決策的理由，和獲得的後果通通告訴蘇聯，同時聽取他們希望提出的任何建議。不過有一點得弄清楚，就是在會中不能進行軍事談判。

和莫洛托夫見面時，我第一件事便問到蘇聯的撤在制度。美國記者想把美代表團抵蘇的人間情趣新聞拍出去，而沒



蘇聯初時的克魯姆林宮主人。

，表示贊同。會場的情勢空氣打破過一分鐘之久。

在莫斯科時，我對這件事所抱的主要見解，是想進一步強調一個觀念：強有力的獨裁者，是着征服全球，奴役世界的計劃，和野蠻殘酷的毒辣手法。睥睨不可一世；世人對這種人，必須以威厲方法對付，樹立一個榜樣。我覺得對付世上這羣橫行不法者，應該直捷了當，就像他們直捷了當對付世界上無辜的人民一樣。

有獲准。我問他，像這樣只一般地涉及會議，而內容並沒有觸及會議正式工作的新聞，是不是在禁止之列。莫洛托夫聽後，大罵檢查員「笨蛋」，說他會去查一查。

就在我們剛要出席十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之前，莫洛托夫說，他已把總統給我擬議中關於德國暴行的宣言跟史達林元帥商量過，稍微更動了幾點之後，史達林便同意了。

主張把東條等絞死

會中討論到懲治德國暴行時，蘇聯態度異常強硬；他們在德人手中受害甚烈，所以要求把負責集體屠殺蘇聯人民的德國軍官交付嚴峻而迅速的審判。

艾登却認為一切法律形式都應遵守。

輪到我發表意見時，我說道：

「如果依我辦，我把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以及他們的頭號幫兇通通抓來，交給戰地臨時軍法會議審判，等到次日太陽上山時，那裏便會有一場歷史性事件好看了。」

譯員把我這番話翻譯過去後，莫洛托夫和他的代表團登時大聲叫絕

我這樣想：一旦軸心三國的首腦和他們手下的大頭目給捉住後，我們還得搜出他們的秘密文件，然後像我們要按照國際法審判的樣子，來處理這些證據。不過我不願讓這程序礙及盟軍們的迅速處置。

這意見，我向羅斯福總統提出過，邱吉爾首相和艾登來美訪問時，我也向他們講過。我還在內閣會議中談過好幾次。我坦率表示，我認為德、日、義三國稱首應該一律絞殺。

在我任國務卿期內，這意見並不會遭到確定的反對。等我辭職後，卻被變更了。舉行正式審判的主張得勢了。

不過，若因此便有人認為我反對紐倫堡的審判，卻實非所願。這種審判方針後來定策後，我由衷地加以支持。我只在審判形式的差別上動動腦筋罷了。

欲瞻風采先問家規

在莫斯科旋獨了快一星期後，我對莫洛托夫說：我不曉得常講史達林元帥有些什麼規矩，我不知道該等候多久，或者不是已等太久；總之，我將以能一瞻他「老閻」的丰采為榮，我願意聽由莫洛托夫辦這件事。

艾登抵莫斯科不久，便會見了史達林，這是他事先便佈置好的，我卻不會有此佈置。我的道理是：和我打交道的人應該是莫洛托夫，我不應讓後者以為我想超越他而去找史達林的念頭。

莫洛托夫用很簡短的通知告訴我，史達林定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在克里姆林宮接見我。

我知道擬議中的羅斯福、史達林和邱吉爾的會晤將是談話中主要話題之一。可是，相當大的困難也就發生了。在我未到莫斯科和到了以後這段時期，總統和史達林討論會晤的電報，來往不絕。原則上，雙方同意三巨頭會晤，但會晤地點問題似乎已遭到難以克服的困難。

總統十月十四日的電報中，建議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或東非埃塞俄比亞特利亞（Ethiopia）首邑阿斯馬拉（Assuala）（現由英軍佔領），或土京安哥拉充會晤地點。史達林早就主張在德黑蘭。至於會晤日期，總統建議十一月二十日或二十五日。

十月十九日，史達林回電說，總統所建議以替代德黑蘭的任一地點，他都不能接受。他說這並不是一個安全保障的



特婦女夫諾維李史大美駐聯蘇，日念紀年週五十二命革月十聯蘇爲日七月一十年二四九一
。影合（左）婦夫夫諾維李與，加參黨聯（右）婦夫爾赫，會祝慶大盛行舉節使大任

爾赫待招夫諾維李

問題，這點他倒不担心，而是在當前的攻勢行動中，要和蘇軍保持密切聯絡的問題。他說他的僚屬認爲在這些行動中，他有親自和統帥部保持聯絡的必要。這點在德黑蘭是可以辦到的，因爲那兒與莫斯科間有現成的直達電報電話。

總統在十月二十一日拍給我一份長電，裏面說，他把時間上難免有的差池和他自己在憲法上所負的責任加以研究後，他發覺他不可能去德黑蘭。他的意見是說，一個像德黑蘭這樣懸隔的地方，想在十天當中收到國會送來的立法案並送回原件，都辦不到，他是不能夠去的。德黑蘭的高山使飛機難以進入，飛機在飛進或飛出前，可能要候上幾天。

千言萬語只求一見

總統說，史達林好幾次的覆電中，表明他對羅斯福先生所負的責任沒有認識。因此，他要我把他的一封信轉給史達林，並且當面把總統不願去德黑蘭的既確實又明顯的理由口頭向他解釋，要他了解這並非出諸個人的希求，而是由於憲法上的拘束。

於是他提出伊拉克的巴士拉（Basra）代替德黑蘭。史達林可以從德黑蘭架一條專用電話線到巴士拉，由蘇聯人管理，那麼，史達林仍可與莫斯科直接聯絡。

總統強調一個事實，那便是他願意從美國跑到距離蘇聯國境六百英里的地方去。而這個有著一百五十年歷史的立憲政府仍得他去主持；若不爲此，就使比這個距離還上十倍，爲了會史達林，他也高興一去。在結語中他說，如果因爲幾百英里路教史達林、邱吉爾和他會不成面，後世子孫會把它當成一大憾事的。

我把他這話一五一十對史達林說了，那是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宮，我和他隔着一張上紅色大桌相對面坐的時候，哈里曼大使、包倫（Charles E. Bohlen）和我坐在一起，莫洛托夫和一位譯員則坐在史達林側邊。

當我跨進史達林元帥的大辦公廳時，他也從另一扇門進來，在房間中央迎着我握手，又誠懇又殷勤，他先讓我坐在桌旁的座位上，然後自己坐在對面，背向裏牆。

我們的談話從身邊瑣事談起，交換關於怎樣栽種小麥的意見。我告訴他，在田納西州，種小麥得入土六吋深。這在他看來似乎是開所未聞。我們討論到茶木排。我向他描述，在田納西州，我們怎樣把木料紮成木排，用胡桃木條釘起來

。史達林也向我擺擺道出蘇聯人怎樣用藤來編裝木排。

我告訴史達林我以來莫斯科爲樂，訪問蘇聯是我的宿願，現在畢竟如願以償。我說，在我一生中，參加過很多國際會議，論到款待的優渥和懇切的測到，能比上次由蘇聯政府，特別是莫洛托夫做東道主的簡直沒有。史達林回答說，他不料會聽到這種評語。

棋差一着性命萬條

我說現在這個會議的首要任務之一，是替他與羅斯福、邱吉爾之間的會晤奠定基礎；英美人民，和實際上全球從事反納粹反法西斯之戰的人民，都對這個會晤寄以空前關切。到這時，我才把總統關於會晤地點的電報遞給他。

史達林閱過俄文譯文後，把它交給了莫洛托夫，同時說這件事情須得動腦筋，還有和他的僚屬商量一下的必要。莫洛托夫按閣過後說，重要的軍事行動當時正在進行，政府全體軍政當局都一致認爲史達林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除非會晤地點是一個電訊能常天直接往還的地方。

史達林於是建議頂好把會期延到來春，那時，阿拉斯加的赫爾班克斯（Valhalla）將是個適當的地點。

我說，從國際局勢看，總統和我都深覺這次會晤在所必需；若不能實現，盟國全體人民會深感失望的；因爲我們三國終因這次會晤的影響，而日益合作，而團結一致，進行作戰以及戰後期間的合作。

史達林插嘴說，他原則上並不反對會晤。

我回答說，我知道他現在爲繞腦際的，僅是我們正討論到的那些當前計劃。

他強調說，在他這方面，無所謂固執或成見的問題；但他實在不能了解，一件像國家公文運隔不週到的事，爲什麼會顯得那樣嚴重。而軍事行動上走錯一着，卻不像犯個文法上的錯誤一樣，事後可以改正了事，而是得賠上幾萬條性命的。就他而論，不能在巴士拉開會，完全是因爲實質上佈置的困難，特別是在通訊方面。

史達林說，安全保障問題他毫不擔心。他說這句話之前，哈曼曼大使會對他說，三國領袖可以住在巴士拉後面山中各自的營房里，由本國籍的軍隊衛護，這樣，既可燕居無憂，又可獲充分的安全。

我們談了一點鐘——究其實只有半小時，因為翻譯費時——而開會的時間快到了。我通知史達林說：因為我是莫洛托夫的學生，現在是去上課的時候了。史達林元帥微笑著，並祝我們好運。

討論完畢時，他立起，繞過桌來和我握手，用俄語說了些什麼。他的譯員這時仍在伏案寫完筆錄，他的話白說了。史達林回轉去，聲色俱厲地對他的譯員說（包倫後來告訴我），一個譯員的責任是應該時刻不離左右；我同時也曉得史達林那幾句未譯過來的話，是向我表示，高他與能見到我。

第三十三章 曲終，人散望至重逢

羅斯福和史達林爲了約會的地點鬧僵了，蘇聯右扯左，吾敵吾敵，方才都鬧成了德黑蘭。他從莫斯科會議中溜掉而歸，還帶走一個蘇聯無條件打日本的秘密。這秘密後來變了質，什麼原因？赫爾說：他也不知道。

併吞鄰邦終要吃虧

我見過史達林後的那個會議散會時，我強留莫洛托夫長談，再次強調我會向史達林提出在巴士拉召開三巨頭會議的意見。莫洛托夫問我，那個我說現在就應該解決的國際合作方案是什麼。我於是把我來莫斯科後一再向他申述過的建議覆述給他聽。

莫洛托夫說，關於這些方案，應該成立一個協議。他沉吟片刻後突然又說：

「貴國險一點吃了孤立的虧，是不是！國務卿先生？」

「對，」我答道：「是的，同時貴國也險些吃了孤立的虧，是不是，部長先生？」

莫洛托夫微笑着承認了。

「戰後，」我說：「如果你要遵循孤立主義，併吞鄰邦，是可以辦到的，但你也會吃虧的。我年輕時，認識田納西州一位奉漢，這人生性魯莽，好欺凌他人，有些事上老是獨行其是，結果終生未得一友。」

十月二十八日，總統通知我，說他不久可望在北非「出現」，十一月九日必須自華盛頓動身。（這次是出席羅斯福，邱吉爾，蔣委員長的開幕會議。）他說希望我能按原定日期在十一月七日回國，因爲他實在有在離華盛頓前和我一談

的必要。

他建議說，如果史達林覺得不可能和他一晤，那末史達林應該盡可能飛巴士拉一趟，即使在那兒耽擱一天都成。這一點的重要性高於一切，其餘時間，總統希望史達林能讓莫洛托夫為代表和邱吉爾及他會商。



我次日回答總統說，我滯留莫斯科已較預期為久，我高興在大西洋事邊和他見面；我說，從日增的徵象來看，史達林不會到德黑蘭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時我非常懷疑，非軍人的莫洛托夫是不是會被派去替代人。

兩天後，我不得不給總統去電報，告訴他我這裏有四個團員在來莫斯科途中染上惡性瘧疾，不能回去。如果讓我去北非等他，冒一冒可能害上瘧疾、痢疾，或其他類似疾病的危險，我以為也非所宜，因為我沒有種牛痘，也沒有打防疫針。總統同意展期動身，在美國候我。我於是電告，我甯願乘飛機橫越南大西洋，而不坐巡洋艦。

十月三十日，會議閉幕，這晚，史達林元帥在克里姆林宮喀德爾女皇廳設宴招待與會代表團。外長會議以來，這是我參與的第一次社交盛會。

轉回自莫斯科會場歸來，在機場物見夫人。莫斯科，如今再添上我的拒編應酬，更足以強調此行動的深切。

我的席位設在史達林右首，這倒給我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在宴會那段長時間和接上的餘興裏，跟史達林談話。我盡量利用這時機來討論我們的邦交與將來，因為我知道在我離莫斯科前，這將是最後一次機會了，我說話時總帶圈兒引

他開口。

史達林，頭腦異常圓到，不管討論什麼問題，凡可以使我更了解他現在和將來處境之處，他似乎一點也不會忽略。他和我談話，開頭便說：「你們的會開得很圓滿。」我立刻回答說，這種成功完全得歸功於他，是他叫他的偉大國度採取這個決定性的步驟，和英美共同參與一個以合作為基礎的全球計劃。這話似乎令他高興，整個談話中，他表示他自己無條件贊成一個爲了和平而從事國際軍事、政治及經濟合作的廣大計劃。

我用盡可能最有力的方式，向史達林提出需要他和總統及邱吉爾首相個人間合作與領導的全部理由。可是，談到與他們在巴士拉晤面時，他確切地說出他的結論，他不能在目前軍事緊急局勢下離開。他說我們應該信任他在這方面的真誠。

然後他說他將派莫洛托夫代替他，因為根據蘇聯的法律，莫洛托夫是政府中他的當然指定坐第二把交椅的人，在他自己缺席時，前者是指定的代理人。他問我的看法怎樣。

我隨即答道，如果他認爲環境絕對不容他去，莫洛托夫將是一個好代表。但是總統和我自己覺得，如果史達林能夠出席，那麼，對全世界可以發生一個極大的心理影響。我說，如尚有一線可能，我仍欲懇請他自己出馬。

這話毫無結果，他的決定似乎已成定局。我推測他曾和顧問人員討論過這問題，後者覺得無論是軍事情勢或是會談的必需性，都未到必須要他立刻離開的時候。我決定就此打住，要是再追逼下去，恐怕對我們目標有害無益了。

雅爾達翻腔的諾言

可是接着他却真作了一項極具重要性的談話，叫我又驚又喜；他說，在盟國擊敗德國後，蘇聯將參加擊回日本。他說得的的確確，清清楚楚。

這問題完全由史達林自己提出，雖然他驕爽或許想到我先前跟李維諾夫大使關於這件事談話。他結束時說，我可以用最秘密的方式把這意思通知羅斯福總統。我由衷地謝了他。

史達林關於這一決定的談話，是直截了當的，說時認真有力，事前完全無人要求過，而他也未要索報價。

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時，史達林用書面向總統提供同樣的諾言，可是這次却是總統同意蘇聯在亞洲取得許多領土的讓與的結果，這些領土包括千島羣島和庫頁島的一部份在內。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已辭職，因此我不曉得是那種情勢的變遷，使這些讓與成爲必要——但當日史達林提出諾言要我轉達總統，是沒有附什麼條件的。

筵席上，大家舉盃頌頌。史達林和我喝的是紅葡萄酒，來賓中很多却喜歡喝伏特加。我們的駐莫斯科陸軍武官德安少將 (Major General John R. Dumble) 在席上出了次小風頭，當他回敬史達林爲美軍而舉杯時，他也乾了一盃，預祝英美兩國軍隊有一天和蘇軍在柏林會師。史達林從我的旁座上立起來，繞到德安面前，單獨給了後者一個無上光榮的碰盃。

散席時，史達林領着我和其他兩三個人在隔壁房裏坐了幾分鐘，然後走進另一間電影放映室。他自動開始用最囂張的口吻談起過去關於蘇聯會跟德國單獨媾和的流言。我說凡是熟悉蘇聯人民和他們在這次戰爭裏和德國關係的人，都明白他們不會單獨跟德國講和。他衷心同意這一說法。

我們的車道主於是給我們放映電影，那是一部描寫一九一八年大革命期內，共產黨人在西伯利亞和口是心非的日本人劇戰的片子。該片在一九三八年播製，在莫斯科上映時，曾引起日本大使的強硬抗議。當時他們並無意掩飾所以選這張片子來映的內在目的，而其來之速，恰在史達林向我談到蘇聯將參加對日作戰之後，其意義也便加倍了。

酒酣握別默然無語

電影後是音樂會，我一直聽到終場，這時已是凌晨兩點左右——雖然我們定這天早晨五時起飛回國，我也沒有管。史達林似乎很高興我能留在那裏聽。這回音樂會是由有名的蘇聯音樂家參與演奏的。

分別的常見，我和史達林有著一件動人的經歷。他說了一些慣常的告別辭後，和我握手，用俄語說「再會」，然後走開。走了三四步，他突然轉身破回，和我再拉手，把握良久，默無一語，然後以嚴肅的態度，掉頭走開。我自己想，任何一個美國人，若能具有像史達林這樣的品性和待人接物的方法，在美國是很可能身居高位的。

回到使館，拍了兩封電報給總統。因爲我認爲史達林對日決定的情報十分機密，因此，一半用海軍部的密碼，另一

半則用隨軍的密碼給總統。又因為我認爲英國外務部有時比我想像的更易洩漏重要消息，所以我讓總統把這消息僅備告訴邱吉爾一個人。

至於羅、史、邱三巨頭會晤的計劃，我告訴總統說，史達林的一言一行，十足表示他對四國宣言所揭曉的國際合作新進步運動完全贊成；不過在目前，他決不會讓步，去德黑蘭以外的任何地方跟總統和邱吉爾會晤。總統和史達林間既僵持不下，而我又確信史達林不會去巴士拉，所以，我便以暗示設法使總統再讓一步，同意在德黑蘭開會，總統後來終於同意了。

踏上返國的飛機時，我強烈地覺得在莫斯科已完成若干偉大的工作。我們同意了國際組織的創立，這便是後來的聯合國。蘇聯答應加入並且願意和西方諸強在其他許多方面密切合作。我們同意了對義大利和奧地利的政策。我們設立了歐洲顧問委員會和義大利顧問會議。我們之間對德戰後的處置問題，對法國的態度和戰後應循的經濟政策等，交換了很多意見。同時，會議之外，史達林還答應一俟擊敗希特勒便參加對日之戰。

還有一點是蘇聯從未一提在當時解決戰後疆界的問題，這在去年是深使我們頭痛的事。

我們飛經德黑蘭、開羅、阿爾及爾、馬拉喀什（Marrakesh）、達喀爾（Dakar）、福塔雷森（Fortaleza 巴西）、及波多黎各返國，一路無事。我們飛近巴西時，進入熱帶區，兩小時的困難飛行使若干旅伴困苦不堪，但對我似毫無影響。每落一站，我便和總統互通電報，我知道他和史達林在德黑蘭會晤的決定後，異常高興。

十一月十日抵華盛頓機場，總統來迎，還有國會的代表團和他一道。

我們同赴白宮，次晨交談中，我向總統追述莫斯科會晤的大概。他則對將來的開羅和德黑蘭會議更津津樂道。他似以孩子般的熱切心情期望與史達林的會晤，所以特別急於想獲知我個人對史達林的印象。數小時後，總統已踏上旅程，去參加這兩個具有歷史性的會議了。

第三十四章 巴爾幹的不幸

英蘇商討劃分控制巴爾幹協定，問美國是否同意？這一協定雖設只擬限於作戰時期，但蘇聯已預知其必將造成惡劣的後果，堅決反對。最後，羅斯福總統爲邱吉爾設勸了，未把俄國蘇聯意見，發電英首相表示同意試行三個月。這協定不久即被英蘇子以擴大，更在羅聯進會議時，發生了不幸的後果。

英蘇密議勢力範圍

一九四四年四月，蘇軍開始進入羅馬尼亞的當兒，蘇聯和巴爾幹各國間的關係，站上了我們外交的第一線。

蘇聯進軍的目的在解放呢，抑或是想撈點什麼呢，很多國家的報紙紛紛猜測。同年五月三十日，英大使哈里法克斯突然問我關於美國政府對英蘇間一項協定的看法；這協定中規定蘇聯的勢力可以控有羅馬尼亞，而英國的勢力則可以控有希臘。

他還給我一份英政府的書面照會，裏面問我們對英蘇間的協定有無異議，協定中大體是說雙方同意羅馬尼亞事務應屬蘇聯利益範圍，而希臘事務則應屬英國利益範圍。英蘇間這種諒解只適用於戰時情況，對於三強中任何一強在締結和約時須予運用的權利和責任並不發生影響。

英國外務部說，美國政府充分注意到不使這個協定甚至在外表上染有劃分巴爾幹的勢力範圍的意義。

我告訴哈里法克斯我將加以慎重考慮；接着我又坦白地說：

「一談到這去，我們既然看見大家對目下這種一國政府穩另一國政府侵及巴爾幹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政治、軍事或其他

內政的舉動正攻訐紛紜——將來也一定會有一——的事。那麼，這種放棄我們廣大基本政策宣言，放棄我們的原则和實踐的做法是有問題的。如果有一兩件如你所提議的重要事例違反這些宣言，原則與實踐，參與運行動二國中的任何一國將無任何先例可援，也沒有任何穩定的法則可資準繩，並堅持要求他國政府去遵守。」

事實上，我完全反對任何整個歐洲或部份歐洲勢力範圍的劃分。莫斯科會議中，我曾極力反對這事。自我看來，任何勢力範圍的建立，將無可避免地播下來日糾紛的種子。我覺得勢力範圍這東西，不能不損及我希望實現的國際安全組織的整個權力。

過去或現在，我都不是以均勢或勢力範圍為維持和平方法論者的信徒。

第二天，五月三十一日，邱吉爾（哈里法克斯無疑已將我的談話用電報向他報告過了。）直接給了總統一個電報，極力勸說我們同意那個協定。他強調英國並不希望把巴爾幹劃成若干勢力範圍，這個協諾也只適用於戰時情況，英美兩國政府在擬訂和執行盟國對希臘和羅馬尼亞的政策上的現行合作也將無變更。

美不同意決加阻止

他的電報裏還附有兩則情報，（一）這協定是英國政府向駐倫敦大使古塞夫（Coulson）提議訂立的。（二）蘇聯在五月十八日已通知英國，說他們同意這個建議，但他們在能作最後保證前，希望曉得是不是會和美國政府商量過，和我們不是也同意這種辦法。

羅斯福先生把電報交給我考慮，同時要我擬個覆電。

我的國務院的僚屬贊同我將來向哈里法克斯勳爵所採的態度，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給這樣的協定任何支持，事實上且極盡我們所能加以阻止。

國務院還在準備覆電，邱吉爾首相六月八日又來了個電報，他重述這不牽涉勢力範圍的問題，但他接上說，雖然我們大家行動必須一致，但總得有人出面，蘇聯應該處置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英國應該處置希臘，在他看來這是合理的。希臘在英國戰區內，是英國的老盟友，爲了她，英國在一九四一年犧牲過四萬餘性命。他又說，論到南斯拉夫，情形

也是一樣的真實。

邱吉爾先生說，因為英國一向在希臘獨當一面，而又須小心翼翼免得開罪蘇聯，要不然，這件事他會事前不斷讓總統知道的。他說，巴爾幹的局勢演變得非常快。

他說：如果這個問題不關係到英國的生存，她也會儘可能效法美國在南美的榜樣。爲了「小民」，像這樣關係生存的大問題，她自然得重視其事了。

這個電報的重要性在它拉入了兩個英國前此沒有提過的國家——保加利亞由蘇聯處置，南斯拉夫由英國去處置。這樣一來，對這把一組國家諸聲聯耶寬下和把另一組國家放在英國勢力下的協定，我們的反對似乎比過去更刻不容緩了。

總統在六月十日覆電邱吉爾首相。奧而承認負責任何國家軍事行動的政府——在軍事上，英國負責希臘、蘇聯負責羅馬尼亞——難免會因軍事發展的必需而作若干決定。但我們認爲，類此決定會伸入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自然趨勢，將因英國提出的這個協定而增強。總統中述我們的意見說，儘管邱吉爾先生說協定只限於軍事方面，但英蘇間的歧見，一定會因此持續下去，而巴爾幹也一定會因此走向勢力範圍的劃分了。

總統結語中說，我們寧願見由一個爲巴爾幹而設立的諮詢機構來解決誤會和防止獨佔性勢力範圍的發展。

第二天，六月十一日，首相的覆電到了，又長又有力，裏面說總統的電報對他關懷殊切。他說，如果行動前都得和每人商量一下，那麼這個行動便要軟弱無力了。局勢如有改變，巴爾幹的局勢總是超在前面的。

邱吉爾先生舉了兩個例，都是由於他的超自行動使局勢得以解決——一是復活節日希臘的兵變，另一是行將發生於埃及的核子事件。如當



邱吉爾與英甲申派希區

日英國必須和其他強國商量，同時得準備一套三角或四角的通報制，那末混亂可能早已發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他以詳論的口吻說，在希臘的危機中，總統給他的電報會建奇功。他完全同意總統的意見，結果也就圓滿異常。他於是問，爲什麼要把這極有效率的指揮不用，反交給由一個來自世界各地庸庸碌碌的官員們組成的委員會去處理呢？他進一步問，鑒於他和總統對巴爾幹問題之看法大體一致，爲什麼他們不能把這個指揮權掌握在手呢？

總統接受試行三月

首相最後建議，應給他所倡議的協定來個爲期三月的試行期，然後再由三強加以檢討。

這個電報到達時，我正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赫雪（Hershey）作數日的小憩。總統既未和我商量，也沒有問過國務院，第二天直接回電接受了首相試行三個月之建議，但附了一句話，就是關於戰後的勢力範圍不得建立這一點，務須弄得明明白白。

總統不會把這大行動通知國務院。

就在這一關頭我返華盛頓。我回來的那天（六月十二日），因爲不曉得總統會直接給首相覆過電報，所以我們給了英國大使館一份備忘錄，這是總統在先已批准過的，裏面列舉我們反對英蘇協定的理由。

到六月十七日，我還不曉得總統十二日會給首相去過電報，所以寫了一封信給總統，裏面指出邱吉爾已公開把他的計劃適用於整個巴爾幹區；除了羅馬尼亞和希臘外，他還提及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我還指出他把這件事跟美國在南美的地位相提並論。

我說：「邱吉爾先生對英方理由所作的進一步解釋，並不會說服我們的反對態度，或者使我們覺得有改變一下我們對這個具危險性的建議所持的意見的必要。」

我同時請他注意被我稱作「這件事中極端棘手的一面」——也就是說，這探性質的一種建議，英國不先和我們討論，而在她已經向蘇聯提出，並且等後者問到地是不是跟我們商量過後才來同我們講。

據英國外務部說，整個建議是從艾登對蘇大使古塞夫的偶然談話中產生的。而邱吉爾先生五月三十一日來的那份坦

白的電報却明明白白說，英國會向華大使建議，英蘇之間應就羅馬尼亞和希臘問題來個協議。我說，從邱吉爾的電報裏「可以看出，如果蘇聯不提出我們立場的問題，便簡簡單單地同意了英國的提議，那末，美國政府勢必面對一個締結好了的英蘇間勢力範圍的協定了。」

六月二十八日，一份從我們駐希臘大使麥克威（Lincoln Mac Veigh）那兒來的電報吸引了我的注意。麥克威的使館當時設在開羅，他告訴我們，英國駐希大使會通知他，說美國政府已經同意了這個建議，並附有一項條款，就是該行三個月後應該加以檢討。這是我們第一次知道總統六月十二日的決定。

造成雅爾達的後果

我寫了一封信給總統，第二天送給了他，裏面附了一份麥克威大使的電報抄本，同時問他我們的立場是不是有過什麼改變。

總統在六月三十日答覆了我，簡單得很，只附了幾段或者說幾點電文的摘要，那便是他和邱吉爾先生之間交換的電報。

這裏面有我們在國務院起草致邱吉爾先生的電文，是我六月十七日送給總統的。他在六月二十二日拍給了首相。他在裏面說，關於巴爾幹問題，他頗為憂慮，國務院也是一樣。他坦白地說，英國在已向華勝提出並等後者問到我們是不是贊同後，才把這件事來跟我們商量，對於這種辦法，我們殊覺不安。他說，希望以後處理這樣重要的事情能够避免這種辦法。

首相第二天（六月二十三日）的覆電中說，他不能承認他做錯過什麼事。他說，三個人各居世界的一隅，如果甲對乙有任何建議，那得先讓丙知道，而又想大家得有效合作是辦不到的。他舉了總統自己的一件事為例，總統有次會給「U. J.」去過一份電報，告訴後者和波蘭總理米柯拉茲克（Mikolajczyk）談話的情形，也不會通知過邱吉爾。（總統和邱吉爾偶爾用「U. J.」這個稱呼，來指史達林。「U. J.」是「Uncle Joe」的縮寫。）

羅斯福先生在六月二十六日答覆邱吉爾的電報裏說，自他看來，他們兩個人中的每一人都會無心地在某一方面採取



過獨斷的步驟，而現在他們都同意這是一時權宜之計。他強調地說，重要的是凡影響同盟國作戰結果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應該經常一致才成。他隨即把前次拍給史達林涉於他和米柯拉茲克談話的電文抄了個副本給邱吉爾。

以後的事實充分證明我們對這個在總統默認後正式實現的英蘇協定上所抱的憂慮的正確性。一九四四年十月間，邱吉爾首相和艾登外相去莫斯科看史達林和莫洛托夫時，他們把這個協定益發加以擴大了，甚至按百分比把英蘇兩國在指定的巴爾幹國家中各自應有的相對勢力的程度加以規定。據來自我們駐莫斯科和土京安哥拉大使館的電報說，蘇聯在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將佔七十五對二十五或八十對二十的優勢。而英蘇在南斯拉夫的勢力則秋色平分。後來，蘇聯根據這個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協定，認為英美已對巴爾幹的某些部份，包括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爲她的勢力範圍。這個假定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雅爾達會議中產生了不幸的結果。

第三十五章 和平的播種

「聯合國之父」赫爾從之美會議中看出了全球團結的希望。他開始來製造這道希望，他自各方面取材、選擇、比較、產生了一篇同盟國聯合宣言。羅斯福走去對正在入浴的邱吉爾說：「叫它做聯合宣言罷！」「聯合國」於是呱呱墮地了。

泛美國結適用全體

差不多就在珍珠港事變後，我已開始考慮到採用怎樣一種形式，團結對希特勒及日本作戰各國的問題。當時連和我們協同對軸心作成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國在內，對抗軸心的國家快近三十個了，真是皇皇大觀。

我這個同盟各國應該結成一體的觀念，首先是得自利馬（祕魯京城）和哈瓦那（古巴京城）的兩次西半球會議。也就是說，在危機四伏的時候，必須組織起來團結禦侮。我在思維中把這種政策擴大之，用到世界局勢裏去，原來自從蒙得維的來亞（烏拉圭京城）會議以，我已經常常說，我們的泛美政策是可以適用於全球的。

我要我的旋風研究下一九三八年以來的泛美關係，檢討一下總統對於跟軸心作戰各國的團結問題說過些什麼，同時仔細研究第一次大戰中所循的程序，包括指揮統一的問題和軍事同盟在內。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六，我叫遠東司司長韓密爾頓（Maxwell M. Hamilton）草擬一個宣言，由參與對軸心作戰的各國發表，用這個宣言把大家聯成一氣以求勝利，讓大家委身於我們所揭櫫的基本原則。次日，星期日，用珍珠港事變後一週，我和我的那一羣放蕩們開會，商討這個宣言和另外一個成立最高作戰會議的宣言。

關於由盟國發表宣言，韓密爾頓準備了可供任擇的兩份：一份列入盟國全體，一份則由兩個分開的宣言構成，一個

是由蘇聯以外的全體盟國簽字，因為蘇聯並未和日本作戰，我們很快便決定不用第二份，因為我們相信把蘇聯和其他盟國合在一起，比較上更有力量。經過進一步交換意見後，我邀助理國務卿柏爾、經濟顧問費斯和翰密爾加進入另一室，把剛才建議修改各點併入草稿，再帶回到會議室來。他們照樣做了，半小時後回來。

起草宣言擬定主旨

我們然後同意了後來寫作聯合國宣言的主旨，序言的開端重申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在大西洋憲章中同意過的原則。然後說到與軸心作戰各國「認為他們全體的全球性完全勝利，是保衛生命、自由及獨立所必需，同時也是維護盟國本身領土內以及全球其他各地的人類自由及正義所必需；盟國全體相信他們現在從事的奮鬥，是對抗野蠻和企圖征服世界的兇殘勢力的一種共同防禦。」

接上是列舉同意之點，一共有三項。每一政府保證：一，「使用它的全部資源以反抗曾在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三國（德義日）協定上簽字，和她已開戰或可能開戰的一國政府或數國政府，資源的使用要一直繼續到那個政府或那幾國政府最後失敗為止。」

二，「盡其所能與其他各國合作，以求對抗共同敵人，或其中任何一個敵人的軍事努力和資源的使用，得到充分聯繫。」

三，「如未經互相同意，決不停止敵對行動，或與共同敵人或其其中任一敵人單獨締結停戰協定。」

這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們的立場相較，我覺得我們正向前採取兩個高瞻遠矚，有裨實際的步驟。第一，我們想使跟軸心作戰的國家承受約束，接受大西洋憲章中述過的某些原則，諸如人民有選擇他們本



具有林肯與華盛頓面型，被譽為「聯合國之父」的赫爾。

身政府形式的權利；不求擴展；不得作有關人民所反對之領土變更；貿易和原料的取得；勞工生活水準，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全改進；國際安全；海洋自由來往；和削減軍備等。

我們的政府在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不會努力使同盟各國接受任何作戰目的約束，當日同盟各國政府會同意種種秘密協定，規定如果他們打贏了，領土可加予變更。威爾遜的政府因此被批評得很厲害，因為他不會設法使同盟國家在戰爭目的上取得共同協議。爲了沒有這樣一個協議的存在，他在和會裏的問題便糾葛叢生了。

這次我覺得，同盟國應事先致力於某些原則，至於疆界調整和其他問題的細節則留到以後去解決。如果大家把這些原則宣佈得足夠有力，而又能堅守不渝，那麽細節問題一到要解決時，便會更容易解決。

盟國間這次是不是又有什麼秘密協定，我們自然有知道的必要。當我向他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向我們保證說沒有。

第二，這次我們跟其餘和軸心作戰的各國聯成一個完整的同盟是出諸心願。上次世界大戰中，我們却憤重地稱自己做「參戰國」，而不是一個盟邦。我們現在準備中的宣言是一種同盟性質的。它具有通常軍事同盟的兩項要點，也就是保證以充分的支援和合作從事對抗共同敵人的戰爭，並保證除彼此同意外，不對共同敵人停止敵對行爲。

中國蘇聯名列前茅

從十二月十五日到十九日之間，我和我的僚屬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去完成那份後來成爲聯合國宣言的文件草稿。我們還討論到另外一份設立最高作戰會議的文件，這個會議將由英、美、中、蘇四國政府的首長或代表組成。

邱吉爾首相蒞臨華盛頓。在以後幾天裏，總統親自把我們草擬的聯合宣言和設立最高作戰會議建議兩部份的文字加以討論。邱吉爾先生或者是哈里法克斯大使還把這兩個文件發到倫敦去，徵詢英戰時內閣的意見。

十一月二十七日，總統把他們對這兩篇文字的批評寫給了我。邱吉爾已收到戰時內閣關於聯合宣言的建議，同時總統也說他已加以考慮了。

「我以爲，」他說，「應該力把宗教信仰自由放進那個文件中去。我相信這一點可設法動李維諾夫（蘇聯大使）贊

同。」

他確實保證繼續與軸心作戰這段文字叫蘇聯很爲難。因爲她並沒有跟日本作戰。他建議在文字上小予修改，使這個保證只適用於對付與本宣言簽字國作戰的軸心征服武力。

總統說，他一直在設法，想傾可以不必用聯合宣言和最高作戰會議建議兩份不同文件的辦法。

他建議聯合宣言首段裏列舉的國名應包有全部與軸心作戰的國家，連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也在內。他說，「在我看來，把小國家儘可能列入宣言這份的長名單裏去有特殊的利益。」

總統以爲中國和蘇聯應該從按英文字母排列的名單裏搖出來，跟英、美一道領銜。他評論的口吻說：「我有這樣一個感覺，如果把蘇聯的名字跟在若干實際上貢獻很小的國家後面，她會不高興的。」

一般說來，他最後說：「我切盼能在這篇宣言的文字上作最精密的思索；它將補充大西洋宣言的不足，特別是在我們爲何而戰的真正的這一方面。」

「等到你和哈里法克斯對聯合宣言的意見一致以後，我想我們應該立即召開一個會議，由你自己，哈里法克斯，邱吉爾首相和我參加。」

請來胡適完成簽署

當晚六點鐘，總統便在白宮召開這個四人會議。

會中，總統和邱吉爾顯然對應該設立個最高作戰會議的意見未趨一致。我們的討論大部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因此，我們同意採用一份新的只有聯合宣言的新草案，把最高作戰會議的草案撤開，留到以後再予討論。

會議過後，總統召見蘇大使李維諾夫，給了他一份宣言抄本，要他立刻發交他的政府徵詢意見。

兩天後，李維諾夫到我的辦公室裏來，把他政府建議的三點修正意見交給我。

總統同意將蘇聯所提的修正意見納入宣言。於是我便再送他一份新草案，總統在十二月二十日把它送給了我，旁邊有他手書的批註。

「CH。很好。現在蘇聯和WSC（邱吉爾）已批准了，還差個中國，FDR。讓我們在一月一日公佈罷，這就是說要快。FDR。」

我們立刻把聯合宣言送給列名其中的各國政府，按照總統的要求，我請有關各國政府迅速回覆，好讓這個文件在一月一日發表。我把中國大使胡適請來，親自將送給中國的宣言抄本交給他。

次日，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把聯合宣言的最後定稿送給總統，讓他自己和邱吉爾首相簽署。我想總統可能希望要李維諾夫大使和新任中國外長宋子文在白宮簽字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早上，邱吉爾首相還在白宮入浴，總統去找他，提出把聯合宣言稱為「聯合國宣言」的意見。這位週週聞名的浴者答應了，「聯合國」這個名詞從此呱呱墮地。總統把我們的最後定稿就在白宮裏重抄，好把這個模範的名稱安上去。

大年初一，羅斯福、邱吉爾、李維諾夫和宋子文簽署了這份歷史性的文件。

第二十六章 人亡政息話滄桑

赫爾反對的莫斯科舉筆頭，反對奧迪丁美洲小胡穿軍裝，反對把自己再國路上納粹踏過的殖民地。他說：這是爲了「希望動盪蘇聯也採用流行百半球的合作與不干涉政策。」他在一九二三年起與盟老友羅羅羅一談就辦，做海，無怨無艾，心力交瘁，不幸，老病要他辭職，死得又接去他的老友，這反在他心頭的浪花一個接一個湧來，可是他的希望仍如此堅強，他有力地寫道：「聯合國終久會完全適用於維持和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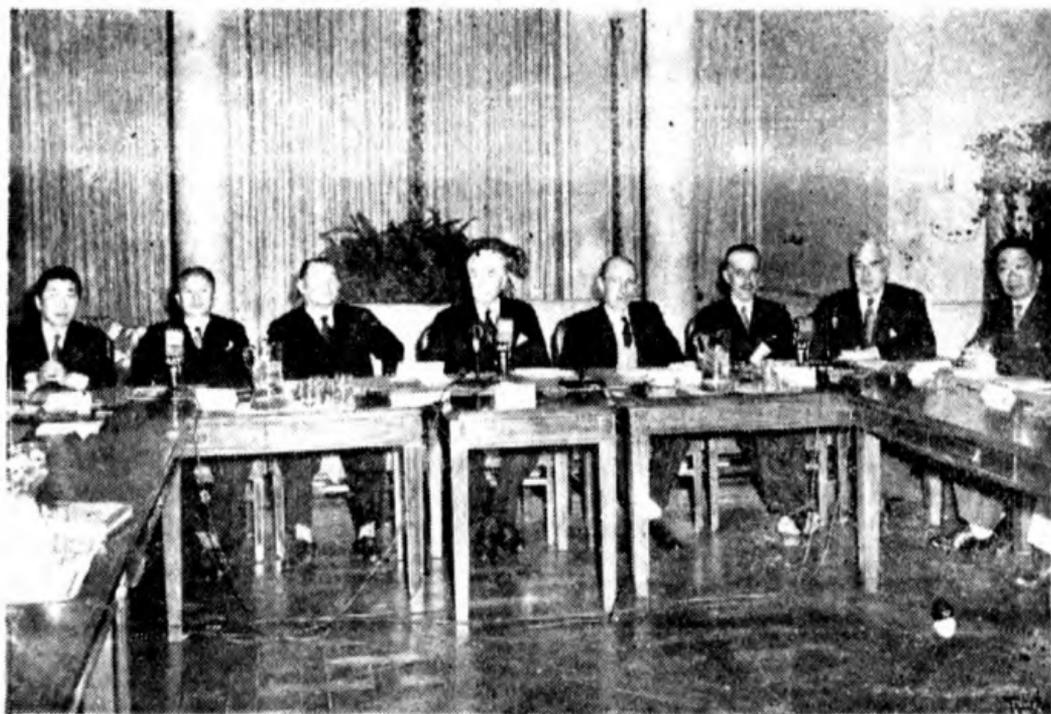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的秋天近了，我和我的僚屬，開始懷疑史達林元帥和他的政府，對合作政策是不是開始另打主意。這個政策是他們在莫斯科會議中同意過的，從那時起，除了極少的例外，他們是遵行著的。

我們漸漸見到若干徵象，說明蘇聯會狼狽地在她和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三國的停戰協定上大撈一下，好從中獲得些帶控制這些國家味兒的東西。就在這個時候，我們才迫而注意安全理事會中蘇聯對表決制度問題的強硬態度。

因此，九月十八日，我拍了個電報給駐莫斯科大使哈里曼。談到顧巴被檢出會議上發生的表決制度問題，我說，這問題，添上哈里曼報告的其他新近發展，未來蘇聯長期政策果將如何已成最重大的疑問了。我接着說我開始懷疑史達林和克里諾林宮是否已決定推翻他們在莫斯科和德里蘭定下的政策，向相反的道路走去。我於是要哈里曼把蘇聯政策的目前趨勢估測一下，讓我們也好決定怎樣去對付這種蘇聯態度上可能有的轉變。

我對哈里曼說，蘇聯對美國的政策爲什麼會發生轉變，她對英國的態度又爲什麼會強硬起來。他對這方面的看法是尤其有助於我的了解的。

次日，哈里曼的覆電到，裏面舉了些例子，有的是關於蘇聯的片面行動，有的是她顯然不願和英美合作。他說我們已有足够的證據來預測：如果世界性的機構已經建立，任何爭端的討論需要全體常任理事國意見一致的話，那麼，不管他們中間是不是有一國牽入這場爭端，凡是蘇聯政府認爲影響到它利益的任何問題，它會隨面無情，阻止安全理事會去



議會議小和界世將二第行舉學像教巴額在國一英美中，日九十二月九年四四九一。 生誕的「國合聯」
 示圖，係圖一切關係有勢局全安後戰之洋平太與議會次該。開議於現出次百國表代國中，
 政行國中，王博勒維顯表代密百國表代國中，王博明若羅使大美駐國中；右坐左自，形情詞致中會而爾赫聯務國考
 。讓世想，斯爾丁退，斯爾亞與，斯克沃里哈，俄赫，王博明若羅使大美駐國中

討論的。蘇聯政府還會主張由蘇聯和其他被捲入爭端的一國或數國來解決，特別是凡跟她鄰邦有關的爭端。

左右開弓 雙弦齊發

哈里曼說他相信史達林同他的重要顧問人員對蘇聯和三強在較大的方面的聯合極為重視，但是他們希望他們的政治軍事實力將使他們對情勢具有操縱自如的力量。他說，蘇聯老百姓無疑地渴望和平，他們相信和英美在戰時滋長的友誼，在戰後會繼續下去的，並可保障持久的和平。

要是史達林對這種聯合不僅物質上同時也是心理上的價值棄而不顧，哈里曼大使不相信在蘇聯人民中，可以不引起極嚴重的關懷。可是，史達林身畔還有有力份子，他們不願在蘇聯利益受影響的地方捨棄獨立行動的權利，並把她的安全完全寄託在一個未經試驗過的世界組織上，跟一羣他們不完全信任的人為伍。他以為史達林喜歡在他的弓上裝兩根弦，同時使用這兩種方法替他的國家謀得和平，並促進他所預見的國家利益，在他看起來，似無矛盾之處。

我離職時，我所主張的對蘇政策是有賴於下列二基礎的。一是：繼續與蘇聯作經常而友好的討論。每有一點都跟他們商量。不和他們「相見」。把那些我們覺得是和平的國際關係成功所繫的原則向他們解釋。如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釋。盡量清楚地向他們指陳：一心一意與他國合作對蘇聯的利益，若和僅在鄰邦佔優勢的小好處比起來是無上的。向他們說明，我們並不反對一個國家宣揚它政府形式的優點，不管它是共產主義也好，民主主義也好。但我們的確反對一國干涉他國的內政。

健康如許我留任，我希望動說蘇聯也採用流行於西半球的合作與不干涉政策，同時我還希望把這政策變成各國公認的真實的世界政策。蘇聯在這個從美洲移植過去的政策下，可以跟她的鄰邦保有最友善的政治關係，最活潑的經濟交易，而避免干涉她鄰邦的內政。

我們對蘇政策第二個前提是：用我們自己的行動當作具體的例子，讓蘇聯知道我們認為蘇聯應採取怎樣的行動。因此我反對我們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意見，說是我們從日本手中得來的太平洋的島嶼應該成為美國的財產。我強烈地感到，所有從砲心掌握下，艱辛地取得的殖民地，應該一律置於聯合國託管制之下，絕無例外。我們不難了解到蘇聯會反對

我們公然取得這些島嶼，但也不難了解蘇聯會因此把這次領土的取得當作她自己類似領土取得可資依據的先例。我們若取了這些島嶼，在要反對他國同樣的舉動時，便無能爲力了。

拉丁美洲不許武裝

從而我同樣反對查普曼特比克（Chapman Teague）條約中的計劃，那是一九四五至三月，我辭職後，在墨西哥城美洲會議上通過的。美洲各共和國在這個條約中實際已同意可用任何數量的武力干涉某些情勢。只要我們一日同意這個有關干涉的新立場，蘇聯也使振振有詞去干涉她的各鄰邦了，而我們要反對她這樣做，理由也較少了。

同樣地，我拒絕同意威爾斯所倡導的計劃，在他辭職前，他提出了個陸軍部與海軍部會同辦理西半球各國武器標準化的計劃。也就是說美國要拉丁美洲各共和國在平時也武裝。我覺得，這個建議武裝他們，然後在某個時候叫他們去打仗的事是既困難又不公平的。原因在我們知道他們不能作戰。他們對我們的援助，如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所供給的，若用在經濟方面和基地的使用上，會要比用在戰場上重要得多。

又因爲阿根廷的民族主義與納粹主義一鼻孔出氣，所以我也反對任何的改變我們的戰時和它不妥協政策的舉動。後來在墨西哥城與舊金山會議裏終於妥協了，阿根廷已被准許加入聯合國。美蘇間本應具有的信心因這一妥協給減少了。

對於蘇聯，總統和我看法相同。我們都知道美蘇邦交之途不會是一條花園錦簇的地毯，但我們都覺得我們能夠和蘇聯共事的。就我記憶所及，我們間對於一個基本前提的意見並無不同，那就是我們必須也足夠和蘇聯政府搞得來。



雅爾達會議，羅諾史合影。

不贊成雅爾達妥協

總統和史達林、邱吉爾舉行雅爾達會議，任何一點都不會同我商量過，就連會中對蘇聯所作的讓步，我也是到它們發表以後才知道的。雅爾達會議是我不在職時羅斯福先生所參加的唯一的國際會議。我對於發生於大國間各項問題的意見巨細無遺地記述在國務院的歷次會議和會談的紀錄上。離職後的我，仍反對變更給予蘇聯的表決權，我反對蘇聯有比我們本國更多的票數。我的看法是：每一大國都普遍地具有這樣一種有力的聲勢和影響而隨時可以絕少困難地獲得它的權益的充分代表權，而無需擁有一票以上的表決權。

我辭職後，在總統來醫院探視我的那些時日裏，連他逝世前五天那次最後的探視在內，他沒有向我說過絲毫他恐怕蘇聯會放棄我們的和平合作運動，或者會阻止或者破壞它的話。他和我自一九三三年以來便共同努力謀求與蘇聯更佳的理解，更不必說到我們的共同致力於和平機權，因此，我深信如果他得到了蘇聯將繼續走着帶有危險性的道路這個結論的話，他會告訴我的。

也許會有人說總統和我給蘇聯的諾言和白紙黑字的盟誓騙住了，我們應該虛得跟蘇聯打交道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得這樣的結論：作為民主國家的美國是不能跟植基於共產主義的政府做朋友的。因此，我們應該採用的政策是一開始便對蘇聯老拳相向。

可是當我們把和莫斯科的關係一一檢討後，不僅我，就連總統也覺得我們所採用的友好政策是充分合理的。一九一七年以來，蘇聯便一直和很多國家角鬥不休，這些國家的拒絕承認她，原因多少在於後者所持的那個從莫斯科指彈毀壞破壞活動的政策。她不斷的努力，才漸漸地增添了承認她的國家的數目，實際上依着所有承認國家的條件，她不得不同意不對她建立邦交的國家施行破壞活動。

她沒有完全放棄這些活動也是有紀錄可考。可是我們的看法認為其他政府可以用逐漸組織，建立並增強起來的全球輿論來反對這種活動，儘可能求其確實地使蘇聯放下這個干涉其他國家事務的政策。自一九三三年我們承認蘇聯起，到一九四三年我們赴莫斯科會議止，這些年間，總統和我曾多次盡力勸說蘇聯政府也是有紀錄可考。我從未錯過一次機會

，向蘇聯指出放棄他們使人不快的干涉政策對他們自己的好處。

總統和我深信，蘇聯成爲聯合國安全組織中擁有全部權利和義務的一員，並和它一心一意合作，對蘇聯顯然是自利之舉，這事實蘇聯的領袖會承認的。我過去如我現在一般的相信，聯合國終久會發達成爲一個又團結，又有力的機構，完完全全適用於維持和平。我們承認困難會有，其中若干員會來自蘇聯，聯合國也必得經歷若干飄搖艱困的時期；但在一九四四年年尾，我們確知我們和跟我們合作的國家已給計劃中的機構奠下了基石，在這個機構裏，蘇聯和我們可以一道工作。

在我們和蘇聯的邦交上，總統和我也經常注意到我們的軍事領袖的有力忠告，這是他們在某些場合中給我們的，他們認爲自他們的軍事觀點看，和蘇聯的友好關係在戰後是極端重要的。

第三十七章 不贊同苛待德國

處理戰敗德國問題，美國內閣發生了不同的意見。國務院和陸軍部提出較寬大的計劃，財長摩根索則提出極苛刻的辦法。魁北克會議中，羅斯福採用了摩根索的計劃，並且還同意繼續向英國施行租借法案，並不附加任何妨害英國。恢復出口貿易的條件。這根本與蘇聯和英國商訂的租借法案無關。魁北克會議的結果使蘇聯大為生氣。

一九四四年九月，羅斯福總統決定和邱吉爾首相在魁北克（Ottawa）會晤，舉行第二次魁北克會議。他問我願不願意陪他去。但是那次會議的目的是以軍事為主，我的身體不大好，頓巴敦橡樹會議又在進行中，所以我告訴他說，我寧願留在華盛頓，不過，如果他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隨時都可以聽候差遣。

會議召開前不久，總統聽從了旁人的話，答應財政部長摩根索（Morgenthau）參加會議。摩根索和他的朋友們已花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擬訂一項苛虐的處置戰後德國的計劃，當時有幾個憤於德國暴行的集團的領袖們，請求羅斯福總統邀請摩根索到魁北克去，主要的目的是讓摩根索提出他的對德計劃。

羅斯福總統本人却傾向於應該給全德國人民一種永誌不忘的教訓的那種意見。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他送了一份很長的備忘錄給陸軍部長史汀生，同時也抄了一份給我。他反對陸軍部為在德國的軍政府官員所草擬的指示手冊。

他說：「那本小冊子給人一種印象，使人覺得未來德國復原的程度



羅斯福出席魁北克會議的摩根索

，也要跟荷蘭或比利時的復原等並齊觀，而德國人民也要儘速恢復他們戰前的產業。

「最要緊的是德國每一個人應該知道這一次德國是戰敗國。但是我并不想讓他們都餓死，譬如說，如果他們需要食物以活命，而他們本身所有者却告不足時，他們可以得到陸軍廚房每日三頓羹湯的供應，保持着他們的健康，而他們一輩子都會記得這種經驗。他們無論就整個或各個而論，都完完全全是戰敗國的事實，必須使他們深深牢記在心裏，那麼他們要想再發動任何新戰爭時，一定會有所猶豫了。」

德國海軍如何處置

關於德國海軍的處置，總統提出一種新的意見。

十月十三日他送給我一份備忘錄說，他同意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完全摧毀德國艦隊的意見，不過有一點他要加以修改。

「過去的摧毀方式，」他說，「是將船駛入海中，使之沉沒。我想在某幾種情形之下，也會有過將投降船隻拆卸為廢金屬而予摧毀的辦法。我不喜歡沉沒以千噸計的銅，那種完全摧毀的方式。」

「最近曾發現一種應用這種船隻的新用途。我們曾經利用沉船構成新港的防浪堤。我們在義大利就做過這種事情，在諾曼第海岸也曾做過。要建築防浪堤可以說是相當省費的方法。我想聯合國應能向同盟國家提出申請，使這些船隻用於一種確定的目的，便是使之沉沒作為防浪堤，改善或建立安全的停泊所。將這船隻用於這種和平的用途，是一種相當好的辦法。」

「在任何這類情形之下，這類船隻應該儘速在指定場所，在一個聯合國委員會的監督之下沉沒。船隻一經沉沒後，實際上就不能再撈起來，恢復其作戰的用途。」

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賀浦金斯來找我。他告訴我，總統希望成立一個「內閣對德國問題委員會。」

九月五日，「內閣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就在我的辦公室裏舉行。賀浦金斯、摩根索、史汀生等都出席參加。我向他們提出我和我的僚屬所準備的備忘錄，日期是九月四日，其中提出內閣委員會可以向總統提出的建議草案。

陸長史汀生對於備忘錄所述各種實際都表示同意，惟其中使德國人民生活水準降至僅足維持生存一節爲例外。財長摩根索對備忘錄也似乎大部份表示同意，但是他顯作肯定表示。九月五日賀浦金斯給我一個便條告訴我，他對於這份文件除了不影響文件內容的文字問題稍有保留而外，都表示贊成。

摩根索計劃被接受

第二天，我們這小羣人又在白宮和總統會商，我將我們九月四日的備忘錄提交總統，並聲明這份備忘錄還沒有獲得內閣委員會其他委員的同意，但是可以作爲討論的基礎。史汀生也提出陸軍部的備忘錄，內容大體上跟我們的備忘錄相同。然而摩根索却提出了財政部苛虐的備忘錄原本。

隨後我們就進行討論，但沒有得到結論。國務院和陸軍部立於一方面，財政部立於另一方面，雙方意見的距離很大，結果自然得不到一致的意見。

因此直到九月十一日，魁北克會議開會時，這問題還懸而未決，我們之間意見一直不能有進一步的調協。我在上面已經提過，摩根索會勸總統讓他出席會議，他的目的就是在會議中向總統及邱吉爾首相提出他那極端的計劃。我當時會請求駐加拿大的美國大使艾索登 (Roy Ashton) 代表我們出席會議。

開會後四天，總統寄一份備忘錄給我，發文日期是九月十五日，他表示他和邱吉爾在大體上已採納了摩根索的意見，這使我非常驚奇。備忘錄上說，總統和首相都覺得要防止德國重整軍備的最好辦法，最重要的莫如魯爾和薩爾兩區的未來處置。過去德國很容易的覓得平時用的冶金，化學和電氣工業改作戰時之用，已使我們有了慘痛的經驗。我們也應記得德國把蘇聯及其他同盟國家的大部份工業都破壞了，受害國家當然有資格遷移他們所需要的機器去修補他們所受的損失，那是很公道的。

備忘錄接着以下又說：

「因此魯爾及薩爾兩區所提及的工業必須使之失去作用，並加以停閉，一般人都認爲這兩個區域應互於世界組織某種圍墻之下，監督這種工業的拆卸，並確保這類工業不能假借某種詭計再度興起。」

「消滅魯爾及薩爾兩區作戰工業的這一方案，是預期待德國在性質上變成以農業爲主的國家。」

「首相和總統對於這個方案都已表示同意。」

總統在附寄備忘錄給我的短簡中說，在他看來，這份方案似乎非常滿人意，他以爲我會贊成不再使魯爾薩爾復興的一般性見解。

我不贊成對德過苛

可是，我不贊成任何「預期待德國在性質上變成以農業爲主的國家」的方案。德國境內有七千萬人民不能靠土地生活，他們不是挨餓，就會增加了旁的國家的負擔。這是一個足以激起德國永世的憎恨的方案。這是因爲有一部人犯了罪，而使全德國人民及其後代子孫都受懲罰。而且不僅德國受到懲罰，而且使大部份歐洲受到處罰。

總統在寄給我的短簡中也說，他已經研究出在德佔領軍駐紮地帶，他原希望取得德國西北部作爲美國佔領區，但是後來他同意邱吉爾讓英國佔領那一部份，而美國佔領德國南部的大部份，包括巴伐利亞在內。

九月十五日，就是總統將包括洛根案計劃及對佔領區決議的備忘錄寄給我的那天，他又多寄了一份備忘錄來，通知我說，應根索在魁北克會話中，在他的對德計劃之外，並提出一項準備給予英國總數六十五億美元信用貸款的建議。由此可見，我們那位財政部長之所以能使邱吉爾附和他那種激烈的對德計劃，其所附交換條件的若干性質。

總統在寄給我的備忘錄中，也提到他已同意在擊敗德國後，對日戰爭仍進行期間，英國可以繼續取得美國價值三十五億元的軍火援助，價值三十億元的非軍火援助。他同意邱吉爾聲明所稱，要是聯合王國還得再盡其自己的責任，那麼那業已收縮得很小的出口貿易，必須重新建立。當然，她依租借法或同類方法，所取得的物品不得輸出或出售以謀取利益；但是，美國對於依租借法交付給英國的供應品，也不應該附加足以妨礙英國恢復出口貿易的任何條件，這是很重要的。

這無異於對我打一悶棍，勢將動搖我們和英國三年來所進行的協商，破壞我們在們一九四二年和英國簽訂的基本租借協定第七條。依照第七條的規定，英國在戰後將採行不歧視的商業政策，就是說，英國在戰後將放棄帝國關稅特惠制

處。

我相信是北克會議這一整個事實發展之使我生氣，在我担任國務卿以來所發生的事件中，無有出其右者。如果摩根索的計劃洩露出去——這是免不了的——不久就洩露出去了，——那就無異說德國將堅決抵抗到底，結果可能使以數千計的美國人喪生。

第三十八章 向總統對陳對德意見

羅斯福總統自魁北克會議回來後，赫爾對於會議中對德問題的決定，向總統對陳述其點
著，總統以為這些等因對英有利，實懸是相反。前坦白指陳這種決定所根據的摩根索計劃未經
有關人員專家商討，亦極輕率；對英貸款不附條件，尤為失策。最後，總統也明確了魁北克會
議對德決策的不很適當了。

摩根索速決策經過

摩根索部長從魁北克回到華盛頓來了，那時總統已先到海德公園去，邱吉爾首相也到那裏去探望他。摩根索對於他在魁北克所完成的工作興奮異常，他帶着他所訂的計劃（將德國改變成以亞漢為主的國家）的最新抄本，匆匆跑來找隨軍部長史汀生和我及其他的人。

九月二十日（一九四四）我在我的辦公室裏召開內閣委員會，檢討這些發展，摩根索，史汀生，財政部顧問懷特（Harry White），陸軍部助理次官麥克勞（MacCloy），國務院的馬修斯（H. Freeman Matthews）都出席參加。總統及邱吉爾先生在魁北克因摩根索的堅持而同意的一切，使得我如受重大打擊，我也并不想掩飾這一點。我認為這對於有關各方面都無異於一幕悲劇。我強調我并不認為這個問題已經了結。

摩根索說，總統邀他到魁北克去，完全出乎他意料以外，他不願意旁人以為是他所主使的。接着他就對這次魁北克會議的經過開始作長篇的解釋。他說，邱吉爾先生起初對於摩根索提議的對德政策，激烈反對。邱首相辯論地問道，是不是把他弄到魁北克來討論那等於將「英國繫在死屍（德國）上的計劃。」

摩根索回頭便對史汀生說，「他比你還更生氣呢，亨利。」史汀生對於摩根索在魁北克進行會商時，關於主要涉下國務院和陸軍部的問題，事前沒有和我們商量過，就擅自處理一節，和我一樣生氣，他也沒有掩飾這生氣的事實。

摩根索說，後來他便和邱吉爾首相私人助理齊雅爾勳爵（Lord Cherwell）討論這個問題，既然把他說服了，齊雅爾再去和邱吉爾討論，便將邱吉爾勳爵轉來。那項建議顯然是以下列理由勸邱吉爾說，英國由此便可以獲得德國的許多銅鐵市場，這樣就可以消滅一個危險的競爭者。摩根索說，當時他們曾幾次想把這種諒解列於許簡，可是沒有一次的措辭是首相所高興的。於是邱吉爾便將他的秘書叫來，將已經同意的諒解口述給他記錄下來，那就是總統和邱吉爾簽字，九月十五日由電拍發回來給我的那份文件。摩根索說那份文件完全是邱吉爾草擬的。

史汀生直截了當的問摩根索說，邱吉爾之接受這種政策，與他熱中於獲得摩根索提議給他的貸款這兩件事之間，是不是有點連帶關係，摩根索回答說不，但是他說，很明白的，這項貸款是這次魁北克會議中，邱吉爾主要的非軍事性質的目標。

摩根索說，第二天艾登外相到了魁北克，他對於總統和邱吉爾對德國問題所獲致的協議非常煩惱。艾登和邱吉爾先生間有過一次激烈的討論，邱吉爾告訴艾登不要在戰時內閣中提出來，要等到他回去以後再提出，因為他要使它獲得通過。

摩根索說他對於艾登的表示反對很驚奇，因為他不久前在倫敦和艾登談話所得的印象遠與此相反。他這種聲明的結果，使我們知道，這位財政部長，甚至在魁北克會議以前，就和英國官員討論到主要上牽涉國務院及陸軍部的問題。

關於貸款方面的情形，摩根索說他發覺總統不假思索的就想接受邱吉爾首相的意見，但是他（摩根索）却堅持應設立委員會擬訂計劃。摩根索本人似乎并不知道要獲得美國的合作，達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的目的，設立這一委員會並沒有什麼效力，但是他覺得這個委員會至少可給我們一個插足的餘地。他說關於英國究竟該採行什麼經濟政策以遠報美國的協助，總統也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謁見總統劉述利害

對摩根索計劃不滿的史汀生



我一點也沒有修飾辭句便說，我非常驚奇，處置這樣重大的問題竟採取這種方式，事前既沒有和政府有關的專家商討，也未顧及我們過去所試行的政策。

總統回到華盛頓後不久，我便到白宮去見他，隨身帶着九月十五日他給我的備忘錄和摩根索的計劃前去。（就是該總統和邱吉爾業已同意的摩根索的計劃要義的九月十五日備忘錄——編者）

我直率的對總統說，摩根索的計劃是毫無理由的，這份計劃的準備並沒有專家，或美國政府或總統手下的主管官員，也沒有其他政府參與。我說，摩根索的計劃除土地以外會消滅德國的一切，使德國人民不得不靠土地生活，也就是說德國人民只有百分之六十可以靠土地維持本身的生活，而其他百分之四十的人只好餓死。

我說關於戰後德國的處置問題，我將記住兩個有決定性的因素，第一須視需要將德國置於盟軍管制之下二十五年或五十年，一直到德國的思想有澈底的改變，擺脫一切納粹主義的理論和幻想，以及日耳曼人是優越的種族，有權統治其他種族的那種荒唐觀念而後止。其次是應使德國人民生活水準居於他們鄰國一般人民生活水準之下，但是也應該依照他們擺脫納粹主義，種族優越感等等，而進向人類權利，個人自由與和平等觀念的程度，比例的逐漸加以提高。

末了，我說我認定英國之所以參加這種極端的飢餓計劃，無非是希望由摩根索的幫忙，取得美國財長所提出的六十五億美元的貸款。我對於貸款這件事，更痛加指責。

我說第一個理由是由美國和英國商談，主要上應該經由國務院進行，因為國務院是政府設立來和外國政府商談的機關，而另一個理由是摩根索的計劃沒有附加什麼條件。我們和英國之間還有無數懸而未決，得設法解決或採取行動的問題，而貸款就可以當做我們和英國談判條件的一部份。摩根索却把這些考慮擱在一邊，或者全加忽視，無條件的奉獻出六十五億美元，既沒有和國務院中的政府之管官員商量過，也沒有和國會中的適當人士討論。

我最後說，撇開其他各方面的嚴格反對不談，如果摩根索的建議被人知道，而總統又是與它有連帶關係的，那麼政

治上會使他遭受很大的損失，因為那時羅斯福正從事一九四四年的總統競選運動。

在這次談話中，總統說的話很少，只表示他自己實際上並未承受摩根索建議的約束。事實上，他似乎並不認識九月十五日他批上了「可，MR. J. WOOD 爲羅斯福姓名之縮寫」的那份備忘錄的破壞性。

那時我又請我國務院的僚屬就我另外再準備一份備忘錄給總統，這份備忘錄發文日期是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一日我親自提交總統，並且和他討論其中主要各點。

英國不願德國破碎

第二天我收到他給我的一份備忘錄，是九月二十九日寫的，日期設在十月一日我和他談話那天以前。由那份備忘錄可以很顯明的看得出來，他並不曉得他在魁北克因摩根索的祈求，已使自己承受了何種程度的約束。

他這樣寫着說：「這種背勢真正的意義，在使英國於戰爭結束時不致完全陷於破產。」這是末了一句話，他特別在旁邊劃上兩道線。

在前一個星期內，報紙上已刊出許多文章，指出魁北克會議所討論的對戰後德國的處置之嚴厲性。這一點給納粹宣傳機構絕妙的宣傳材料，以激勵德國人民作戰到底。

總統在他的備忘錄中說：「有些人對報紙所談的不是他應該說的話，或者根本是不確的事實。」書也沒有想再把德國改變成純粹的農業國家，然而這裏竟有人將這件事洩露於報界，我希望我們能把這人捉住，並予以懲罰。

（後來陸軍部長史汀生告訴我，總統認爲消息是從國務院洩露出去的。史汀生說，他把首先透露這項消息的一位專欄作家的文章給總統看，而這位作家是和財政部的某官員有密切接觸的，這樣才使總統相信消息并不是從國務院或陸軍部洩露出去的。）

總統的備忘錄接着又說：「你知道，戰前德國不僅已建立起戰時工業，而且又建立起充分的外交貿易，以供給重整武裝的充分經費，這保有充足的國際價值，免於在國際上破產。」

「我就是不想眼睜睜的看著大英帝國的財政陷於崩潰，同時德國却建立起潛在的重裝武裝機構，可以在二十年之內又製造一次戰爭，只靠督工廠是不足以防止這種事情發生的。」

「但是誰也不想『完全根絕德國在魯爾和薩爾兩區的工業生產力。』

「然而，在這兩個特別區域實施相當完全的管制是可能的。而且我們不要忘記除魯爾和薩爾以外，德國還有其他區域并在其他『二字之下加線』許多區域和設施，可以生產大量的出口貨。」

提到蘇聯，也順便說到我堅持有關德國任何計劃，都應該徵詢蘇聯政府的意見，他說：

「就蘇聯政府而言，我們的確不知道蘇聯政府心裏轉什麼念頭，但是我們要記得蘇聯人在他們的佔領區內，多少會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若不是我們的抗議偶然也有機會受人注意的話，我們實不能忍受只把我們這一方面的抗議記錄起來的橫勢。」

「我們並不想藉此而中斷或拖延我們和蘇聯政府之間以管制為基礎，或以擬議中的第四章約為基礎而進行的租借談判，然而，這一點對於德國工業的將來並沒有直接關係。」

我既然和總統有了十月一日那次的談話，就不必因總統這份備忘錄再採取什麼行動。然而這份備忘錄却讓我知道了他思路所趨的方向。在他心目中，英國的將來和德國的將來有方向相反的連帶關係。英國在戰後須得恢復舊時的出口貿易，但是總統覺得如果容許德國發展大規模出口貿易，從事競爭的話，英國出口貿易就不能恢復。所以他採納了摩根索的計劃。但是總統却忘記了邱吉爾雖然在協定上簽了字，英國政府實在是最不願意將德國改變成農業國家，因為要是歐洲經濟因為受破碎了的德國的影響而崩潰，那麼英國的生計也會受害。

史汀生說動了總統

總統的備忘錄也明白表現他並不了解他在魁北克所同意的一切的意義。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史汀生部長和總統作了一次談話，史汀生從那次談話中也獲得同樣的結論。他告訴我，因此他將總統九月十五日的備忘錄中的幾句話寫給總統聽，而以下面一段話作結論：「預期在性質上將德國改變成以農業為主的國家。」



史汀生，通知我說，總統聽見這幾句話時，顯然動搖了。總統說，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怎樣會在那份備忘錄上簽了名，他那樣做時顯然未多加思考。

無論如何，在我和總統作了那次的談話後，總統就不再採納歷根索對德國問題的意見了。在我提出九月二十九日那份備忘錄三星期後，他給了我一個答覆，其上所註明的日期是十月二十日，開頭就說：「我想我們對於處置德國，現在就作種種準備固然很好，但是關於這種處置的某些問題，使我相信目前不必亟亟於處理這些問題，其處理在今後一星期，一個月，或幾個月內都可以。我不樂意對於我們還沒有佔領的國家作詳細的計劃。」

他說他同意我們嚴正德國軍政的建議，並建議須將有關飛機的種種處理列入。他說他「衷心同意」我們解散德國納粹黨及其附屬組織與乎廣泛管制通訊、報紙及宣傳的種種建議。他同意我們的建議，對於德國可能的劃分不應作決定，關於我們在經濟方面的目的，他說：「我想和國務院方面討論一些文字上的問題。我在原則上同意這點，但是我不知道它究竟何所指，這一次要的目的大都得看我們和盟軍進入德國後所看見的情形而定——我們現在還沒有到德國呢。」

我和我的僚屬在九月四日及二十九日的備忘錄中所提出的意見，在大體上陸軍部都表示同意，後來英蘇兩國也都表示同意，佔領德國時並有一部份付諸實施。然而，摩根索並不因而不堅持他那種將德國摧毀淨盡的理論，他的意思對於盟國處置德國的方案發生了一種不利的影響，結果產生了一種計劃，按之我辭職前我們國務院所想到的尤其嚴刻。然而，由於佔領德國數年的經驗，再加上我們原來所持德國經濟和歐洲的經濟有相互連帶關係的論據得到確切的證實後，結果英美兩國政府必須認說這種理論。

我和總統十月一日那次談話，是我在他辦公室裏最後一次的重要公務，當時我的健康已瀕於崩潰之境，已有辭職的必要了。

第三十九章 「聯合國」的誕生

亞巴敦保德會中，蘇聯提出十六個蘇維埃共和國要為國際組織的會員的驚人建議，爲美國所拒絕而暫時打消了。「聯合國」的名稱，是美國提出來的，英蘇始而反對終於也告同意了。

蘇聯提出驚人建議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賴巴敦橡樹會議 (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 開會，開會後的第二個星期，蘇聯代表葛羅米柯 (Cromyko) 大使突然出人意料地提出一個嶄新的驚人的建議來討論。

會議指導委員會討論的重心，是那些國家可以算是這個組織的發起會員的問題。蘇聯和我們都說過聯合國和協約國都是會員國，但是雙方的解釋發生了根本的差異。我們的意思是聯合國宣言簽字國都是發起會員國，連同其他沒有對軸心宣戰，而實際上是在協助同盟國作戰的八個國家在內——事實上他們的幫助比之某些同盟國還來得大。這八個國家包括六個拉丁美洲國家、冰島和埃及。蘇聯却說原來簽字於聯合國宣言的二十六個國家才是會員國，他們把後來在宣言上簽字的國家算做協約國，他們不願意將我們在前邊提到的那八個國家包括在內。我們關於後面這一點的討論沒有結果，而且在事實上，會議結束時，這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同時，葛羅米柯大使，事前未作通知，竟對指導委員會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包括的十六個共和國，也應該算做聯合國組織的發起會員國，這除一來蘇聯就可以有十六票表決權，並把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和英國外交官德幹 (Cudogin) (英國代表團團長) 弄得透不過氣來，但是他們也馬上就告訴葛羅米柯說，他的建議要引起很大的困

難。

斯退了紐斯向總統報告這件事時，總統鄭重說道，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美國都不能接受這種建議。他訓示斯退了紐斯去告訴葛羅米柯說，他這種建議將引起無盡的糾紛，要是可以同意十六個蘇聯埃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話，那麼美國要求准許聯邦四十八州加入聯合國，當然也一樣合於邏輯。

斯退了紐斯向我報告這件事的時候，我說我真奇怪竟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建議，我又說，我們美國從事戰後計劃工作的人士中，無論任何人的腦子裏都不曾想到過這樣的問題。末了我說，我要竭力加以反對。

葛羅米柯被勸撤回

八月二十九日，斯退了紐斯將他跟總統以及跟我會談的實情告訴葛羅米柯，並且對他說，照我們看來，他這種建議是不合乎常規的，而且在此時堅持建議的話，可能危及這次會議成功。斯退了紐斯要求葛羅米柯撤回他的建議，如果蘇聯政府心裏有這種意思的話，等到聯合國組織的理事會成立後，再向理事會提出，比較適當些。

葛羅米柯表現得極其合作。他說他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來，只不過想通知美國和英國，蘇聯政府心裏有這種意思而已。他同意在這次會議中不應再提及。但是他表示在其他某種場合之下，蘇聯或許會再提出這個問題。

蘇聯政府心目中有多數會籍問題的這件事，頗令人困擾。我於是邀葛羅米柯於八月三十一日來見我，那次我儘可能坦白的向他聲明，我對於他代表蘇聯政府提出來的建議，有些什麼反對理由。

我確切的對他說，他所提出來的建議簡直是「拆台」，我說，必須對聯合國組織提供領導地位和軍事力量的各大國，不論有一票或若干票表決權，都不難使旁人聽從他們的意見，我還說，美國并不想取得一票以上的表決權，然而我們覺得我們的力量隨時都能支持自己。

當天我們在國務院就這個問題準備了一份公函，以總統的名義寄給史達林。總統批准了，他另外又加了一句話說，美國所採取的立場，不致妨礙聯合國組織成立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到那時聯合國組織可有充分權利討論這個問題。

頓巴致檢樹會議快結束時，蘇聯多數會員籍的問題，葛羅米柯還提出來過一次，其後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辭

羅巴敦會議中，斯退丁紐斯與蘇代表葛羅米

爾（右）及普希列夫（左）談話



職前，都沒有再提過。後來吸菸請求准許自俄羅斯和烏克蘭加入聯合國的事，蘇聯方面並沒有向我提過，這件事是雅爾達會議時總統表示同意的。如果他們向我提起的話，我一定會反對。

總統發表會址意見

我們在歷次討論到這個建議時，都設法保持絕對秘密。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備忘錄中提到時，也只說是X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爆炸性極強，如果洩露出去，勢必因各方的反對壓力而舉世震動，既有害於蘇聯的地位，也不利於會議的情勢。

九月六日斯退丁紐斯和我在白宮會晤總統，討論羅巴敦會議所爭論的主要未決問題，羅斯福先生首先提出將組織地址的問題。照他的意思，新組織的各種構想該在全球各個不同地點開會。

他認為聯合國組織的秘書處可以設在日內瓦，但是理事會和大會都不應在那裏舉行，他認為大會應該每年在一個不同的城市舉行，而理事會或許應該有兩個經常舉行會議的地方，一個設在大西洋中間的亞速爾羣島（Azores）上，而另一個應該設在太平洋當中夏威夷羣島之一島上。他覺得國際法院還是搬回海牙去的好。

總統中述這些意見時很認真，他說他準備和邱吉爾首相討論這些意見，他在那個月內就要到魁北克會晤邱吉爾，舉行第二次魁北克會議。國務院也準備了有關擬議中的亞速爾羣島和夏威夷羣島中的尼湖島（Nihoa）兩地點的地圖和備忘錄，總統預定隨身帶到魁北克去。

羅斯福先生對於聯合國地址問題再三考慮，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向我提及他的意見。他覺得將理事會設在亞速爾羣島

或夏威夷羣島，有與世界隔離的好處。因為他本質上是一個海軍人員，他喜歡在海上，他喜歡在島嶼上縱覽世界的那種遠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間，他就熱望發起各國首腦在一艘戰鬥艦或像亞速爾羣島那樣的島上舉行會議。他認為要是理事會的地址選在海上，那它就不致於受任何國家的壓力。他追述過去的巴黎和會（此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及那大會因在大都市舉行而受到的壓力。他認為國際聯盟在搬到日內瓦去以前設在倫敦時也會受過壓力。

他說，他在實質上想建立的，是約略近乎哥倫比亞那際區域（即美京華盛頓所在地——譯者）的事物。（我總覺得總統表示他對國外事件的意見時，喜歡把美國國內的情形作比喻。最明顯的例子見於他在一九四〇和一九四一年所發表的演說中，當時他作比喻說，核心國家的飛慢自達喀爾飛赴巴西之容易，就好像飛機在美國國內，從這一城市飛到那一城市一般。）

然而，將國際組織分設於世界各地，是不合理的，所以在頓巴敦梭樹會議時，我們並沒有十分認真堅持這種意見。無論如何，這個問題不能由四大國決定，得由未來的聯合國組織全體會員國決定。

「聯合國」名正式接受

我們也和總統討論到蘇聯所建議在聯合國組織之下組織國際空軍，并由理事會指揮一問題。斯退丁紐斯和我解釋美國代表團的立場說，我們應該反對組織國際空軍，而建諸由各國空軍分隊依據聯合基礎，使能於接到通知後能立即出動服務。這個建議和六月十五日總統發表聲明主張不組織國際警備軍一事是一致的。總統同意我們應該堅持本身的立場。斯退丁紐斯對總統示意說，在魁北克會議時邱吉爾或者會提出這個問題來，因為聽說邱吉爾先生頗為蘇聯的建議所動。我們又討論到蘇聯所提不能供給安全組織武裝部隊的各小國，應該供給他們的土地作基地之用一項建議。總統和我都堅決反對這項建議，因為這極端是侵害了小國的主權。我們覺得諸如此類的行動，應該是出於自動的，各小國不應受強迫供給基地。然而蘇聯的意見在頓巴敦梭樹會議建議的條款中，也得到相當程度的認可，這一條款規定成立特別協議，將武裝部隊，「設備」以及其他協助交給安全理事會處理。

這時候我們提到新組織時已經常常稱之為「聯合國」了。我們老早在某幾種草案中，已使用這一名稱。總統覺得這

應該是新組織的名稱。在這個名稱之下，有四十個國家共同作戰，以期獲得成功的結果。這是一個很好的名稱，勝利後，我們仍將在這個名稱之下共同合作。然而當斯退了紐斯在會談上提出這個建議來時，却出乎意料以外地受到蘇聯和英國的反對。葛羅米柯曾試行提出「世界聯合」一名稱。賈德幹說他不相信英國政府特別高興「聯合國」這個名稱，他也不會一度想提出包括「聯合」一辭的名稱。（幾天後，蘇聯和英國都接受了「聯合國」一名稱。）

第四十章 因病辭職

一九四四年九月，羅斯福因健康狀況惡化，提出辭呈，羅斯福曾一度懇切地挽留，但終因醫生的勸告，華府再度懇辭獲准，於同年十一月卅日即去了華盛頓十二年的國務卿的職務。羅斯福接受辭呈前，曾與華府「聯合國之父」，希靈頓仍極力加緊聯合國成立大會。若如辭職後不及五個月，羅斯福總統也積勞過度了。

再謝競選懇請辭職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羅斯福在芝加哥年會中被提名為第四度連任總統的候選人。前此不久，他在白宮裏再度向我建議把我提名做副總統候選人，他說他知道只要我肯接受，我可以被提名。

然而總統知道我不肯接受，因為戰爭正在進行，我已完全給外交事務牽絆住了。我的感覺和一九四〇年時一樣，當時我也曾一再拒絕了同一樣的建議，那是就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做國務卿比做副總統的貢獻來得大一些。我對總統的厚意表示感謝，但是我說，我已經深深埋頭在外交政策中，我覺得沒有方法丟開。

羅斯福第四度連任總統，在一般公眾看來，似乎比第三屆來得自然，連我也有這種感覺。舊傳統業已粉碎，一九四四年我們是在戰時，一九四〇年時的情形不是這樣。總統覺得當時情勢很困難，我們深深陷入其間，他又首當其衝，因此他應該順應普通的要求，出面參加競選。

在隨後的競選運動中，我并未參加。

總統送一份備忘錄給我，發文日期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在備忘錄裏這樣說：「我非常希望你在準備計劃

時，設法安排在現任大選日期間，做兩三次廣播演說，美國需要你清曠的思想，需要能使你的思想追上時代。

赫爾他又說，他選在大選日以前，作一次外交政策演說，要是我肯幫他預備一篇演說稿的話，那他真「永遠感激不盡了」。

我接到他的備忘錄時，我已經準備在那個禮拜天到白宮去晉謁總統，告訴他我更要辭職了。我照原定計劃去拜謁了總統，我帶著極度失望的心情告訴他，這些時我因為費神過度，我發覺我的體力的情況已到了不能不辭職的時候了。我說「兩天之內我就要離開辦公室，還行動到床土去了。」這一輪就遙遙無期了。

總統好像不肯相信我的話，我們有一段臨時的談話，隨後我便離開他的辦公室。在那次或那次以後關於幫他準備一篇演說和我自己做兩篇競選演說的事，我們都沒有提到，但是國務院後來還是幫總統準備了他競選運動中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說。

困於病魔入院休養

三天後，十月二日，就是我七十三歲生日的那天，我離開國務院時病勢已很沉重，我在自己的寓所與消停了十八天，都無法恢復。在這期間我仍的繼續做我的工作，隨後便給送到馬里蘭州的比西斯達海軍醫院。我大約在那裏住了七個月，有時情勢垂危。當此美國國家生命中最嚴重的時期，我在國務院將近十二年——在美國歷史上，比其他任何人的任期還長了一半——極可怕的神經緊張的生活，已使我精力耗盡了。

我剛到醫院，總統就派白宮的醫生麥克奈爾海軍中將（Kees T. McArthur）來說明我的病情使我安心，他告訴我，在相當時間內我就可以復原辦公。據總統就來看我，他花了一小時半的功夫來勸導我不要辭職，他保證我可以



赫爾七十二歲壽辰，吹熄壽星蛋糕之小照

請相當時期的假，過相當時期後再到國務院辦公。

我毫不遲疑立即表示不願不提出我的辭呈。我說我自己最注意的龐大計劃還沒有採行，便被迫辭職，已差不多等於要了我的命了。但是，我又說，我相當將在這種重大的任務，已弄得心力交瘁，我的健康已陷於崩潰之境，我說我不能一方面相當着這樣重任，仍留職守，一方面希望身體康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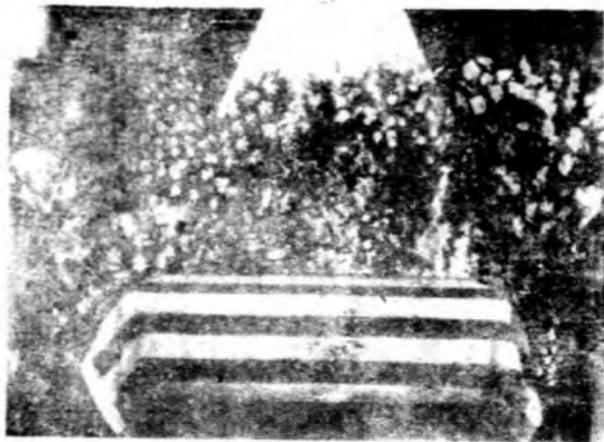
當時總統仍舊很堅持，要我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他現一任期滿以前不辭職。我回答他說，就我個人來說，我非常樂意這樣做，但是我指出如果我這樣做的話，一定立即惹起物議，批評者強調我和國務院的重大責任，一方面對於我的疾病表示同情，一方面他們也會立即堅持要一位國務卿密切注視國務院的工作，因此也會立即轉而批評起總統來了。

但是總統先生當時又要求我至少到選舉後再辭職。對這點我同意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總統給我一封信，開頭便說，我給他的信「擊中了我的要害」，接着又說：「就只是想我們這十二年來的密切的關係就要結束時，也够使人發怒了，不僅因為我們個人的關係始終協調一致，或者是我們的共同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有真實的成就，而且因為我們人覺得不能夠倚賴你的協助和密切地交換意見。

「這一點尤其是真的，因為我們在世界各國友好關係的道路上走了這麼多路，我一直非常盼望借重你的協助，使這樁任務能夠通過當前繁複困難的最後階段，以達於完成。

「你的健康真是我所首先關懷的，我也真的相信你在相當短時期能



羅斯福逝世後，安葬於于日宮地底之墓園。

恢復健康，你可以担任有限的工作，避免國務院瑣屑的事務，因此現在你得將你全部心思放在恢復健康上，朋友們也都要幫助你這樣做。」

接着他又提起他希望我仍留任到總統第四屆任期開始時，他說：

「當然，如果你要我接受你辭去國務卿職務的話，我也可以這樣做。但是我另外有一個辦法，我希望你答應我，到一月廿日我們第三屆任期滿時，再讓你辭職。這樣做有些失之過於重感情，但是如果我們能一起度過第三屆任期，那會給我最大的滿足。這就是說再等兩個月，在這期間，我會隨時來看你，就我們所將碰到的某些問題，徵詢你的意見。」

被譽為聯合國之父

接着總統又提出一個建議，那真是太珍貴了，如果我能接受的話，我真是衷心珍貴它。「附帶地說一說，」他說：「當聯合國組織成立時，我仍懇求你，以『聯合國之父』的資格，出面主持第一次會議。那與你到那時是否仍任國務卿職務并不相干，因為你是全世界貢獻最大努力，促使這偉大的和平計劃成為有結果的事實的人，那是你應得的。從很多方面來說，你對於各國友誼關係有過貢獻，縱然你已經不是在行政當局，你仍可以你道德上的指導協助世界。」

信末，他親切的致候我。

總統的要求出於一片至誠，我深深感動，所以我和診治我的醫生熱切的談了一次話，但是他們給我的答覆是我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不能恢復辦公。因此，我想要我接受總統的建議仍留任到一月二十日的話，對於我自己，對於政府都沒有好處。我覺得任命一位新國務卿接任才對，而且我覺得仍做着有名無實的國務院首長，我對於未曾參加而制訂的外交政策還得負責。

因此十一月二十三日，我答覆總統說，他的信使我深深感動；他對我的健康殷切關懷，及他提到我們十二年來公私兩方面的密切關係，我將終身感激不盡。我再重申我的健康使我不能繼續為公眾服務，實在是我個人的悲劇，我將永遠記得我們之間的友誼與感情關係，然後我說：

「我衷心願望我能如你所望，我的辭呈到一月二十日，而不要在現在生效。我已再度和我的醫生商量過，我的健康

恢復的快，和我擺脫一切煩惱與責任的程度有一定的連帶關係。你很可能知道，在像這樣的時候，要我在留任期間，一直把國務卿的重大責任攬在一邊，那是不可能的。爲了對於你和我長久在一起努力過的目的，對於國家，對於你，對於我自己表示公允起見，我卻覺得我的辭呈現在就應該生效。一

我也再三申述，只要我的健康一恢復，我就完全供他驅使，只要我個人對當前重大問題的解決能有所貢獻。

這次總統接受了我的辭呈，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布，他指派副國務卿布希退丁紐斯接任，我的任期在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宣告結束。

積勞致疾總統逝世

總統到醫院來看過我幾次，面容疲勞而又憔悴——那是在他死前幾個禮拜，我躺在牀上，他對我說：「我應該在你所在的地方。」

我在醫院那長長的七個月期間，我常覺得很開心，因爲我雖驕傲，由種種跡象，我看到我的工作並沒有給人忘記。雅爾達會議時，我接到由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莫洛托夫、艾登和斯退丁紐斯聯名的一個電報，內稱：「這次會議看不到你，我們都非常慚念，在這裏我們寄給你我們深切的關懷，我們希望你很快就復原，讓我們大家仍聚到一起。」

在這裏我有一點要證明的是在雅爾達會議以前和會議期間，總統和旁的人都沒有和我商量過政策的問題。總統在就要動身到雅爾達以前，到醫院來看過我，但是他並沒有和我談到他要跟史達林和邱吉爾所要討論的任何問題，或他可能作的決定。美國政府在後來的其他任何重要會議的目的，事前我也沒有得到通知，只有舊金山會議爲例外。

雅爾達會議兩個月後，四月十二日總統的突然辭世，簡直把我驚呆了。他動身到海德公園前一天，還來看過我。他到海德公園後，再去喬治亞州溫泉，幾天後便在那裏去世。他來看我時，我曾勸他要注意他的健康，我說他應該多休息。他說他第二天要走就是這個緣故。

就我的意見來說，雖然有很多人對於羅斯福總統改革的某一部份或者不表同情，我却覺得他是美國近代史上最偉大

的社會改革家。就他做總司令一節而論，他的成就有勝於其他總司令的成就。就我個人的意見來說，在政治手腕上，當
前沒有他的敵手。自我和他認識以來，他始終熱烈主張個人自由，自由及其他基本權利，以及公民權利所必需的特權。
其中包括正義，法律和秩序的理想。他在見解上是堅強而一貫的，有時是趨於極端的自由主義者。在軍事方面，他所採
取的直接導成勝利的各項步驟，在我們外交方面也是最緊要的，因為這使我們的有了不可缺少的軍事勝利的支持。

第四十一章 美國是和平的動力

美國人不可以爲自己無所畏懼，可以孤身自存。我們這一代在物質文明方面雖然有長足的進步，但在精神文明方面仍多欠缺，甚至呈現退化的現象。我們要保持我們的民主政治，自由制度，提高宗教和道德觀念。我們要時時提防回到孤立主義，我們要有領導各國合作爭取和平、正義、自由與進步的責任。我們要盡大體認政策，以實力支持聯合國組織。

在我這一生七十多年中，我眼看著我們的國家，由大陸國家成長爲世界強國，和全球各個角落都有着利害關係。我們美國今天在力量方面固然強大，在維護和平與人道方面也一樣強大。但是我們既有這樣偉大的力量，也就有與之相等的責任；我們憑藉自己的力量與義務所接受了責任中最重大的，莫過於完全擔當領導各國合作爭取和平、正義自由與進步的責任了。

美國並非無所畏懼

過去有一種爲因襲傳統所支持的、普遍的見解，就是認爲美國無所畏懼；美國的將來是有把握的；美國龐大的資源與組織力足以保證我們的命運；我們的制度將持久不墜，世間沒有比這信念更危險的了。

事實上，我們已經到了應該停下來觀察和靜聽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分析我們自己和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痛切地反省。

這一代的人們是不是比上一代我們的先輩有進步？科學和發明給我們更多更遠心的享受，在這方面我們當然進步得多了，我們有各種各式新的衣襟可穿；新的衣襟可穿；新的娛樂可資消遣；而過去生活享受的財富與工具都比較有限得

很。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情形却愈來愈糟了，我們的教育不普遍，對於自由與法律的精神欠缺熱心，對於公共事業的正當行爲不能維持深切的興趣和必要的明敏的警覺性。

在我看來，過去一代的有組織的社會已經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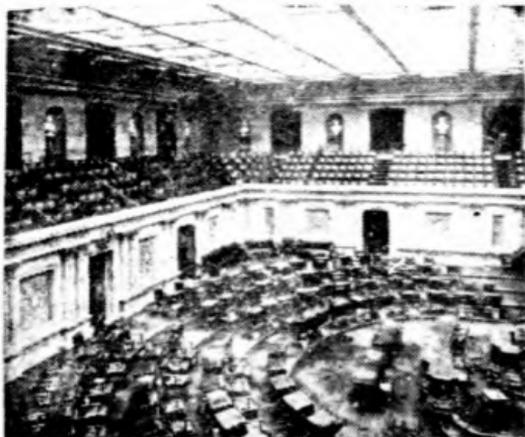
我們已看到整個的國際政治機構崩潰地在退化，整個國際經濟機構大有完全被摧毀之勢，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人類都在衰落中，只想欲頌我們在科學和發明上的進步，卻使人人入夢，那是不能奏效的。除非我們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公民時時獲得情報，而對於公家事務和對私人事務的關懷與注意的程度也約略相等，否則我們處理本國國內問題，和因原子彈的發明而擴大了的和平問題的結果，必會顯然失敗。

維護民主保護自由

民主政治不像大禮拜堂或摩天樓那樣的一個靜止不動的機構。不能希望它一經成立後就能獨立，一代復一代，持久不變。它是一個活的有機體，因此得要人關懷、保護、培育、指導。

我們不能依恃過去的成就，現在的財產。今天我們所享有的一切自由都是抵抗國內或國外的暴君得來的，而其中大多數都是以犧牲和血換取得來的。是願意爲自由而死的男女努力爭取得來的。我們是他們的繼承人，我們必須勇敢地保護我們的遺產。

讓我們推選懂得人民需要的人來做我們的領袖，我們的領袖中，諸如哲學、律師等人，參加公共生活，提倡民主主義，使人民獲得利益。哲學要顧及不關心權利，更不關心地位，或爲任命官吏而任命官吏之權。他甚至和推委迪遜代自己爲總統候選人，確實，我們今天一輩人都帶着同樣



• 美國國會第一會。

的高尚向上的精神。

我們迫切需要更多的宗教，更高的道德作為美國政府的背景。美國思想和行為的宗教與道德基礎也和全世界一般須得加強。除宗教和道德觀念外，沒有什麼更高的文明勢力了。只有這些觀念使人們認識了腐敗與專制，給人們消滅它們的力量時，才能將它們自政府中逐出。

美國各州應孜孜不倦發覺注意保護他們公民的權利。所有公民自由投票的權利應受保護，他們到達投票所的途程上應不受到阻撓。

我認為國會和行政部門在政府方面有遵守嚴格經濟的必要，州、縣與各城市也一樣。這近代世界中，官吏和私人裏面絲毫不關心公私經濟的人，都在日漸增加中。

讓我們儘可能在發展的指點許可範圍內，固守着我們古老的個人進取精神和自由企業的政策。政府對於監督實現保證自由企業使之能真正自由而公平，負擔主要的責任；人民全體應得到保護，但是絕不能脫客那使得我們的國家偉大的精神。

提防孤立主義復活

國會與行政當局對於繼續執行我們以兩黨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實無旁貸。在我任國卿院期間，沒有什麼問題比這一個使我更費力的了。

迄今我仍舊相信應該修正憲法，使參院批准條約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通過的規定，更改為普通大多數。

美國的人民，國會與行政當局必須繼續密切提防，以免美國又回到孤立的危險政策。美國人民在一世代中曾經歷兩次大戰，這應該使所有的美國人相信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重要。國外的戰爭對我們不會不發生影響，我們的幸福，和平與安全跟世界其他國家息息相關，我們不若就是我們想避免也無法避免的領導和合作的責任。

在過去，一直到一九三四年時，我們最違反我們對世界的義務的地方就是經濟的孤立主義。高的關稅並沒有給我帶來繁榮。而在國內却有了無法節省的剩餘物資，在國外却招來其他國家的憎恨。



華盛頓總統曾經說過他反對和其他國家成立永久同盟。雖然他也曾贊助過臨時的同盟。然而我們現在却已成爲聯合國的一員，聯合國的性質就是反侵略的同盟，我們誰也不要因爲有這個同盟的事實存在而驚惶。它並不是反對其他國家的組合；而是反對任何侵略者的同盟，它不是爲戰爭，而是爲爭取和平的同盟。

聯合國組織成立，包括了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在我個人看來，是世界政治發展的一個轉捩點。

但是我們不要希望聯合國會完成一種奇蹟，它的憲章只是人類的工具，稱不上完善；如果要使這個組織發揮有效的功能，得需要時間，忍耐與爭各國的合作精神。

五 強合作保持和平

最重要的還在蘇英中法美五大國的合作。只有這五國間的友好合作，才能產生在保持和平時所需要的諒解與一致的行動。

聯合國應得，也必須獲得美國人民不動搖的支持。我們對於新組織初期會議中的紛爭用不着喪氣。我們不要一方面堅持聯合國沒有作用；因此我們得回復國家主義與孤立主義，而另一方面我們却聲言聯合國證據不夠，因此我們必須以一個世界政府來代替它。

我們應該力主普遍裁軍，並完全由聯合國監督各國確保裁軍的實行。軍備、經濟與軍事的瘋狂競賽，人類文明可以提起公訴；贊成龐大軍備的人是金億萬的男女與兒童的生命和財產當兒戲，但是裁軍應該是比較的，我們絕不能再讓美國在軍事上降低到無能爲力的境地，凡是在我們解釋我們的外交政策時而注視我們的其他國家，也一定能够看得見我們後面的權力的象徵。

我們美國人在表示我們對旁的國家的意見時，也得要有節制，美國民族實在太過於輕易地形容、諷刺、嘲笑旁的國家和他們的統治者，我們忘記我們尖刻的言辭並沒有給埋藏在報紙堆裏；也沒有消失在演說台或廣播中。受咀咒的政府和人民會知道，它們會被一些國家的報紙和廣播一傳說批評，而這些國家或許並不了解我們的批評自由；而且它們妨礙了我們的對外關係。照舊規則來說，我們要警視旁人時，先就應該數十個數字；我却要另加上一條新規則說，我們要警

島旁的國家時，我們先要數十小時或十天，同時我們要設法證實似乎值得咒罵的全部事實真相。

我要美國少數團體特別注意這個規則，無論是種族、國家或宗教團體都應當這樣。憲法的規定在保護全體人民，尤其是少數份子，然而近年來，這些團體中有些因為得力於傳播傳報和宣傳方法的改善，在外交問題上，所發表的言論和所施的壓力，其比例遠過於他們的人數。這些干涉行動的少數份子通常大多數都是由左翼，或反動派極端份子，以及近年移殖來的人民所組成，或受它們的影響；他們是年深日久的煽動者，他們提出來的都是打算損害我們的政治上經濟機構的意見。在多少緊急關頭，在我國政府對外關係需要精細周密的處理，得到一致的和富於進取精神的輿論的支持時，這種團體中就有些出而散佈毒物，否則就是採取破壞行動。

我們必須承認，也得願意担当有關於我們的舊日敵國德國和日本的責任，如果今後數十年中，有對他們實行軍事或其他監督的必要，我們就得願意這樣做，我們不應該有迅速自歐洲或亞洲撤退的觀念。

在另一半球我們要繼續以各種可能的方法發展並擴張我們的睦鄰政策，我們由這種政策所得到的成果，已給我們是够的保證，可以再進一步播植種子，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南方的朋友，都已證明他們確是我們的盟友，只有一個是例外。

我們美國和其他一切國家，尤其是在這次與暴力作殊死戰中的主要盟國。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在最近的將來就要碰到歷代未有的最大危機時，那麼我們無異於欺騙了自己；只要我們有決心統一並鞏固我們的門政治與道德的力量，繼續不斷推進和平、秩序與文明的勢力；那麼我們就會有充分的力量來保持世界永久和平、自由與文明。

各國應該竭盡所能，孜孜不倦彼此勸告，以絕對平等基礎來做同樣的工作，一方面要去却偏見，另一方面要去却侮辱或妥協。

堅強捍護國際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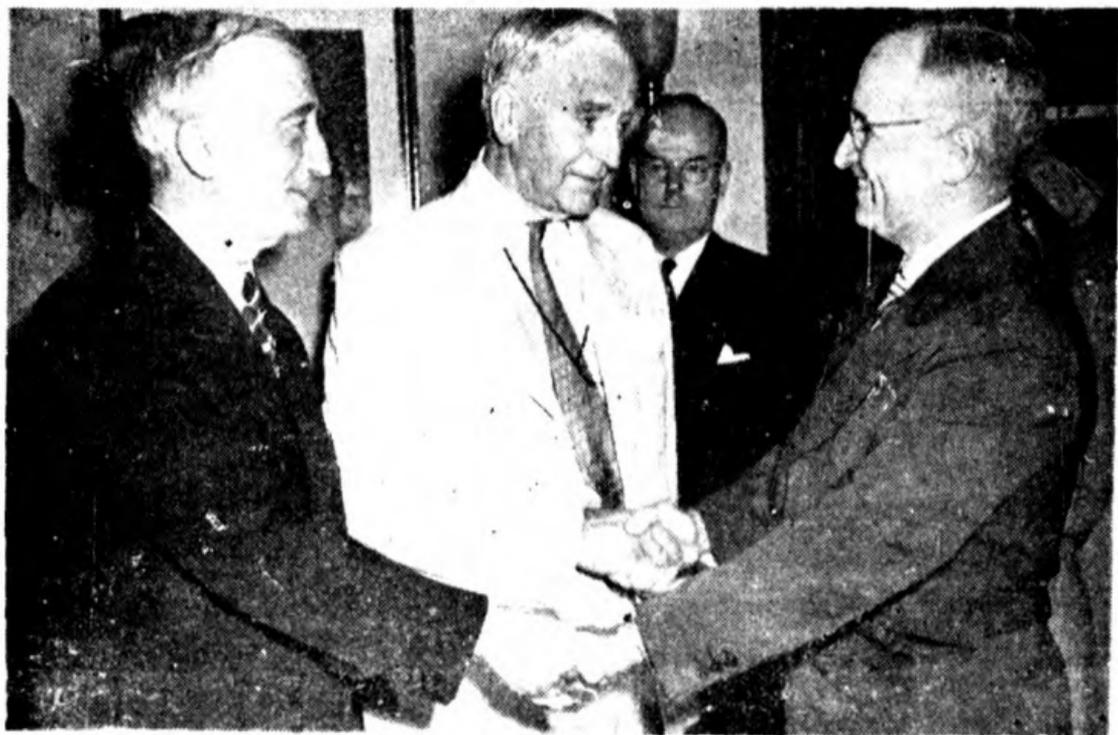
有關國際合作的無黨基本原則，每一條都非常重要，但是各國與人民絕不能推諉的一項最高的責任與義務乃是維護並發展能永久保持和平的國際組織，凡是能忠實履行聯合國會員義務的國家，會發覺他們本身因此而獲得平等的，不可

勝數的利益；不能履行義務的國家的遠程中，將日見荆棘叢生；要是大家都能聯合在一起，使世界組織永恆不墜，並使之發揮真正的效果，那是全體的最大的利益，這可以說是已近乎真理。

我們各大國應該以菲律賓作爲榜樣，在當地人民準備進而自治以後，以至達於獨立的目的時，我們應該常常贊助他們；但是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不要僅僅限於給予忠告，而也應該採取積極的經濟援助，以提高這類民族的生活水準。

我們也要扶助世界與自由活動，今日言論出版自由還沒有普遍於全球，或許還有一半國家在抑壓，檢查，消滅新聞，或加以染色。非河人民彼此之間能完全自由的交換思想，我們不能希望獲得使戰爭成爲不可能的真正的諒解。

這真我結束我的回憶錄說，我深信我們國家的命運還寄於將來，不是在過去。如果我們願意隨時停下來，回顧我們的過去，估量現在，準備將來。那麼我相信我們未來的成就有如無邊無際的草原伸展在我們的眼前；而最高的成就當無過於和旁的國家和諧工作，直到戰爭在我們背上最後的腿膝停止，永恆和平的友誼降臨時爲止。



圖(即)蔣任特務斯情爾，與空軍總司令，後佈宣戰前日週七至下日週十廿八
（左）蔣任特務斯情爾，與空軍總司令，後佈宣戰前日週七至下日週十廿八

！了降投本日

第四十二章 無條件投降的原則

羅斯福總統在卡薩布蘭卡宣佈了無條件投降原則，在我們對軸心及其附庸國的政策，以及對他們未來的計劃上投上一層陰影：一是軸心的抵抗將因此而加強；二是在邏輯上根據此原則，勝利國將僅接收征服國的全部行政和財產，而事實上則盟國并非此計劃。後來英蘇迭次希望解釋「無條件投降」的意義，羅斯福拒絕如此做。但他表示無條件投降並非摧毀敵國人民，並非南北戰爭中的那場內。後來德芬德和修正了這原則，並以此向軸心附庸宣傳，他們可照芬蘭的例子投降，而不提「無條件投降」字樣，羅斯福同意了。

原則提出四座震驚

無條件投降的原則，在我們對軸心及其附庸國的政策，以及對他們未來的計劃上投上一層陰影。

這種原則原來並不在國務院的考慮下，因此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卡薩布蘭卡總統第一次會晤邱吉爾首相的面，對記者招待會提出證明時，我們真和邱吉爾先生一樣的聲音，我聽說首相弄得目瞪口呆。

我和我許多僚屬一般，根本就反對這個原則，原因有兩點，其一是軸心國家可能因此而加強抵抗，作殊死戰，延長了戰爭。

總統本人在卡薩布蘭卡也會就無條件投降一辭作解釋證明，這並不是說要摧毀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人民，而是要結束他們征服其他人民的理論基礎。然而這句短語本身比它的註釋傳播得更廣，它竟成了納粹宣傳者掌握中的武器。

第二個原因是這個原則在邏輯上需得勝利國家準備接收征服國家全國與地方政府的種種，掌管政府全部活動和財產

，而我們和我們的盟友却一點也不想承擔這份龐大的任務。

在國際軍事、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三年多以前，就開始的戰後問題討論中，我們從沒有採用過無條件投降的意見，然而總統在卡薩布蘭卡那樣鄭重聲明這個原則以後，我們除了遵行它，至少在形式遵行它而外，別無辦法。因而不知有多少次使我們煩擾，需要我們去解釋。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末了的時候，英國大使館送來一份備忘錄，通知我們說和平試探已從德國外交部某顯要人員及希特勒的警衛總監希姆萊伸出，通過瑞典，達於英國政府。這種和平試探，事實上是一種聲明說希姆萊準備派軍官一人和納粹黨官員一人來和英國代表會晤，要求獲得「無條件投降」一辭的定義。英國通知我們說，他們想只答覆說是聯合國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并不作進一步的解釋，我們表示贊同。

第二個向我們提起無條件投降的是蘇聯，那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在和哈里曼的談話中提起的。因為有這種提議，我和我的僚屬討論這個問題後，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我向總統提出一份備忘錄，通知他說，莫洛托夫已自動和哈里曼提出「無條件投降」一詞的定義，并且問及美國政府的態度。

不下定義舉例說明

「就我所知道的，」我說，「蘇聯政府認為科加於敵國的投降條件的某些定義無論如何普遍和嚴厲，都可以剝奪去敵人宣傳的便利，結果足以挫弱他們的部隊和人民的士氣。蘇聯既對這個問題發生了興趣，你可否贊成和英蘇兩國政府來一次討論，覓取將科加於各敵國的無條件投





無條件投降：日本投降于密西里艦。

第四十二章 無條件投降的原則

降一辭的某種共同贊成的定義，以爲宣傳之用。

三天後，一月十七日，總統給我一個備忘錄作答，開頭他便說：

「老實說，我並不願意爲了給「無條件投降」下一個定義而舉行一次會談，蘇聯、英國和美國都已同意在未徵詢彼此意見前，絕不談和平，我想在那方面應該各有各的特殊情形。」

他接著又說：

「德國人民會把我聖誕節前的演說聽在心裏——事實上，我們並沒有想到要毀滅德國人民，我們也要他們和歐洲人民一樣一代一代活下去，那當然要他們擺脫現在的征服哲學。我記不得我的話是怎樣說的，但是你可以去看看。」

「其次對於德國的人民和黨聯，也應該告以「無條件投降」最完善的定義的真實意義，那麼最好的例子就是李將軍（一名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主將）向格蘭將軍（一名北方將領）投降的故事，李將軍本想各種條件都談談，格蘭却叫李氏信任他（格蘭）的公正，於是李氏便投降了。李氏隨即提出南部聯邦（南方諸州組織名稱）官吏馬匹的問題，那些馬匹都是屬於私人的，而格蘭對這個問題的處置是告訴李氏，他們應該將馬帶回家鄉去，因爲春節時節他們用得上馬。」

「總統對於美國歷史常識很豐富，他曾下過一番徹底深刻研究的功夫，然而，格蘭亦要求無條件投降，並不是在阿坡馬托克斯（Ampmpton），却是一八六二年，在多爾頓堡壘（Fort Donelson）他接受巴克奈爾將軍（General S. B. Buckner）投降的時候。」

「像上面列舉的那種軼事——總統結論說，「對德國發生的效果比我

們和蘇聯，英國舉行多次會談，來對「無條件投降」一詞下一個定議來得大。無論我們對什麼言語表示了同意，等到某一國要投降時，第一次就得有所修正或更改了。」

一月二十五日我將這份備忘錄內容通知了我們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大使。

蘇芬和談變更原則

幾個禮拜之後，蘇聯本國和芬蘭談判和平時，就更改了無條件投降的原則。

英國外相艾登將蘇聯對芬蘭所提的意見，作為給我們建議的基礎，而藉以軟化無條件投降的原則，這是就軸心小國全體而言。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英國大使哈里法克斯把艾登來的一個電報交給我，是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七日發的，電文上的內容就是這個意思。

五天後我向總統建議，遵照英國的建議，以期對於軸心附庸國家處置比較有彈性。

我在等候總統答覆我的建議時，收到蘇聯大使葛羅米柯的一份備忘錄，表示蘇聯政府同意英國政府和美國國務院所將採取的立場，這就是無條件投降的原則應加以修正。

我還沒有來得及將這件事通知總統，就收到他四月一日給我三月二十五日建議的答覆。「我想這個問題應該分別處理，」他說，「就我個人看來，無論放棄『無條件投降』，或作例外規定，都是錯誤，就事實而言，我們把這種辭語施於誰人呢？顯然的是我們的敵人。」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制訂大西洋憲章時，一九四三年一月舉行卡薩布蘭卡會談時，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芬蘭都是軸心附庸國家，但是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一辭和德國與義大利是我們的敵人的意義并不相同，這四個附庸小國是在德國和義大利壓迫之下成為我們的敵人的。」

「我認為作例外規定是一種錯誤，義大利無條件投降時不也一樣得了很多特權嗎？如果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或芬蘭投降，也應該如此，李將軍向格爾第將軍無條件投降了，但是格爾第立刻就告訴他說，李氏的軍官應該將他們的馬匹帶回家鄉去以事春耕，這是我希望會在國外看到的精神——但是不適用於德國；德國只了解一種語言。F. D.

總統不許擅加解釋

接到總統的答覆後，我各方面倦倦給我的備忘錄中又竭力向我建議要我再和總統討論，經過幾度討論之後，四月四日我又給總統一封信。總統當時正患着很嚴重的支氣管炎，在白宮裏正躺在床上，不能當面和他談話，因此便有以下連綴的信爾往來。

總統第二天答覆。「我澈底了解這個問題，」他說，「但是，我將不惜任何代價防止旁人說無條件投降原則業已放棄，如果我們在特殊事件發生前，就想作任何例外規定，那才是真正的危險。

「我們都知道，要是我們對於今後將適應於任何情形的原則作例外的規定，會發生什麼結果。

「我完全解除了將它應用於特殊情形而外，一定會有不適於投降條件的例外，那是和改變這種原則迥然不同的想法（原文如此）。

「如果蘇英兩國政府向我們作這種勸告，我可以說我們一定和他們表同意，這一點應該向兩國政府都弄清楚，那樣他們就不能指責我們說使蘇聯的軍事工作更加困難，F. D. R.」

然而這個問題并未止於此，只不過兩天後，這個問題又被另一方面，軍事方面鄭重提出。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我當時在倫敦的副國務卿斯退丁紐斯來了一個電報，轉達艾森豪威爾將軍和他的參謀長史密斯（Trotter Smith）的建議。斯退丁紐斯說兩位將軍都向他提出這個問題，表示他們考慮到的意見是「無條件投降」一辭應加以澄清，應該宣佈處置戰敗德國應該根據的原則。

我將電報轉送給總統後，當時他因新病初愈在南卡羅來納州喬治城巴魯區（Bernard M. Baruch）私邸中養息。

四月十五日，我收到總統一個短函，他於提及斯退丁紐斯四月十三日的電報後說：「對此一類問題的任何答覆，都須得我的批准再送出。」

四月十七日我拍了一個電報給我立說斯，要他通知有關各方面，總統希望沒有得到他的認可前，對這個問題不再加

考慮。

暫不提無條件投降

五月七日總統已經回到華盛頓，三天後，我就這問題提交他一份備忘錄。我說國務院方面接到英國大使館的通知說，英國政府認為盟方對軸心附庸國的宣傳有加强的必要，特別提及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在今後的宣傳中要略去「無條件投降」一辭，以期達到加強對德抵抗，獲得最大軍事利益。一般原則的放棄終會避免。

「提出這個建議來時，」我說，「英國大使館還指出蘇聯政府沒有把這個原則應用於芬蘭，如果羅馬尼亞人依照建議他們投降的條件而妥協的話，那也可以同樣的適用於羅馬尼亞。這是假定宣傳機構在準備指令時，也將顧及這些理由的話。至於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國務院覺得此時在宣傳工作方面，取積極行動，事實上定有利益可獲。因此要是你能表示你是否贊同我們和英國及蘇聯採取平行行動，為宣傳作用而准許某種限度的自由，并使一放了解所謂例外者乃在宣傳時不提到這個名詞，當然并非公開取消這個可適用於各國的原則，那我一定非常滿意。」

總統在我的備忘錄上批上了「O.K.」，可，「F.D.R.」等字樣退還給我。

三大盟國的領袖雖然分別在不同的時間發表公開聲明，軟化無條件投降的解釋，然而並未促成德國的及早投降，納粹宣傳機構直到最後還是繼續強調無條件投降的嚴厲解釋。

如果無條件投降的原則沒有發表，或者由聯合國同意提出較寬大的條件，那麼德國是否已在更早一些時候就投降，至今還是一個疑問。

無論如何，無條件投降繼續應用於德國確有一種影響，那就是未來德國的宣傳機構不能像一九二〇年以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年以後的納粹一般，揚言德國的軍隊並沒有失敗，德國之所以投降是因為後方民政當局和人民的軟弱所致。

至於我們東方的敵人（日本）在三個月後，在他們明白無條件投降的原則實施時也可以有條件時，他們投降。



編後記

本書翻譯工作，係由鍾珮、任熙雅、武月卿、程淑英、江德成、李廉君、余利民諸君分任，以隨譯隨付報版刊載，並即排印單行本，時間極爲匆促，訛誤容有未免，尙希讀者諸君不吝教正。

本書插圖，係鄧炳森君自本報資料室積存圖片中精心選擇，力求配合文字，足爲本書生色。

本書原分三十六章，每六章後爲一篇「星期專稿」，茲爲便利翻閱起見，每一「星期專稿」均併入作爲一章。本書中之第七、十四、廿一、廿八、卅五、四十二各章，原均爲「星期專稿」，合應註明。

本書標題及分段小題，暨每頁前之摘要，均係編者摭加，特此聲明。
承胡適先生爲本書作序，深表謝忱！

中央日報 編輯部 謹誌

15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日初版（一—五〇〇〇）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廿五日再版（五〇〇〇—一〇〇〇〇）

赫爾回憶錄

定價

元

版權
所有

著者 赫爾 (Cordell Hull)

編譯者 南京中央日報編輯部

印刷者 南京中央日報社

南京中山路三十九號

發行者 南京中央日報社

南京中山路三十九號

及各地方分銷處

7